

# 火的考验：



## 美国南北战争 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 詹姆斯·M·麦克弗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K712.43

M281

:7

#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 著

刘世龙 李杏贵 任小波 译

周治淮 陈英明

白自然 冷 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James M. Mc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根据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82年版本翻译

HUǒ DE KǎO YÀN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刘世龙 李杏贵 任小波

周治淮 陈英明

译

白自然 冷 杉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03-4/K·290

---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9 1/32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4 千

印数 1200 册

印张 13 1/2

定价：12.10 元

## 目 录

第十八章	北部失望之冬·····	1
第十九章	第二个转折点：葛底斯堡、维克斯堡 和查塔努加·····	24
第二十章	1863年的战争问题与政治·····	50
第二十一章	后方·····	81
第二十二章	战时重建与自由民·····	107
第二十三章	军事僵持，1864年·····	132
第二十四章	第三个转折点：林肯再次当选·····	163
第二十五章	邦联的末日·····	188

### 第三编 南部重建

第二十六章	和平问题·····	225
第二十七章	“激进”式重建的起源·····	251
第二十八章	重建与弹劾危机·····	267
第二十九章	第一届格兰特政府·····	287
第三十章	南部问题，1869年—1872年·····	307
第三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的重建·····	332
第三十二章	从重建后退·····	357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	378
结 束 语	·····	396
附 注	·····	400



## 第十八章 北部失望之冬

###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

1862年11月，新任命的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在弗吉尼亚州似已作好战斗准备，去执行林肯为取得军事胜利所制定的方案——艰苦行军和艰苦作战。伯恩赛德建议，与其把易遭袭击的奥兰治—亚历山大铁路当作他的供应线，继续从沃伦顿南进，倒不如从那个方向发动牵制敌人的佯攻，同时把大部分军队调往法尔茅斯。法尔茅斯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拉帕汉诺克河对岸，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水，还有一条短距离的安全的铁路线提供供给，而且可以由此渡河，直捣里士满。伯恩赛德行动迅速，他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内就推进了40英里，抵达法尔茅斯；到11月19日，全军都已到达。这次调兵的速度之快，颇使罗伯特·李感到意外，有好几天，李都不知道伯恩赛德的去向。好像就这么一次，北军的进军瞒过了叛军。

但是，当联邦军到达法尔茅斯时，形势开始变得不妙起来。伯恩赛德下令用来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架桥的浮舟莫名其妙地出了差错。（浮舟是若干依次抛锚的平底船，用于在水深的江面上架浮桥。）由于哈勒克和几个工兵军官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浮舟直到11月底才抵达，这就使罗伯特·李能够不等联邦军架好桥，就把兵力集结于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的高地上。联邦军对下游14英里的河段进行武力侦察；他们发现，邦联军兵力太强大，在那里不能避敌渡河。所以伯恩赛德只得着手制定就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渡河的计划。12月11日，天还没有亮，工兵们就在大雾的掩护下开

始放置浮舟。大雾消散后，埋伏在沿岸房屋里的叛军狙击手开火一一射杀这些工兵。联邦军炮兵轰击了小镇，但狙击手们仍在残垣断壁中开火。最后，身穿蓝色军装的三个团的志愿兵乘船横渡，发动了一次进攻，在逐街的巷战中赶跑了狙击手。浮桥已架好，大军于次日渡河，只等12月13日，大雾一散就发动进攻。

罗伯特·李把他的74000人部署在小镇西面和南面绵亘七英里的山头上。左边离河不远处是沼泽地，而且它的中部地带险峻而崎岖不平，联邦军无法从这些地点发动进攻。因此，邦联军的主要防御工事就集中在小镇正后方的马赖高地和南面三英里处的普罗斯佩克特山，前者由朗斯特里特的军团据守，后者由杰克逊据守。联邦部队共113000人，编为三个“大师”，每个大师下辖两个军。左路大师由威廉·B·富兰克林指挥，计划攻击杰克逊的阵地。右路大师由埃德温·V·萨姆纳指挥，准备进攻马赖高地。胡克的中路大师是预备队，其任务是进行突破。

联邦军首先攻击杰克逊的阵地。乔治·戈登·米德指挥的穿蓝军装的师一度突破叛军防线，而后又在猛烈的反击下退却。如有适当的支援，米德极有可能突破邦联军的右翼。尽管伯恩赛德在下午三点左右曾几次下达紧急命令，要富兰克林全力以赴，再次发动进攻，但富兰克林却从未想过要把他指挥的50000兵力投入一半以上去作战。

由于右翼毫无希望获胜，富兰克林又在联邦军的左翼失败，于是北军在那天取胜的微弱希望便成画饼了。在马赖高地下面，有一条凹陷的道路，朗斯特里特的步兵就沿着这条路，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高地上的炮兵控制着一片半英里宽的空旷地带，这是联邦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正如朗斯特里特的一位军官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旦向那片地开火，就连一只小鸡也休想活下来。”身穿蓝军装的北军士兵并非小鸡，他们向马赖高地发起了七次英勇

的进攻，虽然一无所获。一位新闻记者写道：“要使士兵们表现得更加英勇，或者使将军们显得缺乏判断力，那是人性难以办到的。”一位来自纽约的步兵说道：“我们看来想把地狱拿到手。”<sup>1</sup>

12月初令人舒畅的夜幕终于降临时，石墙前面的几英亩地里到处都是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联邦军伤亡12600人，邦联军伤亡不足5000人，什么目的也未达到。当寒夜里伤兵们正忍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时，伯恩赛德则在为其流血不止的士兵而伤心不已，并为富兰克林未能在联邦军左翼开拓其良好的开端而愤慨。伯恩赛德曾打算在第二天亲率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师去冲锋，但由于部下的劝阻，他放弃了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停火间隙，埋葬了死者之后，联邦军于12月15日夜撤过了河。

## 北部的信心出现危机

南部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后松了一口气，而北部的失望情绪变得尖锐起来。《哈泼周刊》大声疾呼，人民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们沉默地和坚强地承受着愚蠢、背叛、失败、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亲友和资产收入的丧失。几乎每一种痛苦都能使一个勇敢的人倍受折磨；但是，人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容忍这次发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屠杀重演。”军需兵司令蒙哥马利·梅格斯写道：“整个国家不知不觉地已精疲力竭，信心和希望正在破灭。”就连《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约瑟夫·梅迪尔这样坚强的激进分子都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他担心：叛军不会败北，“在1863年势将达成停战协定”。林肯获悉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的结局后，曾对一个同事说：“要是还有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那末，我现在就已身历其境了。”<sup>2</sup>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这把林肯的地狱弄得更糟了。在12月的那些惨淡的日子里，军事上的失败已成为



华盛顿各种不满和谣言的催化剂。共和党对政府处理问题的作法表示不满，主要集中在国务卿西沃德身上。在南部脱离联邦的1860年—1861年的冬天，西沃德曾力图妥协，因而不为激进派所信赖。人们认为，他是内阁中的“魔鬼”，是只“看不见的手”。他对林肯所施加的保守影响危害了总统那充满活力的领导，尤其在有关奴隶制和军队司令官的任命等问题上。在12月16日和17日的两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除一人外，都投票要求改组内阁，以确保“目的与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这个针对西沃德的决议是在财政部长蔡斯的鼓动下通过的。蔡斯是西沃德在内阁中的主要对手，他与激进的参议员们过从甚密。参议员们的这个谋划如获成功，那末他们的权力就会增大。

此事是迄今为止对林肯的领导地位的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给最高层造成了一次组织机构的危机。林肯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屈从”于参议院的要求，那么就会失去对政府的控制。这样，美国就会更接近于议会制政府。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泄漏出去后，华盛顿流传着新的谣言：全体内阁成员，甚至包括林肯本人，都将辞职。这次危机使总统感到“十分震惊”。林肯把对西沃德的“有害影响”的指控看作是一个“可笑的谎言”。他曾对一位朋友倾吐真言道：“这些人希望得到什么呢？……他们希望摆脱我，而我有时多半是愿意满足他们的。……自从昨夜得知秘密会议的情况后，我深感痛心，平生还没有哪件事使我更痛心的。……我们现在濒于解体。我看上帝似乎在同我们作对，我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sup>3</sup>

当林肯于12月19日会见一个由八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他已经重新平静下来。西沃德为了摆脱压力，已经递了辞呈，但林肯并未透露消息。他未加置评地聆听参议员们的讲话。他们“认为西沃德对指导战争并不热心，而且似乎把他当作我们遭到失败的真正根源”。总统并未表态，只是邀请代表团次日再来，进一步讨

论。次日，这些参议员再次来访，林肯在出色的表演中，施展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湛艺术。参议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已把除西沃德以外的全体阁员都叫到场。林肯发表了一篇既得体又强硬的讲话。他说，他总是尽可能地就重要决定与内阁磋商，然而决定还是由他独自作出的；内阁成员虽然有时存有异议，但政策一经决定，就为全体阁员所支持；还说西沃德是位重要的政府成员。随后，总统转过身去，面向内阁成员，请他们证实。大家的目光注视着蔡斯，他被十分巧妙地推到这种尴尬的地位上。蔡斯曾经对这些参议员说，西沃德对内阁的不和谐负有责任。现在，他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和参议员们一起丢脸；但是，他如果再次断言，又会失去总统对他的信任。蔡斯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对林肯的讲话表示赞同，但为了挽回面子，又遗憾地表示，对重大的决议，内阁并未更充分地讨论。参议员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泄气，并对蔡斯表示失望。他们知道，林肯已经获胜。

次日，深陷窘境的蔡斯来到白宫递交辞呈。总统迫不急待地说：“交给我吧。”蔡斯不情愿地交出辞职信。林肯阅毕，得意洋洋地说：“这下子可是快刀斩乱麻了。我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再也不能既让西沃德辞职，又保住蔡斯了。林肯用一个古典的隐喻来形容他的胜利：“现在我可以运用自如了，在我的两个口袋里各装着一个大亨。”总统拒绝了两个辞呈；内阁依然如故，危机过去了。阴沉的政治气氛顿时一扫而光。这场交锋对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林肯这次证实了自己是主人。他这样处理了这件事而没有得罪任何人，这在政治艺术上是一个有益的教训。<sup>4</sup>

## 西线的战争：维克斯堡

从西线传来的军事消息也不那么鼓舞人心，无法抵消东线的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结束后在北部引起的低落情绪。1862年进攻肯塔基失败后，邦联军改组了西线指挥机构。约瑟夫·约翰斯顿于11月来到查塔努加，全面负责西部军区的工作，从而统一了邦联在该战区的指挥权。宾夕法尼亚出生的约翰·C.彭伯顿将军在联邦军中有两个兄弟，这次，他以密西西比州的邦联军统帅的身分来到维克斯堡。布雷格仍指挥集结于纳什维尔南面30英里处的默夫里斯伯勒的田纳西军。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阿肯色州拥有25000军队。12月7日，位于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普雷里格罗夫发生了一起使人对联邦事业多少起到感奋的事件。在那里，10000名叛军袭击了联邦军驻扎在该地的两个师。当联邦军的另一个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邦联军的侧翼时，叛军大为惊慌，尔后即被击退。普雷里格罗夫之役的胜利使阿肯色北部处于联邦的控制之下。但是，邦联军仍有足够的实力防止联邦军向小石城挺进。在西线，联邦军将着重对付维克斯堡以及田纳西中部的布雷格所部。

联邦军三路并进，企图在维克斯堡实施首次突破。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以及叛军的迅猛反击，联邦军未能达到目的。联邦方面的田纳西军区司令格兰特通过密西西比州北部发动了一次陆上攻势，从敌人背后袭击河上要塞。这时，林肯任命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军司令，以接替引起争议的本杰明·巴特勒。林肯希望由班克斯率领一支远征军沿密西西比河北上，从南面攻击维克斯堡，同时让其余的联邦军从北面对其实施包围。但是，占领后的路易斯安那的行政管理问题和位于哈得孙港的邦联军的坚固要塞，都使班克斯无法向巴吞鲁日以北派出一兵一卒。在没有通知格兰特的情况下，林肯还批准另一位政治将军——伊利诺伊州的约翰·A.麦克勒南德率领一支去下游的远征军从孟菲斯出发去远征维克斯堡。格兰特得知此事后，要求澄清他在密西西比战区的权限。政府向他保证，在位于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



河之间，南至维克斯堡的军区范围内，他可以掌管全部 75000 军队。由于对麦克勒南德不信任，格兰特派谢尔曼前去指挥为参加麦克勒南德的远征而集结于孟菲斯的军队。麦克勒南德于 12 月底来到孟菲斯。他发现，他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仅仅是格兰特手下的一位军长，而谢尔曼为了策应格兰特的陆上攻势，则早已率领他的那个军顺流而下，去攻打维克斯堡的防线了。麦克勒南德大怒，然而林肯确认了格兰特的权威，于是麦克勒南德也就无可奈何了。西点军校毕业生格兰特战胜了政治家麦克勒南德。

在邦联军的两位将军范多恩和福雷斯特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所采取的形式却不同。他们在 12 月中旬同时率骑兵袭击格兰特的供应线。福雷斯特率 2100 人巧妙地躲过一支支联邦巡逻队，毙伤、俘获联邦军 2000 余人，切断田纳西州杰克逊城以北 60 英里长的铁路线和电报线，缴获 10000 支步枪及其他设备，离去时只损失了 500 人。与此同时，范多恩的 3500 名骑兵迫使霍利斯普林斯的联邦驻军投降，并摧毁了格兰特在该地设立的一个补给站。这再次证明，小股骑兵有能力使依靠铁路供应线深入敌方领土的大军陷于瘫痪。格兰特不得不下令停止向维克斯堡推进，返回田纳西州。

格兰特改变计划，对谢尔曼承担的那部分攻势构成了威胁。这是因为谢尔曼的背水进攻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格兰特从叛军背后发起进攻，将使邦联军削弱维克斯堡的防御。由于福雷斯特切断了电报线，谢尔曼无从知道格兰特的进攻已经受阻。在维克斯堡以北三英里处的奇克索陡崖上，叛军集结了 14000 人。谢尔曼如果打算登上干燥的陆地，对维克斯堡采取进攻，就必须占领这些陡崖。尽管进攻的联邦军与守军之比高于 2:1，但邦联军深沟高垒，拥有足够的大炮来控制沙洲，而联邦步兵要通过周围布满沼泽的长沼，沙洲是必经之路。联邦军于 12 月 29 日发动的攻势从

一开始就毫无希望。谢尔曼的四个师伤亡几达 1800 人，而邦联军的伤亡才 200 人。联邦军向上游撤退，回到距维克斯堡 20 英里的那个疾病蔓延的沼泽地营地，而这时北部的公众才得知，又一个 12 月攻势失败了。

## 西线的战争：斯通河战役

联邦军在 12 月的第三次主要攻势曾出现败北的危险。罗斯克兰斯在 10 月 30 日接管坎伯兰军团时就知道，政府希望他把叛军逐出田纳西中部。由于骑兵的尾随袭击而拖延多天之后，罗斯克兰斯的 42000 部队于圣诞节的次日从纳什维尔出发，前往默夫里斯伯勒与布雷格的 36000 之众的田纳西军对阵。他们发现，邦联军在城西北一英里处很浅的斯通河两岸严阵以待。12 月 30 日夜，两军仅相距数百码露营。双方的军乐队同时在袭人的寒气中鸣鼓奏乐，唱起对台戏。一方高奏邦联国歌《迪克西之歌》，向对方的《扬基歌》发出挑战……。到最后，有个军乐队奏起《家，可爱的家》来，其他乐队接着奏下去，直到两军的乐队都奏起来；而且成千上万的士兵，无论是北方佬还是叛军，共同唱起了熟悉的歌词。或许，他们之中还有人在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嘲弄大惑不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彻夜合唱，第二天又互相残杀。

布雷格无意撤退，甚至无意保持守势。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以便在拂晓时进攻联邦军右翼——企图夹击背水的联邦军，使之进退两难，同时切断其供应线。12 月 31 日拂晓，邦联军发起进攻。与在多纳尔森和夏洛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回他们又赶上北方佬正吃早饭。叛军的杀声回荡在低矮的柏树丛中和光秃秃的田野上。在这场攻势下，身穿蓝军服的联邦军右翼的两个师被击溃了。身穿灰军装的叛军骑兵闯入联邦军背后，在装载着军需

品和弹药的篷车中引起一阵大乱。然而，罗斯克兰斯临危不惧，亲自在最前列纵横驰骋，重整部队。同他并肩战斗的参谋长被一发炮弹炸掉了头颅。部署在联邦军正中央的谢里登师岿然不动，这使罗斯克兰斯来得及在纳什维尔山的前面组成了一道新的战线。不到中午，邦联的进攻就在这里停顿下来。

这场战斗是这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枪炮声震耳欲聋，士兵们纷纷采摘棉花堵耳朵。在联邦军左翼的中心，乔治·托马斯麾下的一个旅控制着朗德福里斯特树林沿铁路线的一小片林区，它成为重建的联邦军战线的转折点。布雷格为了摧毁它，决定竭尽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为完成此举，他率领约翰·C·布雷肯里奇的一个扩编师渡河。下午，该师向朗德福里斯特树林发动攻击，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而且损失惨重。

是夜正值新年除夕，阵地上无人奏乐，伤兵的呻吟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布雷格电告里士满，他已大获全胜。的确，他似乎是赢了。他还声称：“敌军正在溃退中。”然而，敌军并未溃退。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几位将军劝他撤退，但是“老罗西”（他的部队这样称呼他）决定坚持下去。尽管双方都把各自的一个师调到河东，但次日并未发生什么战斗。布雷格在1月2日发现，联邦军仍留在原地，遂（不顾部下反对）下令向河东的联邦军发动攻击。布雷肯里奇的那个师把联邦军步兵赶下山头。但是，联邦军炮兵——有58门大炮集中在河对岸——从侧翼近距离射击，炸得叛军血肉横飞。

次日，双方遭受重创的部队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知道，不是己方就是彼方很快就会被迫撤退。双方的伤亡率在这场战争中是最高的：邦联军的伤亡、失踪人数达33%，而联邦军则为31%。布雷格手下的将军们已对他失去信心。南军正由于给养不足和连日冬雨而遭到磨难，而联邦军却从纳什维尔运来新的给养，看来要永远守在阵地上。因此，在1月3—4日夜，邦联军开始撤至南



面 35 英里处的达克河后面的新战线，住进建在那里的冬季营房。

于是，罗斯克兰斯就侥幸地反败为胜。尽管此役伤亡惨重，然而，因弗雷德里克斯堡大溃败以及维克斯堡前沿的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北军，在获悉来自斯通河的消息后，又开始振作起来。林肯对此深表感谢，他致电罗斯克兰斯：“上帝保佑你们，大家都和你们在一起。”后来，总统写信给这位将军说：“我对每件事都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并说：“你给我们带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次如果遭到失败，那国家就很难保全下来。”<sup>5</sup>

## 维克斯堡战役：第二阶段

在斯通河战役结束后的四个月里，两军都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到那时道路就不再泥泞。因此，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格兰特企图利用这段时间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高地，以便向维克斯堡发动一次攻势，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地形是他的最大障碍。维克斯堡建在一座 200 英尺的山崖上，这使那里的炮兵得以控制河道。要想从正面发动进攻，简直无异于自杀。在河西，除水位低的地方外，无法在迷宫般的河川支流和沼泽地上作战，况且，1862 年—1863 年的冬天又格外潮湿。在河东，从维克斯堡到孟菲斯连绵 250 英里的弧形地带是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把一片平均宽达 60 英里的德尔塔低洼地封闭起来。如今，这里是一片良田，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但在 1863 年还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沼泽、河川和茂密的森林。宜于作战的，只有维克斯堡东面和南面的一片旱地。摆在格兰特面前的问题是，让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物资给养开进去，击退敌军，占领要塞，并与控制着维克斯堡以北河段的联邦舰队重新取得联系。

从地图上看，由田纳西州经陆路到达那块旱地是最简单的办

法。但格兰特早已尝试过，未取得成功。而逆流而上，撤回到孟菲斯，再从陆路出发，在北部人看来又像是退却。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背水向维克斯堡发动攻势。格兰特在1月底顺流而下，去亲自指挥在维克斯堡上游不远的西岸安营扎寨的部队。这是因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受信任的麦克勒南德将军军阶最高。

### 失败之冬

是冬，格兰特尝试着从五条不同的路线把部队和给养运过河。其中，试图绕过维克斯堡的那些堡垒，以使炮艇、运输船和部队在城下安全通过的路线有三条：(1) 谢尔曼的那个军从夏天就动工开挖那条运河，但洪水在3月淹没这个地区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过，洪水并未切断通过这条运河的那条理想的深水航道。(2) 其他部队在北边几英里处开始挖另一条运河，以便在维克斯堡以南和密西西比河的条条支流接通。然而，这些支流水太浅，除最轻便的运输船外，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过。(3) 另一个军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打通一条400英里长的水路，它从位于维克斯堡以北极远处的普罗维登斯湖，经过支流与河流一直通到位于该堡下游很远处的雷德河。该部在付出大量的劳动来锯断水面以下的树木后，也放弃了这条水路（因其只宜吃水浅的汽艇通行），而赞成两种显然更有希望的尝试，即经由德尔塔那无边无际的水路运兵，从北面威胁维克斯堡的侧翼。

第一个尝试就是派出亚祖水道远征军，炸毁赫勒纳对面的大堤，使炮艇进入了属于亚祖河支流错综交叉的河网。在这些险恶的水路上，炮艇经常搁浅，低垂的树枝砰砰地敲打着船上的大烟囱。这些水路把海军的负责军官搞得狼狈不堪，一筹莫展。在炮艇无法通行的一段狭窄航道，邦联军集中起重炮，炸开一道拦河坝，迫使北军船队调转船头。最后，另一个尝试是组织斯蒂尔河的拜乌远

征军，使海军通过德尔塔条条连结的水路。在这场冒险中，此时担任密西西比分舰队司令的戴维·波特率领 11 艘炮艇穿过比船身宽不了多少的弯曲的航道。随着这支奇怪的小船队进入丛林深处，叛军持斧砍倒树木，横倒在船只前后的水中，一度曾出现使整个船队无法脱身，束手就擒之势。然而谢尔曼令其步兵登岸，赶跑了邦联军。于是，疲惫不堪的水兵把船驶回密西西比河，一路上，树枝不断地扑打、撞击着船舷。

### 春天的成功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格兰特从未丧失攻克维克斯堡的信心。没有哪个战役更能表现出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获得成功的意志、以及用这种意志从容地影响部下的能力。到 3 月底，在他心中酝酿多日的一项计划已臻于成熟。由于各种绕过维克斯堡的努力都已失败，他打算命令波特驾驶炮艇和供应船直接从炮兵阵地通过，同时让各路大军沿西岸向南前进，与位于维克斯堡以南的舰队会师。士兵们将在那里渡河，向彭伯顿防御工事的不牢固的下腹地发动一次攻势。这个计划虽然简单，却十分大胆。一旦开始作战，就断了退路。因为一旦过了河，在打回位于维克斯堡一带或该堡上游处的密西西比河以前，格兰特与其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谢尔曼和波特反对这项计划，而林肯则表示怀疑。但是，和罗伯特·李一样，格兰特是位伟大的将军，因为他愿冒大风险。他于 4 月 5 日把所辖三个军中的两个南调。这两个军奋力穿过深深的泥淖，把凑合用的木筏拖过河川支流，时而架桥，时而敷设木排路，或边走边开出新路来。在 4 月 16—17 日的两个无月亮的黑夜，波特的 12 艘船静悄悄地顺流而下，驶向维克斯堡。突然，叛军的监视哨在两岸燃起篝火，把天空照得通红。维克斯堡的重炮向船队开火，船队颠簸着全速通过由枪弹和炮弹织成的长达四英里的



交叉火网。所有船只都挨炮火击中，多数都腾起火焰，还有一艘沉没。但其余的船只都得以通过，仅有一人阵亡。几天过后，6艘运输船和12艘驳船试图在夜间取得同样的战绩，却运气不佳——有6艘驳船和一艘运输船（装载着医疗用品）沉入水底，但全体船员都获救了。

现在，格兰特的大部分部队都集结在维克斯堡以南，而且物资充裕，可供短期使用。部队乘摆渡过河，直抵位于维克斯堡以南35英里处的布鲁因斯堡高地。正如格兰特后来叙述的那样，他经历了：

一种难以比拟的解脱感。……现在，我身处敌占区。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把我和后勤基地隔开。可是，我这次却是在干燥的地面上，且与敌人同处于河的一侧。从12月直到现在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一切劳动，一切艰难困苦和损失……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sup>6</sup>

格兰特在密西西比登陆时并未遭到抵抗。因为他前曾命令部队作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运动，使彭伯顿受骗而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别处。在格兰特和他的两个军渡河的当日，谢尔曼就与另一个军在维克斯堡以北的奇克索陡崖附近佯攻。而与此同时，本杰明·格里尔森上校则正在指挥这次战争中最为壮观的一次骑兵袭击。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前音乐教师格里尔森就组建一个极好的骑兵旅。这表明，联邦骑兵终于达到了邦联的骑兵实力。格里尔森率1700名骑兵出发，迅速深入密西西比州腹地，直奔彭伯顿在杰克逊城以东的铁路供应线。格里尔森的骑兵在不断击退尾随的邦联骑兵的同时，不但扒掉了50英里长的铁路，还吸住邦联军的一个步兵师，使其围捕联邦骑兵的企图枉费心机。16天以后，联邦军部队终于在离出发地点600英里的巴吞鲁日抵达联邦防线。他们毙伤叛军100名，俘获500名，所付出的代价仅为24人。

他们的战绩可以与处于巅峰期的福雷斯特或斯图亚特媲美。这也意味着，格兰特的23000人于5月1日抵达吉布森港时，迎战的邦联军只有8000人。联邦军冲过守军阵地后，格兰特即率谢尔曼军顺流而下。现在，与他的44000人对阵的，是彭伯顿的32000人以及约翰斯顿努力集结于州首府杰克逊城的数千人。格兰特下令，把那些从附近的种植园缴获来的四轮马车及其他车辆装满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并下令部队尽量把能带走的干粮全装进干粮袋；随后，他放弃河边基地，停止与北部的电报联系。在杀回维克斯堡以前，他的部队将“靠农村来维持给养”。

在所有北部人看来，格兰特在此后的两周中失踪了。在此期间，他的部队跋涉180英里，在与分散之敌作战中，四战四捷。这些分散的敌军如果合为一股，其兵力几乎同格兰特的部队一样多。随后，格兰特的部队把邦联军围困在维克斯堡的防御工事内。用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个战役“光辉地证明了下述战术准则的正确性：猛打，反复打，不停地打”。<sup>7</sup>

格兰特指挥部队迅速运动，神出鬼没，把邦联军搞得晕头转向。他没有径直向维克斯堡进军，而是往东向杰克逊城进攻。格兰特的策略是拿下这个州首府并在那里击败约翰斯顿，消除后顾之忧以后，转而西进，以期在维克斯堡附近击败南军主力。邦联军企图对这些行动予以反击，却又被意见不一所困扰。约翰斯顿敦促彭伯顿从维克斯堡开拔并与他会师，以便在尽可能远离维克斯堡的地方攻击格兰特。可是，彭伯顿早已接到杰弗逊·戴维斯的命令，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维克斯堡，故拒绝远离河岸去冒险。彭伯顿虽是宾夕法尼亚人，但他决定站在妻子的弗吉尼亚同胞一边。他不愿因不适当地冒险而使人们怀疑他对邦联的忠诚。5月12日，联邦的一个军在位于杰克逊城正西的雷蒙德歼灭邦联军的一个小支队。14日，联邦的两个军把约翰斯顿临时拼凑的军队赶

出了杰克逊城。谢尔曼的那个军留下来破坏该城的铁路和工业设施，而格兰特则率余部西进，去攻打彭伯顿部队。这位不走运的彭伯顿将军一直在缓慢地向南移动，打算切断格兰特那条（不存在的）供应线。5月16日，联邦的两个军（29000人）在位于杰克逊城和维克斯堡中途附近的钱皮恩山与彭伯顿军的一部（21000人）遭遇。

接着打响了这个战役中的决定性战斗。要不是因为麦克勒南德指挥失当，这次战斗的决定性意义本来会更为深远。在詹姆斯·B·麦克弗森将军指挥的军猛攻联邦军右翼时，左翼的麦克勒南德却踌躇不前，贻误战机。彭伯顿移师至最激烈地拉锯争夺的几个战斗地点。他眼看自己的几个团溃不成军时，乃决定撤退。他有一个师被北军分隔切断退路，只得东南逃窜，逃离维克斯堡。不算该师，彭伯顿在此次战斗中损失了3851人（格兰特损失了2441人）。但是，格兰特认为，如果麦克勒南德更机警一些，本来可能歼灭更多的叛军。

翌日，向前推进的北军在维克斯堡以东10英里的大布莱克河与邦联军殿后部队遭遇。毫无斗志的守军不堪一击，大多数人撤退过河，烧毁河上的桥，但是，尚有1700人留下束手就擒。约翰斯顿再次要求彭伯顿北进与他会师，但彭伯顿仍是置之不理，撤回维克斯堡工事内，让分散防守峭崖及附近渡口的几个旅向他靠拢。彭伯顿在解释他保卫维克斯堡的决定时写道：“我仍认为，对邦联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地点。”<sup>8</sup>

格兰特已得到加强的45000部队从陆上包围住维克斯堡，同时联邦炮艇从河上切断了该城与外界的联系。格兰特相信，邦联军一再失败，士气已经低落，于是，他在5月19日下令向维克斯堡的堑壕发动进攻。然而，叛军的士气已经恢复，并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击退身穿蓝军装的北军。这似乎证实了这一格言：堑壕里的

一个士兵至少抵得上空旷地上的三个士兵。维克斯堡深沟高垒，其防御工事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坚固。这些工事沿山脊构筑，前有深壑，并有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树枝还给进犯者施以困扰。

尽管如此，格兰特还是决定在5月22日发动另一次进攻，而且事先他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并用大炮轰击敌阵。他希望避开在疫病流行的夏季围城。他还担心，长期围困会使约翰斯顿得以在他的后方组建一支劲旅。22日上午10时，联邦的三个军全部出击，沿四英里长的战线同时发起进攻。进攻的一方一度在好几处突破敌军工事。但是，他们抵挡不住邦联军颇具威力的排枪射击，无法站稳阵脚。在5月19日和22日的两次进攻中，北军的损失与此前三个星期的征战所造成的伤亡不相上下(约为4200人)。

两次进攻的失败，这迫使格兰特下决心对该城实施围困。戏剧性的5月的征伐战结束了。但是，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比起在弗吉尼亚战场发生的事件来，这个战役在南部和北部都不那么引人注目。

## 乔·胡克与“举世无双的部队”

弗雷德里克斯堡失利后，波托马克军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有四位亲麦克莱伦的将军直接向林肯诉说伯恩赛德不称职，其中有威廉·B.富兰克林，他作为左翼指挥官，未能利用联邦军在此役中唯一的一次突破。但另几位反麦克莱伦的军官，特别是胡克将军，亦批评伯恩赛德，特别是胡克将军随随便便就向新闻记者信口开河，乱讲伯恩赛德做工作一塌糊涂，管理无能，还说缺少一位“独裁者”来治理国家。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渗透到士兵那里。来自缅因州的一个士兵写道：“让一帮无赖和蠢才来领导伟大的自由事业，其全部表现乃是腐败，其结果乃是灾难、可耻和丢脸。”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伯恩赛德是一个糟糕的管理人员。尽管国家富饶，而且以其全部资源作为他的后盾，物资在军需仓库堆积如山，但驻扎在法尔茅斯的部队到冬季却在营房里受罪，他们食物不足，医疗条件很差，军纪松弛，疾病流行——甚至还有坏血病。1863年1月，开小差的士兵数量增加到每天至少200人。一位军官把1862年—1863年的冬天描绘成为“此次战争中的瓦利福奇”。<sup>9\*</sup>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一次打击是以“泥泞进军”而闻名的没有打响的战斗。决心再交好运的伯恩赛德命令他的部队进逼并渡过拉帕哈诺克河，从侧面攻击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邦联军。诋毁这位将军的人反对这个计划。一位军官写道：“富兰克林对这一情况已多次讲过，并大声呐喊，他已使他的整个指挥完全陷入混乱，因此遭到失败则加倍令人信服。他的所做所为使他注定要失败。”<sup>10</sup>在一个暖和异常的冬日——1月20日，他们在干燥的道路上开始行动。然而，那天夜里一场大雨把道路浇得一片泥泞，使全军深陷在其中，动弹不得。那大炮，那载着浮舟的四轮车，用三匹马去拉也是纹丝不动。河对岸的叛军士兵欣喜地看热闹，并且手中举着许多嘲笑人的画有箭头的招牌：“此路通往里士满。”

两天过后，伯恩赛德放弃了这一行动，下令部队返回营地。随后，他即前往华盛顿要求林肯批准他撤换那些捣乱的将军——首先是富兰克林和胡克，否则他就辞职。林肯乃把富兰克林和另外几个将军调出波托马克军；但总统也知道伯恩赛德已失去部下的信任，便接受了伯恩赛德的辞职，任命胡克接任指挥！

其实，这一任命并不像它在表面上那么令人震惊。胡克尽管对伯恩赛德捣了鬼，还是受到部队和公众的欢迎。林肯知道，胡克

---

\* 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又译福吉谷，美国独立战争时，乔治·华盛顿率领的1.1万军队在布兰迪恩战败后，于1777年12月—1778年6月驻扎于此。瓦利福奇位于费城(当时为英军占据)西北约36公里的斯库尔基尔河西岸，扼险易守，为战略要冲。——编注

是个有名的酒徒和色鬼(据称,俚语 hooker “一大杯威士忌”或“一个妓女”之意即源出于这位将军的名字);总统还知道,他是位敢作敢为、劲头十足的将军,并希望他把这种精神注入部队。林肯在任命胡克的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劝告信:“我曾听说,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位独裁者,我相信你是说了这话的。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没有考虑这一点,才授予你指挥权的。只有那些取得成功的将军才能树立为独裁者。我现在所要求于你的,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我将冒独裁的风险。”<sup>11</sup>

胡克一开始干得很好。他整顿了日用品供应和军需服务工作,提高了食品质量,清扫了肮脏的兵营,改善了战地医院,并使病员减少一半。他加强了军纪,同时又宽厚地准予休假。他取消了大师编制,重建过去的军,并通过给每个军都设计徽章来使各部队都增加自豪感。他把分散于整个部队的骑兵旅或骑兵团整编为一个军,从而提高了骑兵的效能。林肯于3月10日保证对归队的逃兵实行大赦后,士气上升了,开小差的减少了,许多逃兵归队了。不出两个月,胡克使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士兵恰如其分地写道:“在胡克手下,我们开始了愉快的生活。”<sup>12</sup>

从不谦虚的胡克夸口说,他已创建了一支“举世无双的部队”。他对总统说,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会拿下里士满,而在于何时拿下。他希望上帝降仁慈给叛军,因为乔·胡克是不会施以仁慈的。林肯对胡克的夸口感到不安,这使他不祥地想起了约翰·波普。林肯慧眼识人,担心胡克的吹牛是他掩盖他没有把握。他中肯地说道:“在一切动物中,母鸡是最聪明的,因为它在下蛋前从不咯咯地叫。”林肯可能对军中的一个老传闻已有所知:胡克是一个玩扑克牌的超级好手,“当他到了关键时刻应该争取胜过千筹的时候,就偃旗息鼓了”。总统于4月亲临军中时,给胡克的临别赠言是:“你下次战斗,要投入全部兵力。”<sup>13</sup>



## 钱瑟勒斯维尔之役

波托马克军团在以前历次战斗中从未全力以赴。胡克要是遵从了林肯的劝告，凭借他那比罗伯特·李沿拉帕汉诺克河部署的60000人几乎多一倍的115000大军，极有可能大获全胜（在此之前，朗斯特里特已率两个师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两州的分界处执行分遣任务）。北弗吉尼亚军团也挨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天。士兵的粮食定量降低了；由于弗吉尼亚农村打过仗，饲料已经告罄，马匹都饿得奄奄一息。但是，士兵的士气仍然旺盛。他们沿河掘了一条25英里长的堑壕，这使他们对抵挡住任何数量的北方佬都信心十足。

胡克无意重演伯恩赛德那种徒劳的正面进攻。他制定了一个极好的战术性计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得很好。他把五分之二步兵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进行另一次正面佯攻，同时亲率其余的部队溯河远上，在那里蜂涌地涉水过河，活捉了颇为吃惊的邦联军哨兵，然后移师东进，去围拢叛军的殿后部队。（与此同时，胡克把大部分恢复了锐气的骑兵派去实施纵深袭击，以切断罗伯特·李的供应线。结果此举成为一个错误，因为这次袭击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严重损失，但胡克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却没有足够的骑兵出去侦察。）4月30日傍晚，在罗伯特·李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上仍有40000联邦军，而同时离罗伯特·李在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殿后部队仅8至10英里的联邦军则有70000兵力。钱瑟勒斯维尔是弗吉尼亚州怀尔德尼斯地方的一个位于十字路口上的旅店。此处长着茂密的次生林和密密麻麻的矮树丛，没有开垦地。

胡克和他的将军们得意洋洋。第5军军长乔治·戈登·米德

宣称：“干得好，老乔！我们已位于李的侧翼，他对此还一无所知。”<sup>14</sup>其实不尽然。罗伯特·李知道联邦军的位置，但他正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显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向里士满撤退，但这样则暴露了部队的两翼，从而招致敌人的攻击；或者命令部队面向来敌，以对付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更大威胁，但这样又暴露了殿后部队，招致敌人从弗雷德里克斯堡发动的攻击。

罗伯特·李自是有其特殊之处，两者都没有做。他再次冒大险，分兵两路，留下朱巴尔·厄尔利率领 10000 人据守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堑壕，余部则进军钱瑟勒斯维尔。5 月 1 日，钱瑟勒斯维尔的联邦军向东移动两英里，到达怀尔德尼斯以北的一片旷野。但是，当 they 与邦联军的先头部队交火时，胡克突然命令其部队撤至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防御阵地。因为这意味着把主动权让给罗伯特·李，胡克的几个军长都表示反对。这还意味着，怀尔德尼斯的密林将抵消联邦军的数量和炮兵两方面的优势。为了解释这位过去以“善战的乔”而闻名的将军作出的这个奇怪的决定，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在一场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身负指挥重任的胡克不知所措了。在可向对手下千筹赌注的时机下，这位扑克手竟踌躇不前，毕竟在巨额赌注越下越大时，他就赌不赢像李那样的赌徒了。

正如他的一个将军后来所写的那样：自 5 月 1 日下午始，胡克在心理上就成了一个“挨打的人”。罗伯特·李再次对敌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斯图亚特的骑兵发现，位于钱瑟勒斯维尔西面三英里处的胡克的右翼“没有掩护”。尽管邦联军已经分兵多路，但罗伯特·李决定再次分兵。5 月 2 日，他派杰克逊率 28000 人迂回行军 14 英里，前去攻击联邦军侧翼，同时让余下的 18000 邦联军步兵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与三倍于己的敌人对峙。这是罗伯特·李迄今为止最富冒险性的一次赌博。因为，胡克如果发现了这一行动，可能在

杰克逊未部署好兵力攻击其右翼之前，就在罗伯特·李的两部之间打进楔子。

联邦军的侦察兵发现了杰克逊的行踪，胡克向据守右翼的第11军军长奥利弗·O. 霍华德将军发出警告，要其加强防御阵地。但是，当杰克逊的部队经过其前沿时，胡克不但没有下令全力进攻，反而只派出两个师进行武力侦察。这次侦察报告说，杰克逊的部队正在南移。于是，胡克便相信邦联军正在退却！胡克和霍华德都因此而放松了警惕，尽管霍华德那个军的前哨一再警告说，叛军正在森林近处集结。

5 时半，第 11 军的 12000 士兵中有许多不是在玩牌就是在做晚饭，杰克逊手下的叛军突然大声呐喊，冲出森林，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联邦军的侧翼。第 11 军下辖多个德裔美国人组成的团。在其他部队看来，他们的威信颇低；而这天的战斗也丝毫没有提高他们的威信。有些团遭到突然袭击之后，开始虽然顽强地战斗，但却从未有机会再次组合队形。联邦军各团在形成一条稳固的战线并在天黑时迫使猛攻停顿以前，被邦联军向后压退了两英里以上。杰克逊急于切断联邦军与拉帕汉诺克河的联系，他策马向前，为夜间进攻实施侦察。邦联军的一个连把正返回自己战线一边的杰克逊一行错当成联邦军的骑兵，这些神经质的邦联军士兵放了一阵排枪，击伤了这位将军。次日清晨，杰克逊的左臂被截去了。罗伯特·李闻及此事时说道：“他失去了左臂，而我却失去了右臂。”<sup>15</sup>

尽管杰克逊的进攻取得了成功，但胡克在次日仍有获得击败罗伯特·李的良机。联邦军在怀尔德尼斯把邦联军的两部分部队分隔开来。联邦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同时在黑泽尔格罗夫占据着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是炮兵可以有效作战的仅有的几片林间空地之一。胡克误认为黑泽尔格罗夫是个暴露着的突出地块，于是就在黎明时下令将其放弃，从而铸成了他的大错特错。临时指挥

杰克逊那个军的斯图亚特很机警，迅速地把 50 门大炮转移到山坡上，从那里连续猛轰联邦军工事，并由邦联军步兵反复发起进攻。联邦军遭受重创，不得不退出阵地。

胡克只投入一半兵力，他把林肯的“投入你的全部兵力”的劝告置诸脑后，没有命令闲置的两个军投入战斗。在战斗期间，胡克正倚着钱瑟勒旅馆的一根柱子，一发炮弹击中了这根柱子，把他震得失去了知觉。尽管头昏眼花，他还是不把部队交给极想让联邦军每个师都投入战斗的一位老资格的军长。上午 10 时左右，联邦军撤退到钱瑟勒斯维尔北面的新阵地。

此时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留下的 25000 联邦军终于占领了城外的高地。罗伯特·李在得知这支部队正在接近其背后时，再次在钱瑟勒斯维尔分兵，给斯图亚特留下 25000 人去牵制那里的 75000 联邦军；而他则率其余部队出发去增援厄尔利的 10000 部队。5 月 3—4 日，在发生于钱瑟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一次激烈战斗中，邦联军把在前线上占有优势兵力的联邦军赶过了河，而这时胡克却率领大军在西边仅几英里处按兵不动。随后，罗伯特·李调转兵力与胡克对抗，但是胡克放弃了战斗，于 5 月 6 日渡河来到拉帕汉诺克河北岸。

对“举世无双的部队”来说，这回败得痛苦而屈辱。然而，首先是胡克被打败，而不是他的部队被打败。联邦军在这次战斗过后，士气并不像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那么低落，尽管联邦军方面在四天的战斗中伤亡 17000 人（邦联军的伤亡是 13000 人），钱瑟勒斯维尔之役一直被称为罗伯特·李的“最伟大的杰作”，然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胡克的战地指挥在这场战争中显得最为糟糕。尽管邦联取得这次大捷，但由于杰克逊于 5 月 10 日死于负伤后并发的肺炎，所以最终失去的还是比得到的多。

根据一位访问者的说法，林肯得悉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消息

时,脸色“苍白”。他大声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全国将会说些什么?”<sup>16</sup>在这个绝望之冬的其他失败(据公众所知,格兰特仍陷在维克斯堡附近的沼泽地里)之后,接踵而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的失败很可能是对联邦事业的一个致命打击。但是,恰恰相反,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在1863年的夏、秋两季,联邦军的几个决定性胜利将使战局变得有利于北部。

## 第十九章 第二个转折点：葛底斯堡、 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

### 葛底斯堡战役

南部对钱瑟勒斯维尔大捷的欢欣鼓舞的气氛，掩盖了邦联日益加剧的问题。封锁在加强；通货膨胀在恶化；格兰特从四面八方紧紧围住维克斯堡；班克斯在逼近哈得孙港；罗斯克兰斯似乎已做好准备，要把布雷格赶出田纳西中部；联邦军正准备对查尔斯顿实行水陆联合进攻；波托马克军团在拉帕哈诺克河北岸处于临战状态。南军在各条战线上都为数量上居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邦联内阁和高级将领在5月举行了几次会议，以制定一个对付这种形势的战略。朗斯特里特提议，由他率领两个师西进，增援布雷格，向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势。此举如获成功，将不但解放田纳西州，还将迫使格兰特放松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是，罗伯特·李反对这个计划。他说，铁路太糟糕，无法把大军西运；即将到来的夏天无论如何也会迫使维克斯堡那些水土不服的北军撤退；最重要的战场是弗吉尼亚，北弗吉尼亚军团不但不应削弱，反而应予加强，以便再次向北部发动进攻。这样将解除里士满受到的威胁，使部队能够从富饶的宾夕法尼亚农村得到补给；用迫使那里的联邦军增援东部以减轻西部邦联军受到的压力；通过显示南部战无不胜的力量来加强北部的民主党主和派；能够重新提出欧洲承认邦联的问题；并有可能占领华盛顿或其他北部城市。罗伯特·李以其崇高威信而力排众议。政府批准了他的进攻计划。

罗伯特·李对弗吉尼亚战场存有狭隘的偏见，因而一直受到



人们的批评。作为一个为保卫他所在的州而参战的弗吉尼亚人，他缺乏从南部作为整体的全局观点出发的广大战略眼光。邦联军看来虽然在弗吉尼亚取得胜利，但却在西线输掉这场战争。罗伯特·李认为，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将迫使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放松对西线的控制。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从另一方面看，若不是因为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州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战术性胜利，南部可能会更早地输掉这场战争。如果邦联军打赢了下一场葛底斯堡战斗，就不会听到任何人议论罗伯特·李的战略眼光有何不足之处了。

朗斯特里特指挥的几个师返回李的军团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使李的实力大增，达到75000人。他们在6月初开始行动。为了弄清叛军在搞些什么名堂，联邦军的骑兵试图渗入斯图亚特的骑兵掩护部队。他们于6月9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在库尔佩珀附近的布兰迪车站突然发动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骑兵战斗。尽管北军骑兵最后被赶过河去，但他们打得很不错。里士满报纸就斯图亚特及其“趾高气扬的骑兵”在布兰迪车站遭到突然袭击一事，纷纷加以指责。这种批评激怒了南部优秀的骑兵。斯图亚特急于再搞一次戏剧性的骑兵行动，这一行动对行将到来的战役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然而，最初一切都很顺利。邦联的先头部队（原为杰克逊统辖的那个军，现由理查德·尤厄尔指挥）不是俘获就是驱散了驻扎在温切斯特和谢南多厄河谷内几处地方的联邦军，并于6月中旬越过波托马克河。胡克向林肯建议：由于邦联军正在北进，他应该南下攻占里士满。林肯否决了这一建议，并向胡克提出了战略方面的正确忠告：“我认为，你的真正目标是李部，而不是里士满。”<sup>1</sup> 尽管胡克行动快速地把部队集结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但他还是诉说：叛军人数比他多；政府没有支援他；如果他得不到政府的信任，

他永远也不会获胜。这听起来像是麦克莱伦的腔调,使人痛心。林肯开始疑虑胡克不敢再同罗伯特·李作战。总统以前曾考虑过把胡克从指挥岗位上调开的问题。当这位将军在哈帕斯费里驻军问题上同哈勒克发生争吵而递送辞呈时,林肯批准了他的辞职,并于6月28日任命乔治·戈登·米德继任司令官。这使米德颇感意外。

邦联军的进击对北部人思想产生的影响,同与罗伯特·李的愿望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激励反战情绪,反而在多数北方人中激起了愤怒的感情,从而镇住了同情南部的“铜头蛇”,使他们噤若寒蝉。入侵的南军抢走了可以找到的一切牲畜、马匹、四轮车、食品和鞋子(付给或答应付给邦联的货币),并在所占领的城镇征收贡物。他们还俘获了一大批宾夕法尼亚黑人,把他们解送南部为奴。所有这些同样激起北部人的愤怒和痛恨,而这种情感是南部人在保卫其领土时曾经有过的。

米德接过指挥权那天,罗伯特·李的三个军有两个驻在钱伯斯堡;尤厄尔的那个军有一部分驻在约克城,其余的部队则位于哈里斯堡附近。斯图亚特的骑兵已经开走,纵深直入去袭击联邦军殿后部队。过去对麦克莱伦发动的类似袭击曾使斯图亚特名声大噪,而这次行动却只会给他带来这样的指责:罗伯特·李在最需要眼睛时,夺去了他的“眼睛”。罗伯特·李希望跨过萨斯奎汉纳河,扒掉位于哈里斯堡和兰开斯特之间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可是,斯图亚特不在身边,这使他对联邦军的位置一无所知。当一位侦察员报告说,联邦军已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挥师北去时,罗伯特·李才慌忙派出传令兵,召集分散的各师。罗伯特·李打算在葛底斯堡以西8英里处的卡什镇集结兵力。米德早已部署好部队,把守通往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各道关口。双方都无意在葛底斯堡交战。但是,在7月1日清晨,前往葛底斯堡抢鞋子的一个邦联步兵旅在途

中与城西的两个联邦骑兵旅交火。有 10 多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在葛底斯堡汇合。北军的骑兵指挥官约翰·布福德早已认识到该镇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布福德命令骑兵下马，以击退冲过来的叛军；同时，双方的传令兵急忙去召援军前来增援。于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仗打响了。

## 葛底斯堡战役

邦联军距葛底斯堡较近，故能较快地集结起来。他们在 7 月 1 日调来 25000 人投入与联邦军 19000 人的战斗。在这一天的很长时间里，在人数上居劣势的北军在最后撤离前，拼死打退了南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上午 10 时左右，英勇顽强的联邦第一军赶来解救布福德的骑兵，遏制住葛底斯堡以西的邦联阿·P·希尔那个军的数次猛攻。联邦第一军军长约翰·F·雷诺兹被狙击手击毙。中午过后，联邦第 11 军赶到，在镇北占据一块阵地，与南下的尤厄尔部遭遇。不走运的联邦“德裔师”两翼薄弱，再次被原由杰克逊指挥的那个军击溃，使得葛底斯堡以西的联邦阵地在打完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的一仗后也垮了。北军无秩序地从城里撤出来，占领了公墓岭的一块阵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墓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在此使用枪炮者，一经发现，将依法严惩不贷。”

罗伯特·李于下午三点左右到达葛底斯堡。由于斯图亚特不在身边，也不知联邦其他部队在何处，所以他仍不愿主动挑起一场大战。但是，部队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命令尤厄尔“如果可行”就酌情决定攻占公墓岭。杰克逊统帅该军时，这样的一纸命令就会导致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可是，尤厄尔则举棋不定。他知道，联邦军已在山上掘壕据守，部署了不少大炮，最后决定不发动攻击。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已开始讨论葛底斯堡的许

多“如果”中的一个“如果”：尤厄尔如果在7月1日进攻公墓岭，他是否会将其攻占？他如果成功了，这次战斗乃至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否会相同？

是夜和次晨，双方现有部队大都进入了阵地。联邦军阵地活像个鱼钩，带钩的一端从卡尔普山弯向公墓岭，钩柄向南沿着公墓岭那低矮而狭长的山脊伸至小朗德托普山和朗德托普山之间的钩眼。由于卡尔普山和朗德托普山分插成为两翼，而且由于此防线呈凸状，使援军能迅速地从一处调至另一处，所以联邦军阵地极易防守。呈凹形的邦联军防线的长度几乎是联邦军防线的两倍，而且两端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

7月2日晨，朗斯特里特研究了联邦军阵地之后，他断定联邦军阵地十分巩固而不宜进攻。他建议罗伯特·李督师从侧翼向南迂回，在联邦军与华盛顿之间选择易于防守的阵地，并迫使米德前来进攻。但是，罗伯特·李的斗志正旺，相信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如果没有足够的骑兵，朗斯特里特所鼓吹的那种侧翼运动是危险的。而且罗伯特·李认为，由于给养有限和交通线容易遭到攻击，要么硬着头皮打一仗，要么就得撤退。因此，他没有接受朗斯特里特的建议，而决心进攻联邦军的两翼。尤厄尔仍认为右翼太强，罗伯特·李因而命令朗斯特里特在联邦军左翼发起第一次进攻，而与此同时，尤厄尔将在朗斯特里特的大炮轰鸣声中向公墓岭和卡尔普山发动第二次进攻，以防米德增援左翼。

由于朗斯特里特并不相信罗伯特·李的作战计划，所以对这次进攻的指挥缺乏积极性；还由于直接通向攻击地点的近路处于联邦军的一个信号站监视之下，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就不得不反向行军，走另一条道路，结果直到接近傍晚时才发动进攻。防守联邦军左翼的是第三军军长丹尼尔·西克尔斯，此人是位前坦慕尼协会的政治家，因曾谋杀妻子的情夫而臭名昭著。西克尔斯违背命

令行事，把他那个军从公墓岭山脊南端的低地推进到沿埃米茨堡路的较高的地方，给联邦军防线增加了一个突出部。西克尔斯的推进使小朗德托普山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联邦军的古弗纳·K·沃伦将军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认识到，让邦联军占据这个山头，就会使叛军炮兵纵射整个联邦阵线。沃伦立即把第五军的两个旅派往小朗德托普山，他们只比冲上来的邦联军早到几分钟。在乱石遍地的山坡上，双方展开一场拼死的拉锯战。北方军坚守住了小朗德托普山。但是，联邦军还是在西克尔斯的阵地突出部西北角的桃园、麦地和魔窟——此地处于从小朗德托普山流下的一条沼泽般的小河对面，似砾石组成的一个迷宫——几处地方恶战后撤退；这几个地方也因而闻名于世。邦联军各部的攻势虽很凌厉，但配合不好，各旅零星地各自为战，所以联邦军官来得及向受威胁的地点调遣部队。联邦军在公墓岭的主要防线防守稳固。到黄昏时，叛军已经精疲力竭，放弃了对右翼的进攻。

朗斯特里特在左翼开始进攻时，尤厄尔的大炮早就开火了。可是，尤厄尔并未派步兵攻打卡尔普山和公墓岭，而是同联邦炮兵打了一场毫无结果的长达三小时之久的炮战。当他的步兵最后向前推进时，有两个旅渗入了公墓岭（由倒霉的第11军据守）东侧的联邦军阵地，另一个旅则占领了卡尔普山南坡的若干联邦堑壕——被派去增援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已先行从这里撤离。但是，在尤厄尔的防区，也是由于进攻的各旅之间缺乏配合，遂使邦联军坐失良机，无法利用已经成功的突破；傍晚时分，进攻初见成效，但得不到支援；而联邦军的援军把叛军赶下公墓岭，并在叛军到达卡尔普山的制高点之前就遏制住它的进攻。

阿·P·希尔的那个军在第一天遭到伤亡，朗斯特里特的那个军（乔治·皮克特的师除外，该师直到天黑时才赶到）在次日被打得七零八落。朗斯特里特再次恳求罗伯特·李迁回到联邦军左

翼。罗伯特·李不予理睬。他知道，在两天的战斗中，联邦方面的三个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第十一军）同样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次，罗伯特·李极为失误，未能洞悉其对手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这些伤亡已使联邦军士气低落。他还认为，攻击联邦军两翼会迫使米德削弱其中部。罗伯特·李不顾朗斯特里特的反对，决定集结三个师的兵力，由皮克特的生力军开路，攻击联邦军的中部。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北军士气旺盛；米德巴不得敌军进攻他的中部。而且，被选中的攻击地点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所辖的第二军的两个师防守的，它们都是波托马克军团的精锐部队。

然而，在皮克特于第三天向葛底斯堡发起攻击之前，卡尔普山的枪声就在这天拂晓打响了。这是联邦军发动的进攻，以求夺回失守的塹壕。在长达六小时的鏖战中，他们不但攻占了塹壕，还把大部分叛军通通赶下山。中午时分，一阵可怕的沉寂笼罩着这片土地。在步兵发动进攻以前，朗斯特里特调集了143门大炮轰击联邦军的中部。斯图亚特的骑兵在前一天夜间刚刚抵达，此时就大摇大摆地向战场的东面开去，以便皮克特发起正面攻击时，从背后攻击联邦军中部。可是，斯图亚特的骑兵在联邦骑兵的截击下受挫，因而从未到达距联邦军后方两英里半以内的地方。这场为时三个小时的交战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联邦将军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指挥一个旅发动了几次猛烈攻击。

1时许，两发信号弹的声响打破了葛底斯堡的沉寂。突然，邦联军射出的炮弹铺天盖地而来。联邦军的炮兵开始回击，接着，就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战。起初，邦联军的炮击还准确，并造成伤亡。但是，随着大炮的后座力使炮架的架尾下沉，炮弹开始高飞起来，落到联邦步兵的后面。这些步兵蜷缩在一堵石墙和一些胸墙后面。浓烟滚滚，南军炮兵观察哨无法说出其炮



火的效果如何。一个多小时过后，联邦军的许多大炮停止了射击。这是为了对付预期的邦联军进攻而保存弹药，同时为了欺骗敌人，使之认为联邦军的炮兵已丧失了战斗力。

邦联的炮手中计了：他们以为，其炮火已击毁北方佬的大炮；近3时许，邦联炮兵停止了炮击；身穿灰军装的邦联步兵开了上来。当13000名叛军以阅兵的分列式队形接近联邦军战线时，北军的大炮突然开始猛射，把邦联军的队伍切成数段。随后，北军步兵向正在疏散的南军纵列队伍打起阵阵排炮。虽有少量叛军冲过石墙，但不是被立刻射倒，就是被俘。皮克特自己的那个师，三个旅长有两个阵亡，一个负重伤。他的十三个上校，个个非伤即亡，无一幸免。在其余的几个旅中，军官的伤亡数字，几乎也有这么多。在这场战争的最著名的一次冲锋中，进攻部队只有一半回到自己的战线一边。李将军骑着战马来到他们中间，试图用以下的话作为安慰：“这都是我的过错。”“你们务必帮助我。”“凡是没负伤的，都要重整旗鼓。”

## 战斗的后果

罗伯特·李和朗斯特里特热狂运筹，修补其防线，以迎接意料中的联邦军反攻。然而，并未发生任何反攻，负伤的汉考克要求米德发动攻势，但是，小心翼翼的米德，只当了六天指挥官，其中就有三天为部队的生死存亡而战斗，现在却没有心情去利用机会。他担心部队因伤亡惨重和精疲力竭而丧失了战斗力，不能发起攻击。不错，联邦军损失惨重，有3155人阵亡，14529人负伤，5365人失踪——伤亡总数为23049人，占部队86000名作战人员的四分之一强。战场上尸陈狼藉，其惨状为这场战争所仅见：数千匹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马与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士交错枕藉。但是，米德尚有一支20000人的预备队，这些人在为时三天的战斗中，

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一位比米德更敢作敢为的将军很可能让这支生力军充当反击先锋。邦联军比联邦军的伤亡更为惨重。他们的炮弹几乎耗尽，在 52 名将官中，有 17 人非死即伤，而其他人员伤亡介于 25000 人到 28000 人之间——为参战的 75000 名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强。

米德的谨小慎微在战斗结束后，依然如故。罗伯特·李的军队 7 月 4 日在战壕里整整待了一天；接着，在满怀希望地开始北进的整整一个月后，这支部队垂头丧气地冒着暴风雨撤往弗吉尼亚。林肯从一开始就认为，邦联军的进攻不但不会构成威胁，在更大程度上倒是个机会——是个在远离后方基地的地方削弱并有可能消灭叛军的机会。在总统的敦促下，陆军总司令哈勒克一再给米德发电，指示他“向前推进，在李渡过波托马克河以前向其发动进攻。”<sup>2</sup> 联邦军骑兵对罗伯特·李率师撤退加以骚扰，击毁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上架的浮桥。由于近日多雨，该河的水位太高，无法涉水而过，遂使罗伯特·李陷入困境。掉队和开小差已使李部的作战人员减至 42000 人，而米德则得到增援，其兵力恢复到 85000 人。然而，米德本人却精疲力竭，对哈勒克不断地发来的催促电报显得心烦意乱。他慢吞吞地尾随着罗伯特·李，对是否进攻邦联军设于威廉斯波特的筑垒防线犹豫不决。此时，邦联军的工兵则在拼命地飞架一座新桥。在 7 月 13—14 日夜间，叛军从新架起的桥上逃之夭夭，仅损失了几百名殿后部队。

林肯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极为懊恼。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写道：“我只有一、两次看到总统如此烦躁，如此垂头丧气。”林肯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只要伸出手去，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说或怎么做，都无法使军队前进。”<sup>3</sup> 当哈勒克函告米德，总统很不满意时，这位性情暴躁的将军就递上了辞呈。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米德尽管行动迟缓，但葛底斯堡之战而为

公众所大加赞扬。在取得这样一次胜利后解除一位将军的职务，这对政府来说，如果不是更糟的事，似乎也是一件蠢事。哈勒克再次向米德保证，政府对他很信任，并拒绝接受辞呈。林肯伏案给米德写了一封信，以平息将军的怒气。但总统本人的不悦却使这封信有悖他的初衷，所以他始终没有发出这封信。他在信中先对米德的胜利表示祝贺，然后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将军，我相信，你并未意识到李的逃遁所带来的不幸有多大。你完全可以抓住他。联系到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如果抓住他，就会结束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场战争将无限期地拖延。”<sup>4</sup> 林肯所说的“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指的是夺取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以及罗斯克兰斯把布雷格逐出田纳西中部。

## 联邦在西线的胜利

### 攻下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

在5月22日进攻失利后的六个星期中，在维克斯堡，联邦军坚定不移地加强了对它的包围。工兵在邦联军防线下挖掘坑道，并于6月25日在坑道中实施地雷爆破，但与之配合的进攻却未能取得突破。另一地雷准备在7月6日爆破，届时格兰特计划发动一场全力进攻。但是，不待北军发动进攻，叛军就够呛了；他们的口粮已经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昼夜受到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轰击的威胁；白天还有狙击手对他们放冷枪；他们已疲惫不堪，几乎处于饥饿状态。留在维克斯堡的平民住在洞穴里，分吃士兵那点配给的食物，到后来，就用骡肉和老鼠来充饥了。他们把获救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约瑟夫·约翰斯顿身上，他集中各部队残余力量，组成一支30000人的军队，滞留在东面20英里处的大布莱克河的对岸。但约翰斯顿缺乏给养、武器和交通工具，而格兰特的防

线却因拥有 70000 名顽强而装备精良的老兵而得到加强。6 月 15 日，约翰斯顿向里士满报告：“我认为，维克斯堡已经没有救了。”<sup>5</sup>

被困在维克斯堡的许多士兵也是这样想的。6 月 28 日，他们向彭伯顿将军发出呼吁书，其结尾是：“你如果不能给我们口粮，你最好就投降。”<sup>6</sup> 7 月 3 日，彭伯顿打着白旗越过防线，同格兰特谈判投降条件。当然，双方对此时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形成高潮的这些事件，都一无所知。维克斯堡要塞于 7 月 4 日正式投降。30000 名邦联军战俘宣誓（即他们发誓，在交换战俘以前，不拿起武器）后，被释放。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趁机逃回家园，再也不打仗了。

7 月 4 日天黑以前，谢尔曼率军 50000，尾随着正在兜圈子的约翰斯顿的部队。约翰斯顿把这些邦联军撤回到杰克逊城，希望诱使谢尔曼派步兵猛攻那里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经过若干激烈的小冲突，谢尔曼开始包围该城，以便像在维克斯堡那样使守军遭受饥饿而屈服。这正是约翰斯顿所担心的。因此，他于 7 月 16 日夜开始悄悄地撤退，把密西西比中部拱手让给联邦军。

邦联军的损失还不止于此。5 月 23 日，联邦军的班克斯将军以 15000 部队以及法拉格特舰队的几艘军舰包围了哈得孙港。这个港口周围的塹壕以及沟壑、树林和河川的浅水支流等天然防御屏障，比起维克斯堡的设防，毫不逊色。班克斯于 5 月 27 日和 6 月 14 日曾两次发动进攻，两次均被击退，使联邦军的伤亡 10 倍于守军。第二次进攻失利后，班克斯就主张迫使守军因饥饿而屈服，而这次守军所遭受的饥饿之苦更甚于维克斯堡。一位邦联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吃光了“所有的牛肉、所有的骡子、所有的狗、所有的耗子”。<sup>7</sup> 维克斯堡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哈得孙港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好在 7 月 8 日投降。邦联军被一截为二。此时，密西西

比河便成为联邦军的一条交通干线。7月16日,泊在新奥尔良码头的一艘商用汽船就来自圣路易斯,一路上并未受到什么骚扰。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叛军狙击手虽然令人生畏,但林肯说得好:“江河之父将平静地回归大海。”<sup>8</sup>

人们普遍认为,格兰特指挥的维克斯堡战役是这场战争中最成功的战役。他的部队毙伤敌军10000,又俘敌37000(维克斯堡30000,在此以前7000),其中包括十五位将军,而自己的伤亡却不到10000。他们还缴获了172门大炮、60000枝步枪。一位著名的英国军事史家写道:“我们必须追溯到拿破仑指挥的历次战役,才找得到时间同样长,损失同样小,而战绩又同样辉煌的战例。”林肯对维克斯堡的结局感到很高兴,这与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坐失良机大不相同。总统说:“格兰特是我需要的人;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也是他需要的人。”<sup>9</sup>

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损失从根本上动摇了邦联。一位在维克斯堡被俘的邦联军列兵写道:“现在,我看,现在南部已没有任何维持下去的前景了。我们丧失了密西西比河,我们的国土被分割,剩下的已经不值得为之战斗了。”一位曾在葛底斯堡战斗过的叛军士兵后来写信给他的姐姐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他们处处都在狠揍我们。……我希望他们会讲和。这样,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就能重返家园。”维克斯堡的失守,使杰弗逊·戴维斯“至为忧伤。……我们现在正处在政治生存的最黑暗时刻。”邦联军械处主任乔赛亚·戈格斯于1863年7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

各种事件以灾难性速度接踵而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就要取胜。李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威胁着哈里斯堡,甚至威胁着费城。看来维克斯堡要嘲弄格兰特的一切努力……。但现在,眼前的景象之暗淡,就仿佛早先它有过光明的时刻那样……。人的力量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

此变化，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昨天还驰骋于成功之巅——而如今，我们的命运似乎就要彻底完蛋。邦联现在摇摇欲坠，行将解体。<sup>10</sup>

## 邦联军撤出田纳西州

1863年7月，南部在一连串灾难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的部队从田纳西中部的撤退。1862年底的斯通河之战结束后，在近半年时间内，两败俱伤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默夫里斯伯勒以南交战。尽管罗斯克兰斯的坎伯兰军团所拥有的步兵团几乎比田纳西军多两倍，但邦联军在骑兵方面还是占优势。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瑟夫·惠勒率骑兵向罗斯克兰斯的交通线发动了好几次袭击，而约翰·亨特·摩根则开始发动一场颇有声势的然而收效甚微的袭击。他一直挺进到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最后他和他的大部分人马一起被俘。游击队亦给联邦方面的供应线造成严重的破坏。罗斯克兰斯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出一支骡队进行袭击（他的马匹不足），深入邦联军后方，切断了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之间的铁路线。但是，福雷斯特在亚拉巴马州追上了这些袭击者，并将他们俘获。

华盛顿不断地催促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击布雷格的战役。就在林肯等得不耐烦时，罗斯克兰斯终于在6月24日采取了行动。他一旦行动起来，就不顾一连两周下雨，快速和机智地把手下的63000人部署就绪。在坎伯兰的丘陵地带，有45000邦联军踞守在四个隘口后面的坚固防御阵地上。罗斯克兰斯一面用骑兵和一个军的步兵佯攻西面的隘口，一面派出三个军穿过或绕过其余的隘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邦联军在弄清是谁在进攻他们之前，不是被赶出阵地，就是被从侧翼绕过。

布雷格被迫撤回塔拉霍马之后，又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联邦军

的一个装备着可连发七弹的新式卡宾枪的步兵旅乘车迂回到邦联军的后方，并威胁了他们的生命线——铁路。他再次后撤，一直撤退到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仅以伤亡 560 人的代价，就把敌军几乎压到佐治亚州境内。来自华盛顿的电报通报葛底斯堡大捷和维克斯堡大捷的消息，使罗斯克兰斯很生气。他回电说，他希望陆军部不要只“因他写下的不是血书”，就无视他取得的成就。<sup>11</sup>

查塔努加是个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城市，位于田纳西河流经坎伯兰山脉时冲刷而成的山峡中。它既是邦联控制下的两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的枢纽，又是通往田纳西东部和佐治亚军事工业区的门户。由于北军攻占维克斯堡已使邦联军被分隔成两块，那么再经查塔努加进入佐治亚州，又把邦联军分隔成三块

林肯极力敦促罗斯克兰斯乘邦联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击查塔努加。但是，这位受到坚决支持的将军则坚持认为，不修复全部铁路和桥梁，不把新的后勤基地堆满物资，就不能向前推进。罗斯克兰斯还要求另一支联邦军同时从肯塔基向诺克斯维尔推进，以保护其左翼。这就是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指挥的那个新组建的俄亥俄军团。他在被解除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后，就被派往西线。8月中旬，两支联邦部队开始向前推进。伯恩赛德的 24000 部队迫使在数量上居劣势的邦联守军要么从诺克斯维尔撤退，要么投降。多数守军投奔驻扎在查塔努加周围的布雷格的主力部队。9月3日，伯恩赛德进入诺克斯维尔，终于达到了林肯所期望的解放田纳西东部的目的。

与此同时，罗斯克兰斯再次显示出他那一旦行动起来，就能迅速而机智地调动千军万马的能力。他一面以三个旅的兵力佯攻查塔努加北部各交通要冲，一面率领大部分部队在该城南部的几个地方同时横渡田纳西河。布雷格受佯攻的迷惑，以为“耗子从这么



多洞里同时窜出来”，他发现在城南出现的联邦军已从两翼威胁着他在查塔努加的强大防御工事。<sup>12</sup> 随着联邦军越过崎岖的山口挥师东进，直指布雷格的生命线——西部通往大西洋的铁路时，这位邦联将军于9月9日撤离查塔努加。

## 奇克莫加战役

这是罗斯克兰斯在两个月内第二次把布雷格调离战略要地。可现在战争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布雷格施展了他的骗术诡计，把“逃兵”派往联邦军战线，传播邦联军士气低落以及撤退的谣言。罗斯克兰斯急忙率部队前进，以切断这想像中的撤退。他让三个军分别穿过相距各20英里的山峡。然而，布雷格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在查塔努加东南集结兵力，以打击彼此分离的联邦军各部。布雷格已得到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顿两个师的增援，从而使他的兵力与罗斯克兰斯相差无几。在里士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戴维斯和罗伯特·李决定让朗斯特里特再率领两个师驰援布雷格。邦联铁路当局虽然条件有限，但倾其全力把12000部队以及全部装备、大炮和牲畜从弗吉尼亚州运到佐治亚北部。由于伯恩赛德的部队已封锁了经由诺克斯维尔的近路，邦联军的增援部队就不得不途经亚特兰大，沿着不同路段遭到破坏的铁路线而绕道965英里。此行花了10天，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部队按时抵达，参加战斗。但是，他们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朗斯特里特抵达以前，布雷格曾有三三次机会，可以伏击罗斯克兰斯的分散的部队。但是，他的军长们每次都找到了不执行进攻命令的借口。这些流产的邦联军调动使罗斯克兰斯开始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他命令各部队在查塔努加南面十二英里的奇克莫加河谷集结。随着朗斯特里特的第一个团于9月18日下火车，邦

联军各部即开始强行通过奇克莫加，企图包抄联邦军左翼，并切断联邦军与设在查塔努加的基地的联系。翌晨，全面战斗爆发。这次战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次战争中最为激烈，然而又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次战斗。战场的很大一部分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能见度有限；各师、各旅都各自为战，与全面的战斗计划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一位联邦军将领把奇克莫加战斗说成是“一场疯狂的非正规战斗，与大规模的游击战颇为相似”。<sup>13</sup>

尽管双方都未在9月19日取得任何优势，但邦联军的几次以师为单位的进攻，已迫使联邦军收缩防线。乔治·H. 托马斯指挥的联邦军左翼承受着大部分压力。托马斯预料邦联军会在早晨再次攻击他那个军，于是就说服罗斯克兰斯加强左翼。布雷格的确打算袭击联邦军左翼。可是，他在9月20日晨的进攻发动迟缓，而托马斯则有援军助一臂之力，打退了邦联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都损失惨重。

后来，邦联军来了好运气，从而使战斗变得对他们有利。一位联邦军参谋没有看见一个联邦师在弥漫的硝烟和树丛中列成阵势，于是就报告说，联邦军右翼有个缺口。罗斯克兰斯命令另一个师前去堵住这个假想的缺口。于是，当这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去填补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缺口时，却造成真正的缺口。恰巧，朗斯特里特就在这时径直向这个因联邦军这次错误的调动而造成的缺口发动进攻。中午时分，叫喊着的叛军突破了缺口，切断了两个联邦师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进击右翼的余部，并大有楔入托马斯部队背后之势，而此时托马斯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对付正面的敌人。罗斯克兰斯与溃退的联邦军右翼部队不期而遇，他和各师的残部一起逃往查塔努加。然而，托马斯仍保持镇静，把三分之二的兵力坚持在阵地上。幸有两个后备旅及时赶到，他才免遭一场大难。由于两个后备旅的增援，托马斯在联邦军右翼建立了新的防

线，击退了邦联军的好几次全力进攻。就在这天夜里，联邦军撤往查塔努加。托马斯因其非凡的指挥才干而得到“奇克莫加岩石”的美名。

奇克莫加之战是邦联军的一次重要的战术性胜利。罗斯克兰斯电告华盛顿：“我们遭到极大的灾难。”消息传到里士满，一位政府职员兴高采烈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大捷的后果将是激动人心的。整个南部将再次充满爱国热忱，而北部则将相应地意气消沉。……可以断言，联邦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分布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的南部人民是不可征服的。”<sup>14</sup>

但是，南部的胜利是以伤亡 18454 人的代价换来的，几乎占参战人员的 30%。联邦军的伤亡也几乎相等（16170 人）。但是，北部的损失可以弥补，而南部则不能。结果，奇克莫加战役成了邦联军的最后一个有意义的进攻性胜利。这场胜利还表明它是一场没有战略性后果的胜利。由于布雷格未能乘胜扩大战果，罗斯克兰斯仍占据着查塔努加。

相互责难困扰着邦联军的高级指挥层。由于布雷格未能利用朗斯特里特的突破，也由于他没有在次日趁联邦军仍然混乱之机再次发动进攻，布雷格麾下著名的将军们一起指责他作战的战术拙劣，而好争论并爱吹毛求疵的布雷格则指责他的几位部下动作迟缓或不服从命令，他把两位军长撤职。后来，争吵竟闹到这种地步，杰弗逊·戴维斯为此从里士满长途跋涉到布雷格的司令部去平息这种讨厌的争论。但这位邦联总统竟把问题处理得极其糟糕了。他当着布雷格的面询问每个主要将军：是否认为部队需要一个新统帅。每个人都说要个新的统帅，但戴维斯却决定仍由布雷格指挥！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是南军数一数二的将领，都可担当此任，然而却不为戴维斯所青睐。戴维斯仍然器重布雷格，然而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

## 查塔努加的几次战斗

奇克莫加战役结束后，林肯处理指挥问题时更为灵活巧妙。邦联军已把罗斯克兰斯围困在查塔努加：布雷格的部队已占领该城东面的传教士岭，并把大炮架到雄伟的卢考特山顶，从而控制住西面和南面的全部道路。北方佬能够利用的唯一的供应线是条迂回的道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北部。不过这条道路在雨天几乎无法通行，而且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很容易受到叛军炮火的袭击。然而，联邦政府还是决定增援罗斯克兰斯。陆军部命令谢尔曼指挥的 17000 人从密西西比州东进，并用火车把波托马克军团的 20000 人从 1200 英里以外的弗吉尼亚调到查塔努加。林肯再次起用约瑟夫·胡克，让他在新战场上指挥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军。这次战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后勤成就就要算部队的这次调动了。北军从弗吉尼亚调往田纳西的部队几乎是邦联军上个月调动数量的两倍，但距离更远，需时更短。

但是，只要查塔努加的部队得不到给养，把这些士兵部署到那里就毫无意义。坎伯兰军团有面临长期饥饿之虞。到 10 月中旬，已有数千匹战马死去，士兵的口粮也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奇克莫加的失利似乎使罗斯克兰斯一蹶不振，无力应付这场危机。10 月 17 日，林肯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联邦所有军区通通交给格兰特将军全面指挥。格兰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托马斯接替罗斯克兰斯的职务，担任坎伯兰军团司令。他的第二个行动是亲自往查塔努加。正如一位军官后来所写的那样，当格兰特抵达时，“我们开始看到事情在进展。我们感到每件事情都按照计划进行。”<sup>15</sup> 格兰特执行了一个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以打破对给养的封锁。10 月 27 日夜，一个联邦旅乘架设浮桥用的平底船悄

悄地顺流而下，前往布朗渡口；同时另外两队人马则从陆路前去攻击把守通往渡口的各条大道的前哨。联邦军在拂晓时分开始出击，先是把邦联军赶跑，击退其反攻，随后即架好浮桥。于是，他们在卢考特山顶的邦联军大炮射程以外建立了一条新的供应线（饥肠辘辘的联邦士兵给它起了个“饼干线”的雅号）。

由于驻扎在卢考特山谷的兵力不足以防止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布雷格根据戴维斯总统的命令于11月4日派朗斯特里特率15000人（后又增加了5000人）前去把伯恩赛德赶出诺克斯维尔，因而又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朗斯特里特认为这是甚为愚蠢的行动，这使布雷格的兵力减至45000人，而这时新抵达的胡克部则使联邦军的兵力骤增至将近60000人。朗斯特里特还认为，就他所接受的任务而言，他的兵力是太少了。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邦联军于11月29日向诺克斯维尔防御工事发动的攻击被击退了，南军损失很大。

谢尔曼率另一支部队——田纳西军团的17000人再回到查塔努加，于11月15日抵达，从而使联邦军拥有了主动权。联邦军的三大主力——坎伯兰军团、田纳西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各有一部在格兰特统帅下组成联军共同作战。这是在这次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布雷格在400英尺高的传教士岭上据守着一条六英里长的防线，山脚下和山顶上都掘有战壕，而在陡峭的半山腰，还有一条未修完的散兵壕。邦联军的三个旅占据着高达2000英尺的卢考特山。内战的全部经验告诉人们，从正面攻击传教士岭无异于自杀。因此，格兰特的作战计划要求，由谢尔曼率田纳西军团的四个师在岭北端实施侧翼攻击，同时由胡克率三个师直接进攻，或者绕过卢考特山，穿过其间的山谷，直扑传教士岭，进攻那里的叛军左翼。托马斯的坎伯兰军团担任的是次要任务，即威胁邦联军中路，以防敌军向两翼增援。托马斯的部队急于为奇克莫加的失败

报仇，因而为充当这个消极角色而恼怒。他们坚决要格兰特收回成命：“他们不得跃出战壕出击。”<sup>16</sup>

11月24日，胡克的几个师经过连续的小规模战斗，精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把数量上居劣势的叛军赶下卢考特山。由于这些战斗被大雾遮掩，故称为“云端战斗”。次晨，雾散日出，卢考特山顶上的一面星条旗在两军面前迎风招展。这时，谢尔曼的几个师却遇到了麻烦。他们在攻下传教士岭北端的一座小山后，发现这座小山不过是条支脉，一条乱石嶙峋的峡谷把它与主脉分隔开来，那边盘踞着帕特里克·克利伯恩的加强师，这是布雷格手下的最好的一个师。11月25日晨，谢尔曼手下经过战斗锻炼的西部人向该阵地发动进攻，但未能成功。尽管格兰特派兵增援，谢尔曼仍是毫无进展。

当胡克率师赴传教士岭另一端时，由于查塔努加河上的桥遭到破坏而耽搁了几个小时，当他抵达后，格兰特即命令托马斯向传教士岭下的第一道叛军战壕防线实施牵制性攻击。托马斯的士兵以曾在奇克莫加溃退的部队中的两个师为先导，斗志昂扬地开赴前线，一举攻占了这些地势较低的战壕。然而，他们一旦攻占了这条战壕，就立刻把自己暴露在叛军于山腰和山顶的第二道和第三道战壕组成的火力之下。联邦军的若干团开始向山坡进逼。很快，在一片兴奋的叫喊声中，全线同时向前推进，越过由战壕组成的第二道防线。格兰特怒气冲冲地问道：“是谁下令让他们攻上山的？”谁也没有下达这道命令。它不过是在士兵们开始行动后，由第一线指挥官临时下达的命令。正像格兰特和托马斯在一英里以外的后方指挥所惊异地观察到的，联邦军在这次进攻中，比皮克特在葛底斯堡的进攻显然更没有希望，但他们蜂涌向前，直插顶峰。

但是，布雷格的工兵军官犯了个错误，他们把高处的战壕筑在该岭地形上的制高点，而不是筑在略低几英尺的“军事上的制高

点”，以使地面上的一些隆起地块挡不住其火力。因此，迎面而来的北方佬发现了这些沟壑和小洼并在它们的掩护下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足以向叛军防御阵地纵射的距离内。顷刻间，惊慌失措的邦联军垮掉了，数千名士兵非逃即降。一位军官写道，大获全胜的联邦军“完全陶醉在兴奋之中”。他们在这嘲弄人的胜利中高喊着“奇克莫加！奇克莫加！”，同时还看着身着灰色军服的叛军“仓皇逃下山去，遁入林中，一路上丢下不少背包、滑膛枪和毛毯”。

格兰特认为，“再也没有别的部队像布雷格的军队那样遭到痛打的了”，所以希望组织一次猛烈的追击，以全歼之。可是，克利伯恩那个师并未后退一步，从而有效地发挥了殿后作用，使布雷格得以在南面 25 英里处的佐治亚州的多尔顿附近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打了几个小仗后，天气变得恶劣起来，两军各自返回冬季营地。<sup>17</sup>

猛攻传教士岭是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当有人谈起布雷格曾认为他的阵地坚不可摧时，格兰特微笑着说：“嗯，它曾经是坚不可摧的。”<sup>18</sup> 坎伯兰军团完全收复了奇克莫加。不仅如此，该军团还最终完成了在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突破邦联军后方以后所开始的一连串胜利，尽管前面还有一些流血最多的战斗。查塔努加的失守也决定了布雷格的命运。这位将军私下向戴维斯承认：“这场灾难不容辩解。作为一个指挥官，这是罪有应得。我们两人恐怕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一片反对声中仍决定我留任指挥官。”<sup>19</sup> 戴维斯勉强任命约瑟夫·约翰斯顿接替布雷格担任田纳西军司令的职务。

查塔努加大捷进一步证实，格兰特是联邦最伟大的将军。从此以后直到 1864 年 3 月，他担任联邦陆军总司令。和格兰特一起成为联邦最后胜利的缔造者的，还有另外三位也曾在查塔努加作战的将军——谢尔曼、托马斯和谢里登。他们四人皆来自西部战

场。1864年，他们之中的两位——格兰特和谢里登——前往东线的波托马克军，试行他们制定的克敌制胜的方案。

## 1863年的战争与外交政策

1863年1月，亨利·亚当斯·在伦敦撰文称：除非联邦军队再遭到一次灾难性打击，否则邦联就没有希望得到外国承认。钱瑟勒斯维尔就是这样的一次灾难。之后，罗伯特·李入侵宾夕法尼亚和格兰特进攻维克斯堡的初战失利，都使人们重新谋求邦联得到外交承认。6月22日，拿破仑第三曾就联合承认南部而采取行动的问题与英国议会的亲邦联议员进行磋商。对这一行动很不幸的是，被选中于6月20日在英国议会提出此动议的人是约翰·罗巴克，他是一个被亨利·亚当斯恰如其分地形容为“比半疯还半疯”的人。罗巴克在一篇漫无边际的讲话中，不慎重地泄露了他和拿破仑第三的谈话细节。议会对这种追随法国的想法，顿时爆发一种沙文主义的愤怒。帕默斯顿否认政府已从巴黎收到有关此问题的任何官方文件（这是有点儿诡辩的）。拿破仑第三对罗巴克的辜负信任颇为懊恼；于是，此事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不但使亲邦联派普遍丢了脸，更使罗巴克信誉扫地。随后传来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被攻下的消息，这对寄希望于英国的南部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亨利·亚当斯在7月23日写道：“现在人们立刻承认，谋求外来干涉的一切想法都已破灭。剩下的唯一冲突机会是铁甲舰事件。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注视着这些铁甲舰。我认为，我们将会解决。”<sup>20</sup>

---

• 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名记者、作家。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内战期间，其父亲弗朗西斯·亚当斯任联邦政府驻英国公使，他任父亲的私人秘书。著有《美国史》、《民主：一部美国小说》等。——编注



## 莱尔德撞角舰

亚当斯提到的铁甲舰与“莱尔德撞角舰”<sup>\*</sup>有关。这种战舰在1863年几乎使英美关系陷入危机。麻烦的根源在于英国对自己的1819年中立法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该法禁止“提供装备和设备、安装或武装”战舰以用来反对任何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1861年6月，佐治亚州人詹姆斯·布洛克率一个使团来到利物浦，为邦联购置或建造战舰。布洛克是一个顽强而机智的代理人，以有限的财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为邦联签了一个合同，建造两艘威力很大的商船劫掠艇，这就是后来的“佛罗里达”号和“亚拉巴马”号。这两艘商船劫掠艇击沉或俘获了一百多艘过往的美国商船。布洛克在利物浦的对手是美国领事托马斯·A. 达德利。这位领事雇用特务、密探、双重间谍专门收集违犯英国法律而为邦联建造上述两艘商船劫掠艇和其他军舰的证据。布洛克也用自己的间谍去对付他们，如伪造船舶国籍文件，向达德利的密探递送假情报，还制造假象，以便这些船只在驶离英国以前不能在法律上证明其真正用途。

英国为它的中立法提出了狭义的技术性辩解。外交大臣罗素勋爵说，只要这些英国建造的船只没有在英国领土上“安装和武装”成为战舰，就没有违反中立法。“佛罗里达”号驶离利物浦时没有武装，只是后来在巴哈马群岛（这本身即为英国领土）才被改装成为商船劫掠艇的。到1862年7月，由于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第290号”船将以同样方式驶离英国，罗素才下令没收该船。可是，就在这个命令由于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和官僚们的玩忽职守而被耽搁下来时，布洛克从一个双重间谍那里听到风声，于是不等没收令下达就把已造好的船开出海上去“试航”。该船再也没有返回港口，而是

---

\* 莱尔德撞角舰：这是一种在舰首装有金属撞角的军舰，由苏格兰探险家、造船技师莱尔德（1808—1861）设计并由他创立的莱尔德造船公司制造的。——译注

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按预定计划装备成一艘专门袭击商船的驱逐舰，从而开始了它以“亚拉巴马”号命名的海上作业。

布洛克还与莱尔德造船公司签订合同，建造两艘铁甲战舰，舰首的水下部分装有七英尺长的大铁钎。这类“莱尔德撞角舰”的威力超过任何船只，是专为撞毁联邦封锁舰队的木船而设计的。布洛克千方百计地保守机密，不泄露这种战舰的真正用途。他甚至把这舰只的所有权转让给一家法国公司，而这个法国公司表面上是为埃及的帕夏购买这些船的！但是，达德利的侦探们搜集到的证据堆积如山，都说明这些船是为邦联建造的。1863年的整个夏天，美国驻英公使弗朗西斯·亚当斯不断质问英国外交部，并含蓄地威胁说，如果允许撞角舰溜走，就要开战。罗素理屈词穷地答道，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奈何。9月5日，亚当斯写了一份气势汹汹的照会，其结尾的措词是：“我如果向阁下指出这就是战争，或许是多此一举。”<sup>21</sup>

次日，英政府扣押了这些船只，后来又买下，交给皇家海军。当外交信件公布时，亚当斯在美国几乎成了英雄，显然，由于他的“这就是战争”的照会才迫使约翰牛让步的。其实，在收到亚当斯照会的前两天，英政府就已决定扣押这些撞角舰了。然而，事情出现这种结果的确应归功于亚当斯。他在前几个月提出的强硬抗议，再加上西沃德在华盛顿对英国大使持同样强硬的方针，都始终对英政府保持着毫不松动的压力。英国商人和海军军官担心，如果一个中立的美国为英国的敌人建造驱逐舰，那末，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结局甚为可虑。因此，他们也向女王政府施加了压力。

对邦联来说，在外交政策处处不尽人意的一年中，<sup>60</sup>没收莱尔德撞角舰事件是最沉重的打击。求得英国承认和调停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现在，在英国建造战舰的机会看来也丧失了。由于受挫，邦联把英国一些领事（他们仍被官方派驻联邦）驱逐出南部城市，

并把詹姆斯·梅森专员从伦敦调至巴黎。这就等于外交关系的破裂。然而,这无损英国一根毫毛,而且,对邦联来说,除了或许保持住其受到损害的尊严以外,也毫无作用。从现在起,邦联的外交将集中于法国了。

### 在墨西哥的阴谋

起初,那个地区的事态似乎还很有希望。法国皇帝对南部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自1862年始,拿破仑第三就使帝国在墨西哥参与了一场冒险,而联邦的胜利则会危及他们的成功。1861年的墨西哥在政治和财政上的不稳定,引起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军事远征,以索回墨西哥欠下它们的外债。经过谈判解决后,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撤出军队。但是,拿破仑第三把一些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强加给软弱的墨西哥政府,并于1863年增兵35000人。这些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并于1863年6月推翻了自由主义的领袖贝尼托·胡亚雷斯。

与此同时,邦联已与墨西哥北部省份的反胡亚雷斯的酋长们结成准同盟关系,这些酋长们又从偷越德克萨斯边界的走私贸易中捞取好处。到1863年,南部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与法国签订一个协议。根据协议,邦联承认法国控制下的墨西哥政权,以换取法国对邦联的承认。当拿破仑第三策划选择奥地利的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时,邦联使者就到马克西米利安那里建议结盟。尽管这位奥地利人有这种愿望,但其主子拿破仑第三并不真心愿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国务卿西沃德巧妙地两个极端之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其一是放弃门罗主义;其二是公开与法国决裂。他彬彬有礼然而却坚定不移地警告拿破仑第三,美国不会容忍外国干涉墨西哥。但他同时也含蓄地暗示:法国如继续不承认邦联,他的国家就有可能承认马克西米利安。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相当奏效。在欧洲的冲突中越陷越深的拿破仑第三逐渐对墨西哥失去兴趣。他与邦联使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阻止法国为邦联建造战舰。邦联谋求欧洲的承认和援助的最后一次认真的努力已遭到失败。邦联于 1865 年垮台后,对天真的马克西米利安来说,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冒险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邦联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美国把 50000 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派到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而同时,西沃德对法国越来越大地施加压力,以使它的军队撤出墨西哥。法国于 1867 年撤军时,马克西米利安政府随之垮台,马克西米利安本人则为胡亚雷斯派系的人处决。

## 第二十章 1863 年的战争 问题与政治

北部在 1863 年下半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对联邦和邦联的内政产生了强大影响。在波托马克河以北，这些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半年一直在加速发展的后方对前方的支持日益减弱的现象。特别是葛底斯堡战役使北部人民兴高采烈，恢复了信心。一位纽约人得悉宾夕法尼亚这一战役的结果后写道：“这次胜利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政府的力量都增强了好几倍。……铜头蛇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sup>1</sup>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铜头蛇的势力已发展壮大，他们几乎使社会濒于分裂，在政界要重新组合，并使北部的战争努力发生动摇。

###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1863 年春，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正在俄亥俄州竞选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他在寻找一件有助于自己作出牺牲并得到提名的事件时，发现伯恩赛德将军无意中成了他的盟友。伯恩赛德的政治判断力表明并不比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所表现出的军事判断力好些。他被免去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职务后，便被任命为俄亥俄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sup>\*</sup>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铜头蛇

---

\* 联邦军和邦联军都建立了名为“军区”的地区军事组织机构。每个军区由一位负责指挥的将军领导，负责军区管辖范围内的作战和军事行政事务。某些军区的边界线和名称经常改变，这对研究南北战争的人来说，是产生极大混乱的根源。最活跃的联邦军区设在作战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邦联各地。然而，联邦各边疆州以及北部各州亦自

的老窝，而此时又恰逢反战情绪上升时期。4月19日，他发布“将军第38号通令”，宣布他的军区将不再容许叛国行为。

在5月1日的一个讲话中，瓦兰迪加姆故意向这个命令挑战。他把几个月以来所讲过的问题又说了一遍：这场战争是一次极其糟糕的失败；解放宣言应予否定；征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是违反宪法的；选民应该废黜“林肯王”；北部应该停止战斗，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复原先的合众国，如有必要，就排除新英格兰参加。根据伯恩赛德的解释，这就是叛国。5月5日凌晨2时，一连军队来到瓦兰迪加姆在代顿的家，破门而入，将其逮捕。

回顾一下过去五个月中在北部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能了解采取这一行动的背景。尽管历史学家对瓦兰迪加姆到底有多少追随者说法不一，但是，其势力的强大足以对北部在这个令人不满的冬天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构成威胁。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和编辑都在要求抵制解放奴隶，抵制征兵，甚至抵制这场战争本身。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前州长宣称：“尽管这些目标在这个〔解放〕宣言中是作为公开承认的战争目的而宣布的，然而南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征服。”衣阿华州的一位民主党编辑认为，解放宣言使人们有理由在北部反对革命。他写道：如果人民“具有一点点在喀提林\*被逐时曾激励着罗马的那种精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林肯〕〔连同〕内阁、国会等等通通扔到波托马克河里去。”在中西部几个县各自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武力是永远不能恢复联邦的”，同时号召“停止敌对行动”，并挑衅性地保证“我们不支持现政权为了实行邪恶的废奴而对南

---

行组成军区。部队在这些军区内负责击退入侵、镇压内部暴乱、防范间谍活动及破坏活动、负责征兵等。在1863年，俄亥俄军区由田纳西河以东的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和肯塔基各州组成。

\* 喀提林(Catiline, 约公元前108—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他曾阴谋反对元老院。——编注

部继续进行十字军征伐；……我们将誓死抵抗把我们的任何公民征入军队的一切企图”。这种情绪不仅限于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纽约的忠实党徒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的决议指出，“这场北部政府对南部进行的战争是非法的、违宪的，不应继续下去”。民主党的一个不热情的主战派霍雷肖·西摩在当选纽约州州长后，被推到了党的全国领导层。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沾满鲜血的、野蛮的和革命的”解放奴隶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sup>2</sup>

言论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大量的堂皇言论与信口空谈并无二致。但是，这种言论一旦导致人们采取行动，就像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危险了。这两个州在1862年的选举中已产生了民主党的州议会。这两个议会在就战争政策所进行的激烈摊牌中，同共和党的州长（于1860年当选）分庭抗礼。两个州的众议院都通过决议，号召停战，召开和会。伊利诺伊州议会甚至提出参加这样会议的几名特派代表。印第安纳的州议会轻蔑地否决了共和党州长奥利弗·莫顿的年度咨文，反而投票赞同纽约州州长西摩的那种“崇高的爱国激情”。两个州的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可以使本州部队撤出战争的议案。

理查德·耶茨州长在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排除了这种威胁。他援引了一条含糊的宪法条款，从而使议会休会。印第安纳州州长莫顿做不到这一点，也无法成功地否决任何议案，因为，按照印第安纳州的宪法，简单多数即可推翻一项否决。但是，该宪法具体规定：议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构成法定人数。在莫顿的纵容下，共和党人不出席州参议院的会议，以致达不到法定人数。足足有两年，这位意志如钢的人在没有任何拨款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州。他靠银行和铁路的贷款，靠共和党控制的各县的捐款，以及陆军部的一笔250000美元的补助金作为本州的活动经费。这是一种违背宪法但具有革命性的作法，不过这是革命时

期。莫顿提醒陆军部长斯坦顿：“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那你我都将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被逐出这个国家。”斯坦顿不无夸张地答道：“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sup>3</sup>

民主党主和派不仅在里士满而且在北部诸州都很有影响。邦联陆军部的一个公务员在1863年2月报告说，“一些来自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公民”已到达南部首都，

与我们的政府就结束战争的最佳办法进行磋商；若此举失败，就将提出西北部各州和邦联之间进行调整的某种方式，作为反对北方〔即新英格兰〕各州和联邦政府而实行的新的联合。……我毫不怀疑，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到年底，我们就将看到这种态势：对美国政府作战的北部人比对南部作战的奴隶还要多。<sup>4</sup>

铜头蛇操纵的报纸公开鼓动军人开小差。人们读了这些报纸，就给他们当兵的儿子写这样的信：“我很遗憾，你们在进行……这么一场并不神圣的、违宪的可恶的战争，……这场战争除了使黑人获得自由，使白人沦为奴隶以外，别无它图。……回家吧，你要是不得已当了逃兵，是会受到人们保护的。”来自铜头蛇势力嚣张的地方的部队开小差的最多。1863年初，第128伊利诺伊团除35人外，全部开了小差。这些逃兵宣称：他们愿“躺在树林中，直到背上长起苔藓，也不帮助解放奴隶”。第109伊利诺伊团获悉奴隶解放宣言的内容后，有半数的人开了小差，而另一半人则变得很不听话，致使格兰特将军解散了这个团。两个团都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地区的县份。<sup>5</sup>

为了反击民主党主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主战派组织了忠诚分子团体和出版机构，以动员人们对战争的支持。1863年，这些组织又合并为全国联盟（由共和党人控制）和效忠者联盟（以民主党主战派为主）。他们在是年的春季选举中获得首次成



功，\* 尤其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而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却十分卖力地选举反战州长。这些选举向共和党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民主党主和派如果可在新英格兰获胜，就肯定会在其他各州取胜。全国联盟动员了全部财力，联邦政府尽力予以资助，陆军部批准本地士兵放假参加投票（经验表明，压倒多数的前线士兵投共和党的票）。即使有这么多的帮助，共和党人在康涅狄格州也只获得51.6%的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43.8%的选票。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三党——民主党主战派候选人拒绝接受民主党主和派的多数地位，并把他们之间的较量纳入议会内，共和党候选人才成功当选。

在这种充满阴谋性谣言的政治气氛中，伯恩赛德以发表反战言论为理由逮捕了瓦兰迪加姆。一个军事委员会判决，在南北战争期间监禁这位俄亥俄人。一位联邦法官拒绝下令把瓦兰迪加姆交由民事法院监管。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谴责这种诉讼程序。纽约州州长西摩说道：政府的作法是“卑怯、野蛮和不光彩的。这岂止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这就是革命。……它确立了军事专制主义。……如果它得到支持，那么我们的自由就荡然无存了。”<sup>6</sup>

俄亥俄民主党人一致提名受害的瓦兰迪加姆为州长候选人。尽管林肯对此事感到为难，但他拒不否定伯恩赛德将军或军事法庭对瓦兰迪加姆定罪的判决。反之，他使用了高明的一着：他把处罚由监禁改为流放，从而使这位铜头蛇的义士黯然无光。打着休战旗的联邦士兵一路护送瓦兰迪加姆来到布雷格将军在田纳西的防线。邦联军勉强接受了这个令人疑信参半的礼物。

瓦兰迪加姆乘船偷越封锁线，从南部逃到加拿大，企图在那里

---

\* 与现在不同，举行州选举的时间在当时是因州而异的——有的在春天，有的在8月，9月或10月，有几个州在11月（与现在相同）。

指挥他在俄亥俄竞选州长的运动。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写的一篇颇受欢迎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使人们清楚地接受瓦兰迪加姆遭到放逐的教训。瓦兰迪加姆的一些律师把此案告到最高法院，并在最高法院辩论说，军事法庭在战区以外审判一个平民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最高法院于1864年2月拒绝复审军事委员会的判决，因而实际上维持了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sup>\*</sup>

##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瓦兰迪加姆事件是在民主党人畏惧黑人的心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决定招募各黑人团队，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1863年2月，一位反对黑人士兵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发雷霆道：“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应该由白人来管理、防御、保卫和维持。”43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环形签名请愿书，谴责征募黑人士兵是共和党企图建立“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的邪恶的阴谋的一部分。<sup>7</sup>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黑人士兵为北部而战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取得人身自由的革命向种族平等推进一大步。这很早就是北部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目标，他们要求把招募黑人入伍放在首要地位。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一旦让黑人获取黄铜色的人身特权证，让他带上饰有鹰像的衣扣，让他扛上一支滑膛枪并在兜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

---

\* 1866年，人们的战争热情已部分地冷下来后，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案情相近的军法判决。那个判决是在1864年对一位印第安纳州的铜头蛇兰丁·P·米利根作出的，其根据是，即使在战时，只要民事法庭在发挥作用，就必须由民事法庭审判平民。这项原则会使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无效。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瓦兰迪加姆案，是有争议的。因为，他已于1864年返回俄亥俄州，而且林肯政府也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呆在那里，甚至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否认，他已获得了公民权。”<sup>8</sup>

尽管黑人在独立战争和 1812 年战争中都曾持枪作战，但他们后来很快地被解除了武装。1792 年的一项联邦法令禁止黑人参加州里的民兵，而且也没有任何黑人获准参加正规军。1862 年，反蓄奴制的将军们在堪萨斯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占领区招募黑人士兵时，政府就不予支持。只要北部仅仅为恢复联邦——原先的联邦而战斗，那末林肯政府就会认为不得不让这场战争一直成为“一场白人的战争”。

### 海军中的黑人

然而，海军历来有一些黑人水手。战争一爆发，联邦海军就不管什么人都用，其中包括来自北部各海港的自由黑人和来自南部的逃奴。他们大都以奴仆身份当司炉和抬煤的脚夫，但也有些黑人执行战斗任务。早在 1861 年 8 月，在成功地袭击哈特勒斯湾要塞时，就有一队由逃奴编成的炮手在“明尼苏达”号旗舰上操纵一门大炮。九个月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斯莫尔斯的南卡罗来纳奴隶立下了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战功之一。他在查里斯顿港强行夺取了邦联舰只“普兰特”号，驶出港口投奔联邦封锁舰队。在战争后期，斯莫尔斯“舰长”就在联邦海军当领航员，之后，进入政界，开始其杰出的从政生涯。总计有好几千黑人在联邦海军服役。他们在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9</sup>

### 征募黑人士兵

1862 年，有些共和党人受到黑人参加海军作战的事例的鼓励，要求也征募黑人在陆地作战。到底雇佣体格健壮的逃奴比武装他们为联邦以及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会好多少呢？当北部因缺少白人志愿人员而使政府在 1862 年夏下令起草民兵法时，上述论点

变得更有说服力了。1862年7月17日颁布的两项法律，开创征募黑人士兵的时期。没收法的一项条款授权总统，“用他能做出最佳判断的方式”雇佣逃奴，以平息叛乱。民兵法的一项条款授权当局“在发现黑人能够胜任任何陆军或海军中的勤务时，可以招募他们服役”。<sup>10</sup>

这些法律都未要求总统征募黑人当兵。林肯临时把这些法律条款解释为授权他征募逃奴服劳役——自然，军队一年多以来就一直这样做了。林肯大抵已下定决心武装黑人，他只不过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宣布。他在处理此事时，沿用了解放奴隶的政策从制定到宣布的10周中所使用过的老办法。1862年8月4日，总统对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代表团说：“武装黑人会使忠诚地拥护我们的各边疆州的50000步兵反对我们。”六个星期后，他对芝加哥的一个代表团说了相同的话。但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斯坦顿却在8月25日悄悄地批准卫戍南卡罗来纳州沿岸诸岛屿的联邦司令官征募5000名自由民入伍。<sup>11</sup>

到1863年初，林肯已成为征募黑人士兵的热情支持者。总统在3月对田纳西州的军人州长说：“对恢复合众国来说，有色人口是一支极其有用但尚未利用的力量。只消把50000名业已武装起来，受过训练的黑人士兵部署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就会立刻结束这场叛乱。只要我们认真地抓紧此事，又有谁会怀疑我们能达到这点呢？”<sup>12</sup>

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总统的上述言论。陆军部设立了有色人种部队局来协调征兵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班克斯将军开始组建一个“非洲军”。曾为马萨诸塞州组建两个黑人团的北部废奴主义者乔治·L·斯特恩斯把征兵工作带到纳什维尔，以征募那里的黑人入伍。在已占领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军们组建了一些黑人团。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把洛伦佐·托马斯将

军派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去征募自由民入伍。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文职将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把办事能力与办事技巧融为一体，这种技巧对说服那些顽强但有种族意识的西部士兵接受这项新政策是必要的。到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已招募 76000 名黑人士兵，占黑人士兵总额的 41%。

1863 年春，格兰特麾下的一名伊利诺伊州士兵写道：“真诚地忏悔对灵魂是有益的。……在一年前的 1 月份，我不愿听到任何有关解放奴隶的事情。去年秋天，我冷静地接受了征募叛乱分子的黑奴的作法。今年 1 月份，我毫不犹豫地欢迎解放奴隶；而现在……我变得毫无〔种族〕歧视，看不出他们为何不能当兵。……我几乎在开始考虑如何在〔黑人〕团里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sup>13</sup> 这个士兵的“忏悔”暗示在某种条件下成立黑人团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条件就是少尉以上的全部军官及某些军士必须是白人。获得晋升的机会有助于许多白人士兵改变对武装黑人政策的看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种族主义军官，他们难得尊重部下。

一开始任命白人军官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任何军事经验的黑人是罕见的。在由以前的奴隶建成的团队，非文盲士兵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从北部征募的各黑人团也由白人当军官，尽管这些团里有些黑人士兵颇具备充当军官的潜在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从士兵中提拔有能力的黑人，就显然是出自种族偏见了。废奴主义者和黑人领袖虽曾抨击这种歧视政策，但收效甚微。在战时组建的 166 个黑人团中，被任命为军官的黑人不足百人（不包括军医和牧师），其中没有一个军官的军衔超过上尉。

在 1864 年以前，一直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歧视就是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间的薪饷的差别。根据 1862 年民兵法，黑人士兵的薪金定为每月 10 美元，而白人士兵却有 13 美元，外加 3.5 美元的服装费。废奴主义者有力地斥责了这种歧视。1863 年 8 月 10 日，弗雷

德里克·道格拉斯晋见林肯，抗议这种薪饷待遇的不平等。据道格拉斯后来回忆，总统对他说：

雇佣有色人种军队对有色人种来说，有很大好处——这一措施在战争初期未能成功地采用，有人对征募黑人当兵是否明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应征入伍极大地触犯了广泛存在的偏见，……他们没有得到同白人士兵相等的薪饷，看来是一种必要的让步，以便为他们真正作为士兵服役而扫清道路。<sup>14</sup>

尽管在1864年做了部分匡正，报酬方面的不平等不过是把各黑人团当作二等士兵对待的几种表现之一。有些团起初就是从事劳役的部队，他们挖掘堑壕，装卸军需品，为白人部队担任沉重的勤务工作。甚至当黑人士兵组成战斗单位时，也时常携带低劣的武器和装备。林肯原打算让黑人部队守卫要塞、保卫军需品临时仓库和辎重车队、担任后勤杂务，以便减轻在前线作战的各白人团队所承受的压力。这个想法出于三种考虑：（1）对黑人是否会成为善战的士兵持怀疑态度；（2）相信自由民深入南部担任驻防任务更能适应气候，而北部士兵在那里却深为疾病所困扰；（3）后方勤务工作会减少被俘的可能。

最后一个因素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邦联政府曾用处死和沦为奴隶来恐吓被俘的黑人团官兵。作为报复，林肯于1863年7月30日在—项政令中宣布：只要有一名联邦俘虏在违反战争法情况下被杀害，就会有一名叛军战俘被同样处死；只要有一名联邦士兵沦为奴隶，就会有一名邦联战俘从事苦役。这项命令只部分收到预期效果。邦联并未处决被俘黑人团军官，并通常把那些战前即获自由的被俘黑人当作普通战俘时待。但是，黑人投降后被害的事件却发生了好几起。1864年4月12日发生于田纳西州皮洛堡的事件最引人注目。有几位被俘的自由民显然是被处死了；有的重新交给

故主为奴；另外一些黑人战俘则在邦联防御工事里从事强制性劳动。由于难以得到南军对待黑人战俘的确切情报，林肯政府并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邦联亦拒绝交换黑人战俘，从而中止了交换战俘计划，并导致战俘在 1864 年人满为患、死亡率过高的悲剧发生。

由黑人接替白人担任杂役、体力劳动及卫戍任务，有助于说服白人士兵赞成武装黑人，但也使黑人团沾上低人一等的污名。这些黑人平日拖着长步，胡乱弹着班卓琴和听天由命的陈规陋习，使北部人怀疑黑人的军事能力。甚至有些废奴主义者也拿不准，这些生来就习惯于畏惧白人、服从白人的奴隶，是否会在作战中顶得住这些同样的白人。《纽约论坛报》1863 年 5 月 1 日写道：忠诚的北部人“已普遍愿意让〔黑人〕参战。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相信他们会认真参战。许多人希望黑人将被证明是懦夫和逃兵——其他人则对此甚为担心。”在黑人团任职的上校们恳求将军们让他们参加战斗，让这些士兵有一个验证自己的机会。

### 参加战斗的黑人士兵

黑人部队在维克斯堡战役中两次参战，改变了许多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5 月 27 日，两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团参加了对维克斯堡下游的邦联要塞哈得孙港所发动的进攻。尽管联邦军在进攻中受挫，伤亡惨重，但黑人士兵的英勇作战却使许多北部人大为吃惊。一位白人军官写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出，前几天的战斗是如何消除了我对黑人部队的偏见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次战斗“解决了一个问题，即黑色人种能够作战。”10 天后，在维克斯堡北部、濒临密西西比河的米利肯斯本德，新组建的几个逃奴组成的团队帮助击退了邦联企图在河西冲破联邦军防御阵地所发动的一次袭击。当时驻在格兰特部队的助理陆军部长写道：“黑人在米利肯斯

本德作战之英勇，完全改变了部队对雇佣黑人军队的看法。我听说，那次战斗结束后，那些在私下曾对让黑人参战的想法冷嘲热讽的优秀军官，都同样深深地表示赞许。”<sup>15</sup>

尽管黑人在这两年的两年中参加了几次大的作战行动，但比起白人来，他们还是更多地从事卫戍和勤务工作，而较少参加战斗。黑人和白人的伤亡率即反映出这一点。联邦的白人部队几乎有6%的人员阵亡，而黑人士兵阵亡者只占1.5%。另一方面，黑人部队的病死率（19%）几乎是北部白人士兵的两倍。作为卫戍部队，许多黑人团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却备受高病死率之苦。尤其是固守一处的士兵，那里的供水变质，细菌繁衍迅速传染疾病而置人于死地。黑人士兵的医疗条件也不如白人。黑人部队只有为数极少的黑人军医（只有八人编入现役），而白人医生都不乐意到黑人部队去。

到1863年10月，已经组织起58个黑人团。北部人最初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消除。确实，占领了南部的一些地区后，联邦征兵人员有时使用强行抓丁的办法，把仓皇而不愿当兵的逃奴赶到一起，强征入伍。在北部，甚至爱尔兰裔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黑人有阻挡叛军子弹的一些用处，否则，这些子弹很可能射向他们。这就是“列兵迈尔斯·奥赖利”（一位爱尔兰出生的新闻记者兼军官查尔斯·哈尔平）写的一首题为《黑人被杀的权利》的流行歌曲的主题：

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奇耻大辱；  
去招募黑人入伍；  
而遭杀戮的威胁，  
又非我白人莫属；  
可至于我啊，千真万确！  
我们这里很自由，



我要让黑人替我去遭杀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伙伴们，  
在这天的时时刻刻，  
被杀戮的权利我要与他共享，  
而我一丝怨言不吐。<sup>16</sup>

到1864年，民主党在黑人士兵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后退，只反对为黑人争取同等薪饷、同等入伍津贴和同等待遇。看来，黑人的唯一权利，就是被杀权。在废奴主义者的极力敦促下，国会的共和党人终于在1864年6月通过一项法案，给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以同等薪饷。但是，反对派迫使这项立法作出了某些妥协。为了取得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国会领袖们不得不接受一项议案，规定黑人士兵享受同等薪饷而补发薪饷的差额仅从1864年1月算起；除此之外，在内战爆发前即获得自由的黑人从入伍之日起领取同等薪饷。这项立法亦未能使奴隶出身的士兵取得同等的联邦入伍津贴。其他形式的歧视亦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即使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现象，招募179000黑人士兵（以及大约20000黑人水兵）一事，仍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黑人为联邦而战，将有助于他们的种族取得自由。黑人帮助北部打赢这场战争，也使他们自己在战后赢得平等的公民权。

## 北部的征兵

到1863年初，人们已逐渐明白，北部将像南部在一年前那样不得不征兵。前一年秋天起草的民兵法就说明这个情势。当时已招募的服役期为九个月的士兵（共90个团），将在1863年年中服役

期满。1861年征募的服役期为两年的40个团也将期满。尽管这些士兵中的一部分可望再次应征，但却极少有新兵自告奋勇前去应征。因此，1863年3月3日的兵役法规定，凡身体合格，年龄在20岁至45岁之间的男性公民(再加上已申请入籍的外侨)，均符合征兵条件。

兵役法虽然在表面上是一部征兵法，但其真实目的还是刺激人们志愿参军。根据总统在联邦历次征兵前(1863年7月、1864年3月、7月和12月)所发出的号召，陆军部给每个选举区定出一个兵额指标，这个兵额指标是根据合格男子减去已参军服役人数后的比数而提出的。但是，每个选举区都有50天的时间可使志愿兵的数量达到配额指标。只有在志愿人员的数量达不到指标时才使用征兵办法。州的官员和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确保志愿兵人数达到指标，以避免征兵的污名。

补助金是刺激志愿人员的主要手段。后来，这逐渐变成联邦征兵制的最大弊端(南部缺乏资金，在强制和劝导两者之间，更多地依靠前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点\*)。因为新兵来源减少，迫使各选区不得不提高价码，竞相争夺志愿人员。有钱的选区诱使人们离开他们居住的选区，到给钱最多的地方入伍。1863年10月，联邦政府制定一条法令，发给每个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sup>3</sup>00美元的入伍津贴。到1864年，某些选区的新兵从联邦、州和地方领取的津贴总额可能增至1000美元以上。在战争期间，北部政府付出的入伍津贴数额超过五亿美元。一时间，专事招徕新兵的大批“入伍津贴掮客”冒了出来(他们提取部分津贴金作为佣金)。这个征兵制亦产生一批“入伍津贴扒手”，这些人在一个选区入伍，领

---

\* 南部有几个州和县向志愿人员提供少量入伍津贴，通常为50美元。邦联国会于1861年12月11日批准向为期三年的志愿兵追加50美元，并于1864年2月17日投票，决定发给每个入伍人员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

到补助金后，便不辞而别，然后再易地重演故技。有些新兵这样干了几次；有个人竟承认自己曾这样干了 32 次之多。

顶替和赎身的作法同样地臭名昭著。联邦草拟的征兵法与邦联的征兵法不同，它没有规定职业上免服兵役的条款。可免服兵役的人只包括：身体不合格者和唯一供养寡妇、或贫困父母、或孤儿或没有母亲的儿童的人。但是，北部法律的确援引邦联的先例，允许应征人员提供替身。为防止替身价格像南部那样地涨到天文数字，这一征兵法允许应征人员支付 300 美元的赎身费，但这只能免征一次，将来不能再免。

尽管在征兵中实行赎身以逃避兵役的作法在今天似乎令人震惊，但这在 1863 年却有过去的许多先例可循。然而，行骗和对不公正现象的告发都不可避免地与此些作法有关。“替身掮客”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替身佣金而致富。掮客与负责体检的军医狼狈为奸，把身体不合格的新兵送到部队。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志愿兵对这种征兵制允许以赎身逃避危险的方式感到不满。这些老兵常常排斥加入他们部队的替身兵。军官们在报告中对替身兵的军人素质说法不一，但多数人持否定意见。这些人的逃跑率似乎高于平均率。

赎身特权亦引起人们的愤懑。由于很少有蓝领工人拿得出 300 美元（至少是半年的工资），这种征兵制自然就歧视他们。就像南部早先的情况，人们开始大声疾呼：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只有穷人去战斗。鉴于日益强烈的抗议，国会于 1864 年 7 月废除了赎身的作法，当然，那些出于正当的道德或宗教理由而拒服兵役者例外。但正如反对此举的人所预见的那样，替身价格立刻飞涨；于是，比诸过去，更少的穷人能花得起这笔免征的钱。

人们通常认为，内战中的征兵制代价高昂，是个严重的失败。只有 46000 人被直接征入联邦军队，而替身兵却有 118000 人。加

在一起,这 164000 人以及早先入伍的数千名民兵,还不到联邦士兵的 10%。显然征兵是失败的。但是,当人们回想起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刺激志愿人员入伍时,就会出现一幅不同的景象。在实行征兵法的两年中,有将近 100 万志愿人员应征入伍或再次志愿应征入伍。因此,研究联邦征兵制的多数近代学者都得出这一结论:这个征兵制度尽管有许多缺陷,还是发挥了作用的。<sup>17</sup> 然而,这一制度实在搞得太不适当、太不公平,因此在未来战争中乃不实行征兵方法了。

## 士兵在内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

内战真是一场富人战争而穷人战斗吗? 联邦军士兵和邦联军士兵入伍前的职业资料使人们对这种普遍的看法产生怀疑。表 20.1 把联邦军士兵参军前的职业与来自的各州的全体男性的职业作了一个比较。<sup>18</sup> 乍看起来,该表似乎证实了“穷人战斗”的说法,因为白领工人与专门职业似乎在军队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士兵多为青年(平均年龄是 24 岁,且有近五分之二士兵入伍时才 21 岁,或不足 21 岁),而 1860 年的职业状况则代表着各种年龄的人。对 19 世纪美国职业流动性的研究表明,从事体力劳动或农业劳动的大量青年是在一生中稍后时期,才转入白领阶层或专业阶层的。考虑到这一点,联邦军队似乎就很能代表北部居民了。要说稍有区别的话,则是非技术工人未能充分表现出来——部分原因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有关邦联军士兵的职业资料十分缺乏。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学者是贝尔·威利,他利用各团的连队花名册,对七个州的 9057 人做了抽样调查,其结果见表 20.2。显然可以从该抽样调查看出,

非技术工人在邦联军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以士兵中的年轻人为例,白领工人的职业,特别是专业性之类的职业则比例过大。

除非南北两部应征入伍的农民都比居家农民贫穷(这从其他证据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邦联有“20种黑人”免于征兵,这虽臭名昭著,然而在统计上却无足轻重。),否则,这些在职业方面的抽样

表 20.1 联邦军白人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抽样与来自联邦各州全体男性士兵在 1860 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联邦军士兵 (美国卫生委员会抽样)	联邦军士兵 (贝尔·威利抽样)	全体男性 (据1860年人口普查)
农民和农业工人	47.5%	47.8%	42.9%
技术工人	25.1	25.2	24.9
非技术工人	15.9	15.1	16.7
白领工人和商人	5.1	7.8	10.0
专业性职业	3.2	2.9	3.5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2	1.2	2.0

表 20.2 来自阿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各州的邦联军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与这些州的白人男性在 1860 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邦联军士兵	白人男性 (据1860年人口普查)
种植园主、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61.5%	57.5%
技术工人	14.1	15.7
非技术工人	8.5	12.7
白领工人和商人	7.0	8.3
专业性职业	5.2	5.0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7	0.8

表明，这场战争无论在北部或南部，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一场穷人的战斗。

关于内战的另一个长期流传的神话是：北方佬征募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为其打仗。1864年，一位义愤的南部妇女对一位纽约官员说：“不错，北方佬！你们的整个军队是由爱尔兰人、荷兰人和黑人组成的。”《里士满观察家报》宣称，联邦军队主要由“德国和爱尔兰的地痞流氓”组成。将近一个世纪后，一位南部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北部士兵多为外国雇佣兵。”<sup>19</sup>

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联邦陆、海军中的210万士兵中，约有50万人（占24%）出生在国外，有20万人（占9%）为黑人。移民不但构成北部士兵的少数，而且在服兵役的适龄男性中，其比重还不够大。联邦陆军的白人士兵有26%是在国外出生的，而联邦各州的适龄白人男性却有31%生于国外。对移民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没有申报的外侨不属应征范围。因此，尚未申请入籍的移民不受强制性征兵的约束。我们占有的资料表明，国外出生的四大主要民族中的两个民族——英国新教徒和德国新教徒——的入伍人员比重与其男性居民的百分比相当；但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则不然。其原因可能是，压倒多数的天主教徒支持民主党，并反对这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和反蓄奴制的战争。<sup>20</sup>

由于国外出生的人有90%居住在联邦各州，联邦军的移民数量和比例就理所当然地比邦联军的高得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邦联军各团“除极少数例外的团外，通通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组成”的说法，也是一种神话。埃拉·朗的细心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9%或10%的邦联军士兵出生于国外。由于南部适龄男性只有7.5%的移民，这意味着国外出生的人在南军中的比例过大，这与北军中国外出生的人比例过小正好相反。<sup>21</sup>所以如此，原因尚不清

楚。这可能与邦联军中替身兵比例较高有关，其部分原因是从不属于征兵对象的外国移民中招募，部分原因是南部未能招募黑人当兵。而黑人参加联邦军，则减轻了对出生于国外的居民群体的压力。

## 北部对征兵的反抗与骚乱

虽然穷人和国外出生的人都按适当的比例担负战斗任务，但是，征兵对这些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最大。联邦征兵法成了民主党人和民族文化论者反战的触发因素。民主党的报纸和政治家煽动反对征兵的情绪。当兵打仗去解放黑人的前景加倍激怒了畏惧黑人的民主党选民。在一些城市，反对征兵的抗议变成了暴力行动。在中西部巴特纳特的几个区，武装团伙袭击并谋杀了征兵官员。

反征兵和反黑人的不满情绪犹如两颗火星，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大骚乱。骚动于1863年7月13日开始，爱尔兰工人和妇女组合的暴民横行大街，火烧征兵办事处，抢劫和焚烧共和党的要员的住宅，企图捣毁《纽约论坛报》大楼未逞。暴民们的主要目标是黑人。在一片“杀死黑人”的喊叫声中，他们至少杀死了十几个黑人，烧毁了黑人孤儿院。由于大部分民兵已开赴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葛底斯堡战役，所以这座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增长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骚乱的第四天，警察和从宾夕法尼亚州匆匆赶来的几个团的士兵终于控制住纽约市。波托马克军团的部队向暴徒开枪射击，其无情的程度与他们两星期前在葛底斯堡枪击叛军不相上下。这次骚乱所造成的损失令人咋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1200人，但最近的研究已把数字降到大约120人，其中多为被警察和军队杀死的暴徒。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动，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日趋紧张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复

杂关系。

骚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层和上层纽约人的反爱尔兰人情绪重新高涨，这接着又在1863年7月以后几个月中成为对民主党主和派普遍抱反感的组成部分。民主党人，即使不是铜头蛇，也在这种强烈的反响中进退两难。西摩州长的威望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他在发生暴乱的第二天赶到纽约，企图说服暴徒们平静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一开头就称暴徒为“我的朋友们”。共和党报纸从未使他忘记这个错误。的确，许多北方人认为，西摩的不少讲话都责难解放奴隶、责难征兵，因而煽起这场骚乱的责任。

纽约等地的反征兵暴乱平息下来后，征兵工作有了进展。尽管北部的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使铜头蛇在1864年夏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但民主党主和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再也不会像他们在<sup>1</sup>1863年春时那么有力了。甚至在纽约骚乱以前，由于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北部多数地方的反战情绪就开始低落下去。北部人在解放奴隶和解放黑人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在1863年7月也在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但这决不是因为各黑人团队对联邦事业作出了贡献。

## 解放奴隶事业的巩固

7月18日，即平息纽约征兵骚乱两天之后，联邦军的两个旅袭击了邦联扼查尔斯顿港门户的炮台瓦格纳要塞。这是为夺取查尔斯顿但未能制胜的一次战斗。这次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在内战中本是常事，然而，这次进攻所以独特，是因为由一个黑人团，即第54马萨诸塞团打先锋。该团的英勇战斗以及其伤亡之大，使它名声大噪。当白人暴徒在纽约市四处袭击黑人仅仅几天之后，黑人士兵就树立了这个为联邦捐躯的榜样，不能不说是最为



戏剧性的了。共和党各报都提出了这个明显的道德规范问题：为联邦而战的黑人比那些发动骚乱反对联邦的白人更应该获得权利。《纽约论坛报》评论道，此役“使瓦格纳要塞之对有色人种的声威高扬，正像90年前邦克山之对北部白人的声威大振一样”。《大西洋月刊》写道：“透过那黑夜的炮火烟幕，有色人种的英勇气概在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们的眼前闪光。”<sup>22</sup>

到1863年7月止，解放黑人的支持者和黑人士兵一直处于守势。现在，他们正好赶上将于这年秋季举行的重要的州选举，可以转入攻势了。激进的编辑们和演讲人用新的语调讲话，大胆而自豪。解放奴隶不再是一种政治责任。人们捍卫解放奴隶事业将不再是出于军事需要。现在，共和党人把它当作一场拖延已久的有关正义与权利的革命事业来加以维护。黑人士兵之英勇和铜头蛇叛徒之怯懦成了共和党人谈论的主题。林肯本人在8月26日的一封公开信中定下了调子。这封公开信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一份重要文件。林肯在这封致反对解放奴隶的人们的信中写道：

你们说你们将不为解放黑人而战，而有些黑人看来却愿为你们而战。……我军的一些战地司令官为我们带来了最重大的胜利，他们相信解放奴隶政策并使用有色人种部队，给予叛军迄今最沉重的打击。<sup>\*</sup>……

〔在取得最后胜利时〕一些黑人不会忘记，他们曾沉默无言，咬紧牙关，目光坚定，手持刺刀，帮助人类完成这一伟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我担心，有些白人不会忘记，他们心术不正、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sup>23</sup>

---

\* 此处指的是格兰特于8月23日写给林肯的一封信：“我衷心支持武装黑人问题。武装黑人与解放黑奴共同构成对邦联空前沉重的打击。……我们武装黑人，就多了一个强劲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战士。而且，把他们从敌人那边争取过来，就在同等程度上既加强了我們，又削弱了敌人。”（林肯文件，国会图书馆）。

尽管有些民主党主和派隐约地觉察到北部舆论的转变，但仍企图一意孤行。用一份民主党报纸大标题上的话说，他们在1863年秋季选举中的政纲是：“不要废奴主义，不要解放奴隶，不要黑人平等。”民主党竞选发言人反复谈论“崇拜黑人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党的集会上，年轻的姑娘们举着横幅，上面的口号是：“爸爸，把我们从与黑人的平等中拯救出来。”<sup>24</sup>

最重要的秋季选举是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俄亥俄州。遭放逐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温泽指挥他的州长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是州最高法官乔治·E. 伍德沃德——一位铜头蛇的同情者。这两个州的选举和其他地方不那么公开的竞争，成了对林肯战争政策的公民投票。据吉迪恩·韦尔斯说，总统对选举结果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比起他1860年那次当选，他对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更为担忧。”<sup>25</sup>他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这些选举表明是对政府的响亮的支持。共和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特别是在俄亥俄州，瓦兰迪加姆一败涂地，只得到10万张选票。共和党人赢得了俄亥俄州下届议会四分之三的席位。甚至在霍雷肖·西摩的纽约州，共和党人也在近三分之二的议员选区获胜。

和春季选举一样，士兵的选票对共和党人是举足轻重的。有几个州曾安排士兵缺席投票。此外，陆军部再次批准成千上万的士兵休假，前往不准缺席投票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去投票。尽管此举暂时削弱了波托马克军，但政府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风险要值得。作战人员有92%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在家的选民”只有56%投了共和党的票）。俄亥俄州的士兵只把5%的票投给瓦兰迪加姆。<sup>26</sup>士兵的选票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共和党人的论点，即爱国主义等于共和党纲领。

1863年秋季选举推进了解放奴隶事业。伊利诺伊州的一份

报纸在 1863 年 12 月写道：如果早一年就解放宣言举行公民投票，那末“几乎可以断定，多数人会表示反对，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就为压倒多数所赞同”。一位纽约上层人士在 1864 年初写道：“1860 年以后人们对蓄奴制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有谁能对此作出预言呢？……上帝饶恕我们在三年前有眼无珠。”林肯在 1863 年 12 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解放宣言发布后曾经有过一段“暗淡无光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时日”。但是，从秋季选举以后，“联邦朋友们一度濒于分裂的危机就成为过去了。”<sup>27</sup>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废奴主义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大声疾呼多年而无人理睬，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光荣的预言家。1860 年时，废奴主义者曾遭到暴徒袭击，而如今，人们却向他们欢呼。两相对照，《纽约论坛报》评论说：“历史在如此迅速地演变的过程中，并非经常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对比。”老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回忆道：“真正的改革者在孤军奋起时无一不被人嘲笑和轻视。比起大多数改革者来，我们正较早地从备受诋毁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着听到过去的反对者说：‘我错了。’”<sup>28</sup>

也许，巴尔的摩的一位自由黑人的一段日记对 1863 年这个奇迹之年做了最好的评论：“今年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在年初都曾经是或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成了一位为本种族的事业而战的士兵。我的上帝，请保佑这一事业，使我得以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把它推向前进。”<sup>29</sup>

##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 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

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弗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征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斯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sup>30</sup>

这些“不光彩的场面”有许多是因南方人自尊心过强和热衷于使用暴力而造成的。1863年的一天,邦联的两位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佐治亚州的本杰明·希尔和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在一次参院的辩论中对骂起来。闹到最后,希尔把一个墨水瓶向扬西扔过去,将其面部打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亨利·S.富特同其

他议员打了好几次架。他在斗殴中挥舞各种武器，包括他的双拳，雨伞、长猎刀和左轮手枪，等等。1863年4月，众议院记录员在里士满国会广场开枪打死主任记录。更有甚者，几位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成了里士满生活的臭名昭著的丑闻。1863年，一位有影响的南卡罗来纳人在致参院临时主席罗伯特·M.亨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些有害影响看来控制着阁下的各委员会。请原谅，多数议员是否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在开始这样认为了。”<sup>31</sup>到了1863年，南部国会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此后便再也没有起色。

南部还未搞邦联闹分离的几十年中，其政治家已经惯于在联邦国会搞妨碍议事进程战术，而现在成为邦联时，他们感到旧习难改。一位亚拉巴马人在1863年访问里士满后下断言道：“许多人在搞垮旧政府方面天赋很高，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sup>32</sup>再者，不是国会而是军队吸引去许多邦联最有能力的领袖人物。1861年，有好几位邦联立宪会议议员和临时国会议员加入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邦联立法人员不足三分之一。与此相比较，战时联邦国会的成员却有一半以上曾在国会工作过。

服兵役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也困扰着邦联内阁。戴维斯最初遴选的两位内阁成员都谢绝了任命，而去接受旅长的职务。另有两人亦于1861年辞去内阁职务而从戎。除朱达·P.本杰明一人成功地历任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职务外，邦联内阁成员在能力和地位上无一人能与林肯内阁的西沃德、蔡斯、斯坦顿和韦尔斯相当。戴维斯政府的批评者将其内阁形容为一出“滑稽剧”或一群“滑稽可笑而一钱不值的人物”。这些说法虽有欠公允，但内阁与国会一样终究都是比较平庸的机构，在解决邦联的当务之急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人员调动过于频繁，不利于政府发挥效率。

六个内阁职位，先后有十六人任职，而联邦内阁的七个职位则先后有十二个人任职。邦联先后有五人担任陆军部长和三人担任国务卿，而联邦则只有两人和一人分别担任过这两个重要职务。

###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南部人对国会和内阁的批评，比起他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肆意谩骂来，就不算什么了。强有力的罗伯特·图姆斯写道：总统是个“虚伪的和伪善的……家伙。”密西西比的一位著名人士认为，戴维斯是个“可耻而愚蠢、暴躁而傲慢的独眼暴君。”<sup>33</sup> 戴维斯的头号冤家对头是佐治亚人，尤其是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林顿。林顿·斯蒂芬斯写道：“戴维斯先生是个昏头昏脑的疯子，他心胸狭窄、自高自大、虚情假意、野心勃勃，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赖和傻瓜。”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戴维斯“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他竟声称他“对他〔戴维斯〕的憎恶”与他对“我〔亚历山大〕的那条可怜的聋瞎老狗相等”。现代的历史学家避免作出这种辛辣的批评。但他们之中却有若干人同意戴维·波特的见解。波特写道，戴维斯的领导构成了“他个人的失败记录，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就可能会赢得独立了。”<sup>34</sup>

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单独为邦联的失败承担这么大的指责。南部的许多战时问题都是总统无法控制的。然而，戴维斯作为一个领袖，无疑是有严重缺点的。他严肃、无幽默感，而且随着战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严重，使得情绪很坏，时常冷言冷语地冒犯别人，树敌成癖。他作为一个治国者，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琐事末节上。海军部长马洛里写道：他召集的内阁会议开得很长，“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远，偏离正题，花上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一项决定，而各部部长的桌子上却堆满了需

要他过目审批的文件。”<sup>35</sup> 戴维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第一个抱负就是指挥邦联军。因此，他试图亲自抓陆军部的工作。五个陆军部长中有两位，“事无巨细，全都请示”戴维斯。<sup>36</sup> 另一位部长未与总统相商就作出决定，于是戴维斯对之否决。事情过后，这位部长就辞职不干了。与林肯不同，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如何。他不会承认错误；他缺乏林肯具有的与批评者和与那些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标一致的人们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种政治上的敏锐，那种平易近人的特征，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天才和那种讲明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口才。

到战争的第二年，对戴维斯的重大反对开始表面化。他的政权凭着布尔河大捷所产生的余威，还能平稳地渡过1861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都已无踪无影。出于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佬的共同考虑，南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同意不恢复各自的党组织。在1861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反对戴维斯和斯蒂芬斯。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国会候选人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的。选举运动没有发生问题，投票也搞得很轻松。戴维斯于1862年2月22日冒着暴风雨宣誓就职时（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临时总统），政府仍然表现出超党派的一致。

但是，那场暴风雨预兆即将到来的事件。1862年春出现了一个反政府派别，这是军事挫折和政策行动所造成的。戴维斯尚未宣誓就职，亨利要塞、多纳尔森要塞和罗阿诺克岛就已落入北军之手。举行就职典礼的次日，纳什维尔被联邦军攻陷，此后，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亦很快易手。戴维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亦为北方佬接管。通货膨胀开始日益加剧，对南部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国会于4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征兵法。更有争议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授权总统暂停实行

人身保护法。

##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军的一些将领在 1861 年逮捕了有不忠行为的平民，他们无视人身保护法，拒不把这些平民交给法院。对这些作法，戴维斯政府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否定。1862 年 2 月，在格兰特即将进入田纳西州、麦克莱伦即将进入弗吉尼亚州之际，邦联国会授权戴维斯“在他认为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并出于保护的目的地而需要发布戒严令的城镇和军区”，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sup>37</sup> 戴维斯随即在邦联的几个地方公布了戒严令。南部一些将军在西部某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权限照此办理。戴维斯对他们大加斥责，宣布他们的戒严令无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并发生战斗的危机关头，里士满下达撤销戒严令的命令是无足轻重的。1862 年 8 月，布雷格将军甚至在远离战线的亚特兰大公布了戒严令，理由是该城作为交通和供应中心，具有重要性。

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议声浪。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主义”将危害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副总统斯蒂芬斯说：“让取得独立第一，谋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远无法复得。”斯蒂芬斯敦促州长们“反对并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动”。佐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是首先这样做的，他称暂停公民自由为“武力剥夺”。<sup>38</sup>

由于这些抗议，国会同意该法于 1863 年 2 月期满。翌年，有好几位州法官发布命令，释放那些被控开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这样就使一些地区的邦联官员无法实施征兵。在维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继战败以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开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联邦主义团体在内地变得更为突出。1864



年2月,国会应戴维斯请求,同意制定一个新法案,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同时指明该法将于7月31日期满。

戴维斯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期限只有18个月。他运用这一权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与邦联总统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国会批准之前,他就行使这一权力将近两年了。然而,这件事在邦联激起的反政府情绪至少不比联邦低。随着征兵和强行征用供应品,此事促使了反对派的出现。这些反对派在战争的后半期使政府无法发挥应有的工作效率。

### 反对派领袖们

尽管每个州都有反政府发言人,但反对派还是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特别是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万斯唯恐失掉他那个州的特权。在每件事上——从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将军直到在偷越封锁线的国营走私船上的载货空间——他都与邦联政府争吵。在佐治亚州,有三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图姆斯、斯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团。图姆斯因未能当选邦联总统而感到沮丧,后指挥部队也未能取得多少战功。他于1863年3月辞去旅长职务,此后即成为严厉批评戴维斯的人。副总统斯蒂芬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在此后的战争期间,他很少回去,而情愿呆在佐治亚州,他对每个扩大杰弗逊·戴维斯的“独裁大权”的措施都予以抨击。布朗州长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他对“极权化”的战争措施越来越反感,从而促使他用妨碍议案通过的办法进行抵制。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戴维斯的反对派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州权的旗号进行反对。布朗在1862年写道:“我的立场就是那些老牌州权领袖从1798年至今所采取的立场。我参加了这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权利,并防止加强政府。在达到

这一目标以前,不管谁当权,我还是要造反的。”<sup>39</sup> 州权在南部是一项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杰弗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其他邦联领导人极力主张征兵、戒严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权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现实主义置于古老的原则之上。然而,斯蒂芬斯及其同事却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发展起来。在危机面前,邦联不但未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林肯政府也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在军事受挫时期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政治与邦联政治在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却减轻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着政党,而南部则没有。南部没有政党,却反常地产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势力之所以变成失控,恰恰是因为它具有超政党的性质。由于没有党的机构,这种反对就成为个人的和派别的活动,有时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邦联宪法,戴维斯没有再次当选的资格,所以他无意建立党组织。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拥护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党,戴维斯便无法采取组织手段争取人们支持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国会选举就是在超政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戴维斯政府的政绩是主要问题,但候选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反对意见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渠道,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在国会选举中,公开反政府的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收获,但他们在众议院以大约十五个席位之差,在参议院以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当戴维斯政府保持了国会的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一个党组织,政府就很

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部则恰恰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党的领袖。而且组织得同样好的反对势力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团结。林肯在面临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时，战争的势头则推动温和派转向解放奴隶和全面战争的激进政策，从而在历次选举和重要的国会投票中使党团结一致。北部的州长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这就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忠诚和互利的关系。

到 1863 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北部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而使南部变得更为虚弱。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内部战线上，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 第二十一章 后方

### 战争对北方经济的影响

1863年，伴随着军事与外交上的胜利，联邦迎来了经济上的空前高涨。北方在军需生产的刺激与军事胜利的鼓舞下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南方则因遭到入侵和破坏而日渐衰弱。《纽约太阳报》对即将结束的战争评论道：“叛乱之初，叛军领导人最欣赏的论调是，如果南部不再与北部进行商业贸易，那么‘纽约大街上将杂草丛生’。”\* 但实际上，“北部贸易和军火贸易的猛增”完全弥补了中断南北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就纽约而言，近两三年内商业上出现的普遍繁荣，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sup>1</sup>

#### 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年—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年—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军队的

---

\* 这确实是南部的一种论调，1861年6月，南部的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上一篇题为“他们大街上的杂草”的文章，有人声称在繁华的纽约大街上确实看到了杂草在生长。其他人则描述了纽约“寂静的街道，无人居住的旅馆……”。曾引为自豪的都市的繁荣已经消失，……因为南部的贸易决不会恢复。纽约必定要衰落。”

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征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征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伊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革命。<sup>2</sup>

用“革命”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sup>3</sup>

---

\* 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译者

## 运输业

经济运输部门几乎同农业一样发展得很顺利。尽管战争初期封闭了密西西比河，但内陆河道所有的运输工具在总量上却增加了。为支援联邦军的西部战场，维克斯堡上游的河流网上运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东西大湖和水路运输量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运给东部战场军队并用作出口的大批粮食的运载量不断增长。战争期间伊利运河每年运输的吨数比19世纪50年代多54%。尽管邦联的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把大多数商人船队都赶出公海，但内陆水域贸易的增长加上联邦海军的需求给造船业带来了繁荣兴旺。美国战时四年中所建造的商船吨数相当于战前和平时期的两倍。1864年建造的总吨数到1908年才被超过。<sup>4</sup>

尽管发展如此之大，但战时铁路运输的发展更超过了水路运输。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运输能力已经过剩了，特别是在阿勒格尼河西部；但是战争的需要又很快使铁路运输达到并超出其运载能力。1860年至1865年，北方几条铁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利润也增长一倍，有几条铁路还第一次付出了股息。在大部分北方铁路线中，只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线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即使如此，这两条铁路也从战时增加运输量中获得了利润。

战时大量的军需运输要求繁忙的铁路线敷设复线，在几条河流上架起新铁路桥；使轨距标准化或增添一条第三铁轨，或准备额外车轮，以便运输的货物无需转换车辆就能在不同轨距的线路上运送；建设联合终点站，以避免货物或旅客经过一个城市中转时，要从这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而造成延误。这种改进大部份来自政府的压力。1862年1月，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公共安全可能需要时”对任何铁路实行管制。虽然林肯难得行使这种权力，但有了这种授权就能使铁路把优先权让给军事运输。政府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四条不同的铁路线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这些铁路公司大

都把铁道铺设复线,并于1863年把他们的路轨经费城连结起来。然而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交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容易堵塞的一条隘道,虽然有几位北部官员曾谈过要在那里建设一条政府所有的铁路,但没有实现。

然而,在攻占后的南部地区,陆军部大规模地参与铁路建设。美国军用铁路局(USMRR)于1862年2月成立,以在弗吉尼亚北部铺设几英里线路而开始其工作。当南进的联邦军队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时,美国军用铁路局又接管了攻占的南部铁路并修筑了新的线路。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用铁路局管理着2105英里的铁路线,并拥有419辆机车和6330节车皮,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部门。

## 工业

当战争促进了经济的运输部门时,对北方工业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由于战争造成棉花短缺,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棉纺织品的产量下跌了74%;不过毛纺织品生产增长一倍,部分地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位居第二的最大的消费品工业——制鞋业,由于失去了南方市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军队的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损失。在战争的头一、二年,南部市场的丧失也损害了其他工业;到1863年—1864年,军工生产才开始兴起。战争最初的两年间铁的生产下降了14%,但到1864年,仅仅联邦各州的铁产量比先前创全国记录的1856年的产量还高29%。1861年,煤的产量下降,之后几年又升到了新的高度;1861年—1865年,光是北部煤的产量就比1856年—1860年南、北的煤总产量高出21%。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枪支、火药、皮革(用来做马具和骡具)、铜(用做步枪子弹的火帽)、货车等等,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到1864年使得联邦

各州的生产指数比 1860 年的全国生产指数提高 13%。

战争也加速了机械化及工厂生产作业的扩展。战争期间尽管缺少熟练的工人,但枪支的生产也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批工业之一采用了可以互换的机制部件的原则。北部另外两种工业的经历也说明了战争如何加快了机械化的趋势。到 19 世纪 50 年代,缝纫机的发明已开创了缝制成衣的生意。但是战争时期对军服的突然需要成为服装业进一步机械化和标准化的促进因素。1860 年至 1865 年间,缝纫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陆军部给服装制造商提供关于士兵系列等级尺寸。这就产生了服装标准“尺码”的概念,而且在战后又成为民用服装的标准“尺码”。战争也加速把新技术应用于制鞋业。大约 30 年前,制鞋业已开始从小作坊制作发展为工厂制作。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一种用于缝制皮革的缝纫机投入使用,加速了这个过程;在 1858 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发明者莱曼·布莱克获得了一项专利,他改进了一种能把鞋面和鞋底缝在一起的纳鞋机器。特别是自从许多熟练的制鞋工人参军之后,为供应军队的定货,用手工制的旧方式是太慢了,因此战争给布莱克的发明开创了一个市场。1862 年马萨诸塞州的企业家戈登·麦凯购买并改进了布莱克的专利品,开始向制鞋厂商销售这种机器。到 1863 年底,这些机器已缝制了 250 万双鞋。

### 内战与经济增长

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根据这些和其他因战争刺激而引起的北部经济变革,称赞内战使美国发动了工业革命。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史学家从两个方面抨击了这个论点。他们争辩说,(1)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就已经发生了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改革,而战争可能加速了其中某些进程,但并没有引起直



接的根本性变化；(2)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证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缓慢了，因此与其说战争促进不如说可能妨碍了工业化。<sup>5</sup>

第一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运输工具的改革、制造业、美国成批生产法以及19世纪工业化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战争之前。因此显然内战并没有开创美国经济的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的胜利，而不是现代化的起因。

第二个论点初看起来好像也不无道理。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比率比1840年—1930年之间的任何十年都低。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商品产量增加51%，50年代增加62%，70年代增加62%，80年代增加63%，90年代增加36%，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只增加了22%。19世纪60年代人均产量实际上减少了3%，与其他五个十年相比，其中每个十年都平均增加20%。60年代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25%，而1839年以后，19世纪剩余时期每十年则平均增加94%。60年代农业产量增加15%，而其他几个十年则平均增长35%。从1850年到1873年，在战争期间每年铺设的新铁路只有1000英里，而其余时期平均每年铺设3000英里。根据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的意见，这些统计数字集中到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内战阻碍了美国工业的发展”。<sup>6</sup>

但是前一段的统计数字包括了南部。考虑到战争给南部的资源、生产能力以及消费者购买力带来的巨大破坏，人们毫不奇怪，19世纪60年代从全国来说是经济增长较低的十年。当联邦各州在战争期间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邦联的经济混乱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它的经济的增长。战后加速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遭到破坏的南方经济的重建，并表现出19世纪60年代停滞后赶上来的过程。1840年—1860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商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45%，但19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后，在1870年—

1880年间人均增长率平均每年是2.6%，1880年后增长率又下降到2%以下。因此在1880年美国经济的平均产量保持原来的水平，正如1840年—186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稳定，而内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sup>7</sup>

然而就统计数字来说，战争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妨碍长期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根本改变了财富和产量的地区性分布。1860年，南部白人人均占有财富比北部白人高95%；到1870年，北部人均占有财富比南部白人高44%。1860年北部和南部的人均商品产量（包括农业）大体相等；到1870年北部的人均产量比南部多56%。1860年南部占有的国民财富是全国的30%；到1870年只占12%。<sup>8</sup>

### 战时非军事立法

政治权力的地区性转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战争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也把正在现代化的北部资本主义从南部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重要性早在1862年就已经变得很明显。战时财政立法制定一种统一的货币（绿背纸币和国民银行券）以及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组织。1862年国会在南部民主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三个重要的法案。这三个法案反映了辉格党—共和党的现代化目的。这三个法案是：宅地法、土地赠予学院法以及太平洋铁路法。

宅地法承认居住五年之后，根据请求，移民可以获得160英亩公共土地的所有权。1860年共和党纲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土地”，这一条作为一个问题在国会中已长期受到南部人的阻挠，并且在1860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共和党摆脱了南部梦魇般的压力后，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了这个法案。战争结束之前，根据这个法案大约有20000农民占有了300万英亩土地，法案最终

处理了 8000 多万英亩土地的归属和所有权。

土地赠予学院法为几所著名的大学打下了基础(它被称作莫里尔法是用议案的提案人、佛蒙特的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案以比例代表为原则,按每个国会议员和参议员 30000 英亩公共土地拨给每个州。出卖这些土地的收入将用来在每个州至少创办一所学院,以开展“农业和机械技术”的教育。教育改革者们近 30 年来,为使高等教育更适应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追求,强烈要求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南部人和民主党人以前曾加以阻挠。布坎南 1859 年否决了这个法案。林肯在 1862 年 7 月 2 日签署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扶植教育的最重要的实例。

太平洋铁路法案在 19 世纪 50 年代曾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由于铁路是沿着北部路线还是南部路线来修筑的争执而使法案形成僵局。南部脱离联邦后,问题才得到解决。1862 年 7 月 1 日通过了这项法案,规定东部的终点站在奥马哈,西部的终点站在旧金山湾。法案规定,修建每英里铁路至少拨给 6400 英亩公共土地(后来又加了一倍),联邦贷款 16000 美元。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后来改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1869 年两个铁路公司把他们的铁路在犹他州普洛蒙托莱接轨。1864 年,国会特许成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圣保罗到西雅图),而且拨给更多的土地。先后拨给其他铁路公司的土地加在一起,总数达 1.2 亿英亩。

事实上,三个法案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无代价授予定居者土地不时受到向铁路部门和各州拨地的干扰,它们把土地当作银行贷款的担保,或把土地卖给最高的出价人。但是,批准这些法案的共和党人打算把它们当作补充措施,以促进非蓄奴地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宅地法以土地的形式给农民提供资本;莫里尔法规

定向人力资本投资,帮助农民和“技工”变得更加富裕,劳动生产率更高;给铁路贷款和拨给土地是要把大量的社会间接资本吸收到经济建设中去。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制定了多项立法,它们永远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面貌。法定货币法,国家银行法,宅地法,莫里尔法,太平洋铁路法,国内税收法和没收法,都象征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由于确信这种胜利,北部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乐观主义。1865年,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是,如果战争以我们的资源无损的情况下结束,那么首要的资本家的主张将得到高度和充分发挥的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我国过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事业。他们在谈论百万位数时,其信心和以往谈论千位数时一样。”<sup>9</sup>

## 劳工与战争

在北部,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战时这种发展的是一群蓝领工人。他们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主要是爱尔兰人。他们对共和党的战争目的和方针缺少热情。特别是当他们没能完全分享到战时繁荣时,许多工人拒绝同中产阶级一起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鼓掌。工资的增长比物价的增长低20%还多,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工资才开始赶上来。

工资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的成分发生了变化。50多万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都加入了联邦军队。雇主为弥补他们的空缺,雇用或提升了一些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1860年,妇女大约占生产劳力的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上;但战争期间妇女占的比例至少升到了三分之一。代替熟练男工的妇女和其他补充人员做同样的工作而取得的报酬较

少，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缺少经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比较低——这有助于说明 19 世纪 60 年代期间为什么人均产量下降 3% 的原因。

为了使工资的增长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工人们偶尔也进行罢工。其中有许多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特别是 1863 年—1864 年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所进行的那些罢工。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和生活费用相同的水平。主要是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妇女，他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落在后面。如果罢工不影响军队作战，联邦政府很少进行干涉。在边境各州和已占领的田纳西，联邦官员确实曾几次使用军队去阻止或驱散过罢工。1864 年 3 月，在纽约州科尔德斯普林的帕罗特枪炮厂，政府也曾经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去逮捕罢工领导人（这事发生在 1864 年军队发动战役的前夕，帕罗特工厂制造的大炮将在这些战役中起重要作用）。

战时罢工的胜利使熟练工人产生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新感受。大多数罢工以及从罢工中产生的工会都是自发的和地方性的；于是，许多全国性的工会应运而生，这些工会战后成为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工会会员人数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还为数极少，到 70 年代初猛然增加，那时产业工人加入工会的人数比 19 世纪任何时期都多。

大多数外国出生的工人都是民主党党员，他们对现代化和解放奴隶抱有同样的党派敌视态度；而大多数本地出生的工人都是共和党党员，他们赞成自由劳动的思想甚至到了为解放奴隶而欢呼的程度。有几位劳工领袖明确表达了同激进共和党人相同的观点，认为必须摧毁现代化以前的南部奴役劳动制度，并且给予所有工人以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拥护 1865 年 1 月卡尔·马克思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所阐述的观点：

欧洲的工人们确信，美国独立战争曾为中产阶级开辟了占优势的新纪元，同样美国反蓄奴制战争也将为工人阶级带来占优势的新纪元。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新纪元，它将注定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为了解放被奴役种族和重建一个社会去领导全国进行史无前例的战斗。<sup>10</sup>

有几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在战后劳工改革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最著名的有温德尔·菲利普斯和本杰明·巴特勒。但是战后年代，共和党人与劳工领袖们各自在理解自由劳动思想方面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工人们在要求平等权利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用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特的话来说，他们开始要求：“同等分享他们的工业创造的财富。”（着重点是后加上的）<sup>11</sup> 到1870年为止，三分之二从事劳动的美国人都是工资收入劳动者，而不是业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思想、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我奋斗和阶级调和看来对他们那种从属的雇佣劳动的地位越来越没有关系。他们正在意识到劳工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独立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资本的特权是矛盾的。内战既是自由劳工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促进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因素，这种运动最后抛弃了那种为保守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的思想意识。

## 南部对经济的不满

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两次战争失利后，使邦联后方最严重的问题更加恶化，这就是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随后三个月内，物价上涨了58%。1863年10月22日，里士满一位人士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卡雷伊大街上，一位可怜的妇女向一位商

人买一桶面粉。商人要价 70 元。那位妇女惊叫道，‘天呀！我怎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我有七个孩子，我可怎么办？’商人冷酷地说，‘我可不知道，太太。要不你就吃你的孩子吧。’”<sup>12</sup>

四个月之后，在里士满一桶面粉的价格是 250 元。许多南方人身处这种凄惨的窘境，但又丝毫不了解其原因何在，于是，他们就为这种苦难寻找替罪羊。众人的目标集中在“投机商”和“敲诈勒索者”身上，人们认为他们囤积居奇，以便在因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中获利。新闻界和舆论界也严厉谴责这些“卑鄙可耻的人”，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会把宇宙的空气都装在瓶子里，然后每瓶以这样的高价出售”。杰斐逊·戴维斯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卑劣的投机商企图垄断市场，并且从我们的保卫者的鲜血中赚钱”。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一旦提到别人时，有些南部人就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犹太商人身上。用邦联国会议员的话说，“他们像埃及的蝗虫那样云集在这里，吞没了国家的财物，抽尽了国家的供应品，垄断了国家的贸易……。当战争结束时，大概就会发现几乎所有邦联的财产都落到犹太人夏洛克的手里。”<sup>13</sup>

当然，在邦联有“投机商”，但大多数商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困难时期他们都力图正派地谋生。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虽然他们出售货物可能获利 50%，但是如果他们在他们卖和买的这段时间里总的物价标准已上涨 45% 的话，那么他们获利就很少。邦联有几个州通过“镇压垄断者”的法令。它们要镇压的垄断者指的是那些据说从垄断日用品市场中获利的批发商。1863 年 4 月，邦联税收法规定对批发商的利润征收 10% 的追加税款。这法令没有一条是可行的，因为在邦联财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估评盈利多寡并找出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1863 年的征收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投机商的。因为农民和商人常常拒绝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食物和日用品出售给军

队，所以军需官员就采取了征收供应品的办法。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为了纠正滥用职权并使征收手续合法化，1863年3月26日，邦联国会通过了“调节征收法令”，该法令给征收官员规定了准则，每当这些官员就制定一个合理价格与销售者持不同意见时，可以根据法案提出公断。然而同其他许多邦联财政立法一样，这项法案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突然爆发通货膨胀，征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农民逐渐变得不愿意按任何价格去接受邦联的钱。军官们为供应品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们强夺所需要的一切，而只给愤怒的农场主打个白条借据。到战争结束时，据估计，这些借据尚有五亿美元未付清。

征收政策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因为当征收官员走近时，许多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赶进树林里。其他人也完全拒绝去种庄稼。征收法还使许多南部人起来反对邦联。路易斯安那区的农民们告诉一位邦联官员说，“他们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愿见到我们的骑兵。”这话表达了广大农民的共同情绪。几乎南部每个州长都斥责征收法。各州的州权倡导者们，特别是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竭力给征收官员制造困难。戴维斯的政敌们把征收法当作他们攻击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威廉·扬西愤怒谴责道，“自由人民在同入侵者公开战斗中被击败”要比“偷偷摸摸地使自由权和宪法保护权屈从于军事独裁”好得多。<sup>14</sup> 但是不管怎样恶劣，征收法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政策，军队要获得任何供应品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 与敌人进行贸易

邦联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乃是与北方佬进行贸



易。与敌人进行贸易的问题同战争那样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及 1812 年战争中,美国人已证明自己同敌人贸易是内行的。在内战中,他们表明他们更加内行,而且内战与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诱惑力。南部拥有大量的为北部所急需的一种农产品——棉花,同时南部也急需大量的鞋、盐、药品、军需品以及其他货物,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战前南北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战争期间,政府和将军们的所有法规都无法制止一种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孟菲斯或新奥尔良买一磅棉花只要 10 到 20 分钱,而在波士顿或纽约能卖 80 分钱。在北部买一袋食盐只要 1.25 元,运到南部可以卖 60 元。有些胆大的人想方设法以棉花去换取食盐。尽管邦联禁止棉花出口,南部人仍把棉花卖给北部人或欧洲的投机商;而邦联的官员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用这种贸易挣来的黄金和绿背纸币,能够去购买枪炮和鞋子。尽管联邦政府封锁南部,但它允许——或者说至少不禁止——某种在一定程度打破封锁的贸易。

1861 年双方政府官员都禁止与敌方贸易。但横跨双方的边界有一千英里长,它大部分都贯穿边境各州,并把边境各州分成两个敌对的部分。大量的走私活动是通过寂静的森林或是黑夜中穿过没有巡逻队的河流来进行的。海上也进行着违法贸易。纽约的商人把作战货物用船运到百慕大或拿骚,然后从那里再把货物装上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到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

随着 1862 年联邦攻占南部的大片地区,进行走私交易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根据“商业随国旗而行”的名言,财政部颁布了许可证,同意在占领区进行合法贸易。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有两个目的,即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拉拢南方公民回到联邦中来——因为,根据政策,只有那些作了效忠宣誓的人才能在北方出

售棉花或从北部购买货物。实际上,这种许可证办法根本行不通。有执照的人和没有执照的商人都成群结队地带着绿背纸币、黄金、咸猪肉、鞋子、羊毛毯——甚至黑色火药涌入占领区,去换取由种植园主或代理商出售的棉花。在这些种植园和代理商中,真诚地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并不多,没有宣誓的倒是不少。通过边境上的孟菲斯,大宗走私贸易在进行,这些走私货物越过叛军的防线,在1862年—1863年间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的叛军提供了大量补给品。

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痛恨这种贸易。谢尔曼写道:“我们不能同时和某些人又进行战争又进行贸易。”<sup>15</sup>他发出许多命令限制或禁止这种贸易,但其中某些命令被华盛顿否决了,而其他一些命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南部妇女年届穿多褶多环衬长裙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走私者。有一位孟菲斯妇女穿着这种裙子,但其多环的裙衬架看来可疑,经搜查发现有12双靴子在她的衬架上系着,靴子里装有药品、威士忌酒和其他物品。还有一次,在孟菲斯有一支精心安排的葬礼队伍,从城里抬出一口棺材,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准备送给邦联范多恩将军的部队的药物。

更严重的是北部军人参与了这种贸易。一位派去调查孟菲斯事件的陆军部官员十分遗憾地说,利润或贿赂的诱惑“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腐蚀败坏了军队,使军队士气低落。每位上校、上尉、或是军需官员都与棉花投机商秘密合伙,每个军人都梦想着在他的月薪中增加一包棉花”。1863年,格兰特写道,这种贸易“正在削弱我们33%的力量……。我敢说,去年在田纳西西部诚实的人没有赚到钱;但在那期间,那里倒有许多横财可发”。<sup>16</sup>

聚集在孟菲斯的北部商人中有些是犹太人,这促使格兰特在1862年12月17日发布了他一生中最草率的一个命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财政部制定的各项贸易法规,也违背各项〔军事〕命令,为此,这项命令到达后的24小时之内必须把他们驱逐出

境。”格兰特的做法在北部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动乱。没超过三周，华盛顿传来撤销这项命令的指示。格兰特很快照办。哈勒克告诉格兰特说，“总统并不反对你们驱逐叛徒和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犹太商贩”；但是鉴于这项命令“排斥了整整一个宗教阶层，而他们中的有些人正在我们的队伍中进行战斗，因此总统认为有必要撤销它”。<sup>17</sup>\*

本杰明·巴特勒是联邦高级军官，1862年4月至12月他是新奥尔良占领军的司令官。他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与敌人贸易，实际上，要是他能听听别人的批评，那么情况会完全相反。

巴特勒是个在战时最暧昧和最引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新奥尔良的统治给他赢得了远扬国际的臭名，也受到南部人经久不衰的恨。他最初的行动就是发布一项命令，任何污辱联邦士兵的女人“都将被看作是妓女在经营其副业，或以此论处”。\*\*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勒把一名从公共建筑物上扯下美国国旗的平民处以极刑。远至伦敦和巴黎，这些行动增加了外国对邦联的同情。在本地附近，南方人给巴特勒取的最温和的绰号是“畜牲”。杰斐逊·戴维斯发布了公告，把他斥为歹徒；并且命令说，如果一经抓获，“立即将他绞死”。<sup>18</sup>

但是“畜牲”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实行了迄今最有效和最有益于

---

\* 其他几个指挥官，包括谢尔曼也宣布了犹太商人有罪的命令，一些邦联的官员也同样这样做。在里士满，一位陆军部的秘书写道：这些“犹太敲诈勒索者比起林肯的军队已更多地损害了我们的事业”。（约翰·琼斯：《邦联州首府一位南部陆军秘书的日记》，2卷〔1935年，纽约版，1866年费城第一次印刷〕，第1卷，第221页）这些评论就像通常所持的态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只是一小部分商人和投机商是犹太人。如同所有的战争那样，南北战争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爱国者，也有奸商；但是前者和后者都并不明显地属于任何阶级或种族。

\*\* 虽然发布这项命令或许是鲁莽的，不过是在大量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后发布的。新奥尔良的妇女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侮辱北部士兵。最后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是，法兰西人社区的一个女人把便壶内的尿泼在舰队司令法拉格特将军的头上。

健康的管理。他清理了污浊的下水道，建立了新的排水系统和卫生条例，并且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巴特勒所没收的邦联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些做法使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泥铲”巴勒特；因为，据说，他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偷了南部人的白银。

为把城市经济从封锁而导致的萧条中复兴起来，巴勒特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他所振兴的大部分贸易，是把诸如盐、鞋子、食品这类军需品换成棉花和糖，但这些军需品都到了邦联部队手里。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和遍布新奥尔良的投机活动，使巴特勒获得了不好的名声。人们没有发现将军本人有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位徒劳无功的财政部代表汇报说：“巴勒特是聪明人，想去发现他要隐瞒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但是他的兄弟安德鲁，领陆军上校军衔，陪同他来到新奥尔良，据说他使用不必受检查的手段而发财致富。<sup>19</sup>

1862年12月，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接替巴特勒之后几天，有位公民送给他十万元的贿赂，如果他能批准一项用南方棉花换取北方食盐的交易，而这宗买卖已得到邦联当局的批准。廉洁的班克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伤心地写道：“来到这里，我对国家才感到失望……。每一个同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在忙于盗窃他人的财产。他们能得到糖、银餐具、马匹、车辆等一切东西。已经和敌人公开进行贸易……。照这样下去，我们绝不会胜利——我们的人必须停止盗窃，不然就会断送国家。”班克斯控制了这种最坏的恶习，但是他决不可能彻底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当这么多的钱处于得失攸关时，即使“有一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中国长城”也无法阻止这种交易。<sup>20</sup>

1863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了接收财产法，这项法案打算通过政府没收全部邦联所有的棉花来减少私人交易。1864年1月，

财政部发布了严格的条例来管制非邦联棉花(即曾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所有的棉花)的购买。1864年7月,国会废除了公民在占领区进行贸易的许可制度。

但是这些法令和条例对非法贸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用这样一种方式强制他们,规定买棉花继续用现金支付,而后来这些现金却流入邦联的手中。林肯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由北部人购买棉花比起让同样的棉花穿过封锁出口到欧洲,对联邦更有益,而不利于邦联。总统向一位愤怒的将军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位将军曾试图在他的管辖区内禁止棉花贸易。林肯指出,棉花价格比战前标准上升了六倍多;“而敌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方说在一年内,至少要运出六分之一那么多的棉花,好像没有封锁一样,敌人用这批棉花赚得的钱,就像在和平时期棉花大丰收时赚到的那么多。”于是,南部就能用外汇来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因此允许个别商人贩卖棉花“这不只是对个人利益和贪婪金钱的让步”,因为运到北部的每一包棉花都是不许出口的。“只给敌人枪比起像现在这样既让他得到枪又让他得到弹药要好”。<sup>21</sup>

在制止这种贸易方面,邦联的将军们同他们的联邦对手相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靠近联邦边境的南部居民为了出售棉花很快就进行了效忠宣誓。就像走私商品通过防线时用贿赂去引诱北部士兵动心一样,“一双长统靴和一瓶威士忌酒”就能买通邦联警戒哨兵而达到同样的目的。一位邦联官员抱怨说,每个卷入的人都是“腐败和堕落的”。“棉花不再促进我们的实力,现在已成为削弱我们战斗力的最大敌人。北方佬的黄金迅速完成了联邦军队决不可能取得的东西——征服〔我们的〕人民。”邦联政府在理论上也同意这种观点。里士满的陆军部长写道:“与敌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是败坏风纪的,非法的,当然应该反对,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允许某种程度的贸易,我们的军队将不能生存。”杰斐逊·戴维

斯勉强同意了这种贸易，如果这种贸易是“绝对必要”的话。<sup>22</sup>

对南部来说，这种贸易几乎一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林肯的论点和邦联官员的抱怨是对立的，这种走私贸易毫无疑问对邦联比对联邦更有利。历史学家詹姆斯·福特·罗兹对这种贸易的判断看来是公正的：“它对南部是一种难免的祸害，但对于北部虽是一种祸害，但并不是难免的。”<sup>23</sup> 它还是造成战后十年腐败风气和投机活动的祸根。

## 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内战时期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士兵们病死比战死要多一倍。而对每一个病死的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病员死亡单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最初一个团的编制有 1000 人，而到部队开始进入战斗时常常减员一半，疾病和残疾是主要的原因。

新兵体检常常很草率，有时根本就不体检。1862 年 7 月，对联邦征兵手续的一次调查中推断：“去年对新兵进行草率和表面的体检至少占所征志愿兵的 25%，这种检查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确实是一种累赘。”<sup>24</sup> 此后体检比较严格。但是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新的疾病环境，身处在这种环境，就是健康的新兵也会得病。在双方军队中，农村兵比起城市兵更容易得病。这些农村兵已经一直处在袭击农家青年的多种细菌的侵袭下。在联邦军队中，来自中西部几个州的新兵患病死亡率比来自东北部几个城市化的州高 43%。

两次广泛的时疫流行袭击内战部队。第一次是一种流行性儿童传染病——主要是麻疹和腮腺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得这种疾病。虽然死者很少，但是这些疾病能使由大量新兵组成的部队一

时失去战斗力。第二次是由于污水、变质食物、曝晒和蚊子引起的战地流行病。内战时期主要的致命疾病是痢疾及腹泻、伤寒和疟疾。在军营内，原始的卫生条件或不注意卫生，常常使水遭到污染，残留的废物垃圾招来了苍蝇和齧齿动物如耗子、松鼠等。甚至当军医颁布适当的卫生规则时，士兵们有时还是不注意。罗伯特·E·李在1861年写道：“我知道，我们可怜的病号遭到这么多的折磨，但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去做。他们比小孩还要差劲，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孩子们去做。”<sup>25</sup>

由于内战士兵病死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死于疾病的人数大概多十倍，比死于战场的大约多八倍，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医疗服务是内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sup>26</sup>当然，内战中肯定会有不胜任的或放荡的医生，随军医疗队中存在官僚主义错误、军官对士兵的卫生漠不关心和医疗工作中有守旧思想等等，都负有责任。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根据当时的标准，内战时期的医疗和军队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虽然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二比一，但却优于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七比一的比例，也优于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1898)的六比一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的英国军队的比例几乎是四比一，在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中一直是八比一。在克里米亚的盟军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疾病死亡率是25%，与内战军队相比，它四年内疾病死亡率是13%（联邦军队10%，邦联军队是20%）。美国军医总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他有见识地写道：“联邦军队中病死与战死的比例比起有史以来所了解到的任何军队的死亡率都要低。”<sup>27</sup>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sup>28</sup> 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

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他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月，33岁的威廉·A·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月，美国军队只有113名医生，其中24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其中许多人小于18岁）、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



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采纳,最后在 1864 年 3 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 1861 年 6 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

卫生委员会变成北部妇女为战争效力的主要机构。虽然它的国家官员及其公职人员都是男人,但是管理 7000 个地方性机构的志愿人员,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收集生活用品,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进行筹款并干护士工作。委员会建立补给站,为部队分发衣服、食品和药物。它给往返前线的康复士兵和休假士兵提供食宿。它向团的宿营地派卫生检查员,就诸如公共厕所、下水道、供应水及炊事这类问题对官兵们进行指导。它给士兵们提供蔬菜,这是按部队标准定量经常短缺的品种。它搜集急需的药品和绷带,迅速送往战地医院。它派出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到军队医院里工作。1862 年它租船从夏洛和弗吉尼亚半岛撤退伤员,当半岛上的部队缺少救护车时,它为他们提供了救护车。

1861 年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批评军医总监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像“老朽的饭桶,可恶的绊脚石”。这个旧的军医机构愤怒地反唇

相识，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说教者、乡下医生和好胜的女人。”<sup>29</sup>但卫生委员会是受到士兵们的如此欢迎，它的工作效率如此显著，它在国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它能在 1862 年推动通过一项改组卫生局的议案，并稳妥地保证哈蒙德被任命为军医总监。这开创了卫生局与委员会之间合作的时代，从而产生了像野战卫生队这样的创新事物。\*

其他志愿社团也协助卫生委员会做了工作。有几个国家团体为士兵们提供帮助并赡养他们的家属。西部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为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联邦军队开展救护与医疗工作。罗马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向军队医院提供国内训练有素的护士。1861年 11 月，一群新教徒的牧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向前线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义。一年之内，这个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组织，并给军队以比精神安慰更多的东西。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人员给伤员们提供食物和护理，给医院图书馆提供大部分的图书和刊物，并给康复期的士兵们分发毛毯、棉衣，甚至药品。这些活动有时导致了他们与卫生委员会的对立，卫生委员会比较世俗化的领导人对基督教委员会的那种传道热情总是皱眉蹙额，表示不满。

这些志愿团体对联邦军队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它们在医疗史上也具有长久的影响。卫生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着重科学调查、讲究实效和严谨的博爱主义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战后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它给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提供了样板，该组织是曾在卫生委员会内积极工作的人于 1872 年创建的。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在以后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

---

\* 这个委员会及哈蒙德将军与陆军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在 1863 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有时斯坦顿阻挠该委员会的活动。他不喜欢哈蒙德，并在 1864 年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那时哈蒙德实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军队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了。

作用。

南部组织起来的救护和医疗工作比起北方来不那么集中。尽管当地到处都成立了帮助士兵和医院救护的团体，但是，邦联并不存在卫生委员会或基督教委员会这类对应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邦联的士兵们在医疗护理上比起联邦士兵还是差些。每六个受伤的邦联士兵中有一人死于创伤，而联邦军是七个伤员中有一个死于创伤。邦联士兵的患病死亡率是联邦军的两倍（这里应特别指出战斗中的死亡率也是两倍之多）。这并不是邦联卫生队的过失，而主要是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资源遭到破坏，以致影响了邦联各方面进行的战争努力。生病或受伤的战士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或适当种类的食物。虽然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联邦封锁造成药品短缺，但是有关邦联医疗工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资料认为，在家庭手工制作和与北部的违法贸易大大弥补了药品短缺。<sup>30</sup>但是南部铁路的逐渐崩溃，以致某些地方在最需要药品的时候也得不到供应。

## 妇女与医疗工作

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妇女在内战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在民间志愿团体中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而且数以千计的人还作为专业护士和志愿护士在军队医院里服务。1864年，一位名叫玛丽·沃克的妇女在联邦军队中当医生。她在佐治亚被邦联军俘获，当他们“看到这是只有在腐化堕落的北方佬国家才能出现的事情时”，都显得惊异。<sup>31</sup>

沃克在任职之前必须克服男人的敌视，那些自愿去做护士的妇女多少都会遇到这种敌视。然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树立的光辉榜样开始使护理职业有了尊严，而以前这

种职业一直被蔑视为一种低下卑贱的职业。人们认为，妇女比男人具有更好更温柔的性格，因此最适合做护士。然而在1861年多少还存在着相反的看法，特别是在南部，军队医院那种粗鲁、男性和令人难堪的人体环境不是有身分的妇女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她年轻、漂亮又未婚，就更不应该去这个地方。1861年6月，联邦政府任命著名的疯人院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为女护士的总管。迪克斯规定所有护理职业的申请者“外表”必须朴素，而且至少要30岁。有位失望的申请者抱怨说：“恶魔迪克斯……不愿接受任何漂亮的护士去工作。怎么想到起用这样一个老家伙去管理别人呢。……是哪个蠢汉决定的事？”<sup>32</sup> 某些妇女设法通过了迪克斯的仔细检查后，还必须克服军医的偏见，譬如有这样的军医，他抱怨北部的个个传教士都“愿意把其教区内最烦人的老处女作为有经验的护士介绍进来”。这位军医说，他已经被其中的几位妇女弄得烦死了，“每个人的鼻梁上都架着眼镜，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真诚的目光，注视着她准备占有的男人”。这位医生补充说，她们到来之后，医院的死亡率增加了，“或许是这些眼镜造成的”。<sup>33</sup>

北部妇女逐步克服了这些偏见。1862年7月，军医总监哈蒙德下令军队的综合性医院的护士至少有三分之一必须是妇女（其余大部分或是选派的，或是康复期的士兵），这项命令帮助了她们。在北部，大约有3200名妇女在军队中当护士，占护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南部，虽然许多做奴隶的妇女一开始就在军队医院里服务，但是让有“身份的”白人妇女做军队护士还是较晚一些。直到1862年9月，邦联国会才正式承认女护士。尽管白人妇女在邦联军队护士中所占的比例比联邦要小，但从那之后南部军队开始欢迎妇女了。然而在南北双方，另外有数千名妇女作为医院的志愿者或是卫生委员会、基督教委员会以及类似组织的雇员在工作。有些志愿者是“慷慨的女慈善家”式的人物，士兵们不喜欢她们，但是

大多数都是忘我地努力工作的妇女，并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和赞扬。

女护士主要在远离战斗前线的综合性军队医院内工作。但有些也具有战地医院的危险和艰苦。克拉拉·巴顿，后来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曾经为许多联邦战地医院尽过力。1862年夏天，有几位妇女继在夏洛战役之后，又在里士满附近的战斗时于后方医院里工作。1863年，许多北部妇女来到葛底斯堡；在那里她们既帮助照顾联邦伤员，也帮助照顾邦联的数千名伤员。玛丽·安·比克尔戴克是最著名的前线女护士。她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寡妇，以热爱士兵而被称为“比克尔戴克妈妈”，她特别关心田纳西军士兵的保健工作。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将军的支持，她战胜了来自医生和高级官员们的反对。她是谢尔曼允许与他的部队在一起的几个平民之一。她赢得了这位顽固将军毕生的尊敬。

内战时期，妇女从事护士工作提高了护理职业在美国的地位，正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护士工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1861年，妇女中央救助联合会在纽约市提出一项训练护士的计划。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在北部一些城市建立了另外几所护士学校。在这方面，内战对医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第二十二章 战时重建与自由民

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布了“大赦和重建宣言”。林肯根据宪法就对反对合众国的罪犯实行大赦所赋予的权力，提出对那些曾参加过叛乱而现在宣誓忠于合众国及其所有法律和有关奴隶制宣言的人，实行“全部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全部财产。（邦联政府的内政外交官员，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邦联分子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州，宣誓的选民人数达到了1860年选举时投票人数的10%，这个忠诚的核心就可以重建一个州政府，而林肯答应给予行政上的承认。“这类州政府所通过的关于该州自由民的任何条例，其中应承认并宣布永远给他们自由，为他们提供教育；该条例作为临时措施，但可以符合他们当前作为劳动的、没有土地的而且无家可归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反对。”自然，决定该州是否派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是属于国会的。<sup>1</sup>

这个文件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它论述了战争中最主要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并制定了如下政策：(1)承认到目前为止新奴隶解放所已取得的成就将是重建的先决条件；(2)但是，南方各州暂时可以颁布劳动合同法或其它措施，以便从突然解放所引起的混乱中恢复秩序，(3)一些州从政治上回归联邦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叛乱分子将不施于严厉惩罚，不没收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并且在开始阶段不要求选举人数超过10%。

1863年下半年间，林肯在联邦军事胜利的条件下，有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条款。现在联邦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田纳西以及路易

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在这些地区恢复(或叫“重建”)民选文官政府,已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林肯的这个宣言旨在迎合这种需要。另外,总统希望他对大赦的慷慨保证会引起更多不热心的邦联分子重新归顺联邦,从而进一步削弱邦联。但是,这些复杂的条款分裂了共和党,并且在总统与国会之间引起了对立。要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三个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系的问题即奴隶解放、自由民的地位和政治上的重建来进行分析。

## 解 放 奴 隶

虽然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想把解放奴隶作为重建的条件,但是其中许多人——包括林肯——都怀疑战时反对蓄奴制的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还能合法有效地存在下去。那些根据战时权力可以没收敌人财产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就可能不会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共和党人普遍都赞成来到联邦境内的奴隶,根据没收法、解放宣言或是占领南部的联邦司令官的军事命令——如纳撒尼尔·班克斯的那些军事命令,获得自由;这些军事命令还废除了路易斯安那战前宪法中的奴隶条款。林肯再三声明,只要他当总统,已获得自由的人将不会再沦为奴隶。但是法院在战后会承认这种身份吗?而还未来到联邦境内仍在邦联的三百万奴隶以及没有落实这些政策的边界各州的五十万奴隶,他们会怎么样呢?即使废除蓄奴制已成为重建的一项条件,一旦某个州回归联邦,宪法上也没有任何条款去阻止一个州重建蓄奴制。

到1863年底,共和党人已断定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应有一条要在各地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林肯说:“仅这么一条就能对付和控制一切无端指责”<sup>2</sup>。1864年4月,参议院表决,以38票对

6票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有两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大多数。但是，民主党在1862年国会选举中所得的席位，使北部民主党人和边境各州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在众议院阻挠议案的通过。1864年6月15日，众议院对修正案的表决是93票对65票（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要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还少十三票。<sup>3</sup>

众议院要通过第十三修正案必须等到下一次国会会期，而在此之前，共和党在1864年总统竞选的胜利已说明了北部舆论的倾向。与此同时，为解放奴隶而进一步采取宪法步骤的动议权转向边境诸州和已占领的部分邦联州。早在两年前，边境诸州曾推翻了一项有补偿的、逐步解放奴隶的提案。现在的议题是立即和无条件地废除蓄奴制。正如林肯在1862年曾预言的，整个战争的“磨擦力”正在磨掉这些州的蓄奴制，直到只剩下法定外壳，而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在马里兰和密苏里，由于许多亲蓄奴制的人在邦联军中服役而不在家里，同时其他邦联的支持者因拒绝效忠宣誓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因此联邦反蓄奴制的人在1864年取得了对这些州的政治控制。即使如此，争取解放奴隶的斗争还是势均力敌的。6月24日，在马里兰制宪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废除蓄奴制的修正案。进行新宪法公民表决时，大多数平民竟然投票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只是由于在马里兰的联邦士兵们的支持才以2633票对263票的表决，为在1864年10月13日批准修正案提供了微弱的多数。1865年1月11日，密苏里州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废奴修正案，关于修正案的公民表决，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极其势均力敌的投票情况。（修正案包括另外几个有争议的特点，其中有全部剥夺邦联支持者的投票权）。只是由于赞成修正案的士兵的多数票压倒了反对修正案的平民微弱多数票，从而在85478的总票数之



外增加了1862票的数差,使新宪法获得通过。

这些票数的接近以及许多将要投票反对新宪法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意味着奴隶解放在马里兰和密苏里几乎不是林肯最初所希望的那种“自愿”措施。在战争前后废除了蓄奴制的其它三个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可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864年,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经占领的地区代表所参加的制宪会议,以林肯关于重建的“百分之十计划”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废除了蓄奴制,而且那些合格的投票者都从责任感出发而批准新宪法。1865年1月10日,田纳西的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解放奴隶修正案,2月22日,田纳西的联邦主义投票者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虽然参加这次表决的投票者的比例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要大,但总数还是相差很远,没有达到占全部选民的大多数。

在这五个州的大部分地区,适应商业的城市居民和欣欣向荣的非蓄奴农场主一般都支持解放奴隶的运动。例如,在马里兰,废除蓄奴制的冲突,按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的是在“潮汐区各县的固定不变的农业社会”和“北部及西部正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及农场主”之间发生的。援引来自巴尔的摩其一位支持者的话说,解放奴隶所取得的有限胜利表明一个“与北部进步和繁荣结成的新联盟”。<sup>4</sup>

具有守旧传统的民主党势力在肯塔基和特拉华阻碍强烈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即使在特拉华,实际上是个自由州,那里的22000黑人中处于奴隶地位的还不到2000人。直到战争结束后第十三修正案批准八个月,在肯塔基和特拉华才正式出现奴隶解放。

## 自由民的地位

简单的概括无法说明奴隶们获得自由的种种途径。当奴隶主

在北部军队到来之前逃走时，成千上万的奴隶便成了“投奔北军的黑人”，逗留在后面的奴隶把“北方佬”当作解放者去欢迎。其他奴隶得知穿蓝色军服的联邦部队就在附近，便离开种植园奔向他们的阵地。1864年—1865年当谢尔曼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时，几万奴隶尾随在队伍后面。有些奴隶帮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隶又帮助太太们埋藏银子。受信赖的家庭佣人和马伕往往最先把种植园丢给北部人；而另外一些人则一直对老主人忠诚到底。许多逃亡出来的奴隶为联邦指挥官作向导和侦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却假装一无所知或拒绝向入侵的北军提供情报。只有一个结论是可靠的：大多数奴隶欢迎自由，不管这种自由到头来是含含糊糊的还是幻灭的。到战争结束，在邦联的350万奴隶中大概有150万已经直接地受到北军入侵的影响，而且其中50多万人是在联邦牢固控制地区之内。

联邦政府对这50万逃亡奴隶从来没有制定一项统一的坚定的和深思熟虑的战时政策。军队、财政部（该部控制没收充公的财产）、各宗教团体以及北部为给自由民提供救济和教育而组织的自由民协会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占领军司令部的军官掌握最大的权力。从他们最初企图应付逃亡的奴隶进入时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政策”的东西。在最初阶段，这种准政策也掺杂许多混乱、困难和不公正。

这些逃亡奴隶拥挤在临时准备的营地里，曝露在日光和风雨中，加上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时还“没收”黑人好不容易随身带来的粗陋财产。士兵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造成了性病流行。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而建立秩序，为了防止部队的风纪败坏和剥削逃亡奴隶，联邦的指挥官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指派部队军官作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队士兵保护村子以防范北部非法活动者和邦联游击队（这种村子起到组建黑人

团的作用),给自由民提供口粮、衣服和药品,号召北部的传教团体和志愿团体给予援助,和以尽可能快的行动去动员身体强壮的黑人去当劳工,并最终去当兵。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军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效能。人道主义显然是第二位的。军队并没有考虑自己是从事改革的团体。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逃亡出来的黑奴组织起来,以便把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支援发挥最大的劳动效能。陆军和海军让这些逃亡黑人当赶大车的把式、装卸工人、轻工兵(建筑工人)、医院的卫生员和护士、炊事员、洗烫衣服的女工、仆役、砍柴工,等等。

奴隶做上述工作不同于他们为邦联军队做同类工种的唯一地方是他们作为联邦劳工具有自由,并且得到工资。但有时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邦联的官员们未经本人同意强制黑人服兵役,而联邦的官员们也常常这样做。从理论上讲,为联邦工作的黑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中许多人几乎没见过一美元,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从衣服、亲属的赡养、每日口粮或医疗费中扣除了。邦联的官员或监工可能一直是苛刻的工头,而某些北军的宪兵司令、军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这一方面比起他们也不相上下。许多投奔北军的黑人无法解释,他们的旧的地位与新的身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曾在联邦入侵者占领的种植园劳动过的许多自由民都能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那类种植园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见钱眼开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许多种植园主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带着从前的奴隶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给奴隶工资。但是说到在军队中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一个北部白人工人要确认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劳动制度可能会有困难。在已经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纳撒尼尔·班克斯发布了规章

条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军官们都仿效这些规章条例(在这两个地区,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联邦有组织的控制之下生活)。根据这些规章条例,劳动被确定为“公共义务”,懒惰和流浪被视为“犯罪”。所有尚未被雇佣的强壮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营工厂去劳动。一个逃奔出来的奴隶可以选择自己的雇主,但是一旦签订了合同,他就必须为这个雇主干活直到合同满期。规章条例上规定了最低的工资,还有口粮和住房。但是考虑到衣物、医疗费和病假等等这么多的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种植园的雇工都在为吃住而紧张地劳动。宪兵司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续的忠实干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和完全服从”。<sup>5</sup> 废奴主义者的指责这些规章条例是对自由劳动的歪曲。由于揭发了许多白人承租者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与某些宪兵司令之间的互相勾结,而这些宪兵司令所起的作用与旧的奴隶警察所做的几乎一样。这一切使废奴主义者们的愤怒变得更为强烈。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有些部队军官还是同情和关心的。格兰特委派一位随军牧师约翰·伊赖上校任密西西比河流域自由民的行政官,他和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沿海岛屿的军事行政官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特别关心。在已占领的地区,许多自由民,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自由民,得到优厚的工资。军队往往插手保护工人免遭农场主虐待,以便使农场主遵守对待工人的例规。种植园的承租人并不都是西蒙·勒格里\*。签订合同与工资的概念其本身在南方种植园里就是新鲜的。它是从半封建朝着现代自由劳动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非所有没收的种植园都租给了私人。许多仍然在政府手中。这些种植园里的自由民都是在管理人的指挥下劳动着,这些管理

---

\* 西蒙·勒格里是斯陀夫人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残酷的奴隶主,他把汤姆打死了。——译注

人都是由北部自由民援助团体派去的。这种模式在南卡罗来纳的近海岛屿以及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占领地区，都是共同的。这些管理人不同于承租人或农场主，他们对帮助那些逃亡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比起在农作物种植上获利往往更有兴趣。但获利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赞成蓄奴制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蓄奴制对于南部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北部反蓄奴制的人渴望证明自由黑人劳动的有益性。虽然战争的混乱和破坏使农作物的产量低于战前水平，但是战时棉花价格的飞涨，使大多数种植者都获利——因此反对蓄奴制的人们都断言自由劳动的尝试是成功的。

诚然，无论是那些仁慈的“管理人”还是拚命追求利润的承租户，在白种人的监督下组织种植园工人的做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统治。但是，当军官和文官们面对大量被赶出家园、衣衫褴褛和正在患病的奴隶时，他们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军队把大部分健壮的成年男性逃奴抽出来充当劳工和士兵之后，自由民管理人手下只剩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者了。在这种环境里，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家长式作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玩忽职守，或是发生可怕的死亡率，后者比诸家长式作风受到的指责更加严重，可能成为罪责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逃奴营地里的死亡率可能高达 25%。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南部邦联士兵以及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接近 20% 的疾病死亡率，那么这个数目就不算很高了，因为在黑人队伍中没有老人或儿童。由于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白人难民的死亡率也很可怕。在联邦军队和慈善团体对那些逃亡出来的黑人进行组织、训练和救济之前，在这些逃奴中就出现了最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的灾难。他们决定把所有健壮的黑人都安排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把他们从有害健康的

宿营地疏散开，因为营地里人员拥挤和肮脏，而且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对白人管理人或承租人家家长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作法就是把没收来的土地，要么直接出租给自由民，要么直接出售给自由民。这是北部激进分子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在占领的南部，日益推广执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联邦控制之下的农田几近20%是由黑人单独耕种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兄弟约瑟夫在维克斯堡南部戴维斯一本德的种植园里。在1864和1865年黑人农民在戴维斯一本德租借了数千英亩土地并且成功地种植了棉花和粮食作物，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这位邦联总统从前的奴隶。在1865年的棉花收获中，他们净获利159000美元。这些自由民形成了一个自治区，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黑人行政司法长官和治安推事。在南部其它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自由民在战争期间可以购买土地。

这样的机会给黑人朝自耕农的地位提供初步的开端，这种地位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愿望。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也都预见到未来的南部是属于拥有土地的黑人农民。但是，这种美景却遇到了强大的干扰。例如，1863年—1864年，在近海岛屿上的自由民购买了5000英亩土地，但北部的投资者却买了20000英亩土地（其中一些土地后来被转卖给黑人）。这些北部买主中有许多像其它地方的北部承租人一样，表现出南部种植园主战后所持的态度，他们愿意要无土地的黑人劳动力而不愿要拥有小块农田的黑人自耕农。

宪法看来禁止在南部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1862年7月，林肯曾扬言要否决第二个没收法案，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没收邦联成员

拥有的不动产违反了宪法上关于剥夺财产法的禁令。这个议案规定只没收犯人生活范围之外的财产。<sup>\*</sup> 由于总统的坚持，国会通过了一项说明性决议，禁止剥夺邦联继承人财产的任何企图。当然，这样就使没收法作为一个土地再分配的手段失去了它的价值。根据 1861 年直接税收法，近海岛屿的土地已被出售而不支付税款，这个税收法为重新分配南部土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那里也同样隐隐出现了难以应付的法律和行政两方面问题。

激进分子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宪法上模棱两可的说法，已无法忍耐。一位废奴主义者说：“根据文明国家所有法律和习惯法，反政府的叛乱者应被没收其财产。”自由民如果没有土地，才仅仅得到一半的自由。“为了安全、和平和持久”，激进分子们坚持认为，“必须主要在经济和工业上进行重建；必须着手在南部安置一部分忠诚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是作为耕种者，而且是作为合法的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发生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在那些国家，一切土地归一个阶级所有，而耕种却归另一个阶级。”<sup>6</sup>

1863 年 12 月，林肯发表大赦宣言，将财产（除奴隶外）归还给已进行过忠诚宣誓的邦联分子，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土地改革的良机。虽然数千名南部人排除在这种大赦之外，但林肯公开表示以后有可能把他们包括进大赦之列。一位愤怒的废奴主义者说：“假如总统把土地的所有权都归还给这些叛国分子，那么没收法就是

---

<sup>\*</sup> 宪法第三章第 3 条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民权时，除剥夺公民权终身者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亦不得没收其财产。”第二没收法曾规定没收邦联成员的财产，作为惩办他们反对合众国的叛乱。但由于这条规定会妨碍那些受到这种惩罚的人的子女继承这份财产（“丧失继承权”），林肯曾扬言说，如果国会不修改这项法令以防止上述情况，他就要否决这个议案。由于作为宪法这一条款的根据的英国法律，只应用于不动产，林肯认为奴隶作为财产，应该豁免丧失继承权的律令——换句话说，奴隶能被合法地没收，而土地却不能。

一场闹剧，而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sup>7</sup>

1864年初，激进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提出了一项法案，把1862年的宅地法扩充到南部那些被丢弃和被没收的土地。朱利安的这一法案提出，对于每一个自由家庭的每个人，南部联邦主义者以及联邦军队的退役军人，授与40或80英亩的土地。虽然这个提案与林肯的政策似乎有矛盾；但朱利安声称，已经获得总统的同意，将签署废除1862年关于限制没收犯人的生活资料的决议案。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废除1862年的决议案。但是出于宪法上的顾忌及某些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他们甚至对削弱叛国者的财产权表示犹豫，所以阻止了废除议案或者说阻止了朱利安土地再分配议案的最后通过。国会通过的与此最接近的立法是1865年3月关于成立自由民管理局\*的一项法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每个南部自由民或联邦主义者可以租用40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他们在三年之后，凭“合众国转让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就有选择购买土地的权利。<sup>8</sup>

在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已经在进行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始这项计划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对激进分子和自由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当谢尔曼的军队通过佐治亚并在1864年12月到达萨凡纳时，数千名衣衫褴褛的自由民正七零八落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谢尔曼同20名黑人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告诉谢尔曼：“我们能够最好地照顾自己的办法，便是拥有土地。”会议之后，谢尔曼在1月1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从查尔斯顿到杰克逊维尔海岸线和30

---

\* 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 1865--1872), 又译作“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译注



英里的内陆河岸作为自由民重新定居区，而且给每个家庭 40 英亩土地。这些土地自由民们在国会“将来规定土地财产所有权”之前将获得“土地占有权”。到 1865 年 6 月底，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安置了四万多名自由民。未来将由国会决定是否能把这种“土地占有权”转变成为真正的所有权。<sup>9</sup>

### 自由民的教育

土地所有权是未来基本美好前景的一个支柱，另一个则是教育。对教育的追求比起对土地的追求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北部在南部创办学校的改革运动是一项在从前邦联地区实地进行的现代化的革新。

1863 年，在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一位北部传教士写道，他的周围都是：

穿军服的黑人，穿着破烂衣服的黑人，住在木屋里的黑人，生活在帐篷里的黑人，生活在用树枝覆盖在几根横杆下的黑人，生活在没有横木的大堆树枝堆下的黑人，露宿野外以青天作被窝的黑人；他们都满怀着希望……，每个人都在祈求接受教育，为了学习而愿意去做任何工作。他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高呼要“书！书！”还问：“何时开学？”<sup>10</sup>

废奴主义者率先在北部各地建立自由民援助协会。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废奴主义者对于受他们保护的自由民的责任将不会随着法律上废除蓄奴制而中止。”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自由民的教育。”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黑人渡过难关。”<sup>11</sup> 战争期间，自由民救济协会至少派出了一千名教师，他们在占领区创办了学校。这些教师成为战后最初几年来到南部的 2000 多名教师的先行者。有一位第一批到达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北部教师在 1862 年写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反蓄奴制的工作，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崇高的

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十分高尚。”大约三十年过后,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写道,这些教会的教师中四分之三是妇女;他们都是在内战时期没有得到歌颂的男女英雄人物,“他们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最精采的和平战斗。……〔他们〕的到来不是使黑人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动,而是使他们跳出蓄奴制曾吞噬他们的龌龊污浊的地方……。这就是新英格兰给自由黑人的礼物。”<sup>12</sup>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白人。1861年9月,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建立的第一所自由民学校就是由一名自由黑人妇女执教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在自由民学校的4000名教师中大概有20%是黑人。南部的黑人们用自己的财力创办和资助了其中许多所学校。

然而,如同杜波依斯所提示的那样,自由民的教育主要是一项新英格兰事业。五分之三的白人教师出生在新英格兰。最大的自由民团体是美国传教士协会(公理会),它得到的大部分赞助都来自新英格兰。最有势力的非宗教团体是新英格兰自由民援助协会。有位教师写道,他设想其使命是在亚拉巴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英格兰文明”。另一位教师则希望新英格兰学校女教师的改革运动将提供足够的教师“使整个南部成为一个新英格兰”。<sup>13</sup>

北部教师们在教育的这一方面上所想到的比作为初等教育基础的读写算要广泛得多。他们希望在南部灌输新教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这些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劳动的必要性和高尚性的观念。北部的传教士们指责某些联邦的指挥官在占领下的南方实行强制劳动的管理条令。他们认为劳动的道德观必须通过教育才会成为个人品德的一部分,不能由外界强加于人。最好的纪律就是严于律己。有位废奴主义传教士写道:自由民“需要接受清教徒关于劳动光荣的教义”。蓄奴制由于把劳动同奴役联系在一起,就把劳动的崇高性贬低了。为了帮助自由民“抛弃蓄

奴制的教义”，学校对学生“授以勤奋、家政安排以及节俭方面的课程”。他们教育学生，“勤劳对自由来说是值得赞美和必需的，而懒惰既不道德又可耻”。传教士认为，获得自由的奴隶们需要接受“新英格兰的教堂和学校……培育秩序、节制饮酒、纯洁净化和诚实”并教育他们成为“像北部人那样勤奋、崇尚经济和节约。”<sup>14</sup>

在战争期间，自由民学校中的黑人估计达到了二十万。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已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教育计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学校发动了一场扫盲突击运动，这场扫盲运动后来由按照北部教会学校创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部新的公立学校体制继续进行下去。

自由民管理局是私人援助团体的一个重要伙伴。这个局从1865年至1870年在学校方面花费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该局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荒废土地管理局”。建立自由民管理局提案最初提出是在1863年，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该局应隶属于陆军部还是财政部发生争执，一直拖到1865年3月3日才成立。国会最后决定把它隶属于陆军部。这个局的工作在占领下的南部成为军队战时经验的楷模。这个局由于安置了白人和黑人难民，因而起着—个救济机构的作用，它在农场主与自由民之间草拟劳动合同并加以实施；它与志愿会社合作开办自由民学校。

## 政府和自由民

联邦政府对自由民工作的纪录交错着成功与失败、人道主义与剥削，慈善与残酷等的事例。政府的政策往往看上去是混乱的和目光短浅的；而政府则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解放四百万奴隶和重建因内战而瓦解了的一个奴隶社会完全都是新的经验。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去指导人们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没有做过要负责处理庞大的难民人口问题，没有设立官方机构去实施—

项巨大的福利与就业计划。联邦军队和政府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开创了先例。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如此众多的奴隶；没有第二支军队曾经完成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没有第二个国家曾建立过自由民管理局去处理已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没有第二个社会把如此巨大的努力和金钱倾注在对以前的奴隶的教育上。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是微小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努力都是革命的。

## 政治上的重建

任何一项对自由民的政策，其命运最终取决于政治重建的情况。林肯愿意采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统曾是亨利·克莱\*派的一位老辉格党人。他在南北战争以前，曾与南部辉格党人有过热诚的关系。他知道，这些人中有许多在1861年还是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他的“百分之十重建计划”就是呼吁这些老辉格党人和其他联邦主义者挺身而出，并重申他们与联邦的同盟。对林肯来说，重建的任务是一种恢复而不是一场革命。由于新联邦不会有蓄奴制存在，所以可以肯定，恢复联邦决不是恢复“原样”。但是，总统很愿意同意获得赦免的南部领导人“采用某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去缓和“整个劳工革命”所造成的冲击，并因此能够使黑人和白人“摆脱彼此间的老关系而逐步自己生活”。<sup>15</sup>

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并不希望缓和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必须〕打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主要是一场社会革命……”。寡头政治是南部的结构，统治着

---

\* 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美国爱国者，政治家，是内战前数十年间，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创建辉格党，主张解放黑奴；曾任众议院议长，数度参加过总统竞选，但都不成功；曾任昆西亚当斯政府的国务卿。——译注

南部，而且发动了这场战争。只有消灭这种寡头政治和那种社会形式，才能结束这场战争。”<sup>16</sup> 仅次于菲利普斯的是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他是把重建当作革命的最坦率的鼓吹者。当时欧洲的观察家把他形容为“历史上最激进之一的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他宣称，重建必须“改变南部的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必须粉碎他们各种制度的基础，并奠定新的基础，否则我们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的财富也就白白地消耗掉了”。<sup>17</sup>

在被占领的南部，许多激进的军官和官员都持这种观点。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上校在南卡罗来纳州写道：北部的价值观和制度一定要在战后推广，只有“变革，革新和同化被征服的人民的制度，生活和风俗”，才会做到这一点。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事务官在1864年说：“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中立可言。它一定要造成社会的根本变革；这〔已经〕成为每一场大革命的历史。”<sup>18</sup> 但是，温和派亦引证历史来支持他们的进化论观点。班克斯将军（他负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林肯重建计划）写道：“世界历史表明，得不到控制和不加合理限制的革命会产生反革命。”<sup>19</sup>

在1864年上半年，这些对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形成有关重建问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僵局，但是，这场较量几乎使党陷于分裂并威胁到林肯的再次当选。

林肯的政策是以其联邦不可分离的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各州不能合法地脱离，于是就仍留在联邦内。因此重建的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法律手续，以便使忠诚的公民借此重新取得对他们州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意义上，邦联各州无疑是处于联邦之外的。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不希望准许前叛乱分子仅凭一次效忠宣誓就返回联邦。共和党人出于对前邦联分子的不信任，希望只把重建工作委诸毫无疑问的联邦主义者去做。他们打算提出几个条件，以

保证黑人的自由和公民权。为了证明对宪法所确认的州权进行干涉是正当的，他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宣称，由于南部各州确曾脱离过联邦，所以根据国际法应作为“被征服的区域”来对待。但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激进了；这些共和党人倒倾向于查理斯·萨姆纳的论点：南部各州因脱离联邦而搞了“州自杀”。由于它们已丧失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所以它们恢复到这样的准州地位：只有在满足了国会所规定的条件时，它们方可作为州而被重新接纳。但是，这种准州化的观念某些共和党人也认为是太过分了。在1862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共和党众议员联合民主党众议员以及边疆州的国会议员，挫败了准州化的重建措施。

同时，林肯通过1862年在邦联四个州的占领地区任命军事长官，已在国会取得了主动权。虽然这是针对占领区管理需要一个临时政权作出的着重实效的反应，但林肯显然有意把此举作为走向总统重建计划（即通过行政决定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去制订重建政策）的第一步。在这同时，共和党温和派国会议员对准州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变通办法。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本意，“共和”只意味着非君主政体。但是，和宪法其它部分一样，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个词组是可以作出新的解释的。对1863年的共和党人来说，反叛和蓄奴制可被解释为对一个共和政体的否定。无疑，这会引出某些麻烦的问题。如果邦联各州的蓄奴制是非共和主义的，那么忠诚的边疆诸州又如何呢？不过，到了1863年，共和党以宪法该款为基础进行重建已取得了一致意见。无论是国会准州化的想法，或是总统的各州的关系牢不可破的理论，都没有消失。然而，二者都已包含在共和政体的这个概念中，而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几乎可以为任何事物提供法律根据。

但是，“共和政体”这个词组并未消除林肯与激进派在观点上的区别。温德尔·菲利普斯说道，总统赦免叛乱者并让他们参加重建的政策“使南部的大地主依然把持政坛并使黑人的自由徒具虚名”。菲利普斯警告道：这些获赦的邦联分子一旦重新掌权，“阻挠这场革命的势力就会轻易地得到行政当局帮助，尽管行政当局也希望黑人应当获得自由，但它却没有为他们设法做点别的事……。麦克莱伦在战场上曾经干了些什么事呢——‘他干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而林肯在国内事务中又在干些什么呢——‘尽可能少地进行变革！’”<sup>20</sup>

激进派不仅要求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在开始鼓吹黑人的投票权了。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正义的原因，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废奴主义者一直在试图为北部黑人赢得平等的选举权；而现在他们已准备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南部。他们说，如果得不到选举权，获得自由的奴隶就没有能力对抗旧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反革命政治行动，也就永远不能保卫自身。废奴主义者还认为，自由民在下南部地区形成唯一保留的联邦主义大集团。如果没有他们的投票权，一个重建州的忠诚基础就会很脆弱。如果不给那些曾为联邦工作和战斗的人们以投票权，但同时却把这一宝贵的权利赋予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联邦的人，那么还有什么正义或健全的政策可言呢？1864年初，菲利普斯几次在挤满听众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说：“黑人已经获得了土地和接受教育等各种权利。我们在离开他们以前，我们应当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投票权和有就近的校舍。如果这些我们办不到，那么北部就已经让狡猾的政客窃取了战争的果实。”<sup>21</sup>

在1864年，这一主张对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过于先进了。北部选民只是在最近才用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所以几乎尚未准备

好实现政治平等。但是，如果此时只有最激进的发言人公开主张黑人拥有投票权，那么这场战争的历史就说明哪里有激进派先行，哪里就有共和党的多数跟着干。萨蒙·蔡斯在 1863 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与好几位共和党人进行私下谈话后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愿意让有色人民参加战斗的人现在都愿让他们参加投票。”<sup>22</sup>

## 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发生的事件使林肯和激进派就重建所持的对立观点愈益尖锐化。在新奥尔良，为数颇为可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熟练的工匠阶层——其中包括大约一万名战前的自由黑人——成为真正激进的重建的核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脱离联邦，他们与蓄奴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不大喜欢这种制度。1863 年，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成立了自由州全州委员会，并敦促召开大会，拟定一部新的州宪法。与自由州委员会打交道的一位财政事务官写道：“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同我们过去一样地激进。一个由有才智的自由民组成的有色人种代表团被批准与会。这比诸俄亥俄州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sup>23</sup> 然而，班克斯将军则喜欢路易斯安那的联邦主义温和派，而不喜欢激进的自由州委员会。班克斯并未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召开制宪大会，而是按照曾根据废除蓄奴制的军事命令而修改过的战前宪法进行了一次州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林肯急于加快路易斯安那的重建进程以作为各州的样板，因而要求班克斯率先搞下去。

班克斯处于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地位。联邦军方控制着选民登记手续。班克斯对温和派领袖们予以保护。许多选民在不遵照这位指挥占领部队的将军的意愿之前，都要三思而行。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在 1864 年 2 月 22 日举行的这次选举中，温和派轻而易举地获胜了。班克斯对结局所起的作用激怒了激进的自由州人，



并疏远了强有力的国会共和党人。为了部分地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林肯催促班克斯向温和派施加压力，以便在预定4月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一部自由州宪法。与此同时，自由州委员会委派新奥尔良黑人社会的两位领袖携带要求给黑人投票权的请愿书前往华盛顿。林肯为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和口才所感动，便写信给新当选的被占领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迈克尔·哈恩。制宪会议将决定新时代选民的资格。总统写道：“我提出一个坦率的建议供你参考，是否可以不将某些有色人种人士拒诸门外——如那些很聪明的，尤其是那些曾在我们队伍中英勇奋战的人。他们在将来某个艰难时期，可能会帮我们这块自由的宝石保持在自由的体系内”。<sup>24</sup>

这封信表明，林肯已打定主意迁就激进派。但是，要使这个建议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到采纳，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给黑人以投票权的“坦率建议”。尽管班克斯施加了压力，大会只是就未来黑人选举问题授予州议会以自由决定的权力。新宪法的确禁止了蓄奴制，并为两个种族创建了公立学校体制。但这并未使激进派平静下来。对宪法投赞成票的，只代表该州男性成年白人的10%。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基础对重建来说是过于薄弱了，特别是因为路易斯安那新政府的成员没有一个激进派——最可靠的联邦主义者。如果这就是林肯的重建政策的样板，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愿参与其事了。

### 韦德—戴维斯法案

但是国会拥有某种追索权——它有权拒绝接纳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而且它的确这样做了。它还拒绝接纳阿肯色被占领地区按照林肯的政策选出的国会议员，并拒绝计算这两个州和田纳西州在1864年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选票。国会并不限于采取上述消极行动，它还企图再次抓到重建的主动权。一位精疲力竭的国

会议员写道：“每个人都忙于解决叛乱州问题的计划，每天至少有六个计划以议案形式提出。”<sup>25</sup> 经过近五个月的辩论，共和党人于1864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由马里兰州众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和俄亥俄州参议员本杰明·韦德提出的议案。韦德—戴维斯法案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林肯的计划不同：它所要求的不是10%，而是50%的选民举行忠诚宣誓来开始这一程序；它不是让这批人来选举新的州级官员，而是首先把代表的选举委托给制宪大会；它不是允许所有进行宣誓效忠的白人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而是给那些参加“严格宣誓”并起誓说明他们从未自愿帮助过叛军的人以选举权；该法案规定对自由民的自由给予具体的法律保护，这些法律保护将由联邦法院执行。

然而，韦德—戴维斯法案同林肯的计划一样，把重建程序局限于白人选民范围内。该法案在通过国会的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曾一度给所有“忠诚”分子以选举权；但是，为使法案在休会前获得通过，韦德作了最后的努力，竟同意一项只给白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以挽救这个法案。大多数激进派（激进派在此时约占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乐于让黑人也拥有投票权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走在全国前面”的打算，还是同意了排除黑人的投票权。他们还希望，50%的要求和对白人选民的严格限制将把重建推迟到战后；而到那时，北部日益增强的激进主义就可能支持黑人投票权的要求了。

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投票赞成韦德—戴维斯法案，但是林肯还是行使了很少使用的搁置议案的宪法条款，而总统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只要拒绝签署就可以把会议结束前通过的法案予以扼杀。林肯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解释他所采取的这一行动：他不愿批准一个使他委身于任何一个复旧计划的法案，特别是因为这个法案将毁掉他正在努力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脆弱的

政府。但是，林肯声称，他愿在任何一个“愿意采纳该法案”的州实行韦德—戴维斯计划，然而在总统的温和计划可作为一种选择方案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极小的。”<sup>26</sup>

林肯由于冷漠地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而激怒了韦德和戴维斯。他们二人于8月5日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宣言。“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而总统拒绝批准，随后又发表声明，只要他认为合适，就酌情实施……。其蓄意践踏人民立法权威的行径是前所未有的。”韦德和戴维斯代表国会共和党人进行挑战，并警告林肯：他如果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就必须使自己就严格厉行总统的职责——服从法律并执行法律，而不是立法——用武力镇压武装叛乱，同时把政治上的改组留给国会。”<sup>27</sup>

## 重建与总统选举内幕

在一次其结果有可能决定国家生活的政治运动中一位总统竟受到他所属的政党的领导人士甚为尖刻的攻击是罕见的。但这种情况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重建问题早就和党内宗派活动纠缠在一起了。林肯在1864年初是否会再次获得提名，还没有把握。当时的传统是一届总统只当一任。自1832年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曾经连任过；自1840年以来，还没有哪位在职总统获得其所属政党的再次提名。有好几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至少和林肯一样够格当总统。

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萨蒙·蔡斯。他野心勃勃，很不自量。蔡斯在1864年利用财政部的赞助组建了一个为他提名的政治机构。这一努力使他赢得了那些不再对林肯的重建政策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的支持。但是，支持蔡斯的人干得很不高明，正像1862年12月的内阁危机一样，使这位部长再一次受到愚弄和羞

辱。在2月初，有一本题为《下届总统选举》的亲蔡斯的小册子在一些著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免费签发下在中西部地区散发。几天以后，蔡斯的竞选经理人、堪萨斯州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发表了一个“纯属私人”的通报，极力吹捧这位部长具有总统的潜力。波默罗伊的通报很快就泄露给新闻界。对这些文件的反应使时机未成熟的蔡斯反而自食其果。事实表明，林肯在党内获得的支持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当蔡斯在财政部建立一个机构时，总统已利用其它各部的赞助几乎在北部各州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有14个州的共和党议会或大会——其中包括蔡斯的家乡俄亥俄州——通过决议保证再次提名林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提名林肯。拥戴蔡斯的运动垮掉了。\*

某些反林肯的激进派又把希望寄托在约翰·弗里蒙特将军身上。弗里蒙特于1862年6月辞去他在谢南多厄河谷的司令职务后，便一直在纽约“待命”。自从他1861年在密苏里州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失败后，他在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美籍德意志人眼中就一直是英雄人物。这些集团的代表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提名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其政策宣言要求修改宪法，以“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并把没收的叛乱者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定居者。”<sup>28</sup>

但是，这个显然激进的政纲因有民主党渗入这一运动的迹象而受到了玷污。大会提名毕生是民主党员的约翰·科克伦将军为副总统。政纲中的一条谴责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暂停人身保护法——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问题。大会自称“激进民主党”，这就给

---

\* 波默罗伊通报公之于众后，陷于窘境的蔡斯递交了辞呈，但林肯却愿意让他留在内阁中，这样对总统再次获得提名的威胁会小些。可是，四个月之后，当蔡斯就赞助问题进行辩论时再次提交了他的辞职书，林肯此时已稳当地再次获得提名，于是接受了这份辞职书。

这对陌生的伙伴的政治联盟作了一个极好的总结。尽管有些废奴主义者跟随温德尔·菲利普斯去支持弗里蒙特作为候选人，但多数人都同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观察，即弗里蒙特已成为希望分裂并征服共和党人的那些诡谲的民主党主战派所利用的对象。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人支持弗里蒙特。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时，林肯的各位竞选经理人已经有效地控制局势了。只有激进的密苏里州代表团反对再次提名总统为候选人。为了扩大号召力，大会自称为全国联盟派，并提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主战派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政策宣言避开了棘手的重建问题，赞同林肯的战争措施，反对除邦联军无条件投降以外的任何和平条件，并赞同一项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

这次全党和谐一致的行动掩盖了一直存在的因重建问题而造成的分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会共和党人对林肯的提名感到不快。在幕后，有好几个激进分子继续苦心孤诣地寻求某种途径来让一位更能令人接受的被提名人来取代林肯。总统对重建法案的拒绝签署已使共和党人的不满具体化了。韦德—戴维斯宣言构成了一个很不协调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召开新的大会来提名本杰明·巴勒特将军为总统候选人。人们希望，民主党主战派将会追随这位候选人而团结起来，弗里蒙特将撤销其候选人身份，而林肯认识到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态，届时将会退出竞选。

在1864年8月那种阴郁的政治气氛中，居然有相当多的聪明人认为，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够成功。为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注意1864年历次战役的情况。因为，根据最后分析，1864年选举的关键并不是重建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以惊人的伤亡数字打过几仗后已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城下受阻，北部在该年开始时对军事胜利所寄予的高度期望

已经化成泡影了。到 8 月为止，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就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北部的政治舞台，人们在浓雾中摸索着道路。

## 第二十三章 军事僵持，1864 年

1864 年夏，军事形势的明显逆转，更加使北部人感到震惊，因为在这年初邦联的前途一度十分暗淡。南部的兵力尚不及北部的一半，而且没有更多的后备人力可资利用，而北部则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新的志愿人员和应征入伍者。联邦军占领了田纳西全境，邦联外密西西比军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南部铁路系统陷入混乱，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南部领导人就 1863 年失败的责任问题正互相攻讦，而强大的北军已剑拔弩张，准备撕杀一场了。邦联陆军部的一位军官在 1863 年 11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从未对这事业真正感到绝望……〔但现在〕坚定的信念已经消逝了，我感到毫无希望了。”<sup>1</sup>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像表面现象那样地毫无希望。邦联前线部队在冬季营地掀起的宗教复兴浪潮的推动下，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南军几乎全是老兵，而北军中三年服役期的士兵在 1864 年就已服役届满，这预示着北军各团战斗力的下降。事实上，邦联在 1864 年也有许多士兵服役期满三年，但根据新近修订的兵役法，这些人员应全部再次应征入伍。

与此相反，北军士兵服役期满后即可随意离队。如果他们都这样退役，那么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作战部队——尤其是有三年作战经验的最优秀的老兵的一半——退役了。联邦政府并未强迫这些士兵再次应征入伍，而是靠说服和引导的方法，唤起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自豪感，加上给每个再次入伍者 30 天休假和 300 美元的联邦津贴（此外，许多士兵还从州里和地方领取津贴）。一半以上的三年

老兵再次入伍了。\* 有些人觉得很光彩，但多数人大概都处于下面两个二等兵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状态。这两个士兵隶属曾参加波托马克军团历次主要战斗并遭受重大损失的一个马萨诸塞团。其中一人说：“在这里，他们使用一个人就好比在射击比赛中对待一只火鸡，朝它开上一天的枪，要是没打死，就在傍晚用抽签的办法把它卖掉；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要是在三年中没有杀死你，就要求你再干三年——不过，我倒愿意呆下去。”他的同伴补充道：“要是新兵没有完成这项任务，那老兵就一定得完成之。”<sup>2</sup>

要是没有这些“老志愿人员”（他们佩有特殊的V形臂章），联邦军在1864年就已变成空架子了。由于不少新兵都不是当兵的材料，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津贴领取者、替身和应征入伍者源源不断地涌入老兵所在各团的营地，以增强实力。他们都是些“北部贫民窟的社会渣滓”、“各国的败类，……身上打有烙印的囚徒，……窃贼、走私犯和无业游民”，他们把1861年入伍的士兵搞得目瞪口呆。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老兵不无夸张地写道：“以前从未有哪支部队因这么一伙作恶多端，走投无路的堕落分子而蒙受耻辱。”另外一位老兵评论道：“如果放心地让这些家伙去放哨，要不了多久，部队就会进地狱。”<sup>3</sup>许多士兵一有机会就溜之大吉。格兰特在1864年9月通报陆军部：“我们用这种方式招来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开了小差。根据北部公布的招募新兵数额，我们没有招来超过五分之一的合格士兵。”<sup>4</sup>这些因素使北部那种表面上的数量优势大大地下降。这些因素加上南部在防御作战方面的优势，使得北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消除了邦联赖以生存的这一特殊条件。

---

\* 波托马克军团的三年老兵有半数左右再次入伍。西部部队中再次入伍者的比例则更高些。



## 1864 年的联邦军事战略

为了协调各条战线上的战略，北部于 1864 年实行了统一的指挥系统。林肯早在 1862 年任命哈勒克为陆军总司令时就有这个打算，但是哈勒克推卸了这一责任。1864 年 3 月，格兰特前往华盛顿担任哈勒克的职务。<sup>\*</sup>但是，格兰特并不想当坐办公室的将军。此后，他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波托马克军团，从而实际上成为该军在战略方面的战地司令官，而米德则保留虚衔，实际上当战术司令官。哈勒克欣然让位，下去当陆军参谋长。他呆在华盛顿，而他的办公机关则起到通讯中心和作战中心的作用，把格兰特的命令传达给其遥远的部属。

林肯终于有了一个在战略思想上与他相投的总司令，可以放手让格兰特果断地行动，而不必像对弗吉尼亚战场的前几任指挥官那样地不断督促了。格兰特认为，联邦军各部队过去“独立行动，缺少协调，就像几匹不愿拉车的马，没有哪两匹马的劲往一处使。”<sup>5</sup>这就放纵邦联能把部队从一个地点调到另一个地点，以解燃眉之急。林肯在过去两年中一直试图让数条战线的部队齐头并进，而现在格兰特已制定出这样一个全面计划。他向绵延一千英里的五条战线上的联邦部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春季尽早打响几个协调行动的战役。

拥有约 115000 兵力的波托马克军团将出击拥有 64000 人的强敌北弗吉尼亚军团。格兰特对米德说：“你的出击目标是罗伯特·李的军团。李开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sup>6</sup>弗吉尼亚州境内的两支小部队将在主战场的外围作战：本杰明·巴特勒将从门罗要塞

---

<sup>\*</sup> 国会恢复了中将军衔。过去只有乔治·华盛顿领有这一军衔（温菲尔德·斯科特仅取得该荣誉军衔）。林肯提升格兰特为中将，并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

出发，率军 30000 溯詹姆斯河而上，从东面威胁里士满，并防止敌军增援罗伯特·李部。同时，正在西弗吉尼亚指挥分散之联邦部队的弗朗兹·西格尔将深入谢南多厄河谷，以阻止罗伯特·李得到河谷中的物资和守军的支援。正如林肯恰如其分地形容的巴特勒和西格尔所起的辅助作用：“没有参加剥皮的可以扯住一条腿。”<sup>7</sup>

佐治亚战场的主要性仅次于弗吉尼亚。谢尔曼的 100000 大军与约翰斯顿的 50000 大军（在战役打响时增至 65000 人）在这里对峙着。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对约翰斯顿的部队采取行动，击溃敌军以后，即从速楔入敌占区内部，尽量破坏其战争资源。”<sup>8</sup> 班克斯将从新奥尔良移师莫比尔城下，一俟占领该重要港口，就挥师东北，穿越亚拉巴马州直抵佐治亚州，再与谢尔曼合作，在一次钳形运动中粉碎邦联军在该地区的一切抵抗。

## 几次辅助性战役的失利

不过，辅助性战役计划与大多数军事计划一样，也出了差错。这部分地是因为邦联军仍拥有很强的防御力量，而且也因为联邦军的政治将军——班克斯、巴特勒和西格尔——并未按计划行事。其实，班克斯的莫比尔战役根本就没有打响，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

### 雷德河战役

格兰特和班克斯早在攻下维克斯堡后就希望对莫比尔采取行动。但是，林肯却命令班克斯的海湾军入侵得克萨斯州。当时，法国正在墨西哥建立傀儡政府，总统很想以联邦在得克萨斯州的军事存在给予法国一点警告。班克斯在 1863 年所能做到的，不过是

把旗帜插上得克萨斯湾沿岸的几块飞地而已。然而，他 1864 年 3 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雷德河溯河而上，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他的意图是拿下施里夫波特，并以此为跳板远征得克萨斯州。

邦联军的作战部队为数 30000，分为各个分遣队驻在埃德蒙·柯比·史密斯直辖的外密西西比军区周围。路易斯安那州的叛军主力由理查德·泰勒指挥，他是前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儿子。班克斯拥有一支 27000 人的部队（其中有 10000 人是向谢尔曼借来的），得到戴维·波特舰队司令威力强大的内河装甲舰队的支援。与班克斯协同的是一支从小石城南下的联邦军，人数为 15000。格兰特一开始就认为，这个战役是一次徒劳的箝制行动。他命令班克斯迅速完成这一战役，然后驻守什里夫波特，再把主力部队调至新奥尔良，以发动莫比尔战役。但是，班克斯迟迟不采取行动，把战斗打得一塌糊涂。4 月 8 日，泰勒的部队在位于什里夫波特南面 40 英里的萨宾交叉路口，击溃了班克斯的先遣师。翌日，联邦军在普莱森特山，守住了阵地，给前来追击的邦联军以迎头痛击。

如果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将军，说不定在取得这一次战术性胜利后会迅速进军什里夫波特，但班克斯却决定撤退。他获悉，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军纵队无法与他会师，因为糟糕的道路和邦联军的炮兵已迫使他们返回小石城。更糟糕的是，已经浅得反常的雷德河的水位还在迅速下降，并大有把波特的整个舰队困在亚历山德里亚的滩头上。一位威斯康星的伐木工人出身的上校避免了这一灾难。他监督修建了一组巧妙的水闸，从而使舰队驶过滩头。俟班克斯的部队返回下游时，攻打莫比尔已嫌过迟。借自谢尔曼的 10000 部队并未在佐治亚州与谢尔曼会师，而是前往密西西比州去对付福里斯特了。林肯的得克萨斯战役从未在得克萨斯实施。邦联军仍控制着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北部和阿肯色南部。马克西

米利安在法国的支持下当上了墨西哥皇帝。班克斯虽然仍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的军事政府,但却被解除了战地指挥的职务。

### 詹姆斯河战役与谢南多厄河谷战役

当班克斯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在遭到败北时,巴特勒和西格尔也在弗吉尼亚州无法贯彻他们承担的那部分格兰特的战略。巴特勒率领 30000 装备精良的部队溯詹姆斯河而上,并于 5 月 5 日在里士满南面 15 英里处登岸。他说不定会由此切断里士满通往南方的铁路,占领彼得斯堡,或甚至攻入首都,与临时拼凑的 5000 部队和同等数量的由政府职员组编成的临时民兵较量一番。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削弱罗伯特·李。当时,李正在北面 60 英里处与格兰特进行殊死战斗,因为里士满和彼得斯堡之间的铁路是他的生命线。

巴特勒最终一事无成。他的部队并未以其绝对优势大胆地进攻,相反却是掘壕据守,仅扒掉数英里的铁轨,随后才于 5 月 12 日小心翼翼地向着里士满进军。这时,负责里士满防务的博雷加德将军所调集的部队已在数量上与巴特勒的机动部队(约为 18000 人)相当。博雷加德于 5 月 16 日在距里士满 7 英里处的德鲁里悬崖附近发动一次反攻。虽然双方都伤亡惨重,但联邦军还是被击退返回堑壕。这些堑壕位于彼得斯堡以北的詹姆斯河与阿波马托克斯河之间的一条狭长陆地对面。邦联军当时已在这条狭长陆地对面挖掘堑壕了。正如格兰特后来说的那样,巴特勒的部队“像瓮中之鳖一样地被彻底堵截住,已无法对里士满进一步采取直接的作战行动。”<sup>9</sup> 巴特勒不仅未能打击罗伯特·李的殿后部队,甚至也无法防止博雷加德把近 7000 名援军派往陷入困境的北弗吉尼亚军。

巴特勒虽然表现不佳,但其政治影响仍然很大,林肯无法把他撤职。然而,倒霉的弗朗兹·西格尔却未能逃脱这种命运。正向

谢南多厄河谷纵深方向挺进的西格尔于5月15日在纽马克特遭到5000名邦联军的袭击而溃败。这次战斗之所以为人们所铭记，主要是因为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247名少年学员发起了一次士气高昂的冲锋。西格尔未能完成他的双重使命——切断河谷通往里士满的铁路和阻止增援罗伯特·李的部队。5月21日，林肯解除了他的职务。

## 怀尔德尼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

格兰特的作战计划是当巴特勒和西格尔分别拖住叛军的两条腿时，由波托马克军团操刀剥皮。现在，他看出全部计划都得由他的部队去单独承担。这项任务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因为波托马克军团在为时两周的战斗中所遭受的伤亡比它在内战开始以来的任何一次相当的战斗都更惨重。

5月4日，联邦军各师开始横渡拉皮丹河，去开始一次战役。北部希望通过这次战役，在一两个月内赢得这场战争。格兰特企图绕过罗伯特·李部的右翼，以迫使其部队从堑壕里出来，到空旷的地面作战。罗伯特·李接受了挑战，但他准备不待北方佬走出这个名叫怀尔德尼斯\*的稠密的次生林时，即攻击其侧翼。这是因为，联邦军的人数优势和炮火优势在密林中无法发挥出来。在整整一年前发生的钱瑟勒斯维尔战斗中，罗伯特·李就是在怀尔德尼斯把乔·胡克击败的。这次他又打算向格兰特重演故伎。

### 怀尔德尼斯战斗

5月5日，罗伯特·李的先头部队与格兰特的南进部队遭遇。

---

\* 怀尔德尼斯(Wilderness)，原意为“莽原”。——编注

大吃一惊的联邦军正面迎敌，实施攻击，从而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林海激战。森林十分稠密茂盛，士兵们难以直接看到敌人，只能向发出声响和冒烟的地方开火，因这些地方可能有敌人存在。整旅的部队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军官们简直无法控制那些打得晕头转向的士兵；数以千计的步枪所喷出的火舌引燃了低矮的树丛；大批伤员被活活烧死。多数战斗反复在两条穿过怀尔德尼斯的主要道路的几个交叉路口上进行。第一天结束时，联邦部队仍占据着那几个至关重要的交叉路口。

当夜，格兰特向其手下的精锐部队第二军军长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发出命令，要他在拂晓时分向邦联军右翼倾全力进攻。联邦诸将领知道，朗斯特里特那个军未能在第一天按时到达参加战斗。所以他们仍希望在朗斯特里特于次晨抵达之前就攻击罗伯特·李的侧翼。汉考克在5月6日发动的攻击最初进展尚顺利。叛军右翼被迫后撤一英里，来到一小块林间空地上，这里设有罗伯特·李的指挥所。就在功告垂成之际，横穿密林前进的联邦军各旅开始乱成一团。恰恰在这时，朗斯特里特的生力军迎面开来，其先头部队快步开进林间空地。因遭遇战失利而焦急的罗伯特·李试图亲自率部队去攻击正在重新集结的北军防线。但是，邦联士兵高喊“李将军到后面去”，于是，李便停止行动了。就在这时，朗斯特里特不动声色地指挥了一次反攻，直打得联邦部队人仰马翻。

上午早些时候，朗斯特里特派他部分部队沿尚未竣工的铁路道口向暴露出来的汉考克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现在轮到邦联军在丛林处处驱逐北军时各自为战了。此时烟雾弥漫，人声嘈杂，朗斯特里特正策马向前，侦察形势时，在一片混乱中，被自己人的流弹击中。（在一年前的一次相似的偶然事件中，斯通沃尔·杰克逊就是在距朗斯特里特倒下的地点不足四英里处中弹的。朗斯特里特

虽活了下来，却有五个月未能参加作战行动。)此后，随着汉考克把士兵调至胸墙后面去保卫交叉路口，多数邦联军就从攻击这侧翼的战斗中退下。下午晚些时候叛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了。在薄暮时分，邦联军从北面三英里处发动一次攻击，把联邦军的另一翼逼成一个直角；联邦军数百名人员被俘，其中还有两位是将军。

这一形势使人想起了钱瑟勒斯维尔。当时，叛军虽在这附近对联邦军右翼成功地实施了一次进攻，结果却成为失败的开端。但格兰特却不是乔·胡克。一位神经质的旅长曾跑到格兰特面前说：“格兰特将军，这是一场危机。……我对李的手法了如指掌，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将全力以赴地楔入我军与拉皮丹河之间，从而切断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格兰特声色俱厉地答道：“听到你讲李将如何如何，我打心眼里讨厌。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总是以为他会突然翻上十几个筋斗，转眼间就同时站到我们背后和两翼了。回你指挥所去，多想想我们打算干什么，而不要去想李打算干什么。”<sup>10</sup>

格兰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联邦军右翼稳定下来，夜幕降临了。次日——5月7日，两军都精疲力竭地躺在各自的胸墙后面。在两天的战斗中，联邦军伤亡17000人以上，而邦联军的伤亡估计为11000人——为各自的17%左右。罗伯特·李再次以寡敌众，取得了赫赫战果。过去，波托马克军团每逢这种情况，都是要撤退的。疲惫不堪的老兵们断定，这次也不会例外。一个士兵写道：“我们多数认为，这是又一个钱瑟勒斯维尔，我们第二天就要再次渡河了。”后勤的篷车和大炮在白天后撤似乎证实了这种期待。可是，当夜幕降临，战士们接到南进的命令时，怀尔德尼斯之战的胜负，顿时变得明朗起来，这支军队不再准备撤退了。这些被硝烟熏得黑黝黝的北军士兵，即便刚下过一次地狱，而挥师南去所等待着他们

们的更是一座地狱，他们还是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其中的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我们精神焕发，大家雄赳赳地进军。战士们唱起歌来。”格兰特在战争开始前曾向林肯保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决不会后撤。”东线部队现在认识到，这位来自西线的将军意在把他那种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灌输给波托马克军。5月7日至8日夜间，格兰特沿着与第五军行军路线相邻的道路策马徐徐前进时，虽然并不引人注目，还是被战士们认出来了。战士们欢呼起来。这并不是麦克莱伦时代在阅兵场上的那种欢呼，而是老兵们发自肺腑的呼唤。<sup>11</sup>

### 斯波齐尔韦尼亚战斗

格兰特的目标是斯波齐尔韦尼亚县政府所在地的几个交叉路口，位于怀尔德尼斯东南几英里的地方。他在那里通往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交通线将是安全的。而且，由于联邦军插在罗伯特·李和里士满之间，叛军将被迫在格兰特选定的空旷地作战。但是，罗伯特·李挫败了格兰特的这一行动计划，他已命令现由理查德·安德森指挥的朗斯特里特军在5月7日至8日夜间实行强行军，开到斯波齐尔韦尼亚。当安德森的部队在迅猛推进时，联邦军先头各师受到叛军骑兵以及堵在路上的联邦骑兵所阻，进展缓慢。5月8日晨，安德森的士兵迅速开到位于斯波齐尔韦尼亚以北的临时胸墙后面，及时打退了联邦军的进攻。当双方彻夜行军已搞得疲惫不堪的部队陆续开进防线时，格兰特再次发动进攻，但毫无战果。北军进军斯波齐尔韦尼亚的竞赛中失败了。

目前，衣衫不整的南军占据着塹壕，他们沿着5英里长的塹壕匆匆筑起一道坚固的胸墙。这道胸墙呈巨大的倒马蹄形，掩护着斯波齐尔韦尼亚。格兰特企图攻击该战线西翼末端，但罗伯特·李移师防御这一威胁。格兰特认为，邦联军的中央防线因而削弱，



遂于5月10日下午命令发动两次进攻。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第二次进攻在24岁的埃默里·厄普顿上校的指挥下，一度突破敌军防线。在距叛军堑壕200英尺的树林的掩护下，厄普顿把专门挑选出来的12个团编成密集的四列横队。他率队迅速冲过无人地带。邦联军刚放过两次排枪，北军士兵就像疯子似的狂喊着越过了工事。不过，后续支援的一个师未能利用这个缺口，从而使叛军得以组织一次反击，打退了厄普顿的进攻并重创其部队。

厄普顿的暂时成功使他晋升为准将，并且使格兰特相信，再用一个军的兵力去试用这一战术。厄普顿曾正面攻击邦联军防线的某突出部的西北端；该突出部因其形状而被称作“骡子掌”。格兰特决定对这个突出部的顶端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认为该处由于其凸形而造成守军火力分散，因而成为最薄弱的地点。5月12日晨4时30分，汉考克的第二军冒雨冲出浓雾，越过邦联军堑壕，其轻而易举的程度出人意料。北军士兵在叫喊声中长驱直入半英里，缴获大炮20门，俘敌3000人。但他们因这次胜利而失去常态，成为一群无组织状态的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的乌合之众。北军军官尚未把他们组织起来，邦联军就发起反攻，挫败了联邦军的进攻。罗伯特·李再次企图亲率士兵反击，但是士兵们都意识到，如果他阵亡或被俘，他们的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于是，他们一边往前冲，一边再次高喊：“李将军到后面去”。汉考克的部队被赶回他们开始时夺取的堑壕。在这里，他们抗击了邦联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当这边的战斗在进行时，联邦第六军又在距突出部西面数百英尺处向邦联军堑壕发起进攻。这里是著名的“血角”，这场战争中几次最激烈的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双方冒着大雨，无休无止地进行拉锯战。士兵们个个都打红了眼，变成屠杀机器。士兵们独自跳上堑壕的胸墙，飞快地接过战友递来的上好膛的枪，向

敌阵射击。一个人倒下去，就会有另一个人跳上来。死伤的士兵在堑壕中躺了三层，其中有些人在泥和血的混合物下面任人践踏。密集的炮火把树和圆木炸成碎片，锥形来福枪弹把一颗近两英尺粗的橡树一截为二。第六军的一位军官写道：“我在谈到我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目睹的恐怖情景时，从未指望人们完全相信我的话。这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身历其境，也不愿相信的。”<sup>12</sup> 整整一天又半夜，邦联军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堑壕。此时，罗伯特·李的工兵正在后面一英里处拼命修建一道新防线。午夜过后，战斗终于停止，叛军放弃了骡子掌。联邦军的伤亡为7000人，而邦联军的伤亡也接近这一数字，其中多数伤亡者都集中在四分之一英里长的一段堑壕前。

格兰特虽削弱了罗伯特·李的防线，但未能取得突破。他现在打算把邦联军诱出防御工事。他先调半数部队围绕叛军的右翼运动，尔后又反扑过来，进攻其左翼。雨不停地下着，部队移动缓慢，而罗伯特·李却可在较短的内部防线上转移兵力，以抗击联邦军。虽然在这个调兵遣将的一周中不时发生激战，并使联邦军和邦联军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的伤亡分别为18000人和11000人，但却并未再度爆发像5月10日和12日的那些战斗。在一次战斗间隙中，联邦军的一个参谋回顾了两军前哨的友好交往：

这些士兵令人莫名其妙——现在，他们一边从早到晚地互相残杀，使数以千计人员伤亡，一边却在彼此打哈哈，交换报纸！……他们的主要话题是口粮配给的多寡和优劣，所经历的行军以及曾与之交战的各团。在这种广泛的争论交谈中，一切个人恩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sup>13</sup>

格兰特在5月1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曾表示：“即使耗费一个夏天，也要在这条战线上一决雌雄。”北部各报接过这句话，大事渲染地报道了联邦军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的胜利。据一位老记者

说,这些报道使北部产生“极度兴奋”,“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战争行将结束”。<sup>14</sup> 林肯对这种态度感到苦恼,因为他担心,战争离结束还很遥远,现在过于乐观会使人们产生失望情绪,特别是在伤亡名单报来以后更将如此。

## 从斯波齐尔韦尼亚到科尔德港

格兰特决心在斯波齐尔韦尼亚决战是根据下述假设的:巴特勒和西格尔将切断罗伯特·李的供应线并威胁其后方,于是,叛军不得不走出堑壕作战或者撤退。5月9日,格兰特还派出10000名强大的联邦骑兵,由性格猛烈的菲尔·谢里登指挥,深入敌后去袭击罗伯特·李的殿后部队。联邦骑兵摧毁了补给品仓库,扒掉数英里铁轨,在几次战斗中均击败了数量居劣势的叛军骑兵,击毙杰布·斯图亚特及另一位邦联将领,而且他们在被击退以前还一度突破里士满的外围防线。这是一次惊人之举,若不是因为巴特勒和西格尔在此时蒙受战败之辱,就很有可能分割北弗吉尼亚军,并使他们不得不走出堑壕。然而,谢里登的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很快得到弥补(尽管失去斯图亚特是无法弥补的),罗伯特·李的供应线依然畅通无阻。

格兰特在5月14日至19日进行的战术性调动未能把罗伯特·李赶出堑壕。就在此时,他接到有关巴特勒和西格尔的坏消息。这位联邦军统帅因而下令再实施一次远距离侧翼运动,把部队部署在罗伯特·李和里士满之间。然而罗伯特·李再次料到此举,他移师南下20英里,不待联邦军抵达即在北安娜河后面掘壕据守,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格兰特对邦联军防御阵地试探了一番,决定不冒险发动进攻,而是再次向左翼运动,并于5月28日渡过帕芒基河。他再次发现,叛军已在离里士满东北不足十英里的托

托波托米河后面掘壕据守。因此，格兰特再次——在这个战役中第五次——小心翼翼地向左运动，以包抄罗伯特·李的侧翼。谢里登的骑兵占据了尘土飞扬的荒凉的十字路口科尔德港\*，并抗击邦联军步兵的进攻，一直坚守到自己的步兵开到。罗伯特·李绝望地向右转移战线；更多的联邦步兵到达阵线，他们于6月1日傍晚把邦联部队压回去。次日清晨，格兰特下令全线出击，以便在叛军挖好堑壕以前击溃之。但是，半数的联邦军尚在行军途中，他们企图在闷热的夜间靠强行军通过地图上标得并不清楚的地带。但一个军迷失了方向，天亮很久才慢腾腾地进入阵地。许多士兵疲惫不堪，甚至昏昏欲睡，能够作战的就更少了。格兰特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24小时。这就给59000名叛军以充分的时间挖掘一条六英里长的堑壕，其两翼由托波托米河和奇卡霍米尼河保护。

虽然邦联军防御阵地十分坚固，但格兰特还是决定发起进攻。他已无计可施了，因为再搞一次侧翼运动只会把叛军赶进更为坚固的里士满防御工事。北军老兵很清楚，7月3日清晨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许多士兵在头天夜晚把带有姓名住址的纸条别在衣服上，好让人们在战斗结束后识别出他们的尸体。一位战士在日记中写道：“7月3日，科尔德港。我被杀死了。”战斗结束后从他身上发现了这篇日记。7月3日向科尔德港发动的这次进攻是这场战争中代价最高的失败之一。格兰特后来说：“在我下令发动的任何一次进攻中，我最懊悔的就是这一次。”<sup>15</sup> 这是50000名联邦军向防守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的30000名邦联军发动的一次进攻。掘壕固守的叛军步兵和炮兵的密集的正面火力和纵射炮火在很大程度上使这次进攻归于失败。7000名联邦军士兵非伤即亡，他们多

---

\* 按科尔德港的原文为Cold Harbor,意为“冷港”,据云,此处的小旅店虽提供膳宿,却不备热饭热菜。——译注

数是在战斗开始后的前几分钟倒下的；而邦联军只损失了1500人。

## 谢南多厄河谷与彼得斯堡

某些历史学家错误地把格兰特向罗伯特·李发动的战役说成是一场消耗战。他们认为，格兰特一再发动进攻表明，他情愿遭受严重损失，因为他知道他的损失可以弥补，而罗伯特·李的损失则不能弥补。最后结局虽然如此，但这并非格兰特的本意。他筹划了以智胜敌人的战争，诱敌到空旷地作战。把战斗变成消耗战的是罗伯特·李。他过去曾是最英勇，最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之一，却再也不能拿有限的兵力去冒险，走出堑壕去作战了。邦联军再也不能指望用钱瑟勒斯维尔或葛底斯堡的战术或战略去“赢得”战争了。但是，通过保持守势，他们却可以指望长期坚持下去，使北军遭受沉重损失，从而使他们放弃获胜的企图。这一战略在1864年6月开始奏效。在北部，许多曾经奢望格兰特会在一个月內赢得战争的人，现在却痛斥这位将军是个“屠夫”了。同情南部的“铜头蛇”又开始活动，并攻击说，如果选民在11月不选举一位民主党主和派当总统，共和党人将坚持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解放奴隶，直到所有白人被通通杀光。

因此，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格兰特希望避免打消耗战和围攻战。他再次筹划了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谋略，切断罗伯特·李的交通线，攻击其侧翼，并迫他们走出堑壕，到空旷地进行决战。但是，他再次因邦联军对他的行动作出迅速反应和他的某些将军作战不力而受挫。

联邦军撤出谢南多厄河谷后，即由戴维·亨特将军接替西格尔担任指挥官的职务。亨特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和一位职业军人，

而且也是反对蓄奴制的激进分子。任命他担任指挥职务，部分是为了满足激进的共和党人。格兰特命令亨特向河谷的纵深方向挺进，切断河谷与里士满的铁路联系，并摧毁邦联军设在林奇堡的军需仓库。同时，格兰特派谢里登的部分骑兵去扒断河谷东部的铁路。谢里登完成任务后，与亨特会师，前去袭击詹姆斯河运河及里士满西南的铁路。与此同时，波托马克军团将渡过里士满东南面的詹姆斯河，以切断罗伯特·李经由彼得斯堡的铁路联系，并击溃必然为保护这些生命线而战的北弗吉尼亚军。

亨特起初进展顺利。他在皮德蒙特击溃了一小股邦联军，随即迅速向林奇堡方向移动。他的纪律松弛的部队被游击队袭击其后勤供应激怒，因而沿途烧杀掠夺。在列克星敦，他们于6月11日焚毁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一行动激起了南部人的普遍公愤。罗伯特·李对其后方受到威胁有所警惕，特派朱巴尔·厄尔利指挥10000人前去进攻亨特，并把自己的大部分骑兵派去截击谢里登。6月11日至12日，此时由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指挥的叛军骑兵在特雷维林车站附近与北军骑兵遭遇，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谢里登得知亨特还在蓝岭山脉那边，离他有90英里之遥，于是便放弃了与之会师的打算，在轻微地破坏铁路后，便转身向东而去。在这期间，厄尔利指挥的邦联军的行动比亨特快些。他们把一支与亨特旗鼓相当的兵力集结于林奇堡，并于6月18日在那里击退了联邦军的几次无力的进攻。苦于给养和弹药不足的亨特，由于邦联军骑兵和游击队已切断了他北逃的道路，便退入西弗吉尼亚。他不但未能完成格兰特交给他的使命，还把谢南多厄河谷拱手让给了厄尔利的精兵。

在得知亨特和谢里登受挫以前，格兰特自己针对彼得斯堡的军事部署也未得到贯彻，军事活动开始时相当漂亮。6月12日至13日夜间，波托马克军团悄悄地从科尔德港的堑壕撤出，向南转

移。整整三天，罗伯特·李一直蒙在鼓里，不知格兰特的去向。邦联军以为，这又是一次短距离的侧翼运动，于是就在里士满东面掘壕布阵，并与联邦骑兵的屏护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而这时，北军工兵部队却横跨詹姆斯河建造了一座历史上最长的浮桥（2200英尺）。到6月15日为止，北军有两个军已抵达南岸，其余部队正在途中，而罗伯特·李的全军仍滞留北岸。博雷加德将军仅以2500人守卫固若金汤彼得斯堡防御工事，而其对手是正在逼近的第十八军，在人数上七比一，压倒南军。彼得斯堡如果陷落了，南军就将被迫撤离里士满，而罗伯特·李的部队则将被切断——也许战争大概就要结束。

但是，联邦军的几个军长虽得到这样的机会，但处置不当。威廉·史密斯的第十八军于6月15日下午逼近彼得斯堡的防御工事，攻占了防御薄弱的部分防线。联邦军在这天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之一是：一个黑人师俘获了两个炮兵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密斯在两年前曾是麦克莱伦的门徒之一——反对解放奴隶的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役后的一次改组中被调出波托马克军团。可是现在，他在回到弗吉尼亚，有机会率领他的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部队进入彼得斯堡时，却举棋不定，过高地估计了叛军的实力，坐等第二军与他会师，于是决定不在明朗的月光下发动夜间攻击。

这种失误在此后三天中屡有发生。博雷加德虽然从罗伯特·李部得到了增援，但是北军的兵力在6月16日仍然超过他，是他的四至五倍。北军在这天早些时候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敌人的部分防线；但是，由于联邦各军之间缺乏协调，从而使博雷加德能够防止一次突破。次日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虽然北军占领了更多的阵地，但这对博雷加德来说，是“邦联军最后时刻的来临”。联邦军指挥系统在上情下达方面搞得很糟糕，出现了使进军陷于停

顿的贻误和自相矛盾的命令。是夜，博雷加德又把防线后撤一英里，几乎到了彼得斯堡的外围；同时，罗伯特·李则把那些余下的营养不良的老兵以最快的速度开进这些堑壕。格兰特计划在他们全部抵达前的6月18日发动一次进攻。就像前些天一样，他把战术布署全部交给米德。这可能是个失误，因为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系统再次运转不灵。性情暴躁的米德终于怒气冲冲地给他的将领们发出一份电报：“我发现，规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实现协作毫无意义。……我想像不出，你们会要求我进一步下达何种进攻命令。……我发现，规定用一个小时实现协作进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已向各军军长下达一道命令：务必发动进攻，不必彼此考虑。”<sup>16</sup>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官兵们都染上了可称之为“科尔德港综合症”——不愿向堑壕发起正面进攻。一位将军说道：“这些士兵正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害怕再次进攻土方工事。”另一位将军写道：在对堑壕发动的自杀性进攻中，“愚蠢而无缘无故地牺牲”战士。6月18日下午，一个老兵连对进攻邦联军防线一个防守坚固的据点的命令拒不执行。他们还向正准备发动进攻的一个新兵团高喊：“卧倒，你们这些大傻瓜，你们拿不下那些堡垒！”新兵们坚持发动进攻，850人中就损失了632人。<sup>17</sup>

格兰特和米德终于取消了这些进攻。联邦军上次就贻误了攻占彼得斯堡的时机，邦联军的援军开到后，进攻便化为泡影。在为时四天的战斗中，北军损失11000人以上，而南军的损失却不及北军损失的一半。波托马克军从怀尔德尼斯一路打到彼得斯堡，伤亡约为64000人，战士的血都流尽了。这个数字恰好与罗伯特·李在这次战役开始时拥有的作战部队人数相等。这些损失，以及该年春、夏两季服役期满的18000人，使波托马克军锐气大减。罗伯特·李亦损失了半数部队。不过，剩下的部队、增援部队



和博雷加德的老兵则有长达数英里的精心构筑的堑壕、凸角堡、堡垒和鹿寨的掩护。格兰特不得不决心实施围困，这是他本希望避免的情况。联邦骑兵和步兵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动一次袭击，以切断罗伯特·李在彼得斯堡南面的铁路、公路交通线。这些行动虽然只取得部分成功，但也确实恶化了罗伯特·李已经很严重的供应问题。格兰特还坚决向南和向西扩展他那由堑壕组成的防线，以迫使罗伯特·李拉长自己的防线，从而削弱了他的防御。

### 火山口战斗

联邦军最有希望冲破这些防御工事的一次努力——著名的火山口战斗——以惨败而告终。这再次表明，那些给波托马克军团添乱的军官们运气不佳，力不胜任。联邦军第四十八宾夕法尼亚团的那段防线正对着邦联军炮兵的一座凸角堡。该团有许多来自斯库尔基尔县的煤矿工人。有一天，该团的亨利·普莱曾茨上校无意中听到一个士兵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座该死的碉堡下面挖条巷道，就可以炸掉它。”<sup>18</sup>普莱曾茨入伍前是个工程师，他很欣赏这个主意，并说服了伯恩赛德将军（现为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军团辖下的一个军的军长）采纳了这个意见。米德的工兵对这一工程嗤之以鼻，称之为“哗众取宠，一派胡言”，因为巷道必须挖500英尺以上才能到达邦联军防线，而这需要一些通气孔，从而肯定会被叛军发现。但是，普莱曾茨设计了一种巧妙（但不引人注目）的通风系统；在没有工兵部队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他的士兵在敌人的防线下面挖掘巷道。随后他们又在巷道内填进四吨炸药。

起初还表示怀疑的格兰特，后来逐渐抱有希望：这个地雷坑会在邦联军堑壕内炸出一个洞口，通过这个洞口发动强大进攻，席卷敌人左右两翼，长驱直入彼得斯堡。伯恩赛德的第九军有三个自怀尔德尼斯之役以来一直连续苦战的白人师，还有一个根本就未

见过一次真正战斗的黑人师。虽然黑人部队在好几条战线上都有成功的记录，其中包括6月15日对彼得斯堡外围工事发动的进攻，但波托马克军团的多数军官仍对他们的战斗力表示怀疑。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很难消除的。但是，伯恩赛德是个对反对蓄奴制持同情态度的新英格兰人，他决定给他的黑人师以专门的进攻训练，以在攻击时担任前锋。战士们对这个任务反应热烈。一位旅长写道：“官兵们个个磨拳擦掌，他们要给白人部队看看黑人师的本事有多大。”<sup>19</sup>

地雷坑预定在7月30日黎明前起爆。黑人师已作好打前锋的准备。但是，米德经格兰特批准，在最后一刻却下令由白人师打头阵。显然，将军们仍不信任黑人师的作战可靠性，而且，他们不愿让人们谴责他们拿黑人士兵当炮灰。格兰特后来在战争指导委员会上作证说：如果让黑人部队率先冲锋，而战斗结果却很糟糕，别人就会说“我们把他们推到前面去送死，其原因是我们对他们毫不关心。但是，我们若把白人部队推到前面去，人家就不会这样说了。”<sup>20</sup>

由于米德下令改变攻击队形，伯恩赛德大为泄气，结果他的战术指挥搞得很差。地雷坑把300名叛军送上天，炸开一个170英尺长，60英尺宽，30英尺深的洞。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生畏的景观了。火山口两边200英尺处的邦联军都惊得呆若木鸡，他们丢下堑壕，向后方仓皇逃命。但是，此后联邦军一错再错。冲锋在前的白人师由于毫无准备，在前进中阵形混乱，而他们的指挥官却呆在后面，狂饮从军医那里讨来的朗姆酒，以稳定其紧张情绪。北军来到火山口边缘，目睹这个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混乱中他们在那里转来转去。许多人进入火山口内，而不是向左右两翼成扇形展开，以组成进一步推进的队形。呆在后面的将军们派出了更多的部队，火山口挤满了乱成一团的士兵。从冲击中恢复过来的

邦联军调来大炮，轰击火山口的北军士兵，简直就像是在打桶里的鱼。南军步兵发起反攻，把开出火山口的少量联邦军压了回去。到黑人师投入战斗时，败局已定。白人部队惊慌失措地向后方涌去，黑人士兵不得不在人流中开辟前进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仍打得很好，他们遭受的伤亡比哪个师都大。但是，他们也在混乱中被打得败下阵来。许多叛军士兵一看到北军把过去的奴隶派来与他们对阵，便燃起无名怒火，就对那些愿意投降的黑人士兵，进行刺杀或射击。

格兰特承认失败，最后放弃了进攻。他电告华盛顿：“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所目睹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我从未见过，也不想再有这种攻克防御工事的机会。”组织这次反攻的邦联军将领威廉·马洪写道：在爆炸后的一小时内，“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把邦联军分割为二，……从而敞开通往邦联首都后方的大门。”<sup>21</sup>火山口战斗一结束，对彼得斯堡的围困仍像过去一样。至今，那里地面上还留下一个巨大的洞口，这是为一个错过的机会而留下的纪念物。

### 厄尔利袭击华盛顿

这次惨败并未使联邦在1864年7月向失败的痛苦经历告别。就在火山口战斗打响的同一天（7月30日），一支邦联军骑兵从谢南多厄河谷开进宾夕法尼亚州的钱伯斯堡镇，由于居民们拒绝交纳500000元的献金，致使该镇大部分被焚为平地。这是朱巴尔·厄尔利在三个星期前率领小股部队袭击华盛顿外围后进行的最后袭击。厄尔利在6月把戴维·亨特的联邦部队逐出河谷之后，他的14000名老兵——其中有很多人曾在杰克逊指挥下在此河谷作战——开始北进，企图重新实行杰克逊在1862年采用的战略：威胁华盛顿，以减轻对里士满的压力。7月5日，叛军渡过波托马

克河，7月9日在弗雷德里克以东的莫诺克西河击溃了联邦军的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并于7月11日向华盛顿西北的防御阵地进逼。起初，守卫这些防御工事的是一支很小的部队，还有匆匆动员起来的政府职员和未经训练的民兵，因为卫戍部队已大都被格兰特搜罗到弗吉尼亚前线。格兰特为响应政府的增援要求，从彼得斯堡派出了第六军。7月11日下午，这些坚强的老兵顺序进入工事。此时，厄尔利前有格兰特的第六军，后有终于经西弗吉尼亚开到的亨特部。他在研究了形势后决定：最好是退入弗吉尼亚州，以免遭到灭顶之灾。

厄尔利在焚毁了邮政局长布莱尔在马里兰州的住宅，火烧了钱伯斯堡，还在黑格斯敦和弗雷德里克两城市征收了220000美元的税金之后，居然平安逃脱，这使林肯和格兰特颇感不快。分管四个军区的联邦将领就领导权问题发生了意见冲突，从而阻碍了联邦军的追击。格兰特在8月初取消了这些军区，结束了这种官僚主义。他派谢里登到河谷担任新军区兼谢南多厄河谷军的总司令。该军包括第六军，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骑兵师，亨特的前西弗吉尼亚军以及从路易斯安那战场移交的两个师。格兰特命令劲头十足的谢里登尾随厄尔利，“穷追到底”。因为谢南多厄河谷是罗伯特·李部的粮秣供应地，又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有利基地，格兰特还要求谢里登全部、彻底地毁掉河谷中的庄稼，以至“在该季节余下的日子里飞经这里的乌鸦也将不得不自带食物”。<sup>22</sup>

## 亚特兰大战役，1864年5月至6月

谢里登会这样做的，但首先他要组建他的新的指挥系统。在遥远的南方，另一位很快就要得到邦联军资源摧毁者名声的将军，也在进行休整和改组，准备对亚特兰大采取最后行动。谢尔曼军

在三个月中给邦联军造成近 28000 人的伤亡，而自己的伤亡则仅为 25000 人。相比之下，邦联军在弗吉尼亚州损失了大约 36000 人，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恰为这一数字的几乎两倍。

## 战役概观

这伤亡率对比反映出两个战场上的不同战术。格兰特和罗伯特·李都主张，消灭敌人的手段是进攻和全面交战。谢尔曼和约翰斯顿打的是诱敌战。谢尔曼不攻击邦联军的坚固的防御阵地，而是进行一系列的侧翼运动，迫使约翰斯顿为保护其交通线而一退再退。谢尔曼只有一次在凯纳索山下令从正面发起进攻，而这次进攻并不比格兰特在科尔德港发动的进攻更为成功。虽然约翰斯顿像罗伯特·李退守里士满那样撤往亚特兰大，但这种诱敌行动在弗吉尼亚州往往出现在大规模战斗之后，但在佐治亚州则往往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出现的。约翰斯顿在战役的头一个月的损失比罗伯特·李在怀尔得尼斯为期两天的战役中的损失还要小。

在 5 月到 7 月进行的亚特兰大战役中，邦联军将近一半的伤亡发生在 7 月的最后两周，亦即约翰·胡德取代约翰斯顿担任田纳西军司令以后。邦联政府对约翰斯顿的持久战策略感到不满，于是派胡德接替了他的职务，希望这位罗伯特·李部调来的勇猛的胡德，会发起进攻，给北军以粉碎性打击。胡德确曾发动三次进攻，但结果却遭到北军的粉碎性打击。胡德的部队溃不成军，返回自己的塹壕，而谢尔曼已下定决心去围困亚特兰大。

铁路和地形决定着亚特兰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亚特兰大是铁路枢纽(和制造业中心)，其重要性使它成为联邦方面的进攻目标，而使谢尔曼最初的消灭邦联军的目标相形见绌。佐治亚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和陡峭的山谷所构成的防御屏障比起弗吉尼亚东部那

起伏不平的农村和水流平稳的河川来，要坚固得多。两军在佐治亚州的供应依靠同一条破烂不堪的查塔努加至亚特兰大的单轨铁路。两军都无法在远离铁路的地方长期作战。谢尔曼和约翰斯顿都得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其后方的这条铁路。随着约翰斯顿后撤，他的供应线缩短而变得安全了，而谢尔曼的供应线则相应地延长而变得脆弱了。不过，北军的维修人员倒锻炼得很能干，他们重建桥梁、重铺铁轨的速度几乎赶得上邦联军破坏它们的速度。

### 战役经过

谢尔曼的 100000 大军分为三个“军团”：乔治·托马斯所辖坎伯兰军的 61000 人；曾隶属谢尔曼，现由詹姆斯·B. 麦克弗森指挥的田纳西军的 25000 人以及约翰·M. 斯科菲尔德的不大的俄亥俄军。约翰斯顿的田纳西军有 50000 作战人员（很快就要得到来自亚拉巴马州的 15000 援兵）。5 月初，他们沿着崎岖不平且十分陡峭的山岭掘壕据守。这道山岭横跨查塔努加南面 25 英里处的铁路。谢尔曼无意向这扇“可怕的死亡之门”发动进攻，而是一面派托马斯和斯科菲尔德向邦联军防线佯攻，一边让麦克弗森的部队向右移师迂回，迅速通过位于约翰斯顿左翼南面的一个山口，在里萨卡切断铁路线。麦克弗森是部队中最有希望的年轻将领之一；他作为军长，曾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博得了格兰特和谢尔曼的赞扬。这次，他圆满地完成了其任务的第一部分。5 月 9 日，他的部队突破了防御薄弱的山口，从而使切断约翰斯顿的生命线成为可能，并在钳形攻势中截住邦联军。谢尔曼获悉这一招成功后高呼：“我已把乔·约翰斯顿置于死地了！”

但是，麦克弗森发现，亚拉巴马州的援军有几个旅作为先头部队已防守着里萨卡的防御工事。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兵力。联邦军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这样就

使约翰斯顿对其侧翼所面临的危险有所警觉。5月12日至13日夜，他巧妙地把全军撤至可以掩护里萨卡的防御阵地里。虽然麦克弗森由于自己酌情下达命令而表现出谨慎行事是有道理的，但是，谢尔曼还是很不满意，他对麦克弗森说：“麦克，你丧失了平生的一次良机。”麦克弗森虽有这一失误，仍不失为谢尔曼最信得过的部下。<sup>23</sup>

为了找出对方防线上的漏洞，两军在里萨卡附近彼此试探了三天。在此期间，谢尔曼派出麦克弗森的部分兵力向右翼转移。约翰斯顿再次后撤，以保护其后方。邦联军在南面15英里处的阿代尔斯维尔稍作停留，他们在动身前往十英里外的卡斯维尔投身战斗之前，就与尾随而来的北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现在，谢尔曼的兵力分布在一条20英里长的战线上。5月19日，约翰斯顿计划攻击位于联邦军左翼被分隔孤立的斯科菲尔德军。他命令胡德军进击斯科菲尔德的侧翼，而由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军正面进攻。胡德在去年9月随朗斯特里特参加奇卡莫加战斗时到过佐治亚州，朗斯特里特返回弗吉尼亚州以后，他仍留在该地。胡德的左臂在葛底斯堡受伤致残，他的右腿在奇卡莫加被截掉。他虽然多处负伤，可那股好斗的劲头却丝毫未减。在亚特兰大战役中，他指控约翰斯顿不战而退的倾向。但是，胡德在5月19日也贻误了一次战机。有人错报说，他的侧翼有敌军步兵，这引起他的警惕，于是就继续进行防御。约翰斯顿的反攻计划不得不放弃。邦联军再次后撤，他们先撤至卡斯维尔后面的防线，后又南撤八英里，来到位于一条高耸山脊的坚固阵地上，前面是流经阿拉图纳山口的埃托瓦河。

亚特兰大战役在两周内行军多，作战少，已有点像跳小步舞那种复杂的舞步。两军对峙；谢尔曼优雅地向右、向前迈出舞步，约翰斯顿则相应地后退，他们在彼此点头示意后，就把这个过程再重

复一遍。约翰斯顿每次都退到由奴隶事先挖好的堑壕。北军每到一个新据点，都要挖网络般的堑壕并构筑原木胸墙。谢尔曼把获得解放的奴隶编为一个“先锋队”，协助做这项工作。南部报纸开始批评约翰斯顿不停地后撤的行动。但是，这位将军的一些辩护人指出，他是在用空间换取时间，是在引诱谢尔曼深入敌对地区，在这里北军迟早要在那些堑壕前面撞得粉身碎骨。

谢尔曼没有用进攻阿拉图纳来压约翰斯顿，而是把 20 天的口粮装满他的四轮马车，以免受铁路的制约。他全军出动，绕过约翰斯顿的左翼，开往位于佐治亚州达拉斯的铁路枢纽。这里离约翰斯顿的后方 15 英里，距亚特兰大则仅为 30 英里。约翰斯顿的骑兵很起作用，他们发现了这一行动。邦联军不待联邦军进抵该地，就再次迅速地在达拉斯附近挖好一道新的防线。在 5 月的最后几天，两军在附近，尤其是在一幢卫理公会教徒集会的房屋周围厮杀、交火。那幢房子称作新希望教堂，但被北军重新命名为“地狱洞”。该地长着稠密茂盛的松林，从而使攻击战变得像在弗吉尼亚州的怀尔德尼斯一样地艰难。倾盆大雨把谢尔曼搞得更为狼狈不堪。这场大雨从 5 月末起，一直下了一个月，把红色粘土路面的道路变成了无底的沼泽，使部队动弹不得。谢尔曼的防线每天向东横移一至两英里。约翰斯顿每次也相应地移动，直到 6 月的第二个星期，两军再次横跨铁路线。这次，邦联军的右翼倚着马里塔正北的凯纳索山。

在这些军事调动期间，易于激动的谢尔曼被搞得烦躁不安。邦联军虽已后撤 70 英里，但狡猾的约翰斯顿为了不让谢尔曼如愿以偿，利用地形灵活地避开空旷地，这是谢尔曼谋求决战的地方。此时，在遥远的密西西比州，福雷斯特的骑兵于 6 月 10 日在布赖斯的克罗斯罗兹击溃了两倍于己的敌军。谢尔曼担心福雷斯特现在就会前往田纳西州，切断纳什维尔与查塔努加之间的铁路，于是就



命令两个步兵师携骑兵从孟菲斯出发，“即使牺牲 10000 人，把财政部搞破产，也要穷追福雷斯特到底。只要福雷斯特不死，田纳西就永无宁日”。<sup>24</sup> 在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联邦部队把福雷斯特拖入战斗并将其击败。福雷斯特虽在战斗中负伤，但并没有顺应谢尔曼的意愿，之后不久，重返战线。

福雷斯特失去战斗力暂时缓解谢尔曼对田纳西州的牵挂。但是，约翰斯顿仍沿着一道七英里长的防线，与他掘壕对峙，挡住通往亚特兰大的道路。谢尔曼决心从正面发起进攻。人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显然，他担心这种诱敌交战和掘壕据守的作战方针正使他的部队的战斗锐气大减。他抱怨道：“在耕过的农田里，一道新垄沟就会挡住整个植行。于是大家就都开始掘壕防守。我们是进攻的一方，一定要出击，而不是防守。”<sup>25</sup> 据谢尔曼推断，约翰斯顿为了对付另一次回旋调动而保护两翼，必定已削弱了他的中部。所以，他于 6 月 27 日下令进攻叛军的中部地区。由三个师向凯纳索山主峰南面的两座小山发动主攻，而其余的部队则向凯纳索山及其两翼佯攻。但是，约翰斯顿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他的部队以 600 人的代价打退了联邦军的进攻，给敌人以五倍于己的伤亡。

这个损失与在弗吉尼亚的伤亡相比并不算大，但这一代价却足以使谢尔曼再次采用侧翼包抄战术。他再次派麦克弗森围着邦联军左翼兜大圈子。约翰斯顿再次后撤，这次一直撤到查特胡奇河北面的阵地，距亚特兰大仅有八英里。谢尔曼并未如约翰斯顿所料，向这道防线发动进攻，而是把骑兵派往他的右翼，佯作在这个方向寻找渡河地点，同时集中斯科菲尔德的部队向对面的侧翼实行强行渡河。斯科菲尔德使叛军哨兵大吃一惊，并在约翰斯顿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就使他那个军跨过迅速架好的浮桥。麦克弗森的一个由灵活的中西部人组成的军在后面跟上，这表明他们不

仅可以向右移动，也可以向左移动。约翰斯顿鉴于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联邦军从他的侧翼渡过了河，遂在7月9日至10日夜放弃了他的防线，撤到皮奇特里克里克河后面。

### 约翰斯顿被解职

南部对约翰斯顿的批评达到高潮。约翰斯顿和杰弗逊·戴维斯从1861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对立。在戴维斯看来，约翰斯顿在1862年从弗吉尼亚一直撤到里士满，如果不是幸好让罗伯特·李取代他的位置，首都很可能早已沦陷。1863年，约翰斯顿未能增援维克斯堡被困守军。现在，他没有真正打过一仗就被一路赶到亚特兰大。邦联内阁一致建议撤销这位将军的指挥职务。国务卿朱达·本杰明说道：“约翰斯顿是下定决心不打仗了。给他增援毫无用处，他就没有作战的打算。”<sup>26</sup>

约翰斯顿后来坚持说，他曾计划在联邦军经过皮奇特里克里克河时发动进攻。但他在这时却表示不同意遵循任何特定的行动方针。约翰斯顿在7月16日给戴维斯的复电中说：“他的计划必须视敌人的情况而定。这主要是寻找有利战机。我们正试图使亚特兰大处于……佐治亚州民兵的控制下。这支部队的活动会更为自由，其活动范围会更为广泛。”对政府来说，约翰斯顿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他有抛弃亚特兰大的企图，正像一年前他曾命令彭伯顿放弃维克斯堡一样。亚特兰大失守的后果将很严重。在北部和南部看来，这座城市已成为邦联仅次于里士满的抵抗的象征。约翰斯顿显然不愿保卫这座城市，不愿打击谢尔曼，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7月17日，陆军部长通知他：“鉴于你未能阻止敌军向地处佐治亚州腹地的亚特兰大附近挺进……，故免去你的指挥职务。”部队由胡德接管。<sup>27</sup>

解除约翰斯顿职务的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自相矛盾

的。约翰斯顿很受部队的欢迎，他们很欣赏这种使部队没有遭受损失，伤亡也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持久作战的方针。许多军官对胡德的进取好胜持怀疑态度。谢尔曼后来写道：解除约翰斯顿的职务是“邦联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帮助。”他还说：胡德以咄咄逼人的斗士而闻名，“我们所期望的……乃是在空旷地或任何相等的条件下作战，而不是强攻严阵以待的堑壕。”<sup>28</sup> 许多历史学家对戴维斯撤销约翰斯顿职务持批评态度。然而，他们的评价与谢尔曼一样，都是事后的见解。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很难让戴维斯在1864年把约翰斯顿留在指挥岗位上，正像林肯在1862年很难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职务一样。

### 争夺亚特兰大的战斗

胡德被任命时的情况实际上是强迫他尽快发动进攻。谢尔曼渡过查特胡奇河后，便派麦克弗森再次向东进军侧翼，破坏横跨亚特兰大与南、北卡罗来纳之间的铁路，以彻底阻止罗伯特·李或胡德利用铁路彼此增援。当麦克弗森的士兵正在扒铁路时，胡德便于7月20日向托马斯的坎伯兰军侧翼发动攻击，而该军当时与另外两个军已被一条两英里长的山峡分隔开。胡德希望乘托马斯的两个军横渡皮奇特里克里克河之机，向他们发动攻击，但是，他的进攻为时已晚，北军正严阵以待，南军在北军的胸墙前被打得七零八落。胡德在夜间后撤两英里，进入亚特兰大的防御工事。谢尔曼从北面和东面包围了这座城市。胡德发现，城东麦克弗森的左翼没有掩护，于是在7月21日至22日夜派一个军，长途行军，于次日进击该侧翼。邦联军的进攻起初取得部分成功，击毙了麦克弗森。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田纳西军重建了防线，并将遭到严重伤亡的南军赶回亚特兰大的防御工事。

谢尔曼任命奥利弗·霍华德继任麦克弗森的职务，且立即命

令他率田纳西军从亚特兰大西侧迂回，进攻该城通往南部的残存铁路线。与此同时，谢尔曼派出骑兵，分三路前去破坏更靠南部的这段铁路。邦联派出四个步兵师，对抗霍华德的进犯。7月28日在埃兹拉教堂附近发生的一次战斗中，北军在九天中第三次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在三次战斗中，胡德损失了13000人以上，而联邦军的伤亡则仅为6000人。邦联军士气下降，开小差的现象增多。杰弗逊·戴维斯在交给胡德统率权并心照不宣地下达攻击命令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指示这位将军不要再冒险发动进攻了。但是，胡德对埃兹拉教堂的最后一次进攻，确实使霍华德尚未逼近铁路就停止了包围行动。邦联军骑兵指挥官约瑟夫·惠勒出色地反击了联邦军的几次骑兵冲锋。（这证实了谢尔曼对自己的骑兵评价不高。在此次战役中，南军骑兵一再智胜联邦军骑兵。）惠勒把他的骑兵分为三个纵队，每一纵队在北军骑兵可能给铁路造成严重损坏之前截击之，并将他们打败。

谢尔曼切断胡德的生命线并设法使之离开亚特兰大的尝试失败后，便决定炮轰该城的防御工事，同时认真筹划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在三个月中，他已把邦联军向后压了90英里，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大于自己的伤亡。在这场战争中，除格兰特的维克斯堡战役以外，还没有任何一次战略攻势以如此低的代价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英国作家利德尔·哈特是20世纪举足轻重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谢尔曼是美国内战中最伟大的将领。这是因为他在此役中使用的灵活战术和“迂回办法”比风行一时的阵地战那种流血对峙要高明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可能加以研究，并受益匪浅。<sup>29</sup>

不过，对北部人民来说，这在1864年7月却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当时只看到谢尔曼在亚特兰大的受阻，正像格兰特在彼得斯堡受阻一样。人们在5月间对速胜所抱的希望已被北部在战斗中

遭受 100000 人伤亡的悲痛所淹没。《纽约世界报》问道：“人们在格兰特的战役刚开始时所抱有的希望破灭了，有谁能使人们再次复活这种希望呢？”另一份民主党报纸宣布：“爱国主义已寿终正寝。所有的人都对这一该死的悲剧感到厌烦。……我们的勇气泯灭和忧伤悲哀与时俱增。”<sup>30</sup>对共和党人来说，北部的厌战情绪对他们即将参加的大选是个凶兆，而这次大选正在变为就战争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

## 第二十四章 第三个转折点： 林肯再次当选

### 试探和平的人们

北部在 1864 年夏的厌战情绪再次复活民主党主和派的希望。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大胆地回到美国，结束了他在加拿大长达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林肯不愿再让他受苦，允许他留在美国并直言不讳地发表反战言论。在中西部召开的民主党地方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停火，举行和谈。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提出一些内容相同的决议案。虽然共和党人联合民主党主战派否决了这些决议案，但和平情绪却似乎变得很强烈，以致一些共和党人对他们在秋季选举中的当选机会表示绝望。

最绝望不过的人就要算行为古怪却颇有些影响的《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了。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多少是个和平主义者，并以变幻莫测而闻名。他自 1860 年起就徘徊于好斗主义和失败主义之间。1864 年初，他以林肯还不够激进为由，支持蔡斯竞选总统。但是，他在盛夏时却写信给总统说：“我们流血的、破产的，几乎奄奄一息的国家……渴望和平——人们展望招募新兵、进一步的全面破坏以及再次血流成河，真是不寒而栗。”\*政府如果对这种渴求置若罔闻，那末“我们就将在来年 11 月一败涂地”。<sup>1</sup>

格里利的信引发的事件是这次战争中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纽约论坛报》的这位编辑通过中间人得知，邦联一些密使正在加

---

\* 由于 9 月份征兵的地方配额不够，林肯于 7 月 18 日号召 500000 人志愿参军。一位“铜头蛇”编辑在读到这一号召时得意地说：“林肯的处境比死了还糟糕。”

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准备开始和谈。邦联情报人员的确在尼亚加拉瀑布，但他们没有授权去参加和谈。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邦联设在加拿大的秘密情报网的人员，其任务是策划南部战俘逃离战俘营，操纵纽约黄金市场，与民主党主和派建立联系，并不遗余力地破坏联邦的战争努力。格里利敦促林肯发给这些“谈判者”前往华盛顿的通行证。林肯虽然看透了叛军情报人员的居心，还是授权格里利同他们接触，把“在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承认为了和平，为了重建联邦和废除蓄奴制并携带着杰弗逊·戴维斯的任何书面建议者”带到华盛顿。<sup>2</sup>

由于格里利被委以核实谈判者证书之责，这就把他置于困难地位。这位编辑畏缩不前。但是，林肯派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翰·海前往纽约，敦促格里利开始行动。约翰·海和格里利一起赴尼亚加拉瀑布，并在那里两次拜会邦联的情报人员。会谈的结果仅仅是搞清楚了南部人没有证书。这些情报人员获悉林肯的和平条件后，便把这些条件连同他们的答复一起透露给美联社。邦联的答复是出于宣传目的。这个答复指责道：林肯的条件意味着进一步死亡和破坏，因为它们以南部显然无法接受的条件去阻碍谈判。

就在格里利遭到惨败时，第二个和平代表团出现了。他们周围也充满了类似的宣传。这次是两个没有证书的北部密使谋求与杰弗逊·戴维斯面谈和平条件。他们如愿以偿。这两个人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詹姆斯·吉尔摩和第七十三伊利诺伊步兵团的詹姆斯·贾克斯上校。贾克斯是个有良好战斗纪录的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渴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停止基督徒自相残杀。林肯认为，从这个代表团那里，他非但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或许还能有所获。他允许吉尔摩和贾克斯穿越防线前往里士满。7月17日，戴维斯和国务卿朱达·本杰明在里士满接见了他们。在一次坦率的会见中，两个北部人通报了林肯的和平条件：重建联邦、废

除蓄奴制、大赦、或许还要为解放奴隶而付给部分赔偿费。戴维斯很明白，林肯是不会把最后一点提交国会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邦联总统除南部独立以外并不坚持什么别的和平条款。戴维斯对两位密使说：先生们，大赦适用于罪犯。我们没有犯任何罪行。……我们宁可被斩尽杀绝，也不蒙受这种奇耻大辱。……只要你们不承认我们的自治权，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sup>3</sup>

吉尔摩对这次会见的报道于7月22日在波士顿某报上登了出来——恰好在同一天，格里利的第一份详细的谈判报告也公诸于世。回顾事情的经过，双方在处理这两件事时所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宣传上的得分，而不是着手进行严肃的谈判。两位总统明知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却也都不能无视自己那边人民中有影响的和平运动。在1863年邦联国会选举中，有好几位主和派候选人赢得了席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内地以及其它地方，反战情绪和亲联邦情绪进一步高涨。鼓吹和谈的人中甚至包括邦联副总统。双方都希望通过宣传非官方和平代表团来向自己的人民表明，敌人的谈判条件将意味着他们丧失其所正在为之战斗的一切：对南部来说是独立和蓄奴制；对北部来说则是联邦和解放奴隶。

邦联在这场宣传战中得到了一时的好处。因为林肯的和平条件包括联邦和解放奴隶，北部民主党人就能够利用这样一种信念：政府只要不再坚持解放奴隶，北部就可以得到和平。一篇典型的民主党社论这样写道：“只有成千上万的白人战死了，才会减轻总统的热爱黑人的癖习。”当8月前线仍处于僵持局面以及北部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时，这种见解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一位精明的纽约政客瑟洛·威德写道：“人民都为和平发了疯。林肯不可能再次当选。”各州共和党主席的凄凉惨淡的报告一齐涌进共和党全国主席（兼《纽约时报》编辑）亨利·雷蒙德那里。雷蒙德写道：“我担心，



林肯先生给人的印象……不是为联邦，而是为废除蓄奴制而战，加之征兵、征税以及捷报寥寥无几，都在助长和平愿望。……这种和平愿望将使〔政府〕不堪承受，并给予反对派支配一切的地位。”<sup>4</sup>

8月22日，雷蒙德向林肯提出一个计划，以反击一种站不住脚的见解：“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给联邦带来和平。”他敦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向邦联提出和平建议，其唯一条件就是联邦，“其余的全部问题”（即蓄奴制和重建条件）留待以后解决。如果戴维斯像雷蒙德所相信的那样，拒绝这一建议，那末就会“使北部普遍存在的和平幻想破灭，平息反对派的喧闹，揭穿他们的谎言，……并减少人们对战争、征兵和征税具有的必然性表示的不满情绪。”林肯走得很远，他把雷蒙德的建议具体化为对一个和平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他还起草了一封致一位民主党编辑的信，其结尾是：“杰弗逊·戴维斯如果希望知道，假如他将提出有关和平以及重新联合的建议，而不提及蓄奴制，我会作何反应，那就让他试一试吧。”<sup>5</sup>

然而，林肯并未发出这封信，也没有像雷蒙德所敦促的那样去任命一个和平代表团。在8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使这位编辑相信：这样做在北部会被人们误解为解放奴隶的一种倒退。这会“比竞选总统失败更为糟糕——这将是事业就屈辱地投降了。”因为，这似乎会使那些反对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进一步怀疑林肯在蓄奴制问题上软弱无能，从而使他们疏远。此外，这似乎也使人感到，这是对奴隶解放宣言所体现的自由的“庄严承诺”的背叛。<sup>6</sup>

林肯知道，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频频开会的紧张情况，他们希望由另一位候选人取代林肯。到8月的最后一周，这些不同政见者竟走得这么远，以致准备要求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另一位候选人。这一行动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他们极为敌视林肯的重建政策，部分是由于他们持有总统不会连任的失

望看法。林肯也持有后一种信念。他不待大选揭晓就于8月23日写了如下的备忘录，要求内阁批准：“今天上午和前些天的情况似乎都表明，政府将不大可能再次当选。这样一来，我的义务就是与当选总统合作，以在大选已经结束而新总统尚未就职之际拯救联邦。这是因为，这位未来的当选总统将以不可能在这段时间以后去拯救这个国家为由来确保他的当选。”<sup>7</sup>

## 民主党人提名麦克莱伦

当林肯写下这番话时，他希望民主党人在和平政纲中提名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在1862年11月卸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一职后，就默默无闻地住在新泽西和纽约。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官复原职而四处奔走。这些努力的失败促使他谋求通过政治来表白自己。1863年秋，麦克莱伦公开赞成民主党候选人出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从而宣布他公开反对现政府。是年年底，他谨慎地让人们知道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从1862年起，麦克莱伦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未曾发生什么变化。他仍反对解放奴隶，但赞成靠军事胜利来恢复联邦。这使他遭到该党主张先停战后谈判的主和派的反对。民主党主和派在最后关头仍争取提名纽约州州长霍雷肖·西摩为候选人。但他们的这一努力落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麦克莱伦。

8月29日至31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既提名麦克莱伦，又允许民主党主和派拟写政纲并提名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的乔治·彭德尔顿），从而使该党两翼“弥合了分歧”。政纲谴责“军方随意捕人”，“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不尊重州权”（即蓄奴制）。政纲要点宣布，在四年间通过战争去恢复联邦而遭到失败之后……〔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以便最终召开由各州参加的大会，或采用其它和平方式，其目的是在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时

间，在联邦的基础上恢复和平。”<sup>8</sup>

该政纲要点使麦克莱伦进退两难。他难道能够谈论主张和平第一联邦第二的政纲？麦克莱伦为来自党内两派的压力所困扰，草拟接受提名的复信时为措词而绞尽了脑汁。最初的两个草案赞同停火的主张，其限制性条款是：谈判如果破裂，就将重启战端；但是，这位将军的那些民主党主战派朋友使他相信，邦联将视此为一纸投降条约，因为聪明人难以相信，战争一旦停止还会再度爆发。因此，麦克莱伦的复信定稿就把政纲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联邦第一，和平第二。在“我们现在的对手准备以联邦为基础和谈的情况下”，谈判“可能以和解、妥协的精神”开始。……“联邦就是和平的一个条件——我们不再提出其它条件。”<sup>9</sup>

这封信使多数民主党主战派感到满意，而一些民主党主和派则感到心烦意乱，以至盘算着有一个脱身之计。但是，这些民主党主和派也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包括瓦兰迪加姆在内，仍保持着派别信念。民主党主和派在竞选讲话中强调这个政纲，而民主党主战派则强调麦克莱伦的信。这种“精神分裂症”使共和党人格外高兴。共和党的一位雄辩家说道：“事实上，你不能、我不能，连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能说出他们的政纲是和平政纲还是战争政纲。……总的看来，它既是和平又是战争，它是对叛军的和平，对政府的战争。”<sup>10</sup>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结束共和党的分裂帮了大忙。由于激进派面临的实在威胁是来自一个政党，其半数人反对战争、其整体反对解放奴隶。他们突然意识到，林肯是他们在灾难面前的唯一选择。现在，总统坚持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已经开始在反对蓄奴的人们中间，起着有利于总统的作用了。召开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已寿终正寝。9月22日，弗里蒙特撤回了他的第三党候选人资格。次日，林肯要求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

莱尔辞职，并接受了他的辞呈。布莱尔家族被人们视为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保守派。蒙哥马利一直在悄悄地重建他与民主党人的老关系。激进派怀疑，布莱尔家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具有危险性。林肯要求布莱尔辞职是对弗里蒙特撤回第三党候选人资格的补偿。共和党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参加了竞选。

## 莫 比 尔 湾

就在林肯写好失败主义的备忘录的8月23日，联邦在莫比尔湾为期三周的戏剧性行动中的最后一个行动，封锁了该港，以堵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这次行动亦是联邦成功地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开端。这些胜利将结束这个夏季北部人的不满情绪，并将嘲弄那些把这场战争形容为一次失败的民主党人。

法拉格特的舰队，火速驶往新奥尔良以南各要塞，并于1862年4月攻克该城。它的下一个海上目标显然就是莫比尔了。但是，现在需要法拉格特的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作战。格兰特曾计划在攻陷维克斯堡后即发动莫比尔战役，却因班克斯错误地执行雷德河远征而夭折了。直到1864年夏季，他才为莫比尔抽出部队和舰艇来。该城地处一个海湾的顶端，其出入口位于南部三十英里处，守护这个门户的是三座要塞，一个布雷区和四艘炮舰，其中包括巨大的铁甲舰“田纳西”号。法拉格特集中了14艘木质舰和4艘铁甲舰，从海上猛攻这些要塞，同时由5500名步兵从陆上实施包围。8月5日晨，联邦舰队开始与各要塞的重炮交战，场面蔚为壮观。突然，为首的一艘联邦铁甲舰爆炸沉没，成了水雷的牺牲品。结果，在两座最大的要塞的猛烈炮火下，舰队停止了进攻。但是，法拉格特把他的木质旗舰“哈特福德”号置于整列舰队之首，并下达了使他名垂美国海军青史的命令：“该死的鱼雷！全速前

进!”。“哈特福德”号安全地穿过了布雷区；舰队尾随其后。联邦各战舰进入为要塞火力达不到的莫比尔湾后，即把注意力转向勇敢的邦联炮舰，对之连续猛轰，直到这些战舰投降。即使是令人生畏的“田纳西”号，其舵链被打掉，指挥官负伤，不得不投降了。联邦军到上午10时便控制住莫比尔湾水面；在此后的18天中，他们迫使要塞一个接一个地投降。莫比尔城虽仍在邦联手中，但它与海洋隔绝，对邦联已没有多大用处。

## 攻陷亚特兰大

莫比尔大捷虽很重要，但比不上占领亚特兰大的战役。7月底的战斗结束后，两军都避开他们在亚特兰大城西南的堑壕，胡德是为了保护其铁路，而谢尔曼则是企图夺占铁路。胡德拼死派他的骑兵部队前去切断谢尔曼的铁路交通线，但联邦工兵修复了遭到破坏的铁路。谢尔曼于8月25日发动了他最后的攻势。北军以右翼为基准，在另一次包抄侧翼的运动中逆时针回旋。胡德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联邦军在他的骑兵袭击下被迫后退。他向里士满发出大捷电报，这时专列火车满载着欢呼不已的佐治亚人到亚特兰大参加庆祝活动。

但是，甚至在这些祝捷者进城之时，北军已进抵南面20英里的铁路线，开始用铁轨制造“谢尔曼绞索”——把铁轨放在枕木篝火上烧热，然后再缠在树上。胡德接到骑兵的报告后终于机敏地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就派两个军前去攻击在琼斯伯勒的联邦军。联邦军虽是以寡敌众，还是于8月31日击退了邦联军。次日，他们开始反击，一举赶跑了南军。胡德由于随时都有被包围的

---

\* 这是否为法拉格特的原话尚无法断定，但他命令舰队随他的旗舰穿过布雷区，却是确凿无误的。

危险，就烧毁了城里有军事价值的全部设施，于9月1日至2日夜从亚特兰大撤出了其余的部队和佐治亚州民兵。联邦军于次日开进亚特兰大，谢尔曼电告华盛顿：“我军攻克亚特兰大，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使北部大为震动。一位纽约人在9月3日写道：“今天上午的消息大快人心——亚·特·兰·大·终·于·被·攻·克!!!它是（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迎来的）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事件。”各报纷纷赞扬谢尔曼是拿破仑以来最伟大的将军。林肯、格兰特和哈勒克都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位红发将军。总统预言，谢尔曼的亚特兰大战役将成为“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sup>11</sup>人们在交口称赞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胡德部的逃遁。但是，亚特兰大的象征意义却如此巨大，其陷落的政治后果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家共和党报纸在有关亚特兰大的陷落的通栏大字标题中简略地表达了这些后果：“这是老阿贝对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的回答。这场战争是否失败了？”《里士满观察家报》以南部的观点哀叹：“亚特兰大的灾难”发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它使林肯的党幸免覆灭。……它将使不久前还很光明的和平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它还使低落的情绪在南部四处蔓延”。<sup>12</sup>在这场军队与军队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在政治上获得的成就，还不止是抵销了胡德那支连遭痛击和消耗的部队在军事上的残存。

## 河谷中的谢里登

南部的另一个坏消息来自谢南多厄河谷。朱巴尔·厄尔利的部队挺进至华盛顿外围而一举把他在联邦的失败之谷发动的夏季攻势推上了高潮；这也是许多北部人认为这场战争已成败局的一个原因。格兰特在8月间派谢里登前去打击厄尔利并破坏河谷的资源后，在河谷中对峙的两军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小规模战斗。配

默契的波托马克军团同时发动进攻，他们先攻击里士满城下的邦联军战线左翼，随后又攻击位于彼得斯堡南部的右翼。这就迫使罗伯特·李从河谷召回一个师，从而使谢里登对厄尔利的人数优势达到 2 : 1。

9月19日，谢里登攻击了位于温切斯特东面和北面的邦联军防御阵地。一个糟糕的命令造成运送联邦一个军的车队陷于混乱，从而使联邦军一开始就打得很不好。然而，谢里登以其极佳的战地指挥扭转了混乱的局面；他派骑兵大模大样地冲向叛军两翼，同时以步兵攻击敌中心区。厄尔利的左翼崩溃了，在中心区顽抗的守军也一步一步地从城里后撤，连夜向南蜂拥而逃，沿着位于施特拉斯堡南面两英里处的费希尔斯山的山脊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谢里登在邦联军后面紧追不舍。9月22日，他派出他的三个步兵军中的一个军设法绕过邦联军在费希尔斯山的左翼，并把另外两个军在前方进行佯攻。将近黄昏时分，包抄侧翼的那个军叫喊着冲出树林，把最边上那些惊慌失措的邦联士兵射倒在地，而这时在两英里外的战友们把佯攻转入了进攻，迫使叛军全线溃退。双方在这两次战斗中的伤亡不相上下——都在 5500 人左右——但这个数字反映了厄尔利的部队遭到近三分之一的损失。邦联军溃不成军，一路退至温切斯特南面 80 英里的布朗山口。

这些胜利进一步增加了林肯再次当选的筹码。以前当过将军，现为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 9 月 23 日写道：“谢里登在谢南多厄河谷发表了一篇讲话，这对联邦事业来说，比共和党的全部演说家的演说都更有力量，更有价值。”<sup>13</sup>

谢里登并未停留在他的荣誉上，他的 35000 部队向河谷的纵深方向前进，以执行格兰特的命令的第二个部分。谢里登于 10 月 7 日报告说：“我已摧毁 2000 多个装满小麦、干草和农具的谷仓；70 多个装满面粉和小麦的磨坊；部队还赶着 4000 多头牲畜，已

宰杀并送给部队的羊不少于 3000 头。”这仅仅是个开始。谢里登说：待他完成任务时，“这条从温切斯特到斯汤顿 92 英里的河谷，将没有什么可供人畜食用的东西了。”<sup>14</sup>

这是真正的全面战争。破坏也不完全给一方造成。叛军游击队跟在谢里登部队的后面，到处焚烧车队，枪击数以百计的赶车人、传令兵和掉队士兵。这些游击队迫使谢里登把前线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开，使他无法执行格兰特的最初命令：移师东去，翻越蓝岭，开到位于罗伯特·李后方的彼得斯堡。游击队员们还激使联邦军实行焦土报复，它远远超出了谢里登最初下达的只摧毁具有军事价值的房屋的命令。河谷中数以千计的居民，其中有叛乱分子，也有联邦主义者和中立分子，通通都变成了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难民。

谢里登摧毁了河谷的资源后，即于 10 月中旬北撤，并准备把第六军归还格兰特。但是，桀骜不驯的厄尔利却不愿就此罢休。他已得到等于敌人兵力五分之三的增援。当谢里登还在华盛顿商讨部队未来行动计划时，厄尔利就在策划如何横渡谢南多厄河以北的河岔，向位于米德尔城附近的锡达河后面的联邦军左翼发动突然袭击了。南军的三个步兵师于 10 月 18 日至 19 日夜间悄悄进入阵地，于黎明时分前去骚扰第八军的营地。北军的 7000 人张皇失措地向后方逃遁。这次突然袭击是这场战争中效果最好的一次。叛军继续追击，把联邦军的另外两个军向后压了四英里。

不过，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势头。厄尔利确信已大获全胜，于是就没有设法制止其士兵打乱阵势而去劫掠北军的营地。但是，北军各师尚有半数兵力并未垮掉，而其余的部队则正在谢里登令人振奋的领导下重新编队。这位联邦军指挥官已于前一天下午回到温切斯特。10 月 19 日晨，他听到南面 15 英里外枪声大作，便策马向战场飞奔而去。他的行动很快就在部队中传为佳话。他在



策马飞驰时，遇到了正川流不息地向后方走去的大批掉队的士兵，而这些士兵一见到他，就停下脚步向他欢呼。谢里登对他们厉声喝道：“真该死，别向我欢呼！你们要是爱国，就去上前线！真该死，别向我欢呼！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到前线去，真该死！到前线去！”<sup>15</sup>

他们继续欢呼，但他们也转过身来跟随在他的后面。谢里登在遭受打击的部队中出现，其作用是令人惊异的。到午后三时，谢里登已把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并对无组织的邦联军队发动了一次反攻。到夜幕降临时，北军滚滚向前的洪流不仅冲过了早晨失去的四英里，还把敌人又向南赶出八英里。厄尔利的部队在一个月内三度被击溃，实际上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已不复存在了。从一切实际目标看，除叛军的游击战不算，河谷中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叛军的游击行动继续箝制着联邦军的几支大的分遣队。

### 彼得斯堡前线

谢尔曼和谢里登已同时各向邦联军打了一拳；现在，格兰特希望再打上致命的一拳。9月底，波托马克军团同时打击了罗伯特·李的战线两端。在詹姆斯河以北，联邦军虽占领了属于里士满防御工事组成部分的哈里森堡，但却未能在这里或在彼得斯堡西南取得突破。10月底，格兰特再次攻击敌人的两翼，未获成功。这次，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彼得斯堡前线，联邦部队企图进行一次避实就虚行军，绕过邦联军堑壕，以攻击从西面通往彼得斯堡的铁路。但是，罗伯特·李手下的衣衫褴褛的老兵挫败了这一行动，击退了联邦军并使其遭到重创。

波托马克军团的新部队——替身兵、应征入伍者和津贴领取者——在多数作战行动中都打得很糟糕。他们没有打多少仗就大批地投降了。在一度很光荣的第二军尤其如此，这个军从怀尔德

尼斯一路上血战到彼得斯堡，损失最大。在第六军和谢里登的骑兵能够从河谷返回以前，波托马克军，将具有真正的进攻能力。格兰特虽未能打出他的致命的一拳，但却再次迫使罗伯特·李拉长防线，从里士满东面的威廉斯堡公路直到彼得斯堡西南的哈奇尔斯大道，延长了 35 英里。罗伯特·李警告戴维斯，他的防线已相当薄弱，如果得不到增援，“我担心会大难临头”。<sup>16</sup> 但是，这场战争中最寒冷的冬季来到弗吉尼亚，减少了作战次数，并把灾难向后推到春天。

## 1864 年选举中的铜头蛇问题

当军事胜利驱散了政治上的乌云时，共和党人不失时机地指控对手的不忠。用最恰当的话说，这一战术包含了叛军希望麦克莱伦当选的论点。共和党人大肆宣传格兰特发自彼得斯堡前线的电讯。格兰特写道：“敌军非常希望能坚持到大选结束。他们希望人们反对革命。……每天都有逃兵进入我军防线。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厌战，开小差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但是，他们认为，秋季大选一过就会举行和谈。”<sup>17</sup>

格兰特和共和党人本来可以认识得更正确些。邦联领导人确实认为麦克莱伦的当选会确保其事业的成功。副总统斯蒂芬斯认为，民主党政纲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从北部第一次看到的一线光明”。南军的一位军医确信，如果麦克莱伦获胜，“战争就会结束。这种想法很难用语言表达。但愿我们不会失望”。邦联在加拿大的一位情报人员就北部民主党人问题给里士满打了个报告：“这个政纲意味着和平，无条件的和平。……麦克莱伦将处于真正的和平人士的控制之下。……在任何情况下，政纲都会责成他停止战争并尝试谈判。……停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平。战争一旦停了

下来，哪怕只是很短时间，也不会再度爆发。”<sup>18</sup>

共和党人竭力证明民主党人就是北部的反战秘密团体。这些地下组织中最大的就是金环骑士团。1863年，该组织与邦联的联系被揭露，使这个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而逐渐瓦解。美国骑士团取而代之，其成员集中在中西部的南部。1864年2月成立的自由之子社似乎依次吸收了骑士团的多数成员，其最高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

渗入自由之子社的联邦密探搜集了对该社的一系列指控，并及时发表了这些材料，以便共和党人在1864年大选中使用。此外，据说该组织与邦联特务策划一个阴谋，企图在伊利湖上捕捉一艘联邦战舰、解救一些囚禁在中西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焚烧北部城市、煽起反对征兵的抵制运动、煽动武装起义以成立“西北邦联”。总之，他们要制造那么多的混乱，使南部的北军不得不返回老家去对付后方的内乱。联邦侦探逮捕了很多参与这种阴谋嫌疑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印第安纳州。在该州受过军事委员会审判的人中有个叫兰丁·米利根的，他的定罪在两年后被最高法院的一次有名的判决所推翻。这项判决说，在民事法庭开庭的情况下，军事法庭不得审判平民。

共和党的雄辩家、编辑和宣传小册子的作者们利用这些事实，把民主党与叛国联系起来。难道瓦兰迪加姆终究不是自由之子社的统帅吗？难道他没有写下民主党政纲？共和党典型的通栏大字标题印着：“在北部发动叛乱！！令人震惊的揭发！瓦兰迪加姆推翻政府的计划！主和派政党的阴谋！”陆续出版的宣传小册子的题目是：《铜头蛇在西北部的阴谋：揭露自由之子社的叛国命令》。这个问题扩大的程度，乃至共和党人给整个民主党都扣上“铜头蛇”的帽子，这顶帽子使民主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恢复不过来。

有些历史学家把有关铜头蛇阴谋的传说低估为“共和党人富

有想像力的虚构，……一种政治幻影。”毫无疑问，共和党人对不少的这类阴谋大加渲染，甚至不惜捏造。另一方面，大量的证据表明，其中有一部分阴谋并不仅仅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谎言，猜测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sup>19</sup>或许，联邦侦探或提供了情况证明的铜头蛇在发誓后提供的证词，均应打上折扣；但是，邦联特务写下的官方报告却不能忽视。战后在缴获的邦联档案中发现了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发回的几份报告。这些文件表明，曾把好几十万美元分发给中西部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该州的公职候选人：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被提名人接受了住在加拿大的邦联特务的40000美元；伊利诺伊州的两个和平大会得到了邦联提供的大批黄金。侦探们在铜头蛇家中发现了几个储藏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是用邦联特务经费购置的。还有好几起解救邦联战俘的阴谋，其中包括准备在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于芝加哥举行起义，以掩护从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解救战俘的行动。

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阴谋大都从未成功。这要归因于两个因素：这些秘密社团保密不严，致使联邦特务能打进去；再者，在北部从事阴谋活动的人到采取实际行动时，充其量只能动员一小撮人。大批邦联特务出席了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不过，人们所期待的武装铜头蛇军团却从未出现。幻想破灭了南部人断言，北部的和平运动都是崇尚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已经发生的较大作战行动都是邦联特务自己搞起来的：1864年10月19日发生一起越境袭击，从佛蒙特州的圣奥尔本斯银行劫走200000美元；11月25日，邦联特务在城里纵火达19处，企图烧毁纽约的几家旅馆及一些其它建筑物。他们并未能实现，仅仅焚毁了数幢建筑物，余者全被扑灭。<sup>20</sup>

雅各布·汤普森于1864年12月3日向邦联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报告，充分地总结了这些活动。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在布

坎南任内出任内政部长。他在战前与北部民主党人有交往，这使他成为主持驻加拿大特务机关的理想人选。他与好几位民主党主和派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瓦兰迪加姆。汤普森详述了他发放300000美元去从事购置武器、召开会议、资助报纸的活动：“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从一开始就给我以最大的信任，”他写道：“我已把钱预付给辛辛那提的丘吉尔先生，供他在该市建立一个纵火团体。”汤普森相信纵火是一项反对北部的武器：“已经烧掉了大量财富（这是一种夸张），〔我们必须继续〕随时乘机纵火，从而使有财产的人感到不安全，使他们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确，汤普森在准备烧毁自己的档案，因为“我自己掌握着这么多文件。要是落入敌手，就会彻底毁掉北部许多杰出的人。”<sup>21</sup>

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像，假如共和党人在1864年就掌握了这些文件，他们会如何加以利用。其实，民主党人的“叛国”就是他们最有效的论点。民主党人以“暴君”的指控作为报复；但是，这一指控和该党的其他论点；诸如通货膨胀、债务、腐败、征兵以及侵犯公民自由等一样，都未能点起火来。人们对林肯进行的人身攻击也不会产生效果。这一攻击刊登在《纽约天主教周报》上：“阿贝·林肯——且不提他身上流着肮脏的黑人血液问题，……完全是个低能儿。……他的各种习惯都很野蛮。……他道德败坏，生活淫荡。……他是禽兽！”<sup>22</sup>

就连民主党的种族主义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失去了说服力。这并非因为缺乏尝试。民主党报纸恶毒地散布流言蜚语，说林肯的祖先可能是黑人。参加竞选的演说家翻来覆去地攻击“老阿贝的那些热爱黑人、拥抱黑人的崇拜者们。”民主党第一大报《纽约世界报》的两个记者搞了一个新花样。他们匿名写了一本名为《混血：适用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种族融合理论》的小册子。据称，该小册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所写，鼓吹把混血（这是由原作者生造出

来的一个新词·)当作解决种族问题的一个办法。它预言,共和党人如在大选中获胜,就会使战争进入下一阶段,即“这场战争,作为它的最后成果,可以指望白人与黑人大杂烩”。民主党人竭力利用混血问题。他们写歪诗,画黑种男人在林肯再次当选后的“废奴主义”黄金时代狂吻白种妇女的政治漫画,写在占领下的南部关于生育混血儿的新英格兰女教师的耸人听闻的小说,等等。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手段给民主党人争取了多少新选民。相反,这可能使某些聪明的选民产生反感而离去。<sup>23</sup>

## 战俘问题

一个与种族问题间接有关而被民主党稍加利用的问题乃是交换战俘的问题。民主党政纲谴责政府“可耻地不顾”“那些被俘很久而仍在遭受苦难的同胞”。<sup>24</sup> 战俘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监狱的战俘命运,是北部在1864年夏季产生厌战情绪的一个原因。民主党人把交换战俘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党人坚持平等对待黑人战俘。但是,民主党人并未大肆宣传这一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多数北部人因联邦战俘受苦受难而对南部大加斥责。已经被人看作是亲南部的政党,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赢得多少朋友的。

这个容易使人动感情并且常常遭到人们误解的战俘营及战俘交换问题,在1864年陷入了危机。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拥挤不堪及其惊人的死亡率在北部和南部都已成为丑闻。这座战俘营建于1864年初,准备接纳10000名俘虏。但是,这座战俘营到8月份就挤进几近33000人。有13000战俘死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 按“混血”这个词的原文为 *miscegenation*, 系用拉丁文 *miscere* (意为“混合”) 加上 *genus* (意为“人种”) 而合成的。——编注

里。战俘营司令官亨利·沃兹后来被宣判犯有战争罪行并被处以绞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给沃兹的定罪属错判，因为北部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坚持认为，北部战俘的处境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更糟糕。联邦战俘与邦联战俘的口粮配给量相同，如果说他们在1864年配给不足，那是因为北军已大量地破坏了南部的资源。就安德森维尔战俘营而言，它的恐怖是交换战俘工作失败的结果。而根据这一观点，北部应对交换战俘的失败负责。

这些问题很复杂。北部的宣传的确夸大了南部战俘的情况。战俘回忆录是最耸人听闻的内战文献之一。这些回忆录多为北部人所写，人们很难把事实与杜撰的部分区分开来。或许，下面的概括是公允的：除安德森维尔外，南部战俘营的条件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差多少。实际上，条件通常都很差。南北双方的战俘都苦于卫生设备差、水质不良、疾病、哨兵动辄开枪打人、令人极端厌烦、精神沮丧忧郁。在密歇根湖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在伊利湖上的约翰逊岛以及纽约州的埃尔迈拉，难以适应气候的邦联战俘都因衣服和毯子不足而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另一方面，北部的邦联战俘在伙食和居住条件方面却比在南部的北部战俘稍好些。北部战俘营给被俘叛军提供的是营房<sup>\*</sup>，而邦联的好几座战俘营——包括最大的两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和贝尔岛战俘营（位于离里士满不远的詹姆斯河中的一个岛上）——却都没有提供任何栖身之处，战俘们只好忍受露宿之苦。双方战俘所享受的医疗条件大概并不亚于普通士兵——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标准是很差的。但是，南部缺少药品（联邦的封锁有一定责任）对北部战俘的影响，如同对南部士兵和平民的影响是一样的。

---

\* 马里兰州的波因特卢考特战俘营例外，战俘在那里住帐篷。

以下因素——营养不良、住房不足、药品匮乏——都有助于人们解释南部战俘营的联邦战俘的死亡率为何至少比在北部的邦联军战俘高28%。<sup>\*</sup> 对这些数字的另一种分析表明，邦联军战俘在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可能要低29%，而邦联军战俘在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可能要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高68%。没有什么证据证实北部关于南部蓄意虐待战俘的指控。死亡率的差异基本上可归因于南部经济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崩溃，而战俘人数当时达到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现代历史学家要理解安德森维尔的邦联军战俘为何未能获准利用战俘营周围的大片松林木材来营造临时木屋，简直就和1864年的北部人要理解这个问题同样困难。这样做本来可以拯救不少人的生命。一位佐治亚州妇女对她在安德森维尔的见闻感到震惊：“面对这些可怜的人——虽然他们是北方佬——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似的。我担心，上帝将会因为发生这种事情而允许给我们以某种可怕的惩罚。如果北方佬一旦来到佐治亚州西南部……并看看那里的坟墓，愿上帝对大地大发慈悲吧！”

她接着说道：“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北方佬比我们更应受到指责。这是因为他们不交换这些战俘，而我们贫困的邦联又无力养活他们，而我们自己的士兵还在阵地上挨饿。”<sup>25</sup> 确实，交换战俘的计划失败是监狱在1864年人满为患的主要原因。然而，谁应对这次交换战俘失败负责的问题，却比这位佐治亚州妇女所指出的更为复杂。

---

<sup>\*</sup> 正如多数内战统计数字一样，有关战俘的资料是最不准确的；对南部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大量的邦联档案在1865年4月撤离里士满时不是被毁就是散失。最可信的数字表明，在194743名监禁时间不等的联邦士兵中，有30218名（占15.5%）死于战俘营，而在214865名邦联军战俘中，有25976名（占12.1%）死于监禁。因此，邦联军战俘的死亡率就比邦联军战俘高28%。此外，可信程度较低的数字表明，邦联军战俘的死亡率为17.8%，比同一报告所引邦联军战俘的死亡率要高48%。



在战争的第一年，林肯曾拒绝就交换战俘协定进行谈判，因为这样会被解释为对邦联的正式承认。但是战地司令官们曾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交流，双方在1862年都有大批人员被俘，这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压力，从而终于在7月接受了交换战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都与对方交换等量战俘，任何一方的剩余人员将在正式被交换以前获假释。

根据该交换战俘协议，战俘将于1862年秋基本上交换完毕。不料，该协议却在1863年遭到破坏，其原因是邦联对解放奴隶宣言以及联邦军征募黑人参军作出的反应。杰弗逊·戴维斯指责这些措施为“罪人史上的最坏记录”。他宣称，今后在受奴隶解放宣言影响所及的各州俘获的黑人团军官和全部联邦军军官都将作为“参加奴隶暴动的罪犯”论处，交给州政府处以极刑。被俘黑人士兵亦应交给“其所属各州，依各州法律处置”。邦联国会批准了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当然违背了交换战俘协议而不用说它的其他性质。为确保邦联不实施这些措施，联邦陆军部长斯坦顿下令停止交换一切邦联军官，从而把这些战俘作为人质，以对付邦联要处决联邦战俘的威胁。<sup>26</sup>

到1863年6月，虽然正式的交换军官的工作大部分已告结束，但一些交换和假释士兵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格兰特和班克斯在7月间假释了在维克斯堡和哈德孙港俘获的36,000人，但此后不久，邦联陆军部又令其中的数千名士兵重返部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及时地帮助赢得了奇卡莫加战斗的胜利）。联邦政府认为，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交换战俘协议。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使全部交换战俘工作陷于停顿。到1863年12月，拘禁在北部的邦联战俘为26000人，而在南部的北军战俘则为13000人——其数量之多，足以形成对恢复交换战俘工作的压力。但是，主要的障碍还是南部拒绝在任何交换工作中把被俘黑人官兵包括在内。邦联方

面负责交换战俘的代表宣布，在“放弃把奴隶作为失而复得的财产送归原主为奴的权利”以前，南部将“战死在最后一道壕沟”。斯坦顿在答复中坚持认为，对北部来说，就交换黑人战俘协议进行谈判将“是个奇耻大辱。……当〔叛军〕同意一视同仁地交换战俘时，不会有任何麻烦”。<sup>27</sup>

僵局尚未打破，而1864年5月至7月间的战斗又源源不断地把数量空前的俘虏送进拥挤不堪的俘虏营。邦联在8月提出一对一交换建议，却再次拒绝向联邦当局保证把被俘自由民包括在内。<sup>28</sup> 到这时，格兰特开始相信，任何交换都将给邦联而不是联邦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写道：“对监押在南部的我方人员来说，不予交换是件难事；但是，这对还在部队作战的人员来说则是人道的。”每个被交换的邦联军人员都“立刻成为反对我们的积极战士”，而获释的多数北军俘虏不是因服役期满而复员回家，就是因身体垮掉而住医院治疗。“我们不得不战斗下去，直至南部的军事力量枯竭为止。我们如果释放或交换俘虏，那这场战争就简直成为一场要把人斩尽杀绝的战争了。”<sup>29</sup>

人们常常引用这个讲话去证明联邦坚持平等对待黑人俘虏不过是掩盖他们拒绝交换的真正理由——通过消耗来拖垮邦联。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论点：是北部而非南部才应对安德森维尔的恐怖负责。

但是，证据并未证实这种论点。罗伯特·李在10月1日建议以一对一交换拘禁在弗吉尼亚的俘虏时，格兰特暂时接受了部分交换，同时要求罗伯特·李保证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罗伯特·李答复道：“我们认为，黑人归我方公民所有，不被当作交换对象，也不包括在我的建议范围以内。”格兰特为了结此事而发表声明：联邦政府“有义务维护全体从军人员因入伍而得到的权利”，因此，是罗伯特·李拒绝给黑人以这些权利，才“使我拒绝进行你所要求

的这种交换”。<sup>30</sup>到敌对双方的海军部长于1864年10月拟出交换被俘水兵的协议时，林肯政府还坚持把黑人包括在内——后来就真的把黑人包括进去了。这是在交换战俘的僵局中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在1864年—1865年冬，双方不分肤色，交换了数千名伤病战俘。1865年1月，邦联的交换战俘代表建议交换“全部”俘虏，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sup>31</sup>邦联打算把黑奴编入其部队，因而继续拒绝交换黑人俘虏就会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于是他们就悄悄地放弃了这一立场。在1865年2月至3月间，交换工作取得了进展，每天几达1000人——到战争于4月结束时，剩下的俘虏也释放完了。

## 林肯再次当选

1864年选举是就战争和解放奴隶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没有哪个人能够肯定民主党获胜将会形成何种结局：邦联独立；恢复保留蓄奴制的联邦；抑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共和党获胜的结局则不容置疑：蓄奴制的灭亡和继续进行战争，直至南部投降为止。了解这一点的选民们于11月8日前去投票，选举团以212票对21票的多数再次选举了林肯。麦克莱伦只在新泽西州、肯塔基州以及特拉华州获胜。林肯得到55%的普选票，这个多数比他四年前在这些州得到的48%的普选票有大幅度的增长。只有一个自由州（新泽西州）在1864年选举了民主党州长。共和党人控制了他们在1862年失去的全部州议会，并不同寻常地取得了下届众议院185席中的145席（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为42比10）。一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以如此一面倒的胜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共和党在1860年主要得益于士兵选票（此问题将在本节后面论述）以及边疆各州的选票。在这些边疆州，部队排除了分离主义

的选民，或许还镇住了一些潜在的麦克莱伦选民。

1864年选举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终究举行了这次选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举行过大选。英国在20世纪曾因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两度取消选举。美国在内战中举行选举的试验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结果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然而，没有任何人在1864年建议推迟举行选举。正如林肯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简直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林肯在再次当选后说道：选举结果证明，“人民的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内战中经受得住一次全国选举”。<sup>32</sup>

1864年的士兵选票同样引人注目。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做过这种试验，让它的参战人员在一次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到1864年，有18个州已有可能使部队在阵地上投票。这些州中的六个州规定，士兵选票应与其它选票一起贮存，而在其余的部队投票的12个州，部队选票将单独制表。剩下的北部各州——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并未对士兵的缺席选举作出什么规定。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人宣布反对这一立法，因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对士兵选票表示担心。尽管麦克莱伦的名字在波托马克军团的许多官兵中仍有很大的感召力，但没有什么士兵愿意去投那个宣布战争已经失败的政党的票。一位阅历丰富的军官写道：民主党的胜利会意味着“不光荣的和平与耻辱，以及过去那种对南部统治的卑躬屈膝。”另一位生平是民主党人的士兵说：“我们都希望和平。但它不是任何别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我宁愿在这里呆一辈子（尽管我很不乐于这样做），也不同意我们国家陷于分裂。”<sup>33</sup>

共和党人认为，士兵选票在某些州是有决定性的。林肯作为

总司令，能够在这方面进行运筹。军事行动在11月初就停了下来，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自不能缺席投票的州，给他们放假回家去投票了。民主党人指控印第安纳州有舞弊行为，据说成千上万的共和党选票都是来自州外的士兵投的。另一方面，到阵地上收集士兵选票的纽约州民主党专员却遭到逮捕，并被判以向投票箱塞进选麦克莱伦的假票的罪行（其中有一人供认不讳）。还有其它一些对舞弊和骚扰的指控，但从整体上说，损毁部队选票的不正当行为并不比19世纪的正常选举为甚。在单独列表的士兵选票中（154045票中的119754票），林肯的得票率居然高达78%。在那些返乡投票或其选票并未单独计算的士兵中，共和党人大概也占同样大的比例。即使在波托马克军团，投麦克莱伦票的士兵也只有29%。

在好几个国会选区，士兵选票提供了共和党获胜所需的票数差额。他们的选票亦为林肯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可能还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提供了选票差额。总统即使没有部队选票也有可能获胜。但是，士兵中的共和党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这对林肯的战到胜利的政策，是个令人难忘的授权。需要去打仗的人以较大的票数差额进行投票，而且远远高于在家乡进行投票的人们。<sup>34</sup>

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每个人都很明白。格兰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林肯先生赢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和选举平静地进行，将给予叛军狠狠地当头一棒。就林肯的再次当选对叛军的影响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要比战场上的一次胜利大得多。”彼得斯堡堑壕中的联邦士兵听到林肯获胜的消息时，“都欢呼起来，连嗓子也喊哑了”。一位北军的二等兵写道：“在两军战线相距不足20米的某处，我们的士兵听到叛军胸墙后面传来的声音。‘喂，扬基佬。’‘喂，约翰尼。’‘别开枪，扬基佬。’‘行，约翰尼。’‘你们在叫些什么呀？’‘巨大的胜利归我们了。’对方的反应显得很急切：‘扬基

佬，什么巨大胜利呀？’‘老阿贝已把你们的北部伙计一扫而光了。’  
‘扬基佬，你说得不对吧？’‘一点不假，忧虑全都没有了；整个北部剩下的主和派还不够编一个警卫班。’”<sup>35</sup>

麦克莱伦及其友人虽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结局，辞去了职务。这位将军的一个密友聊以宽慰地说，民主党将不再担负结束战争的责任了。他提到这次选举运动时写道：“我们参加了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我们是在革命的一个周期结束以前去阻止革命。我们幸亏失败了。”伦敦《每日新闻》颇有洞察力的记者认为，仲夏以来，北部舆论的转变表明，北部“确实是沉默的、镇静的、但又极其严肃认真的……，其方式是为世人曾所未见的……。我对他们坚决……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听得越多，了解越深，我就越发感到惊讶。”<sup>36</sup>

里士满也理解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但是，杰弗逊·戴维斯却摆出一副体面的官僚架子，坚持认为邦联“像过去一样不屈和反抗。它的政府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它的部队那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它的人民那不可遏制的精神都不会改变。……敌人在军事上的任何成功都无法使邦联解体。”<sup>37</sup> 谢尔曼在其著名的从亚特兰大向海滨进军中所要粉碎的正是这种负隅顽强。

## 第二十五章 邦联的末日

### 从亚特兰大到海滨

谢尔曼在9月占领亚特兰大后不久，便决定疏散那里的大部分平民。他要把这座城市作为军事基地，免除供养和保护平民的负担，并防范混入平民中的间谍和游击队分子。谢尔曼解释说：“我从孟菲斯、维克斯堡、纳奇兹和新奥尔良已经看出：所有这些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地方，每到一处都要立即派一个整师的部队去驻守，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由于我们得分兵去防卫和保护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居民集团势力，因此，胜利实际上是削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兵力。”<sup>1</sup>

当亚特兰大市长和胡德将军抗议谢尔曼的“残酷”时，这位北部将军抓住时机就大讲叛乱的恶果去驳斥他们。谢尔曼告诉这位市长：“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你不能粉饰它。”南部发动了战争，并吹嘘它能战胜北方佬，“现在战争打到了你们家门口，你们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了。你们反对战争的恐怖，但是当你们派出整车的士兵和弹药……将战火烧到肯塔基和田纳西时，你们感到恐怖吗？”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是把战争无情地进行下去，直到邦联投降为止。疏散亚特兰大平民的命令“并不想迎合人道，而是准备作进一步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着亚特兰大之外的千百万善良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定会实现和平，不仅仅在亚特兰大，而且在全美国”。胡德曾经指责谢尔曼的行为由于“有计划的和独创性的残酷”，而“在战争的暗淡历史中出类拔萃”。针对胡德，谢尔曼严词驳斥说：“是你把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拖进了战争；是你挑起了战争并把它强

加在我们头上，凌辱我们的国旗……你派劫掠船掠夺平民的船只，将成千上万的联邦家庭逐出家门并焚毁他们的家园……。这一切我们都亲眼目睹，谁还相信你那套鬼话？”<sup>2</sup>

谢尔曼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仅在同敌对的军队作战，而且要同敌对的人民作战。”打败南部军队还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摧毁支持和供养他们的铁路、工厂和农场，必须粉碎支持南部军队的平民的意志。谢尔曼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直率地表达了全面战争的意义。他对心理战的理解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并且能将它付诸实践。“我们不能改变那些南部人的心脏，但我们能使战争搞得如此可怕……〔而且〕使他们如此厌恶战争，以致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会再有人企图挑动战争。”谢尔曼的部队在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时，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和破坏了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和许多没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现在谢尔曼打算在佐治亚采取同样的作法。他力促格兰特让他从他的基地里解脱出来挥师通过佐治亚的中心地带，从那块土地上获取给养，并且毁坏部队消耗不完的一切资源。谢尔曼说，这样一次军事行动的心理效果，甚至要比其物质效果还要大。“如果我们能把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顺利地通过杰斐逊·戴维斯的领地，就会向国内外表明：我们拥有戴维斯无法抗拒的力量。这也许不是战争，但却是政治家的风度。”<sup>3</sup>

当时胡德的军队和福雷斯特的骑兵正在谢尔曼的背后巡回徘徊，林肯和格兰特勉强批准了这个冒险行动。胡德的军队只有40000人，不足以攻击谢尔曼，但却足够沿着谢尔曼的交通线北上，吃掉人数不多的留守部队，并破坏向南通往查塔努加的铁路。这也恰恰是他在10月份想要干的。谢尔曼跟着采取行动，留下一个军守卫亚特兰大。在两个星期里，部队回师穿过他们从5月到8月间一直在此作战的同一地区，进行搜索和诱敌作战的活动。福



雷斯特和惠勒的骑兵也对联邦军占领的从亚拉巴马的东北到田纳西西部的地区进行严重的破坏。

邦联的策略是迫使谢尔曼放弃亚特兰大，并使他的部队因追击大肆抢掠的南军而造成兵力分散。但是谢尔曼在将胡德部队驱赶到亚拉巴马北部后，提醒格兰特不要中南方人的圈套。“如果现在班师回营，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整个效果就会丧失”，他说，“既然胡德、福雷斯特和惠勒这帮家伙已被逼得无栖身之地，那么保卫铁路则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要试图守护铁路，我们每月将损兵千人，而且将一无所获。”相反，谢尔曼建议派托马斯率领两个军去田纳西，加上增援部队和新建部队，他在那里的总兵力将达到60000人；超过他的对手胡德。同时，谢尔曼将率领62000部队进军佐治亚，以锐不可挡之势直逼海滨……。我要采取进攻，而不是采取守势！……我要完成这次进军，让佐治亚鬼哭狼嚎！”<sup>4</sup>

谢尔曼达到了他的目的。格兰特同意他的忠实的部属的判断，批准了这次进军。托马斯返回纳什维尔，组织他的混合部队；而谢尔曼则下令其骁勇之师作好远征佐治亚的一切准备。为了对抗他们，邦联只能勉强凑集不过几千骑兵和佐治亚民兵。然而，谢尔曼建议行军285英里去远征萨凡纳是最危险和非正统的军事计划。按英国的一位军事专家说过：“让敌军在自己背后活动，把自己的兵力分散，使自己的部队失去铁路和电报联系，得不到给养和增援，不只是发动一次骑兵袭击，而是把大军开进敌对的国土，一位军事将领实施这样的作战方式，这要么是他的最卓越的战例，要么是他干的最愚蠢的行动”——但一切皆取决于事情的结局。<sup>5</sup>

北军于11月15日撤出了亚特兰大，临走前烧毁了这座城市的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火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烧毁了许多商业区，使亚特兰大的三分之一的地区化为灰烬。谢尔曼站在一座山丘上俯视烈火燃烧中的亚特兰大，检阅从他身边通过的

部队。军乐队奏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都跟着唱了起来。十年后谢尔曼回忆说，“在那之前和以后，我从未听到过‘光荣啊光荣，赞美我主’的歌声唱得气魄那样浑厚苍劲，与当时的情景融合的那么和谐、完美。”<sup>6</sup> 部队成四路纵队齐头并进。骑兵在步兵部队的两翼巡回流动，以防南军骑兵的骚扰活动，阻碍部队前进。一路上，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大都由这些骑兵出面解决战斗。这些骑兵与前来阻止前进的邦联骑兵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唯一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1月22日），佐治亚的一个民兵师攻击了联邦军的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佐治亚人的进攻后，十分惊讶地发现死伤的600名佐治亚民兵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

62000名北军士兵每天以10英里的速度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他们拥有充分时间，一路大肆破坏，使一条50英里宽，贯穿邦联心脏地区的地带造成满目疮痍。谢尔曼的军队造成的破坏被编成了神奇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大都确有事实依据。虽然谢尔曼的命令只授权给正式的征粮队征收粮食，并禁止毁坏平民的房屋地产，然而这些命令经过逐级传达，到了士兵的耳中时已走了样，完全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处在随遇而安的心境；他们了解谢尔曼的全面战争的哲理；从下至最低级的中尉到上至他本人的军官们执行纪律不严，为大家所公认。一位士兵写道：“这次战役打得痛快极了……。我们摧毁了我们不能吃掉的一切东西，抢走他们的橡胶，烧毁他们棉花和轧棉机，倒掉他们的糖浆，烧毁和扭弯铁路，到处喧闹。”<sup>7</sup>

大部分擅自掠夺和烧毁私人房屋财物的行为都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的作为——即没有军官指挥的骑兵、掉队的散兵游勇，加上南、北军中的逃兵，还有伪装成佐治亚的联邦主义者的当地海盗。佐治亚有些地方是被南军骑兵和佐治亚民兵烧毁的。他们是在执行里士满的命令：“从谢尔曼军队要经过的路线上撤走所有黑人、马匹、牲口和粮食，烧毁所有不能带走的東西……。阻塞和破

坏谢尔曼前后方和两翼的一切道路，他的军队不久就会饿死在你们中间。”<sup>8</sup>

一群佐治亚的黑人欢迎北军的到来。他们不是把北军看成复仇的恶魔，而是把他们当作上帝的正义之师。黑人奴隶往往是北军最早解放出来的财产。除了强壮的黑人男子（他们可以组成劳工营）以外，谢尔曼试图阻止所有黑人尾随在他的部队后面，因为他担心这成千上万的黑人将会影响部队的机动性，同时增加军需供应的消耗。他未能完全取得成功。几千名获得自由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生病的和伤残的——和部队列队前进。军官和士兵把黑人妇女带回连队当厨娘或姘妇，雇用黑人男子作佣人或勤杂工。三代之家的黑人们乘着种植园的马车尾随着军队前进。这种迁徙伴随着许多悲剧。一位印第安纳军官写道：“婴儿由于抱得不紧，从骡背上摔下来，掉进沼泽中淹死了，母亲们因为失去了孩子而站在路边啜泣。”<sup>9</sup> 许多解放了的奴隶在部队的后卫拆卸浮桥时试图过河而淹死了。至少有 25000 黑人曾在不同时间参加过军队，后来大部分人由于疲劳、饥饿或者疾病掉了队，只有不到 7000 人走完了全程到达海岸。

尽管种种传说夸大了“谢尔曼的野蛮人”在他们后面留下废墟，但事实上他们造成的破坏的确十分严重。据谢尔曼估计，他们造成的损害“达一亿美元，其中使我们获益的至少有 2000 万元，剩下的只是荒地和废墟”。佐治亚从此再也不能为邦联军队输送给养了。谢尔曼手下一位南方出生的参谋人员起初也为佐治亚遭到的破坏而痛惜，但最后他还是从心理学价值接受了他的首长的观点，认为这使“全体佐治亚人民彻底认清了参加这场战争给他们个人带来的灾难，也看清了他们的统治者是怎样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谢尔曼使战争“如此可怕，以致于和平到来时，和平将是持久的”。<sup>10</sup>

谢尔曼的远征确实对南部的士气产生了这种影响。一位佐治

亚编辑承认：“许多人的脸上蒙上了阴影。他们心中的沮丧难以消除。”一位南军士兵写道：“我断定这么干的该死的蠢事要谢尔曼最好别再干了。自从我们碰到该死的北方佬以后，我们除了得到地狱之外还是地狱，别无其他。我真受够了！……”<sup>11</sup>

北军于12月10日到达萨凡纳，发现那儿据守牢固的防御工事的南军15000人。谢尔曼派了一个师攻占了萨凡纳以南奥吉奇河畔的麦卡利斯特要塞；于是联邦军队通过海军重新与外界建立了联系。然后谢尔曼封锁了萨凡纳。邦联军队在被北军围攻之前于12月21日撤出了萨凡纳。谢尔曼以他所特有的洋洋得意的姿态打电报给林肯：“请允许我将萨凡纳市以及150门重炮，大量的弹药和大约25000包棉花作为圣诞礼物奉献给您。”<sup>12</sup>这封电报于圣诞前夕在北部报纸上发表之后，继联邦军队在田纳西几乎全歼胡德军队取得的大捷之后，再次掀起更大的欢庆热潮。

## 富兰克林战役和纳什维尔战役

当谢尔曼于11月离开亚特兰大时，胡德率军开进了田纳西。他打算把谢尔曼拖在他后面。如果不成，他便打算率领他的39000军队一路穿过田纳西和肯塔基到俄亥俄河，然后向东折到弗吉尼亚与李军汇合。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行军700英里，在田纳西打败托马斯的60000人，首先是打败驻扎在普拉斯基附近由约翰·斯科菲尔德指挥的两个能征善战的军。

11月19日，胡德率领他的缺乏冬季作战装备的军队（他的几千士兵由于鞋子破旧，两周来一直几乎赤脚行军）由福雷斯特的骑兵开路，向北挺进。南军向普拉斯基附近的兵力较弱（大约30000人）的斯科菲尔德的部队侧翼发起进攻。斯科菲尔德向离纳什维尔仅40英里的哥伦比亚的达克河退却。胡德留下两个师牵制哥伦

比亚的北军,指挥他的骑兵和其余的步兵掉头进攻北军的左翼。斯科菲尔德知道背后的危险时已经晚了,只得于11月29日迅速向北撤到富兰克林。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对胡德有利。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斯科菲尔德军队的背后,可以从背后追击撤退的斯科菲尔德军队。但是后来一切工作都出了问题。一系列互相矛盾的、令人费解的命令,使胡德的军、师指挥官们贻误了战机。等到他们向占领斯普林山口的主要通路的北军一个师发起进攻时已经太迟了。斯科菲尔德的整个指挥部于头一天夜里悄悄地从这条路撤到了富兰克林。他们在那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

受到挫败而恼羞成怒的胡德责怪他的部下在斯普林山坐失良机,同时愚蠢地下令于11月30日由正面向富兰克林发起进攻。他的军长们劝他改从侧翼进攻敌军阵地。但是胡德大发雷霆,拒绝改变命令。似乎是为了惩罚他的部队,他在下令发动进攻,即使还有两个师远远落在后面,而且他的兵力与待在牢固胸墙后面的北军相比,并不处于优势。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南军将士英勇作战,但还是被打得支离破碎。南军总计伤亡6300人,几乎是北军损失的三倍。邦联军官的伤亡令人震惊:总共有12位将军、54名团级军官战死、负伤或被俘。

胡德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他唯一明智之举是撤退。但事情正好相反,倒是斯科菲尔德率部撤到纳什维尔而与托马斯的其余部队汇合。胡德的军队紧追不舍,来到纳什维尔,守住了城南的山头,但是他已无选择余地。他的兵力弱得无法进攻纳什维尔的守军;继续北进从后勤学上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撤退,胡德又怕瓦解部队的士气。事实上军队的士气早已低落,因为它等待着联邦军队的不可避免的进攻。托马斯花了很长时间为这次进攻作准备。等得不耐烦的格兰特几乎要撤他的职。但下一次大冰雹又耽误了

些时间之后，联邦军队终于在12月15日发动了进攻。

由两个黑人旅组成的师从右翼佯攻南军阵地，牵制住南军一个军的大部分兵力，托马斯把40000大军投入对左翼的进攻。南军坚持了冬天短暂的一个白昼，于夜间撤到一英里以外的新阵地。第二天黑人部队再次佯攻南军右翼，而主力进攻左翼，击退了南军。跳下马的联邦骑兵手持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徒步在南军背后横冲直撞。与此同时，步兵部队从正面进攻，把胡德的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分割开来。南军士兵在黑夜冒雨蜂涌南撤，而黑夜和大雨阻止了北军的追击。纳什维尔战役是这次战争中联邦军队所取得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之一。北军以仅仅伤亡3000人为代价，使南军损失了两倍以上的兵力。溃不成军的邦联残余部队一直退到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在那里，垂头丧气的胡德在1月份辞去了指挥职务。他7月份接替约翰斯顿时，手下有50000人马，到离任时还不足15000人。开小差的士兵每天不断，从实际意义上讲，田纳西军已经覆灭了。

## 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胡德军队覆灭之时，恰恰碰上从宪法上废除蓄奴制所采取的最后一步。头年6月由于民主党人的反对，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未能在众议院通过。到12月，林肯敦促民主党暂时撇开党派偏见，与共和党一起通过这一修正案。下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占有四分之三的多数，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一修正案。总统为此准备在1865年3月4日要求召开新国会特别会议。但是他主张让这一历史功绩应由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来完成。当修正案于1月份提交众议院时，政府在议员中积极活动，游说十几位民主党人放弃投反对票的立场。

某些民主党人积极响应。一位纽约州众议员提醒他的党注意，民主党在上一届选举中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我们不〔愿贸然〕摆脱蓄奴制的僵尸。”<sup>13</sup>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看来是铁了心，像杰斐逊·戴维斯那样为维护过去而要在战壕中奋战到死。一直到1月31日表决之时，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计出这次表决的结果。由于开始的几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了赞成票，紧张的共和党人的面孔放松了，绽出了笑容。80名民主党议员中有16名投了赞成票，还有8名自动缺席。投票结果：119票对56票，正好比规定通过这个修正案所需的票数多两票。表决结果公布后，国会里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烈欢庆的场面。议员们欢呼雀跃，互相拍着肩膀，得意洋洋地向同僚们大声祝贺。旁听席上的黑人听众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众议院提议把这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庆贺这一永恒而崇高的事件”。<sup>14</sup>

那些参加庆典的黑人是这场战争产生的伟大变革的例证。直到1864年，黑人是从不准进入国会旁听席的。到了1865年，黑人不仅进了国会旁听席，而且第一次被邀请出席白宫招待会。联邦在1864年—1865年的法规禁止联邦法院以种族理由拒绝证人出庭，禁止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轨电车搞种族隔离，并且废除了1810年的一条禁止黑人递送邮件的法律。北部一些州和城市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即取消了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北部有些州曾制定不给黑人某些公民权的法律，但在1863年—1866年之间，相继废除了这类种族歧视性的法律。在一些黑人没有选举权的州对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公民投票，颁布了黑人选举权。改革的最生动的标志大概要算1865年2月1日发生的事件了。在那一天，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批准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洛克到美国最高法院去任出庭律师。这件事唯一不寻常的乃是洛克是一名黑人，是蔡斯的前任在八年前宣布没有美国公民资格的种族的一名成员。

在国会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之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一个州以外，所有北部州的议会都批准了这个修正案。马里兰、密苏里、西弗吉尼亚议会，再加上亲联邦的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的临时议会也批准了这个修正案。只有新泽西、肯塔基和特拉华——麦克莱伦在 1864 年竞选中获胜的州——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其余原来加入邦联的诸州也于 1865 年秋季批准了草案，作为它们根据安德鲁·约翰逊的重建政策重返联邦的条件。1865 年 12 月，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正式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个曾对共和国制造了那么多痛苦折磨并几乎威胁其生存的制度已不复存在了。

## 南部邦联军队中的逃兵

1865 年初，当扭转种族偏见之风吹遍北部时，邦联显然正在崩溃。北卡罗来纳州长泽布伦·万斯和佐治亚州长约瑟夫·布朗加强了对里士满政府的反抗。当季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万斯专为他的北卡罗来纳军队保存下 92000 套军服和大量的皮革用品和毯子。军队中逃兵的比率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到 1864 年底，邦联军队花名册上的 400000 士兵中有一半以上脱离了部队，其中大多数是逃兵。博雷加德将军承认：逃兵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在冬季的一个月里，士兵开小差使北弗吉尼亚军队丧失了接近 8% 的战斗力。

内战中双方军队中逃兵的比率都很高。确切的数字很难统计，因为一方面记录不完全，另一方面，也很难区分哪些是逃兵，哪些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过批准或未经批准临时离队的士兵。看起来大约有 200000 联邦军士兵开小差，他们中有 80000 人被捉回部队，有 147 人被处决。至少有 104000 邦联军士兵逃跑，其中有 21000 人被捉回部队。如此看来，逃兵数将近联邦部队人数的 9.6%，邦



联部队人数的 13%。

到 1864 年秋天为止，双方的逃兵比率一直差不多。1864 年—1865 年的冬季，邦联士兵的逃跑“流行病”，提高了南军在整个战争中的逃兵比率。饥饿、寒冷、前线的悲惨境遇和家乡亲人们的悲惨处境等都是许多士兵逃跑的原因。成千上万的南军士兵在收到他们妻子的来信后逃跑回家了。正如 1864 年 12 月一位南军士兵的妻子在信中写的：“我们家里除了一点粗面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快想办法回来帮助我们安顿一下，然后你再回去。……如果你不早点动身，回来也没有用了，我们全家就要到那边坟场的园子里去和你我的母亲相会了！”<sup>15</sup>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邦联士兵逃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再作进一步的牺牲毫无意义。”李军中一位先前曾声称军队的士气很高的士兵在 1865 年 1 月写道：“谢尔曼的大军长驱直入佐治亚……，所向披靡，胡德在田纳西被完全击败，这一切改变了战争的整个局面。”罗伯特·李将军确信，“军心涣散”是这些“肩负重任和战绩显赫的部队中出现叛逃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个晚上就逃走几百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制止住他们。”<sup>16</sup>

## 菲舍堡失陷与和谈的失败

失败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南、北卡罗来纳腹地尚未遭受联邦军的侵犯，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仍然是对偷越海上封锁线的船只开放的主要港口，因此李的军队仍可以从这两个地方得到有限的给养。为此，格兰特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封锁威尔明顿，而谢尔曼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扫荡，这一次他要贯穿南北卡罗来纳。

在威尔明顿下游 20 英里的开普菲尔河口建有一群堡垒网，保卫威尔明顿。其中最主要的是菲舍堡——这是装有 75 门重炮的巨大的土木工事。开普菲尔河口的航道险恶，而且防守坚固，使联邦海军不可能像他们在新奥尔良和莫比尔那样冲过这些堡垒。因此威尔明顿仍然是接纳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的主要港口。1864 年秋天，联邦军指挥部准备好一支陆海联合远征军去夺取菲舍堡。最使格兰特恼火的是本杰明·巴特勒凭他的资历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军区的指挥权。巴特勒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一艘旧军舰装上 235 吨黑色炸药，让它冲到浅滩去炸毁旁边的菲舍堡。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 12 月 23 日夜里的那次爆炸并没有把菲舍堡炸毁；于是海军乃用火炮对之轰击，向它倾泻了 640 吨弹药，巴特勒派出他的 6500 人的部队的一部分登陆。但是他认为堡垒太坚固而不能进攻，于是又下令让他的部队撤回船上。

格兰特再也不能容忍了。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撤巴特勒的职的借口。由于大选结束，政府不再需要用灵活手段去处理巴特勒的问题，因此到 1 月 8 日，巴特勒坎坷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格兰特迅速派了第二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 8000 人组成（包括两个黑人旅），由艾尔弗雷德·特里将军指挥，有一支由 44 艘军舰组成舰队支援，军舰共装有 627 门火炮，是内战开始以来最大的舰队。在两天里，舰队猛烈轰击了菲舍堡，该堡的火炮仅存两门，其他完全丧失了战斗力。1 月 15 日，2000 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从海上向菲舍堡的正面发动攻击，同时 4000 名步兵迂回到该堡背后冲过掩体前的胸墙。菲舍堡攻陷后，其他的堡垒也不攻自破了。北军的军舰驶进了开普菲尔河，邦联最大的港口遂与世隔绝了。

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菲舍堡的失陷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落在我们事业上的最大的灾祸之一。”<sup>17</sup> 这个灾祸使

邦联正在滋长的和平情绪陷入危机。菲舍堡失陷两周后，斯蒂芬斯参加了另一次毫无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的尝试。作为对联邦的弗朗西斯·布莱尔对里士满的一项非官方建议的回答，杰斐逊·戴维斯“为了谋求两个国家的和平”，委任了由斯蒂芬斯为首的三名专员同北方代表会谈。林肯表示了他愿意接见由戴维斯非正式派来的专员，“以便使我们共同的国家的人民获得和平”。<sup>18</sup>

这次在措辞上的重要区别是向邦联预告了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六个月以前，当北军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时，林肯曾坚持以重新联合和解放奴隶作为和平的条件；现在在联邦军队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从这一立场上后退。2月3日，邦联专员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锚地停泊的联邦汽艇“女河神”号上同林肯和西沃德会谈时，对林肯的态度感到意外，因为除非邦联事先屈服于这些条件，否则林肯连一次暂时的休战也不肯考虑。林肯在程序问题上——南部政治上回归的方式，解放奴隶的时间选择和实施，甚至对蓄奴主赔偿的问题——都准备采取灵活态度，即使遭到自己党内的反对。但是在南北统一和解放奴隶等主要问题上，林肯的态度是坚决的。南部专员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或许这正是杰斐逊·戴维斯曾经期待和需要的，因为这时他还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迷雾之中，认为他们还有取胜的可能。戴维斯告诉他的国会：由于北部拒绝“同意我们取得在其它任何基础上的和平，而要我们向他们的统治无条件投降”，因此，把战争进行到底是唯一体面的选择。<sup>19</sup>

一个月以后，林肯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他再次明确表示：希望“战争的巨大灾难能够很快结束”。但是总统引用《旧约》中的描述，提出这场战争是对美国的蓄奴制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决意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在250年来辛辛苦苦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全都化为灰烬，直到用皮鞭抽出的每一

滴血都要用刀剑刺出另一滴血来偿还时，……那我们只能说：‘上帝的裁决是公正的、严明的’。”<sup>20</sup>

## 谢尔曼打通南北卡罗来纳

1865年2月，谢尔曼的60000复仇大军在一次战役中给南卡罗来纳带来的战争灾祸，比他们从亚特兰大向海岸进军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得多。谢尔曼的计划是：杀出一条贯穿南北卡罗来纳的通道，摧毁沿途一切战争资源，从背后追击李军，使北弗吉尼亚军队处于他和格兰特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以便沮丧情绪在老百姓中间蔓延。

这次进军的后勤保障是战争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们早先进军佐治亚时，在秋季干旱的气候中顺着主要河流推进，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而这一次的路程要比上次远一倍，他们要在异常多雨的隆冬季节渡过许多条因雨水而猛涨的河流和沼泽地，并遭到日益顽强的抵抗。因为南军垂死挣扎，拼凑起一支军队，沿途骚扰，拼命阻挠北军推进。把休整的日子和因一些小冲突和战斗而耽搁的时间计算在内，谢尔曼的军队在45天中平均每天前进不到10英里。这期间还有28天是雨天。

邦联方面原指望气候和地理条件能阻止住谢尔曼的军队。约瑟夫·约翰斯顿坚信：“一支部队绝不可能在冬季通过这个州的南部地区。”但是北方佬却通过了。由100名白人士兵和70名黑人拓荒者组成的拓荒营砍伐整片树林来铺设道路，整个部队都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斧头架设桥梁。为了避免宿营时受到洪水的侵扰，将士们有时就在树上露宿，就连谢尔曼也是如此。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军队中只有2%的人生病。当联邦军抵达索尔基哈奇河时，邦联将军威廉·哈迪曾向他的上司保证：“索尔基哈奇河是不

可逾越横渡的。”可是北军士兵们在河上架桥铺路，没有损失一车一炮就顺利通过了它。哈迪将军沮丧地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约翰斯顿后来写道：“当我获悉谢尔曼的部队一边自己铺路，一边携带大炮、辎重，以平均每天 12 英里以上的速度通过了索尔基哈奇沼泽的时候，我就深信：这是一支从凯撒以来未曾有过的军队。”<sup>21</sup>

谢尔曼兵分两路，一路佯攻查尔斯顿，一路佯攻奥古斯塔。邦联军向这两座城市增派援军。但是联邦军一直向北推进，切断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路线之后却不继续向它们逼近。由于同内地的联系被切断，查尔斯顿于 2 月 18 日向从海上封锁他们近两年之久的联邦军队投降了。正式受降的军官是一位黑人团的上校。他们是最早占领这座光荣城市的军队，其中有些士兵曾经是这儿的奴隶。当他们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开进查尔斯顿的时候，受到了当地黑人们的热烈欢迎。占领军的第一项任务是灭火。邦联军队在撤退时放火焚烧了棉花、军需物资和船只，但是大火已经蔓延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南部的重镇，分离主义者的根基查尔斯顿的陷落，是邦联的崩溃的最引人注目的朕兆。杰斐逊·戴维斯后来写道：“这次挫折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sup>22</sup>对废奴主义者来说，这场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是《解放者》报的编辑威廉·加里森的儿子，第五十五马萨诸塞黑人步兵团的乔治·汤普森·加里森上尉来到查尔斯顿。两个月之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本人，同其他许多废奴主义者一道，也来到这座城市，出席一次升旗仪式，而四年前的这一天，萨姆特要塞失陷时星条旗已被降了下来。

在谢尔曼向南卡罗来纳进军之前，总参谋长哈勒克曾给他打过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你夺下了查尔斯顿，我希望会有一些意外的灾祸把这个地方毁掉。要是在那块土地上撒些盐，那就可以

阻止将来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和退出联邦的庄稼的生长。”<sup>23</sup> 查尔斯顿逃脱了这种命运，但是南卡罗来纳的其他许多地区却未能幸免。在北部人看来，南卡罗来纳理应受到特别的惩罚，因为这个州的好战挑起了这场战争。到1865年许多南部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谢尔曼进军佐治亚时，佐治亚人一再对北方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南卡罗来纳？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去对付他们？是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北军士兵欣然同意这种说法。谢尔曼在报告中说：“全军燃烧着一股对南卡罗来纳报仇雪恨的不可遏制的愿望。我真为它的命运担忧，但是我又想，这种对它的积压已久的仇恨是它罪有应得的。”<sup>24</sup> 谢尔曼在南卡罗来纳下达的命令与在佐治亚一样：没收所有的粮秣和一切具有军用价值的物品，只留下平民的私人财产。但是士兵们根本无视他的命令，比在佐治亚尤甚，而谢尔曼也没有采取措施去制止他们。一名联邦军官的记录说：“在佐治亚很少有房子被烧毁，而这里则很少有房子幸免于难。”士兵们根本不管什么是军用物资，什么是私人财物，肆意抢掠。一位家遭洗劫的妇女这样写道：“他们有时会停下来告诉我，他们有些对不起妇女和儿童，但是南卡罗来纳必须被摧毁。南卡罗来纳和它的罪恶是他们歌词中反复唱的叠句！”一名参与掠夺的士兵直截了当地表示：“叛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也将在这里结束！”<sup>25</sup>

指责谢尔曼所犯的最大暴行是火烧南卡罗来纳的首府哥伦比亚。联邦军士兵于2月17日开进哥伦比亚，到第二天早晨，城市有一半已化为灰烬。关于谁应对此负责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南部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北军蓄意放火焚烧了哥伦比亚，而谢尔曼和他部属的军官则坚持认为，邦联军的骑兵撤离时放火焚烧棉花，火势蔓延酿成大祸。事实上，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甚至在谢尔曼的部队抵达之前，哥伦比亚市内的秩序就已大乱。城里贮存着大量的酒。邦联的骑兵、强盗和奴隶们闯入酒窖狂饮，在大街上

横行霸道，大肆抢掠，放火烧毁棉花。2月17日，几百名联邦军士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从附近战俘营中逃出来的联邦军战俘，也加入了他们醉酒后狂暴行动。没有喝醉的联邦军士兵帮助扑灭燃烧棉花引起的大火。但是当天夜幕降临时，突然刮起了大风，火势从人为和气象两方面汇合在一起，熊熊烈焰到处蔓延。谢尔曼和他的将士们彻夜奔忙，企图控制住火势。但是只是由于凌晨四点钟风向转变，才没有把整座城市完全化成灰烬。没有哪一伙人，不论是邦联军的骑兵、喝醉酒的北军士兵、还是复仇的战俘、奴隶或犯人，可以单独承担烧毁哥伦比亚的责任，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伙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哥伦比亚还不是这场战争中的唯一遭劫数者。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灾难和破坏，比以往全部战争加起来还要大。<sup>26</sup>

谢尔曼的扫荡大军继续向北卡罗来纳推进。在那里，他们碰到了老对手约瑟夫·约翰斯顿。2月6日，罗伯特·李就任邦联军总司令。虽然李在南部的名望大得足以使他独揽军事大权，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作，李就职后第一次行使职权就恢复了约翰斯顿的指挥权。约翰斯顿根本无法阻止谢尔曼的大军前进。他率领一支由几队零散部队拼凑起来的仅有22000人的军队，无法与谢尔曼的60000大军抗衡。不久，又有一支30000人的北军从北卡罗来纳海岸开赴内地，与谢尔曼军会师。约翰斯顿的唯一希望是乘谢军的一部与其他部队分离时攻击这一部队。3月19日，在罗利附近的本顿维尔，约翰斯顿认为他找到了机会。他率领17000名步兵向正在前进的谢尔曼军左翼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支部队与他的部队数量相当。受到袭击的北军士兵掘壕据守。第二天，谢尔曼的其余部队开始到达。但是还未等谢尔曼下达总攻命令，约翰斯顿就向北撤退了。联邦政府军继续前进，开到戈尔兹博罗，在经历了7个星期的行军作战后进行休整。

## 邦联资源遭到破坏

谢尔曼大军开过之后，留下 425 英里长的废墟。这里再也供养不起邦联的军队了。甚至当疲惫不堪的谢尔曼军队长途跋涉进入戈尔兹伯勒时，西南 700 英里以外另外两支联邦军队同时向密西西比河以东发动进攻，使南部这块未遭洗劫的仅存领土也惨遭蹂躏。40000 军队由莫比尔湾和彭萨科拉市分两路出兵，进攻莫比尔城。经过一次历时三周的战役，他们攻陷了莫比尔，10000 守军或被俘获，或纷纷溃逃。与此同时，二十七岁的骑兵指挥官詹姆斯·威尔逊从亚拉巴马西北部到佐治亚南部，领导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和破坏最严重的骑兵袭击战。威尔逊的 13000 名骑兵配备着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其火力比同样数量的一支步兵部队强一倍，机动性高两倍。联邦骑兵冲杀出一条穿过亚拉巴马的通路，经过六次交战，打败了福雷斯特的——度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打死打伤邦联军 1000 人，俘虏 6000 人。他们在 5 月 10 日，在佐治亚的欧文维尔俘获正在逃跑的杰斐逊·戴维斯，使这次长达 500 英里的袭击战达到了高峰。他们沿途切断铁路、摧毁了 600 辆机车或货车，破坏数十座兵工厂和武器库，没收和烧毁了大量的棉花，捣毁了 300 尊大炮和 100000 件轻武器。

在 1861 年，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邦联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的地域辽阔，公路稀少，地势崎岖不平，将会挫败入侵者，就像 1812 年俄国的漫长路程挫败了拿破仑一样。但是事实与这些预言相反，邦联不仅被攻入和击败，而且完全被摧毁了。到 1865 年，联邦军队已经渗入了邦联的 500000 平方英里的每个角落（只有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边缘地区除外），其面积相当于法国、西班牙和西德的总和。这支军队摧毁了南部资产总值的三分之二，牲畜的五



分之二，20岁到40岁之间的白人男人的四分之一。一半以上的农业机械被毁坏了，被破坏的铁路和工业无法计算。从1860年到1870年10年中，北部的全部财富增加50%，而南部的财富却减少60%（如果奴隶不算作财产，则应是30%）。<sup>27</sup> 这些数字对邦联为维护它的生活方式发动的反革命所导致的悲剧性嘲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它也证明了在这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中，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克服距离和地形障碍的能力。

## 1864年—1865年冬季的重建问题

当邦联土崩瓦解的时候，北部的国会再次尝试确定重建的条件。根据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亲联邦的州政府已在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占领地区内行使职能。田纳西的新州政府也即将成立。尽管早些时候总统在重建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矛盾，但他现在希望国会能承认这些新政府。共和党在1864年选举时的协调一致的精神很好地预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一种妥协。林肯于12月任命萨蒙·蔡斯为首席大法官一事，是他对激进派作出的友好姿态。总统在国情咨文里有一句话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姿态，总统在这句话中表示了支持对战后南部采取“空前严厉的措施”的意愿。<sup>28</sup>

总统与共和党众议院领袖们制定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国会将承认林肯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州政府，以换取总统批准一项对邦联其余各州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去年10月被否决的韦德—戴维斯法案十分相似。这项妥协法案最初规定其余南部各州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但是温和派将它修改成只给黑人士兵和有阅读能力的黑人以选举权。1865年1月到2月，众议院一连串争吵不休的会议和议员投票挫败了关于这项法案的一些不同意见。激进派对不给黑人选举权和承认路易斯安那州现政府的议案

都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保守派对给予黑人选举权的议案投了反对票。民主党则投票反对所有重建法案。结果，一项法案也没能通过。在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激进派结成了临时联盟，阻拦通过一项承认重建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提案。<sup>29</sup>

温和派对妥协方案的流产后悔莫及，而对激进派来说，把重建问题搁置到战后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一位激进派国会议员写道：“在这期间，我希望全民普遍接受教育，以适应我们所要求的普选。”<sup>30</sup> 下一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在1864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肯定会更加激进。总统也同样会变得更加激进。从1861年到1865年，林肯已坚定地逐渐转向了左派一边：从有限战争到全面战争；从逐步地、有偿地解放奴隶到立即彻底废除蓄奴制；从反对武装黑人到热情支持武装黑人；从恢复联邦的主张到重建联邦的主张；从获得自由的奴隶进行殖民开拓到给黑人士兵和有文化的黑人以选举权。在战争结束时，林肯的立场与激进派更加接近。在4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林肯重申了他在重建问题上灵活和务实的观点。总统说：路易斯安那的先例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各州。如果对人民的利益有害的话，他的承诺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即使是在路易斯安那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演说结束时，林肯许诺：不久后他还要发表关于重建问题的“一些新的声明”。但是三天之后，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永远剥夺了全国人民聆听这些声明的机会。<sup>31</sup>

## 邦联决定武装奴隶

由于大部分领土被侵占，军队瓦解和经济崩溃，邦联在1865年3月显然已注定灭亡了。然而苟延残喘的戴维斯和李还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最后两张王牌作垂死挣扎。第一张牌是征募黑人奴隶参加南军，第二张是尽力把李军和约翰斯顿的70000名饥饿不堪

的残兵败将集合起来，以连续打败谢尔曼的 90000 军队和格兰特的 115000 军队。这两项计划尽管都是异想天开，但却体现了南部领袖“战死在最后一条战壕里”的决心。

1863 年，北军从黑人奴隶中征兵，提醒了南部的少数有识之士，他们想知道是否南军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取兵源。早在 1864 年初，帕特里克·克利伯恩将军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武装奴隶的建议。但是杰斐逊·戴维斯驳回了这项建议。现在这个意见不能继续再被压制了。因为在 1864 年—1865 年冬季南军土崩瓦解，南部报纸和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征募奴隶的问题。到了 1864 年底，戴维斯和他的内阁已同意了这项建议。两年前，戴维斯曾抨击北军武装南部逃奴是“罪人史上最可恶的手段”。但是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一位邦联人士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的：“当蓄奴制与独立二者必居其一时，蓄奴制就必须舍弃了。”<sup>32</sup>

但是对以维护蓄奴制为战争目的的南部人来说，武装黑人的主张是一种“前后矛盾的自我嘲弄”。当时邦联参议院代主席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亨特问道：“要是不维护我们的财产，我们干吗要打仗呢？”一位南部最有权势的政治将军豪厄尔·科布认为：“如果奴隶能够成为好兵，我们关于蓄奴制的全部理论都是谬论……。我们征募奴隶当兵之日，就是我们的革命失败之时。”科布的同事乔治亚·罗伯特·图姆斯大声疾呼：“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大灾难，就是依靠我们的奴隶们的英勇去取得独立……。弗吉尼亚的军队允许一个黑人团以战士身份加入他们的部队之日，这支军队就将堕落、毁灭而且蒙受耻辱。”<sup>33</sup>

罗伯特·李将军最终克服了这些反对意见。李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蓄奴制维护者，他坚信奴隶们一旦获得解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而不是为北方佬。“我们必须决定，要

么让我们的敌人来取缔蓄奴制，并利用奴隶来反对我们，要么我们自己去利用奴隶。”李写道，“我想，我们最低限度也可以像北部人那样去对待他们。北部人对奴隶们的支援给予高度的重视。”罗伯特·李的名望如此之大，《里士满观察家报》说：“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提出来的任何请求。”以致于邦联国会在3月13日还是勉强通过了一项征募黑人士兵的法案。<sup>34</sup> 濒临末日的巨大灾难使1861年的反革命转变成1865年的革命——但并不彻底。尽管罗伯特·李提出黑人士兵应获得自由，但法案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否给那些为邦联作战的黑人奴隶以自由的许诺，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直到战争结束，任何黑人团也没有建成。

## 从彼得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

由于波托马克军团最终使北弗吉尼亚军团陷入了绝境，这次战役才告结束。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越过一条200英里的狭长战线厮杀，而在西部的联邦主力部队在叛方领土上胜利进军，深入1000英里，这就使西部军队产生骄傲情绪。这些来自农村和边区的瘦而结实的西部人对那些“纸衬领”的东部士兵极为蔑视。当东、西部联邦部队碰到一起时，他们就互相辱骂，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一位印第安纳列兵在1863年说：“如果这场战争由那些衣着整齐的东部人来打，那么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他们只打到邦联的一个州，而我们却打遍了五个州。”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士兵则认为：“波多马克军团只会呆在冬季军营里数钞票。”而另一方面，东部士兵则把西部军队看成是一群武装暴徒。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只是由于西部邦联军素质低劣。“西部的叛军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而不像李军士兵那样纪律严明，难以战胜。”<sup>35</sup>

大多数研究联邦军队的历史学家已同意西部人自己的说法。不可否认，西部军队从多纳尔森到阿特兰大，屡战屡胜，征服了大片的领土。而波托马克军却在弗吉尼亚陷入僵局，一筹莫展。但是造成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由于东西部军队的士兵的素质差别，不如说是由于将领们才智的差异，包括联邦军的将领和邦联军的将领。联邦军的四位优秀将领：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和托马斯都是西部人，而邦联的几位战功卓著的将军：罗伯特·李、杰克逊、朗斯特里特、斯图尔特和福罗斯特，只有福罗斯特是西部人。当朗斯特里特在1863年率领他的军团驰援佐治亚时，他指挥了南军在奇克莫加突围。这是田纳西的南军取得的唯一的一次明显胜利。当波托马克军的第11军和第12军一个月以后从弗吉尼亚开到查塔努加后，这些曾被认为是东部军队中最弱的部队，却成了西部军队中的骁勇善战之师。士兵还是原来的士兵，只是更换了他们的指挥官。

西部军队所打的硬仗确实不及波托马克军团多，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这样认为。一位参加过谢尔曼远征的威斯康星的士兵写道：“波托马克军团确实打了不少硬仗，不过他们的仗和我们的规模不同，而且他们的仗多数都是在报纸上进行的。”<sup>36</sup>他这句话大错特错了。战争中14场最残酷的血战（南北军伤亡总数在17000人以上的）中，有10场战役是在北弗吉尼亚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之间打的。50次战斗伤亡比例最高的南军步兵团队中，有40个在东部战线作战。联邦军队中50个伤亡比例最高的步兵团队中，有41个是东部军队。在7个战斗死亡率最高的联邦军中，有6个军曾参与波托马克军团作战。这个军团的阵亡总数为全部联邦武装力量阵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新英格兰各州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军队的阵亡士兵总数比西部各州阵亡士兵总数高23%。<sup>37</sup>

## 攻陷彼得斯堡和里士满

虽然格兰特本人是西部人，他还是对波托马克军团的傲慢以及对西部人的优越感的憎恶十分敏感。因此他希望在谢尔曼的军队从李军背后发动突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以取得最后胜利所享有的荣誉。现在格兰特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李军在夜间偷偷溜到北卡罗来纳，与约翰斯顿的军队汇合。李也恰恰是这样盘算的。然而，在撤出战壕之前，他冒险在彼得斯堡东面对格兰特军的右翼进行最后一次进攻，迫使格兰特从左翼抽调兵力支援右翼，以缩短他的包围圈。在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装成逃兵的南军取得了联军哨兵的好感后，突然捕获了不知所措的北方佬，并率先发动进攻，攻占了联邦军防线上的防御工事斯特曼堡。南军大队人马从突破口一涌而出，很快就占领了差不多一英里长的联邦军战壕。但是他无法顶住联邦军火炮的纵深轰击和步兵的猛烈反攻。到了上午10点左右，南军被赶了回去，伤亡总共4800人。

现在格兰特掌握了主动权。他派出两个军和12000骑兵去攻击南军右翼，切断了通向彼得斯堡的最后一条铁路，封锁了李军向西南逃窜的退路。在一个叫作五岔口的铁路汇合处，谢里登的骑兵和第五军于4月1日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击溃了10000名南军，使南军伤亡5000人，而北军仅伤亡1000人。格兰特得知谢里登进攻得手后，遂下令于次日拂晓向彼得斯堡守军发起全线进攻。残存的南军拼死抵抗，从一个战壕撤退到另一个战壕，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打死打伤联邦军4000人，使联邦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兰特希望将李军全歼于彼得斯堡，但是南军于夜间渡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向西撤退。与此同时，邦联政府和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部队撤出了里士满，他们撤退前炸毁了桥梁、工厂、军火库，烧毁了所有的棉花和无法运走的政府财产。4月3日黎明，整

个里士满变成了一片火海。

率先占领这座城市的是第五马萨诸塞骑兵队的黑人骑兵。其指挥官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他是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亚当斯的长子，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这又和在查尔斯顿一样，占领军的首要任务是扑灭他们在黄昏时点燃的大火。但是在此之前，里士满的大部分商业区和工业区已被焚烧殆尽。第二天，林肯总统在一队黑人骑兵的护卫下访问了这座已经沦为废墟的城市。他们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的里士满的黑人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位黑人喊道：“我知道我获得自由了！因为我见到了慈父阿伯拉罕并抚摸了他。”北部一家主要报纸《费城报》的黑人通讯员莫里斯·切斯特坦然地坐在邦联的国会大厦，写了一份描述当时情景的电讯。而对里士满的白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把他们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毁灭性革命的确切见证。<sup>38</sup>

### 通向阿波马托克斯之路

当里士满发生这一切的时候，35000名李军正企图摆脱80000北军的穷追不舍。在他们左侧，谢里登率领的骑兵部队和两个军与他们平行疾驰，阻止他们向南部退却。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军紧跟在李军后面，俘虏了成百上千疲惫不堪的南军掉队的士兵。4月6日在法姆维尔附近的塞勒湾，北军经过一场激战，切断并俘获了7000南军，而北军仅损失1200人。李目睹了这场战斗的高潮以后绝望地叫道：“天啊！我的军队瓦解了吗？”4月8日，谢里登赶到了李军剩余部队的前面，在彼得斯堡以西10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缴获了两列车的军需品。4月9日早晨，当残存的南军准备进行最后突围的尝试时，发现北军骑兵后面的两个军。这时，李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手下一位炮兵军官建议把剩余的部队疏散到森林里，继续进行游击战，但是李断然拒绝这种建议。

他说，游击队“将会变成为一帮帮的土匪，敌人的骑兵将会追击他们，去蹂躏他们可能（或许）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的很多地区。我们将会招惹灾祸，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过来”。不！李又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死一千次。”<sup>39</sup>

## 李将军投降

但是，他这样做了：他到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所在地，走进了威尔默·麦克莱恩的农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莱恩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附近也拥有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曾被用作邦联军的总部。他迁到这偏僻的角落正是为了躲避交战双方军队的抢掠，成了在这个起居室里唯一目睹这场战争最后一幕的人。李来到时身着华丽的全套军服，而格兰特却穿着一件褪色的野战军服，穿着溅满泥泞的靴子来参加这一历史性的会议。他的司令部马车在一次阻止南军的激烈战斗中被弄坏了。格兰特，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分别俘获了三个军团（在唐纳尔逊、维克斯堡和这次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将军，提出了十分宽大的条件：释放李的全部军队，允许他们带走他们的马匹、骡子去回家“种地”。当这两位将军握手时，格兰特对于这位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战争，作战如此英勇的对手的失败感到“悲哀与忧郁”，因为“他为一个事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尽管这个事业我认为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最错误的事业之一。”<sup>40</sup>

一些联邦军军官对李投降的消息感到无比惊讶，以致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一位在弗吉尼亚打了三年仗的步兵上校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签字两周后写道：“即使在李已经投降了以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件事。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一辈子都要和他打下去。”但是当4月9日投降的消息传遍了联邦军营地时，士兵们开始了欢庆，好像把历史上所有的独立纪



念日都汇合在一起庆祝。一位老兵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帽子、靴子、外套、背包、衬衣、烟盒满天飞舞，整个天空都成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们互相拥抱，时而欢笑，时而哭泣。那些高大、笨拙、满脸胡子的汉子，竟像姑娘那样互相拥抱、接吻。人们欢歌载舞，又嚷又叫，翻身倒立甚至玩起了跳背游戏。”所有的军乐队都在演奏，都试图在精神和音量上压过对方。<sup>41</sup> 当电讯把李投降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北部时，那里的人们刚刚从庆祝攻克里士满的狂热中平静下来，一场新的更加热烈的庆祝活动又爆发了。

## 林肯被刺和战争结束

突然，电报机传来了重大的消息，人们的欢乐情绪接着化为悲痛——但是这消息是可怕的，十分重大的——林肯遇刺了！4月14日，早已积忧成疾的56岁的林肯总统为了松弛一下，来到了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喜剧表演。戏演到一半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走进了林肯的包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布思跳上舞台（他在那儿跌断了腿），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溜出了后门，跳上一匹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走了。剧院的人未能将他抓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位著名演员的儿子，他哥哥也是一位著名演员。他本人二十六岁，是一位平庸的演员。他是一位性情反复无常的利己主义者，渴望出名却未能如愿，因而心灰意冷。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用他作人质以迫使联邦政府向邦联让步。为了实现这一疯狂的计划，他从华盛顿的下层社会的流浪汉、邦联的间谍、南军的逃兵中征募了几个助手。里士满的陷落和李军的投降使绑架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布思改而决定暗杀林肯总统、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由于派去刺杀约翰逊的同伙惊慌害怕，而未能得逞。西沃德国务卿被刺成重

伤,但保住了性命。4月26日,联邦军队终于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燃烧着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位马里兰出生的布思,并且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判定其他八名同伙共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其中四名被判处绞刑,另四名被判罚苦役。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判决可能有失公正:玛丽·萨拉特,布思策划绑架行动的那个旅馆的老板,她参加了开始的策划绑架活动,但是她大概对改变后的暗杀计划一无所知。塞缪尔·马德医生,他为布思治过受伤的腿,充其量不过是名事后从犯。萨拉特夫人被绞死了,马德被判终生监禁,但是1869年,他同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同伙一起得到赦免。对他们的量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暗杀事件发生后报仇雪恨的公愤和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

## 殉难的总统

1865年4月15日,安德鲁·约翰逊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人们在街上为林肯的殉难痛哭流涕。格兰特

---

• 布思还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打死了,这同一个世纪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样,这引起了大量的推测,究竟谁是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北部人认为杰斐逊·戴维斯同布思同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德鲁·约翰逊由于某种原因介入了此事。一些同时代的人或稍后的作家试图将布思同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幕后策划人是陆军部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拉斐特·贝克,因为他在组织和领导那次追击中打死了布思。有一位作家则认为,布思已改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为了耶稣而刺杀林肯。大多数当代人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了这次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软弱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还有一些作家认为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不是布思,而是一位和布思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作了他的替罪羊。最近的一部书和一部电影设法把所有这些观点汇合在一起,几乎把联邦和邦联的重要人物都同林肯被刺的事件联系起来,因为北部一些银行家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见戴维·巴尔西杰和小查尔斯·塞里尔:《刺杀林肯的阴谋集团》,洛杉矶,1977)虽然关于暗杀事件是个众说纷纭,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似乎是没有别人指使的。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确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本人。关于林肯被刺事件的种种推测见苏埃德·刘易斯的《林肯死后的种种猜测》(纽约,1929年版)第二部分和理查德·柯伦特的《无人知道的林肯被刺之谜》(纽约,1958年版)第11章。

将军在4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1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林肯恰恰在取缔蓄奴制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这就赋予他以基督形象。这一事件使朱丽亚·沃德·豪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在林肯被刺以后的一周里，整个北部充满了悲愤情绪。悲惨的复仇的呼声不仅指向刺杀总统的凶手，而且指向了所有邦联的领袖们。人们认为他们不仅要为林肯的死负责，而且也要对在战争中丧生的360000联邦军将士的死难负责。但是这种复仇的呼声不仅与林肯现在可以与之相比的基督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不符合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动人的结束语所体现的精神。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有恶意，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并为取得〕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sup>42</sup>

这段话中“博爱”与“坚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反映了林肯被刺后几个月中北部人对南部的态度，也恰恰反映出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作为总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这种态度去解决这种或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他在北部人多次发生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都能使他们保持战斗意志。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称之为“忧郁”），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绝望情绪，就像他领导美国战胜了民族的绝望情绪一样。林肯常常通过讲一些轶事趣闻，不仅像寓言一样把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且能在谈笑中使烦恼化为乌有，林

肯非常喜欢同他的两个小儿子嬉戏。一个是 11 岁的威利，一个是 8 岁的特德。在 1862 年，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大概是得了伤寒，特德痊愈了，而威利却于 2 月 20 日病死了。（无独有偶。这一悲剧在两年后重演。邦联总统杰斐逊的 5 岁的儿子约瑟夫·戴维斯在里士满总统官邸的阳台上摔了下去，因颅骨破裂而死亡）阿伯拉罕和玛丽·林肯几乎因威利的死而悲痛欲绝。阿伯拉罕很快便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政治上的反对和军事上的挫折，并努力去克服它们；而玛丽却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林肯任总统的四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在白宫中经历的极度痛苦，正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了那么大的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曾经面临过那么巨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爱和他的伟大使他能够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 内战的结束

在林肯遇刺以后的几周里，约翰逊总统在努力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的和感情容易冲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的同情者。这些受牵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们的法定权利全被置之不顾。

在这期间，结束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的签定引起了斯坦顿的种种猜疑。谢尔曼作为打硬仗的鼓吹者，经常希望一旦叛军被彻底打败，就签定一个条件宽大的和约。他反对武装黑人，不赞成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反对激进派的重建纲领。按照他对林肯的政策的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

定的和平条约与格兰特和李所签定的投降协定相差甚远。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部队将他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部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和谨慎的谢尔曼这一次却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他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态度。谢尔曼毫不踌躇地在4月26日按照格兰特—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如果不是斯坦顿怀疑谢尔曼的动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歪曲事实的言论，使谢尔曼处于不利地位的话，事情本来就会平息的（民主党开始为他唱赞歌）。斯坦顿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他的行为虽然是真诚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谢尔曼永远不会宽恕这位陆军部长。\*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特别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李已经投降，但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迅速地向南逃窜。戴维斯沿途每经过一站，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继续战斗。“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敌军交通线的延长“必然使我们得到胜利”。<sup>43</sup>甚至在约翰斯顿投降以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南部要变成另一个爱

---

\* 斯坦顿的动机和人品往往难倒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分析力。他的效率高，为人廉洁，勤劳努力，热情地献身于联邦事业，是一位完美的陆军部长；但同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不那么坦率，对事敏感粗暴，有时还搞小动作，而且往往不考虑别人的感情。

尔兰，游击战争要长期打下去。但大多数南部人对这些已经厌倦了，罗伯特·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动员口号更有说服力。5月4日，在密西西比以东的亚拉巴马，理查德·泰勒将军率南军残部投降。5月10日，联邦骑兵在佐治亚俘获了戴维斯和他的随从。5月26日，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准将率外密西西比军队投降。5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华盛顿的上空充满灿烂的阳光。尽管和平问题仍摆在前面，但战争的结束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 联邦复员军队

战争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成为事实：（1）没有发生血腥的复仇。邦联分子没有试图谋反。杰斐逊·戴维斯未遭审判被监禁了两年，然后被释放了。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他的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況在叛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2）军队在美国生活中并没有变成一种权势。实际上一直到1904年，每一位当选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除外）都曾在联邦军队中打过仗，并且以其战争期间的功绩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有（包括格兰特在内）成为一名“军人总统”。除格兰特以外，他们都是平民，在1861年的紧急关头毅然从戎。到1865年，他们又很快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在他们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5月23日—2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呼的观众面前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活跃地通过的时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听到了歌声，立刻，在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联邦军队进行曲的歌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以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复员并返回自己

的家园。联邦军队的复员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 641000 人退伍。海军到 1865 年底已把 530 艘战舰压缩到 117 艘。到 1866 年 11 月，只有 65000 人留在军队里，而 18 个月以前还有 100 多万人。大多数士兵似乎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而且显然没有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使这场战争的如此众多的退伍军人受到困扰。一位伊利诺伊州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忙着收割玉米。因此，9 月 29 日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脱下陆军中尉军装，换上父亲的旧衣服，向尚未收割的玉米地发起了进攻。我干这种农活的时候，我的感觉十分奇妙。有时候似乎感觉我只离开家一两天，现在又接着干我走时撂下的活儿。”<sup>44</sup>

## 战争的痕迹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对这位伊利诺伊的退伍军人，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过去的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再现了。战争给整个民族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一位曾在战争中三次负伤，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步兵上尉奥利弗·温代尔·赫尔姆斯在 1844 年说过：“战争的经历使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与其他人产生了一道鸿沟。由于我们的好运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与战火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生活是深奥的，热烈的。”<sup>45</sup> 南北战争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团队史、大众文学和学术著作，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多，也许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多。南北战争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在成千上万的乡镇的广场上矗立的南北战争纪念碑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其他著名事件的纪念碑。在几代人中，南部人用“战前”、“战后”记载他们的历史——但从没有人曾提出这指的是哪一场战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旧邦联的国旗和军歌《迪克西之歌》成为南部

人反对民权运动的一种象征的时候，而《合众国的战歌》却成为民权运动的一支激励人心的战歌。

南北战争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是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总共有大约 620000 名士兵在内战期间丧生（其中包括 360000 联邦军和 260000 邦联军），几乎与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所有其它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680000 人相等。在美国，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哀悼在战争中丧生的亲戚或朋友。直到进入 20 世纪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的城市或乡镇仍能经常见到残肢断臂的内战伤兵。退伍军人组织——合众国退伍军人协会和邦联军退伍军人联合会，使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成为各自所在地区的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时间，英雄主义的神话和浪漫故事掩盖了战争的严酷现实。但是这些神话本身，特别是在南部，很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人们通过这面镜子观察他们的世界，它提供了主宰他们生活的一个远景。

南北战争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联邦作为各个主权州的自愿同盟的概念已被永远地埋葬了。“联邦”这个词的概念已逐渐被“国家”的概念所代替。“合众国”与其说是一个复数名词不如说是单数名词。战争以牺牲各州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1861 年以前，在联邦的办事机构中只有邮政部门直接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公民们向地方或州政府交纳税金，并在州法院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纠纷。说到钱，他们使用经由州立法机关授权的银行发行的钞票。1861 年战争开始时，总统首先动员全国的民兵。由州长负责征兵、装备并亲自率领志愿军的团队。但是战争的重压改变了这一切。到 1863 年，如果各州不能凑足征兵名额的话，陆军部便直接确定各州的征兵名额并将这些州的男子直接征入军队。总统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在那些拘留权取代州法院权力的州里驻扎军队。联邦政府规定大量征收直接税，并成立



了国内税务局去征收赋税。它发行纸币,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并用征税的方法把州的钞票征得绝迹。政府没收南部人的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并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解放奴隶管理局以废除各州管理自由奴隶的州法。最初的第 11 条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而第 13 条宪法修正案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六个修正案根据这个先例限制了州权,并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战争给南部带来的影响最大。解放奴隶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70 年以后,一些曾经当过奴隶的年老的黑人在会见联邦作家事业局时,生动而具体地追述了他们获悉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其中一位说:“在那一天之前或以后,谁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黑人们拍着手又喊又唱,孩子们敲着罐头瓶,叫喊着到处跑来跑去。人人欣喜若狂,他们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解放。”这种变化势不可挡,因而当时人们用《启示录》中的语言和革命来描述这种变革。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相信:这便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国家将在一日内诞生”。<sup>46</sup> 孟菲斯一家报纸在 1865 年惊呼道:“这五年所发生的事件使整个美国南部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位占领威尔明顿的黑人团的随军牧师这样描述那些盯着这些黑人士兵的不知所措的白人:“他们现在要么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要么就是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一位黑人士兵从他看守的一群邦联战俘中认出了他从前的主人,他走上前大声同他打招呼:“喂,主子,这回咱们可是上下翻了个。”<sup>47</sup>

在 1865 年,整个世界似乎确实翻了个,但是能否长久保持下去,这就要看重建工作的进展如何了。

第三编

南部重建



## 第二十六章 和平问题

### 战争后果

1865年的南部呈现出一派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凄惨景象。种植园焦土一片；田间野草丛生；铁路线没有铁轨，没有桥梁，甚或没有任何车辆；这些都说明了进行征服的联邦军队曾来过这里。邦联政权的垮台使广大地区没有法律和秩序。成股的游击队和逃兵到处游荡，抢掠毫无防卫的居民。数以千计的黑人自由民和白人逃亡者饱受疾病、曝晒及栉风沐雨、饥饿等的折磨。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场战争是多么可怕：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附近，被谢尔曼的士兵杀死的65匹骡马堆了六个星期都没埋掉，因为这支部队把铁锹及其它工具都带走了。

北军作为破坏者，横扫南部之后，又作为重建者留在那里。占领部队、自由民管理局和北部的一些救济机构来到南部，以填补因浩劫和混乱而造成的真空。20万占领军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北军对前邦联各州实行军事管制。军事法庭惩处罪犯，而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则处理以前的奴隶与他们以前的主人的关系问题。军队医院医治了几千名南部黑人和白人居民。在1865年夏季，自由民管理局每天发放15万份口粮（三分之一发给白人逃亡者），而军队供养的南部居民至少也超过这个数。甚至在战争危机缓和之后，自由民管理局仍继续提供食品和救济品；从1865年到1870年，自由民管理局提供了近2200万份口粮。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政府机构都为南部的恢复作出贡献。财政部曾派出特派员去南部，将邦联战后剩下的棉花统统没收。无

论这些特派员在离开华盛顿前有多么诚实守法，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诱惑了。一捆棉花售价 200 美元左右，所以棉花仍能像战前那样具有诱人堕落的魅力。一些财政部官员和军队军官将私人的棉花没收，盖上美国南部邦联印章，出售后把钱归在自己名下；或是向那些没有行贿的棉花主索取贿赂。南部仅存的这种动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侵吞了。1865 年，国会每磅棉花征税 2.5 美分，1866 年提高到 3 美分。虽然征收此税的目的与向北部一些产品征收的类似赋税一样，是为了弥补这场战争的损失，但是征收这种赋税好像是对南部进行报复。它也妨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复苏。最后，国会在 1868 年取消了这项棉花税。

### 南部白人的态度

军队军官、政府官员和在阿波马托克斯签署投降书之后，涌向南部的\*\*大批记者寄往北部的有关南部情绪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既有对北军继续抵抗和对自由民施加暴力的描述，同时又有归顺的报道。

南部人是骄傲的人民，他们把一切都押了赌注，但一切都输光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仇恨是很自然的反应。一位年轻的种植园主在战争后期写道：“我对这个可恶的北方佬国家怀有的深仇大恨与日俱增，与时俱增，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毁灭了我们整个人民的幸福，使我们整个大地充满悲哀。……我发誓：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他们痛恨北方佬，而且藐视他们。”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位客栈老板在 1865 年对一位北方记者说，北方佬杀死了他几个当兵的儿子，烧了他的房子，偷走了他的奴隶。“他们只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特权——仇恨他们。从早晨四点半起床直到夜里十二点上床，都在恨他们。”<sup>1</sup>

这种态度在邦联士兵中不像在非参战者、特别是妇女中那样

流行，观察家们同意这种看法。邦联士兵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抗，至少暂时是这样。· 越过防线同北军友好交往的经历使邦联士兵不会因叛国罪而受到宽大的投降条款的惩罚，也对邦联老兵甘心于失败起了作用。但是非参战者却要忍受战争带来的焦虑与苦恼，而且根本无法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们中许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毁掉他们的财产。战争结束后，凝聚在他们心中的悲痛发展成仇恨，并常常发展成暴力行动。这些失败了的南部人不敢攻击使他蒙受耻辱的真正代表——北军士兵，因此，获得自由的奴隶和南部白人联邦主义者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牺牲品。1865年7月发生了一个事件，南部白人妇女用这件事来发泄闷在心中的怒气，一位北部记者报道如下：

一两天以前，在这个城市〔萨凡纳〕一家旅馆里就餐的一位联邦官员，出于礼貌，将一盘酸菜递给一位南部妇女，但回报他的却是一副不可言状的轻视与愤怒的表情。这位妇女说，“你以为南部妇女会接受一只还滴着她的同胞鲜血的手递来的酸菜吗？”<sup>2</sup>

然而，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南方人在愤怒之前先是震惊，再是绝望，尔后是冷漠；愤怒是精神恢复的表现。“我们向北方佬投降了！”一位听到李投降后大为震惊的妇女写道，“这怎么可能？……我们难道不是受尽了苦吗——我们英勇的战士难道不是为此殊死战斗过、并光荣牺牲吗？”1865年7月，一位佐治亚州种植园主的女儿展望未来，看到的只有“悲观的前景，很可能要蒙受耻辱、困苦与贫穷；只有天晓得我们每个人将在哪儿结束这种被剥夺了一切幸福和不堪忍受的生活。”<sup>3</sup> 一位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主告诉一位北方记者：“我们心灰意冷，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再起炉

---

• 然而，两三年后，邦联的退伍军人便在三K党和类似的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

灶。我这一辈子一天活也没干过，我不知如何作起。”许多年之后，亚拉巴马州一位曾经是奴隶的人这样回忆邦联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园的情景：“过去，我看到我们的战士有说有笑地出发了，他们精神抖擞，结结实实，身高体壮，唱着军歌，坚信自己会打赢。可是，当他们回来时，却一个个皮包骨，目光暗淡悲伤，衣服破烂不堪，满面病容，出发时的那种精神劲头全没有了。”<sup>4</sup>

只要南部白人总是处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中，他们就很可能接受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重建条款。一位北方记者写道：“他们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对一切都会感恩不尽……。他们不提要求，不讲条件。他们打败了，毫无办法了——只好顺从了。”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顺从几乎掩盖不住心底的仇恨。不管怎样，就连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都承认：“占领者有权提出条件，而我们必须服从。”<sup>5</sup>

## 北部白人的态度

但是，占领者希望给南部施加什么条件却达不成一致意见。在整个北部，人们的心情矛盾而易变。林肯刚被刺时，惩处卖国贼的呼声震耳欲聋。新总统似乎赞成采取严厉政策。安德鲁·约翰逊说，“卖国有罪，必须使之声名狼藉；比起卖国罪，其他一切罪行都无足轻重。……必须剥夺叛国者的一切，……不仅必须惩处他们，而且必须摧毁他们的社会力量。”<sup>6</sup>

同林肯一样，约翰逊也是一个出身卑微、靠自我奋斗成功的人。其父是北卡罗来纳州一家酒馆的跑堂，他一死，家境便十分贫寒，小安德鲁不得不给一个裁缝当学徒。这位学徒学会这门行当，便搬到田纳西州东部山区，和一位鞋匠的女儿结了婚（她教他书写），从此一步步登上了成功的阶梯。约翰逊拥有一个农场和一些

奴隶。他历任州议员、州长、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最后因历史的突发事件而成为合众国总统。约翰逊是一位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自称是人民大众的保护者，他从不失鲜明的平民式的尊严。“有朝一日，我要让这些贵族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他在田纳西创业之初就立下这样的誓言。“他们不过是一群摆阔的蠢种，比不上那些靠额头流汗去谋生的人的一半。”<sup>7</sup>

身为总统，约翰逊现在可以让这些南方贵族（他指责他们脱离联邦）看看是谁在掌管乾坤了。他研究了控告那些重要的邦联分子犯有叛国罪，并根据1862年的《没收法》没收其财产的可能性。那些曾经反对林肯重建政策的激进派共和党人感谢上帝“在叛徒中培养出一位南方的效忠者，在贵族中训练出一个南方的民主主义者，他终于被提升到总统的位置上，并可能肩负着惩处那些要暗杀联邦要人的刺客的使命”。<sup>8</sup>

不过，随着人们在林肯总统遇刺而爆发的愤怒心情平息后，那种对待叛徒的情绪也缓和下来。约翰逊不再发表指责叛国为罪大恶极的讲话了。北方举行的盛大的胜利庆祝活动和有关南方贫穷困苦，境况凄惨的报道，消除了许多北方人心中的仇恨。对手下败将高抬贵手的情绪开始出现。1865年6月，有影响的《斯普林菲尔德（麻省）共和党人报》宣称，“我们希望尽快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和睦。这个目的能靠漫骂与指责来实现吗？能靠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却还继续争论谁对谁错来实现吗？”

但是，这种情绪很难和切勿过早实施宽大而把“胜利果实”牺牲掉的信念并存。宽宏大量必须以正义为尺度。胜利果实指的是什么呢？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它们最低限度包括：绝不可分裂，保障解放了的奴隶的自由和公民权，保障南部联邦主义者的安全和政治权利，以及至少暂时取消前邦联主义者要员的政治资格。

北方对重建问题的态度的选择幅度颇广。在选择幅度的一端



是民主党提议的自我重建。这样一项政策将允许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宣布效忠于联邦，允许它们监督新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然后继续行使权力，仿佛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自我重建的主张根本无法满足共和党的最低要求。它会使前邦联分子仍旧执掌大权，将联邦人士拒诸门外，损害自由民的各种权利，或许还会危及自由民的自由本身——因为这些恢复起来的州议会可能会决定不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它归诸失败。

在选择幅度的另一端是视重建为革命。激进分子希望用褫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来瓦解南部统治阶级的势力。他们希望把公民权给予自由民，并将没收来的土地授予他们。他们希望依照共和党的概念，把南方改造成像北方那样使用自由民劳动力。共和党人中最激进的人士之一，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乔治·朱利安描述了他的新南方观点：“巨大的庄园、广为分散的村落、荒废的农业、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社会公德的破坏、制造业的衰败、对诚实劳动的蔑视以及对寡头政治的纵容”，等等，将不复存在，共和党人将用“小农场、繁茂的耕地、免费学校、独立社区、兴旺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对诚实劳动的尊重和均等的政治权力”等取而代之。<sup>9</sup>

在这两个极端观点之间，还有一些程度不一的中间选择，有的要给予自由民以部分公民权，有的则要全部给予，有的主张暂时剥夺各类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有的则主张长期剥夺，还有一大堆为获释奴隶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其中包括由政府贷款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土地。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后的两年里，温和的共和党人一直在为制定一项中间政策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却转向民主党的立场，并同使他当上总统的那个党决裂。<sup>\*</sup>

---

\* 人们可以回想起，1864年共和党人提名来自一个占领后的邦联州民主党主战派人士约翰逊为副总统，目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之外扩大吸引力和适应“联邦党”的新名称。

## 1865年总统的重建

虽然约翰逊最初似乎同激进派意见一致，认为有惩处叛乱者之必要，但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的根本信念却与共和党人的信念相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杰克逊主义者（他的中间的名字为杰克逊），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同名入一样不信任银行、公司、债券持有者和新英格兰。他反对辉格党和共和党利用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他的对手名单上既包括种植园贵族，也包括正在东北部崛起的“自负而腐败的”工商业经济的贵族。

总统对共和党人关于自由民的社会地位的观点也怀有敌意。尽管在1864年他曾对田纳西的黑人说过，他愿意当他们的“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奴隶枷锁，但是对反奴思想的自由主张他却从不支持。他本人就拥有奴隶，而且他信奉白人优越论中的统治民族信念。战时，一位田纳西同乡评论说，政府正在把这场战争转变成解放奴隶的运动，约翰逊听了大声叫道：“该死的黑鬼！我是在和这些叛国的贵族们、和他们的主人打仗。”1866年，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首的黑人代表团来到白宫，极力主张把给予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总统对他们的论点避而不答。事后他对秘书说：“这些狗崽子们以为我上当了！我知道那个该死的道格拉斯，他和所有的黑鬼一样，想抹白人的脖子。”<sup>10</sup>

约翰逊和共和党人的这些分歧是逐渐被后者看出来的。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建进程上。总统决定在1865年3月至12月这段长期休会期间不召集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和林肯一样，约翰逊认为重建（他认为最好叫“恢复”）主要是一项执法职能。他也相信林肯关于各州不能破坏的理论。约翰逊说，这场叛乱只是一次个人的叛乱，而不是州的叛乱，虽然这些个人有可能受罚，但是这些

叛乱的州仍保有其全部宪法权利。

1865年5月29日，总统发布了两个重要文告。第一个文告宣布，除了奴隶，对所有宣誓效忠的人都实行大赦并归还财产，只有少数几类人除外。这几类人包括邦联文职人员和外交官；陆军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海军上尉军衔以上的军官；所有辞去议员、联邦法官或军官之职而参加叛乱者；南部邦联各州州长；虐待战俘者或因其它军事罪行而被捕者；所有估价超过2万美元以上的纳税财产的拥有者。不在赦免名单中的最后一类人在1863年12月8日的林肯大赦文告中没被提及；这是约翰逊的方式，目的是要屈辱一下那些炫耀财富的贵族们。约翰逊的文告给那些不在赦免之列的人一个机会，要他们个人提出申请，以求宽恕。

约翰逊的第二个文告为北卡罗来纳任命了一位临时州长，并指示他召集一次选举，选出代表制订一部新的州宪法。只有宣誓效忠并得到大赦的白人才能参加这次选举。在其后几周里，约翰逊向其它六个南方州发布了类似的文告。他对由林肯发起的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州政府也予以承认。他还指定在战时忠于联邦的、在联邦军队控制下的弗吉尼亚州的那一地区行使权力的战时政府，为该州的法定政府。

约翰逊任命的那些临时州长在1861年是反对脱离联邦的，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选择同自己的州保持一致。约翰逊总统希望这些州长能在南方创建一个由联邦主义者和不太偏激的邦联分子组成的新党。在1865年当选为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人的确在1861年是有条件的或彻底的联邦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的政策似乎正在起着预期的作用。各州制宪会议召开时，总统将这些会议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和总统的州权不可损害的理论相矛盾）规定得很清楚：废除奴隶制，脱离联邦为无效，政府拒付邦联欠下的所有债务（其理由是脱离联邦为非法，

故为此欠下的债务是无效的)。

### 共和党对总统所提重建的反应

大多数共和党人最初支持约翰逊的行动。但是许多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当时就批评了总统的政策。他们担心，把选举权仅仅局限给白人，会导致使自由民受到压迫并使旧的权力结构得到恢复。查尔斯·萨姆纳认为总统发表这样的文告是“发疯了”。他私下写道，“在我看来，自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对国家事业的危害有如此之大。”激进派注意到，由于废除了奴隶制，就要废除五比三的妥协方案，而且按代表原则要将全部黑人人口计算在内，这样就自动多给了南部 10 多个国会议员议席。因此，约翰逊的政策就会增强南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力量，而使叛乱受到奖赏——除非给黑人选举权以抵消叛乱分子的选票。“难道就无法阻止总统的这种疯狂的作法吗？”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 1865 年 7 月哀叹道。<sup>11</sup>

多数共和党人当时还没有听取史蒂文斯和萨姆纳的警告。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能认为，黑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重建，但他们还并不准备谴责总统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这一政策仅是一个开端，一次“尝试”，在以后阶段会被充实或修改，从而含有给黑人选举权的内容。约翰逊会认识到，在他要求南方诸州废除奴隶制并拒付邦联债务的同时，要求它们至少给黑人以有限的选举权是明智之举。“不忠诚的白人得到抬举之时，忠诚的黑人一定不能遭到冷遇，”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写道。“但是我真想看看约翰逊先生的尝试会产生什么结果”，另一位温和主义者说，如果南部诸州不情愿给黑人以选举权，那么总统“届时将拥有采取更严厉的政策自由”。<sup>12</sup>

为了引起北部舆论的注意并向约翰逊施加压力，激进分子组

成一个“平等普选权协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小册子和社论。约翰逊对这种压力确有反应，但反应的方式却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8月15日，他打电报给密西西比州临时州长威廉·夏基（他是第一个主持召开州制宪会议以商议实施约翰逊计划的临时州长），向他建议，如果新宪法授予有文化的黑人和拥有250美元财产者以选举权的话，“你就会完全解除反对派的武装，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你这样做绝对保险，而且……其结果是，那些热衷于给黑人选举权的激进分子将会被彻底挫败。”<sup>13</sup>

这份电文暴露了约翰逊的本意。它说明，在约翰逊眼里，激进派将是象征性的措施“挫败”的“对手”。在这些标准之下，南部黑人成年男子中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几乎不到九分之一。如此少的黑人选民不会很快对白人霸权构成威胁。约翰逊认为，这些黑人获得选举权一事，可能会使温和的共和党人相信南部的善意。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它可能还会使南部处于较北部有利的地位，因北部允许黑人在平等条件下参加选举的州只有六个。人们可以把约翰逊与夏基的通信同一年前林肯在路易斯安那州重建时写给该州州长的信作一下比较。两位总统都力图采用非强制性的说服战术，但是林肯没有提及对手，而且他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的建议将使潜在的黑人选民数量增加近一倍。约翰逊把士兵排除在外，因为他知道，这些士兵是使南部失败的最令人耻辱的标志，也是对白人特权的最富有挑衅性的威胁。

无论如何，南部白人一如对林肯的建议那样，对约翰逊的建议也不怎么在意。没有一个州的制宪会议在新宪法中列入给黑人以选举权的条款。对此，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的解释是：因为“这是一个白人政府，而且只为白人利益而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已（在德雷德·斯科特诉讼案中）作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决定”。<sup>14</sup>在给黑人选举权上，约翰逊没有作更多的姿态。他说，选

举资格是各州的事，对此进行干预超越了宪法授与他的权力。可是激进派批评家指出，宪法也规定了总统无权任命临时州长，或要求各州取消奴隶制及拒付债款。他之所以采取了这些超越宪法的措施，是因为宪法并没有为内战后恢复各州这项事先未知的工作的进程作出规定。因此，和其它行动相比，要求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并不更违反宪法。但约翰逊拒不让步，共和党人对选举权问题上获胜的前景越来越不抱希望。

### 北部的黑人选举权问题

1865年秋季，北部三州公民投票的结果使共和党人更加失望了。康涅狄格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议会把是否给予这三个州为数不多的黑人以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付诸这次公民投票。人人都知道，对这些修正案的公民投票，在某种程度上是北部关于黑人选举权态度的晴雨表。民主党人采取利用种族偏见的惯用手段，发起了一场反对给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共和党领袖们则尽力争取使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但在这三个州全都遭到失败。在每一个州，只要有5%的选票改变主意就会使选举结果发生逆转。<sup>\*</sup>绝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对这些修正案投了赞成票。这可以解释为共和党人授权给黑人以选举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修正

• 关于黑人选举权的公民投票为：

康涅狄格州(1865年10月2日)

赞成:27217(45%)

反对:33489(55%)

明尼苏达州(1865年11月7日)

赞成:12170(45%)

反对:14840(55%)

威斯康星州(1865年11月7日)

赞成:46588(46%)

反对:55591(54%)

假定每州的民主党人全部或近乎全部投了反对票，那么，以1864年的总统选举为基线，可以得出各州选民中共和党人的比例，从而可以计算出各州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的百分比。因此投票赞成黑人选举权修正案的共和党人大致如下，康涅狄格州为85%，威斯康星州为80%，明尼苏达州为75%。

案的失败看成是多数北部选民授权反对给黑人以选举权。当时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就不愿迫使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摊牌了。就连激进分子也承认，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的事业受到了挫折。一位激进分子承认，康涅狄格州的投票结果“使我们感到羞耻”，“它危害了——至少推迟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叛乱诸州的最终解决”。<sup>15</sup>

### 南部再度启衅

与此同时，南部出现种种令人警惕的迹象，开始使即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确信，约翰逊的方案不成功。来自北方的报告表明，对自由民和联邦派人士的袭击正在增多。前邦联分子以往的那种挑衅而傲慢的“分离主义”态度似乎已经取代了前不久的俯首贴耳。1865年9月，亚拉巴马州一位主要的政治家对共和党要南部保证效忠和行为检点的坚决主张加以嘲笑。“要保证的是你们，傲慢而得意的激进派，你们应该保证不再……否认任何一部分人的权利。”两个月之后，前邦联的一位战争英雄，南部战前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之一韦德·汉普顿说：“我们的责任是，只要美国总统表明，他倾向于恢复我们作为主权州的一切权力，我们就支持他。”<sup>16</sup> 这话听起来就像又回到了1860年。难怪有些共和党人开始怀疑南部是否从这场战争中汲取了教训。

南部发生的政治事件加重了共和党的忧虑。路易斯安那州的前邦联分子重建了民主党，把州长（在1864年按林肯的政策被选为代理州长）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位州长着手用前邦联支持者取代被任命的联邦官员。现在已同共和党结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主义者不安地向华盛顿发出申诉，其中一人报告说，“州政府现在对联邦人士的仇恨，要比1860年和1861年更甚。在这个州，我们联邦人士若是没有联邦军队的保护，就会遭到迫害，被赶出这个

地方。”<sup>17</sup>

1865年秋，南部其它几个州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为约翰逊器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写信给总统说：“我遗憾地报告，在本州依然有很强烈的叛乱情绪。去年5月和7月，这些叛乱者甚至连警察局都不敢去；但是宽大使他们的胆子大起来了。”<sup>18</sup> 在秋天该州召开的制宪会议上，代表们花了很多时间对约翰逊要求的细节进行诡辩。有几个州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撤销分离主义的法令，因此并未丧失原则；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放弃其南部邦联的债款；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未能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佐治亚州保留对解放奴隶索取补偿的权利。

在北方，或者说，约翰逊对这些行为是不满的。但总统除了徒劳地请求南方人小心从事之外似乎就别无它法了。更糟糕的事接踵而来。在按照各州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批选举中，选民至少将九名邦联议员选入了美国国会，还有七名邦联州政府官员，四名将军，四名上校，以及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前著名叛乱分子为数更多。令共和党人忧虑和气愤的是，这些在战时无力攻占华盛顿的叛乱者在和平时期却要占领华盛顿了。

### 约翰逊和南部

虽然约翰逊也为这些事态的发展而烦恼，但应对此情况负主要责任。临时州长夏基在8月份采取措施，重新组建了密西西比州民兵，以邦联老兵为其骨干。此举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制止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和袭击，但其真正的理由似乎是想重申诸州的权利，并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减缩多数为黑人的占领部队的人数。占领军司令亨利·斯洛克姆将军下令禁止这种民兵组织。夏基立刻向华盛顿连续发出急电，坚持必须建立这一州警察部队。本



来并不赞同夏基的总统却逆来顺受地让步了。他批准了密西西比州民兵的成立，并发了一封电报斥责斯洛克姆和卡尔·舒尔兹将军；舒尔兹正在密西西比州视察，他支持斯洛克姆。“必须信任〔南部〕人民及其政府，”总统训令这两位将军，“如果他们得到了信任，我认为他们会循规蹈矩，并会恢复同……联邦以往的宪法关系。”一位总统屈服于一位临时州长——并且还羞辱两位在葛底斯堡和其它地方英勇战斗过的重要将领——的奇怪现象使南部人大为高兴，而共和党人则怒不可遏。一位南部朋友对总统说：“您对〔夏基〕建立民兵要求的认可使整个南部兴高彩烈。从那时至今，我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约翰逊总统两句好话的。”而一家共和党报纸却警告说，“如果密西西比州的叛乱者就这样被武装起来的话，那他们在每一个州都将会这样得到武装。……这样的种子除了孕育出另一场叛乱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sup>19</sup>

约翰逊对这件事的处理只是他发出的许多信号中的一个信号，这些信号使民主党人觉得总统是他们自己的人。过去指责总统是叛徒和下流政客南部民主党人现在却令人作呕地称赞他“有勇气，在北部激进分子和淌着血的南方失败者之间充当防波堤”。北部的民主党人也对约翰逊作了类似的吹捧。恢复与南部民主党人战前的联盟是他们谋取权力的唯一希望。约翰逊的政策给恢复这种联盟开了绿灯。民主党的报纸开始发出暗示，说约翰逊能够获得该党1868年的总统提名。1865年，北部各州召开的民主党大会都通过了“真诚赞成”总统事业的决议。一位老牌的杰克逊主义者向约翰逊建议：“北部民主党人指望南部支持他们重新掌权。如果你对南部亲近的行动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你就能领导民主党，并能得到西北部和南部团结一致的支持。”<sup>20</sup>

这是令人兴奋的前景。约翰逊毕竟是民主党人，尽管共和党把他选上了台。约翰逊确实希望组建一个由北部民主党人、保守的

共和党人以及南部联邦主义者结成的新的政治联盟。有两个极端派将被置于这个联盟之外：一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一是“叛国者”，但是该计划的南部部分出了差错。富有的贵族们和叛国者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在约翰逊的明显庇护下，正在将真正的联邦分子挤到一边。1865年9月11日，南部九个州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会见总统，对其“维护南部在联邦内的权益的意愿”表示“衷心敬仰”。约翰逊在答辞中大谈特谈他对南部人民的“热爱、尊重和信赖”，以及他打算“容忍和宽恕”他们过去的罪愆。<sup>21</sup>

是什么使在4月份还大谈要严惩叛国罪的约翰逊竟在9月份转变成大谈宽恕的约翰逊呢？原因之一乃是总统是南方人。他同大多数南方人一样不喜欢那些激进的北方佬的性格。此外，他从1865年夏季到秋季的经历中得到启示，相信南部白人，包括前邦联分子，是他真正的朋友。他们赞扬他的政策，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激进的共和党人却公开批评他，温和派在私下交谈中也表示焦虑。

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总统给予那些不在大赦之列的人以总统的特赦。白宫每天都有前来请求特赦的人，或是他们泪流满面的女眷，或是“特赦代理人”，而且拥挤不堪。总统曾立下誓言，要傲慢的南部统治阶级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因而，当这个阶级的人们卑躬屈膝地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并保证以后规规矩矩时，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约翰逊对一群南方人说，他们表示出的忠心“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真是难以言状”；“我回想起我所受到的奚落、嘲讽和白眼”，总统接着说。他高兴地“活着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实现了，也看到了他曾徒劳无功地企图从分离主义的结果中挽救犯了致命错误的人。”<sup>22</sup>

在这种心情下，约翰逊随心所欲地给予特赦——在1865年9月，平均每天特赦100人。在15000名请求者中，他一共特赦了

13500人。这些口袋里装着赦免状的前邦联分子在试图重新夺回其在各州的政权时似乎没有再遇到什么进一步的阻碍了。但是，这一点就连保守的共和党人也不能容忍。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他们能够在进一步考虑整个重建问题期间，行使权力把南部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排除出去。<sup>\*</sup> 由于证实了南部重新要把自由民限制在假自由的半阴暗处境中，共和党人这样做的决心更坚定了。

## 战后南部的土地和劳力

有关自由的消息通过多种途径传到奴隶们的耳中。由于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直到1865年12月才最后批准下来，所以在此之前对奴隶到底有怎样的法律地位人们还搞不清楚。但是早在1865年春季，联邦部队的军官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就宣布在被占领的南部废除奴隶制，并警告说，自宣布之日起，拒付其黑人劳力工资的种植园主将被没收财产。奴隶主们有的彬彬有礼，有的粗暴蛮横，他们把奴隶们召集在一起，宣布说他们自由了。北军军官和临近种植园的自由民把奴隶解放的消息带到奴隶主还没有宣布废奴的地方。到1865年秋天，废奴运动以种种方式深入到南部各个遥远的角落。

许多自由民在成为雇佣劳动者后仍留在他们以前当奴隶时干活的种植园里做工。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离开老地方是获得自

---

<sup>\*</sup> 宪法第一条第五款规定，国会两院“应各自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和议员资格。”因此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可以使用这一权力将南部议员排挤出去，直到他们符合国会规定的资格。当代人有时使用“重入联邦”、有时使用“恢复州权”、有时使用“重建”来称呼这一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前邦联诸州能恢复和其它州相平等的地位。一俟“恢复了州权”，这些州在议会就有代表，它们的选票在总统选举时就可以计算在内，就可以不受联邦军队和联邦法庭的非常干涉；行使州政权的正常职能。

由的关键。在奴隶制时代，奴隶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种植园逃走，战后他们仍保持这种冲动的办法。一位黑人牧师对他的会众说，“你们当中谁也不会真正感到自由，除非你们踩掉脚上沾着的旧种植园的尘土，并走到看不见这所大房子的新的地方。”<sup>23</sup>

已获得自由的人们，也为了寻找当奴隶时失散的亲属、或在别处找工资较高的工作、或到军营或自由民管理局寻找保护和口粮而离开种植园。自由民管理局通常设在城市和较大的市镇上，战后最初几个月内，黑人多是从乡村迁往城市。南部白人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黑人会导致出现卫生、福利和犯罪等重大问题。正值南方亟待种庄稼和修复战争带来的破坏之际，这种逃离种植园的行为也造成了劳力的短缺。占领部队也和南部白人一样关注恢复工作和劳力稳定。占领军敦促——有时也强迫——失业黑人签定农场劳动的合同。北部和南部报纸都指责自由民管理局正在前奴隶中培养一种福利观念。该局一些官员对此很敏感，便切断给有劳动能力的黑人的口粮供应，以迫使他们工作。市政官员为了同一目的也实施了流浪法。到1865年秋，许多四处漂泊的自由民已返回原来的种植园，或到同一个县的其它种植园。但是流动性仍然是自由的重要标志；待到来年再签约时，不少黑人仍离开旧雇主，到别处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 关于给无地者以土地的争论

若有可能，黑人当然愿意为自己干活而不愿为白人干活。许多自由民相信，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获得真正自由。一个黑人问道，“如果连葬身之地都没有，自由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整天当奴隶呢。”一位黑人退伍军人说：“每一个有肤色的人在他能种出自己的棉花并在棉花包上打上‘这是我的’标记之前，都还是奴隶或感到自己还是奴隶。”<sup>24</sup> 1865年，那些想办法攒了一点儿钱的自由民

都想买块土地。复员的黑人士兵用他们的入伍补贴金购买土地，有时倾其所有买下整座住有几户黑人的种植园。但是对大多数昔日的奴隶来说，购买土地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谁都没有钱，即便有钱，白人也因担心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担心鼓励独立思想而拒不把土地卖给他们，甚至连租也不租给他们。

如果无力购买土地，许多自由民在 1865 年就盼望政府分给或租给他们土地。这个希望——“40 英亩土地一头骡”——绝非蠢人的幻想。到 1865 年 6 月，自由民管理局已把近 10000 户人家安置在近 5000 万英亩的种植园土地上。这些土地位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靠海的河流沿岸，是那些逃避联邦军队的种植园主遗弃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在其著名的“第十五号命令”中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自由民。在南方其他地方，自由民管理局掌握了近百万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租给了自由民。该局还向一些自由民提供了工具和耕畜，用其粮食收入偿付。

倘若这些 40 英亩地一头骡的例子还不足以使自由民受到鼓舞，许多自由民局官员和联邦士兵——特别是黑人士兵——就散布谣言说，政府打算把黑人前主人的土地分给他们。那些赞成没收和重新分配种植园的有权势的北方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些报告。9 月 6 日，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一次讲演中，强烈要求没收那些富有的前邦联主义者的土地。史蒂文斯建议给每个成年自由民 40 英亩的土地，其余的出售以作为战争抚恤金，并偿还战争借款。“剥夺这些高傲的贵族的房地产，”史蒂文斯后来在一次国会演讲时说道，“让他们从事劳动，教育他们的子女进工场或去扶犁，这样你就会使那些高傲的叛国者丢脸。”<sup>25</sup>

因此，自由民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指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获得土地。但是，约翰逊总统的大赦令和国会未能通过行之有效的立法使他们的希望大多落空。总统的大赦和特赦包括归还财产。到

1865年仲夏,得到赦免的种植园主返回家园,要求发还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或是由自由民耕种的土地。自由民管理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将军在没有接到总统的直接命令让他这样做时,拒不理睬这些种植园主的要求。霍华德认为,大赦公告不适用于那些被遗弃或被没收的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已经依法分给“难民和自由民〔使用〕了。”<sup>26</sup> 总统看到霍华德这样随便解释自己的政策很生气,便于8月16日命令他归还所有得到特赦的邦联分子的财产。但是霍华德和几位副局长继续敷衍拖延。他们希望在12月国会召开之前尽量多地保留些土地,因为那时新的立法也许承认自由民占有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的至少一部分土地。

与此同时,得到特赦的种植园主受到谢尔曼第十五号命令的影响,也大吵大闹地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负责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管理局副局长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是马萨诸塞人,也是废奴主义的同情者。萨克斯顿以谢尔曼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为理由,拒绝放弃由自由民占有的种植园。但是安德鲁·约翰逊批驳了这种论点,并指示把财产归还原主。在霍华德的支持和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默认下,萨克斯顿顶住不办,以便使国会确认自由民对这些种植园的所有权。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为此目的在1865年12月提出一项法案,但未在专门委员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约翰逊对自由民管理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撤换了萨克斯顿,强行归还这些土地。一些自由民拒不交出自己的农场,直到在士兵的刺刀尖下才被迫交出。黑人们对这种背弃诺言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没有国会立法的情况下,他们和自由民管理局都没什么办法。

1866年2月,国会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使自由民管理局得以存在下去,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自由民对谢尔曼下令征收的土地有三年占有权。但是约翰逊否决了这项法案,国会因总统的否

决而没有通过这项法案。1866年7月，共和党人终于设法越过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自由民管理局修正案，不过该法令不包含承认谢尔曼所分土地的条款。相反，它却为被剥夺了这些地产的自由民提供了一个购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岛屿上政府所有的土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的机会。这样，多达两千户被剥夺了土地的自由民拥有了土地。不过，这一成就对人们在1865年所寄予的厚望来说，是一悲惨的结局。到1866年年底，几乎所有曾由自由民局控制的可耕地都归还给了其前邦联分子的主人。

为了将自由民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国会又作了一次努力：于1866年6月21日通过了“南部宅地法”。这个法令规定：在南部五个州（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内拨出4400万英亩公地，在其上居住并耕种满五年者可得到80英亩的土地。为了使自由民和支持联邦的白人首先得到土地，该法令规定，凡支持过邦联的人不得在1867年1月前提出申请。“南部宅地法”的指导思想是慷慨的，但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这些州剩下的公地大都很贫瘠。没有几个自由民有本钱到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定居，购买种子、工具、家畜和建筑材料，也没有本钱支撑到第一茬庄稼成熟。霍华德将军命令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向移民提供前往定居地的运输费用，但是许多官员执行起来却漫不经心、拖拖拉拉。至少有几千名自由民提出了宅地申请，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一千人符合各种条件而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

土地改革没有成为重建的一个内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提出的没收法案在国会如泥牛入海。尽管废奴主义者发出警告说“只给〔奴隶〕自由，不给土地，就等于只给他们那种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民所拥有的愚弄人的自由”，但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没收土地过于激进。最大的障碍是宪法禁止通过使罪犯在被剥夺财产后无法生活的剥夺财产法案。温和派希望使南部白人对恢复后的

联邦衷心拥护，而夺取他们的土地就别指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许多共和党人对没收财产的道德标准、合法性和适宜性表示怀疑。《纽约论坛报》论述说：“那些希望得到农场的人得为农场干活，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阶级取走了他人的财物，因为那是他人需要的，于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都进了辛辛监狱\*。”<sup>27</sup>

自由劳动思想认为，要通过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其他新教徒式的伦理道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许多北方人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自由民应该用劳动和汗水购买土地，而不该乞求政府对他们特别照顾。但是，要求进行没收的激进派强调说，自由民为奴时劳苦了一辈子，已经“挣得了”土地。无论这种论点多么有理，它在19世纪60年代却无法占上风。大多数自由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本来希望得到的经济独立。相反，他们不得不为白人地主干活，而这些人往往就是他们过去的主人。

### “劳工问题”和自由民管理局

这些从前的奴隶主中，有些人仍然视他们的工人为奴隶，只是叫法不同。“他们认为黑人是白人生来就拥有的财产”，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在1865年9月写道，“总统的宣言打破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广大黑人总是归属于广大白人的。”奴隶制是一种强制制度，“四分之三的〔白〕人认为对黑人不强迫，他们就不干活”，一位北方记者写道。“白人对黑人的自由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这一点似乎根本无法理解。”<sup>28</sup>

这本不足为奇。把奴隶制赞美了几十年的信念是很难在几个月内去掉的。一些种植园主在重新组织劳力时总想尽可能回到奴

---

\* 辛辛监狱在纽约州的奥西宁。——译注



隶制上去——甚至发展到雇佣监工的地步。这些监工用鞭子惩罚反抗的工人。当自由民拒绝在这种条件下干活，或是离开种植园到别处寻找条件更好的工作时，种植园主们就抱怨劳力短缺，并且用“我说什么来着”的口气说，这些举动证明了黑人只有在强迫之下才能干活。

自由民管理局过问了这种不安定的局面。身为自由民管理局局长的奥利弗将军把总部设在华盛顿。一些将领被任命为副局长，负责各前蓄奴州的工作，总部设在这些州的首府或是最大的城市。该局 550 名地方官员中大多数是出身北方中产阶级家庭的低级军官。其中一些人因关心自由民而在该局工作，另一些人还没有打算今后长期从事文职事业，只是在那里混日子。虽然他们大多对自由民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态度却是从激进到保守不尽相同。该局还任命了一批文职官员，其中有几位黑人。虽然由于人手太少而不能顾及南部各地，但是这些官员在占领军的支持下还是有相当的潜力去改造战后南部的劳工关系。

一旦事态表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自由民局便着手使种植园主和自由民维持一种新的关系。官员们鼓励或是要求种植园主同雇工签定书面合同，规定好工作、工资和其他雇佣条件。工资每月 8 到 15 美元，管食宿，有时还管穿衣和看病。报酬采用付现金或作物分成的方式。种植园主逐渐愿意采用后一种形式，一是因为货币较少，二是因为分成式工资只能在收获后付给，从而使雇工对种庄稼产生兴趣，并可防止他们毁约。

自由民管理局力图保护自由民不受剥削，其官员裁决了几千起争端，涉及对契约的解释、违约行为、自由民犯罪及针对自由民的犯罪等等。在南方诸州通过允许自由民在民事法庭上作证的法律之后，该局允许民事法庭在其官员的密切注视之下审理这类案件。一些官员对他们所看到的并不喜欢。一位官员写道：“当自由

民的证词被听证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无用时，在这个州的法庭上允许黑人作证就永远不会确保自由民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大多数人不想让法律得到执行，那么无论是什么法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1865年—1866年间，没有一届重建政府允许黑人进入陪审团。该局负责密西西比州的副局长对该州法庭的职能作了两个月的观察之后报告说，这些法庭对“有关自由民的判决是可耻的”。<sup>29</sup>

凭这些及类似的报告，霍华德将军敦促国会创立“合众国自由民法庭”来代替南方各州的民事法庭。修改过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于1866年在约翰逊否决的情况下被通过了，授权自由民管理局建立特别法庭，在国会宣布叛乱各州归属联邦之前作为军事法庭行使职能。<sup>\*</sup>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的“法庭”一直存在到1868年。但是州法院继续审理许多有关自由民的案子，这是因为有些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和军官受制于约翰逊对该局的一向敌视，不愿过问民事法庭。

难怪南部白人大骂自由民管理局是“祸根”，“蠢得很”，是“邪恶的机关”，韦德·汉普顿在1866年写道：“这场战争带来诸多的怪事，诸多有关共和政府的新理论和对宪法的种种解释，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件能和这场‘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改革所带来’的丑恶和腐败相比的事。”种植园主坚决主张，只要那些爱管闲事的官员不管他们，他们就能“让黑鬼干活”。一位南方人抱怨说：“自由民局似乎不懂得，在白人和黑人发生争论和不和时，白人也可能是对的。”另一位南方人接着说：“〔该局〕官员中最公正的人似乎都不能

---

\* 最高法院在“米利根单诉案”(1866年4月)中作出的决定规定，军事法庭不能在远离战区的地区审判公民。约翰逊总统认为，该决定使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失去作用。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坚决主张只有国会宣布战争结束时，战争才算结束；此时南部是战区，在那里军事法庭是可以进行审判的。

理解‘黑鬼’自由民和北方白人劳工之间的差异。”<sup>30</sup>

这些抱怨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民管理局所象征的——占领和解放黑奴——事物的不满甚于对它所做所为的不满。事实上，自由民局常常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事——让无事可做的自由民回去干活，迫使他们签定内容往往有利于雇主的合同。南方白人在公开场合咒骂自由民管理局，但私下不少人都承认，要是没有这个局，战后的劳工状况会更加混乱。1865年下半年黑人因有望很快得到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而拒绝签定来年的合同。此事在一些白人中引起了一场为时不长但很强烈的“圣诞节暴乱”恐慌。使自由民放弃重新分配土地的想法并强迫他们签定合同这个令人不快的任务落在了自由民管理局的头上。1867年，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总结了他在合同制度方面的经验：“合同在使自由民干活和使劳力可靠稳定方面是成功的，但它没有保证使自由民得到应得的报酬或补偿。”<sup>31</sup>

由于自由民局的各位分局长及官员的个人侧重和信念很不相同，所以该局各项政策实施起来也有很大差异。1865年，负责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各副局长就比负责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副局长更同情自由民。1866年，约翰逊总统免去了一些最开明的副局长，任命保守分子代替他们。〔某些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和当地白人搞在一起，不久也就听信了后者的观点。然而，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官员们在判决他们审理的争执时，多数偏袒自由民。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了8个州15个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审理的286个案例后发现，有194个案子（占68%）的判决有利于自由民。<sup>32</sup>

## 黑人法典

自由民管理局还废止了南方各州在1865年—1866年间通过

的“黑人法典”中最有压迫性的条款。在约翰逊的重建计划之下选举出来的各州议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确定黑人社会地位的立法。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是无可指责的：自由民拥有财产、订立契约、在法院起诉和辩护并合法结婚的权利。在约翰逊政府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压力下，南方诸州还允许黑人在法庭上为有黑人当事人的案子作证。但是法典拒绝黑人参加陪审团并禁止种族通婚。有的州的法典还要求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有些州的法典还规定，某些罪行对黑人的处罚要比对白人的严厉。这些条款引起废奴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但是整个北方却没有资格对这些条款加以谴责，因为大多数北部州也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禁止种族通婚，允许执法时有种族歧视，并且允许或要求在公共设施和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北部有几个州直到不久前还剥夺黑人在法庭作不利于白人的证词的权利。

不过黑人法典中涉及流浪、学徒、劳工和土地的条款遭到了共和党的谴责，说它们旨在建立新的奴隶制。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典最先通过，它们在上述方面最为苛刻。这两个法典对流浪的定义过于广泛，允许法官逮捕他们认为是失业的每一个黑人，以流浪罪课以罚款，并强迫其受雇于种植园主以支付罚款。这两个州还要求黑人在得到特别许可证后方能从事农业以外的任何职业。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租赁城市以外的土地。南卡罗来纳州规定白人雇主是“主人”而黑人雇工为“仆人”。有几个州还规定，对得不到父母足够供养（由法庭确定是否“足够”）的未满十八岁的自由民，可强制其做学徒，其以前的雇主有当师傅的优先权。有的州禁止雇主以更高工资“引诱”劳工离开自己原先的工作地点。

军队和自由民管理局阻止了“黑人法典”中有关种族歧视的条款的实施。“黑人法典”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它的实施，而在于

它给北部造成的印象。无论北方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他们都为南部企图毁掉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的赤裸裸行为而愤怒。“我们正告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芝加哥论坛报》抨击道，“在你们用这些法律玷污我们战士的安息之地、我们自由的旗帜飘扬之地之前，北方人就会把密西西比州变成蛙塘。”<sup>33</sup>“黑人法典”更加坚定了共和党议员们的决心：保持对南部的缓刑，直到他们采取措施保护自由民和胜利的果实。第三十九届国会的议员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于1865年12月聚集在华盛顿的。

## 第二十七章 “激进”式重建的起源

###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破裂

虽然在第三十九届国会里，共和党人占三比一的多数，但是其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旧日的分歧仍妨害在重建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保守派一般对安德鲁·约翰逊的政策感到满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希望通过附加的立法以保证自由民免受暴力和歧视。温和派同意激进派的一个看法，即总统的政策远未能保卫北方的胜利果实。但他们相信北方选民不会支持激进派给黑人以选举权的政策。他们也希望避免同约翰逊决裂，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决裂只会对民主党有利。

然而，在1865年12月，所有共和党人却团结一致，不让南部众议员进入国会。通过事先安排，众议院的工作人员在会议开幕时，把南部众议员的姓名从名册上删去，然后两院立刻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十五人联合委员会（九名众议员，六名参议员）来制定重建政策。共和党人并没有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对总统的挑战，因为总统在给国会的贺词中虽然声明南方诸州已做到他所提出的恢复要求，但他也承认国会有权审查自己的成员资格。约翰逊还郑重宣布，“真心诚意在于保障自由民的自由和财产，在于保障他们劳动的权利和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要求获得恰当报酬的权利。”<sup>1</sup>

这番话似乎在总统和共和党中占多数的温和派之间起到调和作用。国会成立的这个联合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反映出和解的愿望。虽然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成员之一，但控制这个委员会的是温和派。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威廉·皮特·费森登担任主席，

这使查尔斯·萨姆纳很懊恼：他原希望自己担任主席，却连委员会都没进去。该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上，部队军官、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南方联邦主义者和自由民证明：新邦联主义的仇视和暴力活动越来越猖獗。这些听证使共和党人确信：有必要制定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上附加立法来确保效忠和保护黑人。虽然北部民主党人预言，总统将反对任何这类措施，但是费森登和总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表示相信总统愿和国会合作。

与此同时，共和党温和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的莱曼·特朗布尔草拟了两项保护自由民的法案。第一项法案是延长自由民管理局的存在时间，扩大其法定权力，并授权它建立和扶助学校。特朗布尔的第二项法案明确了自由民的公民权，并授予联邦法院受理涉及这些权利之案件的司法权。特朗布尔就这项法案同约翰逊进行了多次协商，他相信他已得到总统的认可。自由民管理局法案在共和党实际上的一致支持下，很快在两院通过。但是，在1866年2月，约翰逊却对该法案行使否决权，使其共和党支持者大失所望。总统的否决咨文宣称，宪法从未考虑要建立“一个支持穷人的制度”。军事法庭在和平时期裁决民事案件是违宪的。最后，约翰逊在一份让共和党人觉得不祥的咨文中说，该法案藐视宪法，因为在其通过时，“国会中没有来自主要受其条款影响的那十一个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国会对其成员资格的审查“不能解释为在和平时期也有权剥夺宪法赋予任何一州在国会的代表权。”<sup>2</sup>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国会没有南部代表的情况下通过的任何立法都是不符合宪法的。

温和派发现这是一付要吞下去的苦药。闷闷不乐的莱曼·特朗布尔对参议院说：“我在提出这项法案时，原以为我和总统的观

点是一致的。我对总统咨文表达的对国会观点的敌视深表遗憾……。他认为，没有这项法案，自由民也会得到保护；而我认为，要是没有国家立法对自由民实行保护，他们就会遭受压制、虐待并最终重新沦为奴隶。”<sup>3</sup> 特朗布尔提出一项动议，可使这项法案绕过总统的否决得以通过。但是，原先投票赞成这项法案的五位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现在却投反对票，使这项动议仅差一点便不足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未获通过。

约翰逊知道他的否决将促使他与民主党结盟。后者召开群众大会来庆祝和批准这一否决。2月22日，庆祝者在华盛顿开完会后列队前往白宫，向约翰逊表达赞颂之情，约翰逊发表了袒护他们的讲话，这是他所发表的最精彩的讲话之一。约翰逊仿佛回到田纳西州站在树桩上演说似地，谴责激进派是不想恢复联邦的叛徒。在控告激进派准备暗杀他时，总统把激进派比作犹大而将自己喻为基督。

倘若我的血要因为我捍卫联邦、并为保持本届政府最初的纯洁和特点而流的话，那就让它流吧；为联邦筑起一座祭坛吧，尔后若有必要，缚住我，将我置于祭坛上吧，温暖并激励我有形之躯的鲜血将作为对联邦的一杯祭酒而倾洒。<sup>4</sup>

许多美国人对总统的举止感到耻辱。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喝醉了？”早就转而反对约翰逊的激进派对持温和态度的同事说：“我这样告诉过你！”参议员费森登私下承认，“总统近来的愚蠢和卑劣的表现”使他幻灭了。“他破坏了诚意，背叛了对他的信任，必使人们由对他痛恨到对他蔑视”。<sup>5</sup>

尽管约翰逊实际上已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宣战了，但大多数温和派依然希望避免同他决裂。他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修改后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和特朗布尔的民权法案上。1866年3月13日，



国会在共和党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下，通过了民权法。\* 目的在于取消“德雷德·斯科特裁决”和“黑人法典”，该法案规定黑人为合众国公民，保障他们拥有或租赁财产的权利，签定契约和履行契约的权利，以及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出庭的权利。总之，它使黑人同白人公民一样，享有一切法律和诉讼程序为自身和财产安全所提供的“充分而平等的好处”。虽然该法案规定了如果州法院实行种族歧视时乃将案子移交给联邦法院的法律程序，但是它不会引起传统的联邦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特朗布尔说道，因为“在任何公平执法的州，该法案都不会发生效力。”<sup>6</sup> 这项法案未赋予黑人选举权，也未授权他们参加陪审团或要求在学校和公共设施中废除种族隔离。因此，共和党人期望约翰逊能签署这项温和的法案，尽管他持有州权信念。除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之外，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敦促总统签署。

但是在3月27日，约翰逊发表咨文对之否决，再次声明在南部议员缺席时通过的立法为非法。这个法案是违宪的，总统说道，因为它侵犯了州法院的独立司法权。这项法案是对白人实行种族歧视，因为它“为有色人种的安全所建立的保护措施大大超过了政府为白人所提供的保障”，还因为它授予新近得到自由的奴隶有获得公民权的优先权，而移民要得到这个恩惠却要等上五年。<sup>7</sup>

如同第一次否决一样，这次否决也使民主党人兴高采烈而使共和党人愁容满面。一位民主党编辑感谢说，约翰逊不相信“我们这个种族能同黑鬼、吉普赛人及狒狒混合在一起。”另一家民主党报纸说，如果国会能宣布黑人为公民，“那么它说黑人应该参加选举，应该坐在陪审席上，应该和你的亲属通婚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些就是总统担心的问题。”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次否决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一击。约翰逊使“其每一位朋友都失去了支

\* 众议院以 111 : 38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参议院以 33 : 12 票通过了该法案。

持和保卫他的最起码的理由”，一位温和派议员说。一位共和党领袖从俄亥俄州报告说：“那些以前捍卫〔总统〕的人现在已随时准备对他加以谴责。”<sup>8</sup>

如果约翰逊是想孤立激进派，以建立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广泛联盟来支持他的政策，那他就打错了算盘。“他赶走的不是共和党中为数不多的少数派，甚至也不足该党的一半”，一家重要的温和派报纸评论道，他“赶走的实际上是整个共和党”。费城一位编辑机智地评论道：“总统想要共和党合他的意，想要它无能为力并放弃其以往所有的业绩和原则。通过这个过程，他设法将这个第一大党的激进派与其全体等同起来了。”<sup>9</sup>

##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

虽然约翰逊真的把温和派逼向激进派的立场，但是前者还不准备完全将南部各州贬到准州地位并给那里的黑人以选举权。相反，他们竭尽全力，想越过总统的否决而通过民权法案和自由民管理局修正案（他们分别在1866年4月9日和7月16日取得了成功），并拟定一项宪法修正案，作为南方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入国会的根据。从头年冬天到1866年春天，重建联合委员会都在为制定一条能为北方所有的舆论接受的修正案而努力。这条修正案必须做到：（1）为自由民的权利和安全提供宪法保障（而不仅仅是立法保障）；（2）防止邦联政治力量的复活；（3）在宪法中规定必须偿还国债而拒不付邦联欠下的债务。该联合委员会中的激进分子还竭力争取制定一条给自由民公民权，或取消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或既给自由民公民权又取消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的修正案，温和派则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他们想把这些建议变得温和些，即暂时剥夺邦联分子的公民权，并从侧面劝导南部诸州，由它们授予黑人

公民权。

4月30日，联合委员会终于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五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经过冗长的辩论，第十四条修正案在6月13日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而在两院通过。第一项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而取得国籍的人，包括黑人，均为公民（这样就取消了德雷德·斯科特裁决）；并且禁止各州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和豁免权”，还禁止不经必要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禁止剥夺任何人“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第二项规定，对任何拒不授予该州某一部分成年男性公民选举权的州，将按该州男性成年公民的比例，削减其在国会的议席。第三项规定，任何曾宣誓支持宪法而后又背弃誓言并参加叛乱的联邦或州政府雇员没有资格再担任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公职；但可以经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取消这种限制。（该款取代了一个委员会推荐的一项更为严厉的方案，该方案褫夺所有自愿参加叛乱者的公民权至1870年。）第四项确认合众国国债有效，邦联的债务无效；第五项授权国会制定“适当立法”以施行该修正案。

这条复杂的修正案引起的争论比宪法所有其余部分的总和引起的争论还多。几乎所有争论都和第一项有关，其中大多都是因为“公民特权和豁免权”，“适当的法律程序”，“有权享受法律平等之保护，”等措词的多种含意而引起的。这种模棱两可是有意的，

---

\* 虽然1866年的民权法案规定黑人为公民，但是将这一条款写进宪法修正案中，就会防止今后出现任何德雷德·斯科特式的对黑人公民权的否认。但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有个措词上的漏洞。它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加入合众国国籍的人，均为“合众国以及该人所在的州的公民。各州均不得制定和施行剥夺美国的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着重号后加的）。由于在这最后一句话未加上“或者其所居住州的”这一字样，让最高法院在对州公民身分与国家公民身分所享有的权利进行区别时钻了这句话的空子；最高法院在1873年的“屠宰场案”的裁决中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对州的公民权和国家公民权作了狭义的解释，因此“屠宰场案”削弱了联邦政府对州剥夺州公民权的行为的潜在判决权。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各法院援引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来大力扩大联邦政府行使民权的权力。

是为今后扩大这些措词的含意留下最大限度的余地。该款没有料到的一个后果是,为了限制各州管理法人(法“人”)的权力而对各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们财产这句话的解释。但是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项条款就主要被用来保护和扩大黑人公民的公民权了。“平等的保护”这个条款是否意味着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取消种族隔离,这个问题一直是大量司法文献讨论的主题。修正案制定者的目的大概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来,法院对这一条款进行的解释是打击种族隔离,并且批准政府机构采取正确的行动来纠正过去的不公正裁决。

在1866年,该修正案的第一项条款引起的争论要少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条款。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指责第三项条款是对已为过去的罪行吃尽苦头的人们进行报复性的惩罚。而激进派却认为它对叛国者的处罚还远远不够,不足以保卫国家反对他们在政治上的复活。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还指责第二项条款是国会胆怯地回避授予自由民以公民权的责任。这一项条款确实写得很妙。按未授公民权之黑人人口比例来削减南部在国会和选举人团的代表,这种作法保护了北部限制南部白人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不给黑人公民权的南部诸州受到惩罚,但却使这样做的北部州不受影响,因为这些州的黑人人口太少,对代表的构成不起什么作用。废奴主义者认为第二项条款是“骗局”,“是对正义和人性荒唐的背叛”。它“只适于保护北部和白人而不顾黑人的死活”。一个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宣布说。“这是迄今世界所看到的对浸透了鲜血的土地进行耕种的最大的丰收。”<sup>10</sup>

不过,激进派还是接受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认为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并只好希望今后的事件或许能推动国家给黑人以选举权。该修正案在1866年国会选举时成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并越来越成为北方对重建问题的公民表决。国会通过该修

正案时还有个内在含意，即只要南部诸州批准该修正案，就允许它们再进入国会，虽然法律制定者们没有明说这种承诺。当安德鲁·约翰逊的政敌、前辉格党控制的田纳西州在 1866 年 7 月批准了该修正案时，国会立即接受了该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尽管激进派惊呼，此举为其他未给黑人以选举权的州进入国会开了先例。

## 1866 年选举

国会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后，有些温和主义者希望，安德鲁·约翰逊会认输，停止对抗、配合重建工作。但他们没想到他很顽固。总统斗意旺盛，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暗示该修正案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国会在南部各州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约翰逊准备就这个问题与国会在 1866 年的议员选举中较量一番。按两党制的逻辑，这样就会把他推到民主党阵营中去。但是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在原纽约辉格党领导人威廉·西沃德、瑟洛·威德和亨利·雷蒙德（《纽约时报》的编辑）的带领下仍旧和约翰逊站在一起。他们想把这两个老政党中的保守分子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以约翰逊为首的联盟，以构成一个新党的核心。

建立这一联盟的第一步是已在 1866 年 4 月成立了全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两个月以后，这个委员会号召于 8 月在费城召开全国联邦大会。约翰逊在会议筹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期望这个会议能促使大多数北方人拥护他的政策。该运动的保守的共和党领袖们在会前安排上尽量不使民主党人引人注目，以使自己不可能被一闻到铜味吓得就跑的共和党人所疏远。但这很难作到。坚决支持约翰逊的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共和党对该运动的支持潜力。总统的行动几乎使该党全体一致反对他。因此，北部大多数亲约翰逊的议员候选人就必然是民主党人了。民主党人很快就控制了

全国联邦大会的领导权。在美国政治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种种希望，在两党制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8月14日，来自南北两方的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全国联邦大会。该组织的政纲要求立即重新接纳南部各州。马萨诸塞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成双结对地步入会议大厅，相互挽着手臂以示团结。约翰逊总统得知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后，心情激动，宣称这次大会比1787年以来的历次会议都重要。

不过，全国联邦运动却因三个致命的弱点而最终失败了。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一个弱点是，运动是由民主党人操纵的。多数北方选民对战争仍记忆犹新，很难信任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有叛国污点的党。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莫顿在18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种不信任已经成为后来人们所知的“挥舞着血污衬衫”的典型例子。莫顿说，“每个不改悔的叛乱者都自称是民主党人。”

每一个兵油子、每一个逃兵、每一个逃避征兵的胆小鬼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在这场战争中为叛乱卖过力的人、每一个用虐待和饥饿杀害联邦战俘的人、每一个图谋在忠于联邦的州里挑起内战的人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在1863年把有色人种孤儿院的孩子们烧死、并任意抢劫、强奸和杀人的纽约暴徒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总之，人们可以把民主党看成是公共下水道，是令人作呕的地方，南部和北部的叛国的污泥浊水都流向那里，有辱时代的一切不人道和野蛮的污泥浊水都流向那里。<sup>11</sup>

全国联邦运动的第二个弱点是其政纲夸张地宣称“全国没有任何地方像〔南方〕各州那样，迅速而全面地服从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共和党人说，日益高涨的反对自由民和联邦主义者的暴力浪潮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共和党人为了党派目的而对南方的暴行加以夸张和利用，但是这种宣传的真实程度毕竟很大，而使宣传

很起作用。1866年5月在孟菲斯，两个月之后在新奥尔良都发生了最严重的冲突。孟菲斯的冲突起因于当地白人和黑人复员士兵之间的口角；在口角平息之时，白人暴徒——其中有许多警察——在市内黑人区大施暴行，至少打死了46人。《纽约论坛报》以孟菲斯为例，讽刺地评论道，“谁怀疑自由民管理局应该立即取消，谁怀疑黑人应该重新受到原主人的家长式的照顾，‘你知道，原主人他们对黑人的理解要比北方佬深得多’。”<sup>12</sup>

7月30日在新奥尔良，一群暴徒——又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殴打了参加黑人争取选举权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把1864年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会议的残余力量又召集在一起。代表们聚在一起，研究把给黑人公民权作为交换条件，来换取由前邦联分子控制州政府。新奥尔良市前市长得到约翰逊的特赦，以便官复原职，还得到总统批准的不准召开这次会议的命令。占领军司令拒绝镇压，派兵保护代表。但是军队晚来了一步，在他们赶到时暴徒已经打死了37名黑人和3名白人支持者。共和党人把此事当作约翰逊政策所带来的结局的又一例子。总统9月8日在圣路易斯的讲话中指责是共和党人激怒了暴徒，并对牺牲者没有表示哀悼。此举对他的事业毫无益处。

全国联邦运动的第三个弱点表现在安德鲁·约翰逊本人身上。在田纳西州时，约翰逊是一个很有效能的树桩演说家。他相信将其政策直接告诉人民，他就能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再次获得成功。他不听朋友的忠告，一反惯例，踏上了从华盛顿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再返回华盛顿发表政见的巡回旅行的征程（8月28日至9月15日）。对约翰逊来说，这种短暂逗留的旅行是个灾难。他热衷于和质问者们大喊大叫地辩解。和观点对立的人们互相侮辱。他讲话的内容很少改变：南部是忠诚的；真正的叛国者是不让南部代表再进入国会的激进派；而他，安德鲁·约翰逊，必要时为

了拯救联邦和宪法,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克利夫兰大喊大叫说:“反对恢复政府和合众国重新统一的人就像杰夫·戴维斯和温德尔·菲利普斯一样是大卖国贼。为什么不绞死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呢?”就像去年冬天在华盛顿所做的那样,总统提醒那些批评其宽宏大量地赦免的政策的人们,耶稣来到人间是宽恕而不是责难人们。“他死了,流出他的血,为了世人生活而献身。……倘若需要更多的血,那么就筑起祭坛,鄙人——你们面前现在的讲演者——为了拯救他的国家,愿作为牺牲祭品,走上祭坛流尽最后一滴血。”<sup>13</sup>

约翰逊失去了自制力,而选举表明他也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就连最有信心的共和党人也对他们的绝对胜利感到惊奇。该党在国会两院保持了其三比一的多数,并在北部各州和西弗吉尼亚、密苏里和田纳西获胜。

## 1867 年的重建法令

哪个党曾赢得过选民的授权?共和党在 1866 年秋季的国会选举中就赢得了这种授权。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授权呢?是此次选举中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问题,这就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不过,要使该修正案获得通过,至少要有四个尚未重建的州加上共和党获胜的所有各州的批准。一些有远见的南方人正确理解了北方选举的结果。他们认识到,如果南方不“接受现在的条款,更强硬的条款就会提出来。”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与他们的征服者合作。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为拒不批准该修正案而提出的理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看来我们要被降格,但只要我们不因此而自卑,我们就会保存自重……。更坏的条款可能会由国会强加给我们,但它们是强加的,而不是我们自愿接受的。”<sup>14</sup>



约翰逊也固执己见。虽然“我们现在被打败了”，总统的一位盟友解释说，“但是我们的事业仍在。如果所有未进国会的州都不批准这条修正案，……极端的激进分子就会在黑人公民权问题上重新改组南方各州……。在下次总统选举时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打败他们。”<sup>15</sup> 当弗吉尼亚和亚拉巴马的议会有迹象要批准该修正案时，约翰逊劝阻了它们。南部各州议会一个接一个地否决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许多州是全体一致否决的。它们冷冷地拒绝了原本指望得到的条款后，便坐下静观国会下一步要干什么。

南部的这种态度使温和的共和党人大为恼怒。一位温和主义者说，“他们不愿进行合作，重建他们所毁灭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从头重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服从联邦，要求他们保护联邦的那些最卑贱的公民。”<sup>16</sup> 南部和总统的不妥协做到了激进派单独无法做到的事：使温和派改变了态度，认为黑人公民权是重建的根本。

自 1866 年的国会选举之后，\* 在国会三个月的开会期内，共和党讨论并通过了“重建法令”，其最后条款是温和派和激进派妥协的产物——这次妥协是经过委员会多次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干部会议决定、国会辩论、院内外活动、通宵的会议和情绪激昂等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先是在修正案上投票支持激进派，而后又站在温和派一边，使该修正案归于失败。

---

\* 这届国会仍是 1864 年选举出的第三十九届国会。当时宪法规定，国会选举之后在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会。这意味着在大多数议员当选之日和他们第一次开会之时，已有 13 个月过去了，除非总统召集他们召开特别会议或议会自身依法另定开会日期。任何一届国会，在其选举的第二年 12 月开会之后，第二次例会要到来年 3 月 4 日召开。因此第二次会议被称为“短期”会议，因其只召开 3 个月——从 12 月初到 3 月 4 日。因此，1864 年选举的议会的第二次会议在 1866 年 12 月召开。1933 年通过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改变了这一情况，它规定了国会应在选举年后的第二年 1 月 3 日召开，到两年后的 1 月 3 日届满。

激进派的目标中有三个是温和的共和党人所不能接受的：(1) 长期剥夺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给黑人和联邦主义者以时机，在南部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活动摧毁新成立的各州政府之前，给它们一个坚实的基础。(2) 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以便给自由民维护其新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3) 由联邦政府开办学校，使南方黑人得以学习文化、技术，并得到自信心以保护其自由与权利。激进派认识到在这次国会短期会议期间不可能达到这些目的，乃支持通过一个旨在直接取消现存南方各州政府的法案，把已成为准州的地区置于军事管辖之下——以期在 1866 年选举出的新国会多少比上届国会更激进一些，从而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

激进派认为，把前邦联各州降格成为准州有许多好处。激进派希望，在军管期间，自由民管理局、自由民援助团体、北部士兵、北部移民和北部资本能够教育自由民认识到自己新的责任，用军事力量保护他们，使南部白人感到国家权力的强大力量，直到他们放弃与其对抗的企图；然后根据“小型的农场、肥沃的土地、免费的学校、关系密切的居民点、尊重正当劳动、平等的政治权利”<sup>17</sup> 这种北部的模式来重建南部。

但是这种使南部成为自由劳动区的理想化想法并没有实现，至少第三十九届国会没有这样的立法。虽然 1867 年 2 月 13 日通过了准州化和实行军管政府的法案，参议员中的温和派还是认为国会必须制定一条规定恢复州权的条件的完整法律。不然的话，重建引起的意见不一将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北方选民就会对共和党未能提出一项“政策”而失去耐心。因此，参议院通过一项与众议院法案相似的议案，规定将 10 个未重建州划为 5 个军管区，\* 宣布这些州现有的文职政府只是临时性的，听从占领军当局

---

\* 包括除田纳西以外的所有脱离联邦的州，田纳西在 1866 年批准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后获准重新加入联邦和国会。

的全权领导。不过，参议院的这项议案又规定，任何一州在召开由成年男子投票选举的新的制宪会议，正式通过了包括黑人公民权在内的新宪法，并批准了该宪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后，其代表即可以重新回到国会。由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那些无资格任职者不得被选举为会议代表，亦不得投票批准新宪法。但是该法案并未要求南方各州从此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众议院同意参议院的法案。3月2日，约翰逊否决了这项重建法案之后，两院在当天再超越过他的否决通过了这一法案。

虽然激进派认为这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方案而接受了这个议案，但是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中却表达了他们的不安。他警告说：南方各州

现在还不具备以独立州来进行重建的条件……。即便承认这些军管区今天已具备了州的资格，具备了我们所知的合乎要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甚至其参加叛乱者都被剥夺了公民权，选举权全握在激进的联邦主义者手里，但只要对黑人不闻不问，那么这种重建的试验就将是灾难性的……。这些地区最需要的是不是轻松而迅速地恢复其在联邦丧失的权力，而是政府，即从华盛顿中央政府伸延出来的强壮的臂膀，它使自由民得到保护，……使北部的资本和劳工、北部的干劲、事业和思想得到保护。……想在一瞬间就把本来不够条件的州建成独立的州，纯属无稽之谈。各州必须逐渐形成。为达到此目的，在它们形成时必须给予扶植和保护。<sup>18</sup>

虽然后来的事态将证实朱利安的种种不祥的预感，但在1867年，重建法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约翰逊在否决咨文中就是这样说的。由于在国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不再为总统有权阻止实施重建法而担忧了。但是作为部队总司令和负责执法的政府部门的首脑，约翰逊仍有很大的权力来挫败国会立

法的实施。总统使用这一权力的意图很明显。因此，国会在制定重建法条款的同时，又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总统权力的措施。

### **对总统权力的限制**

第一个法案于1867年1月22日颁布，该法案规定在第三十九届国会于3月4日期满之后，立刻召开第四十届国会特别会议。该法案保证了议员们在第四十届国会于12月召开第一次定期例会前的这段时间内，能够一直对他们制定的重建计划进行监督。第二个法案是国会于3月2日在约翰逊否决之后通过的“职务任期法”。该法要求，在解除由参议院批准任命的政府官员的职务时，要经参议院同意。其目的在于制止约翰逊撤换支持国会重建政策的共和党官员。“职务任期法”的最后一项条款还规定，经参议院认可才能撤换内阁官员。其意图是保护陆军部长斯坦顿，他支持国会的政策，对国会政策的实行有决定性的影响。限制约翰逊权力的第三个立法是军事预算案（3月2日通过）的一个附件，该款规定总统需通过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发布所有军令，而陆军总司令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撤换。格兰特早先赞同和约翰逊相近的温和的重建政策，但南部针对自由民和联邦主义者的暴行使他坚信需要采取强硬政策。该附款的目的是防止约翰逊不经格兰特同意而独自发布命令，利用军队取消重建。

### **第二重建法令**

3月2日的“重建法令”详细规定了南方得以主动恢复其州的国会代表的程序，但却没有设立任何机构强使他们行动。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个错误。南部白人表示，他们宁愿在军管之下受限制，也不愿在制定给黑人公民权的新宪法上进行合作。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希望完成政治重建的任务。因此，在3月23日，

新国会特别会议通过一项补充的“重建法令”，要求负责南部军管区的各位将领对有选举资格的选民进行注册，并建立负责选举参加制宪会议代表的机构。由于通过了这一法案，黑人领袖、白人联邦主义者（很快就被南方称为“无赖”）和在南方的北部移民（很快就被称为“毛毡提包客”），十分热情地共同着手在南部各州组建共和党。军队担负起对选民，包括解放奴隶注册的任务。国家把这场以解放奴隶为开端的革命推向另一阶段，这场革命被一个心怀敌意的南卡罗来纳人称为“历史上最疯狂、最臭名昭著的革命”。<sup>19</sup>

## 第二十八章 重建与弹劾危机

### 约翰逊继续藐视国会

安德鲁·约翰逊也认为重建是一场疯狂的、名誉扫地的革命。总统保留有相当的权力削弱重建的实施，尽管国会作出种种努力在这方面约束他。他可以任命保守的将军管理南部的军管区。为了使现存的文职州政府对选民的注册和选举大会代表拥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他可以对“重建法令”进行狭义的解释。他可以使用十余种方式运用其行政权力阻挠或推迟南部的政治革命。由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激进派断言，只要约翰逊在位，重建就无法进行。他们发起了一场弹劾总统的运动，由本杰明·韦德取代他。因韦德作为参议院的现任主席，是继任总统的第一位人选。

#### 第一次弹劾尝试

弹劾是一种极端的手段。宪法授权众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对任何犯有“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及轻罪”（第二条第四款）的联邦政府官员进行弹劾，授权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进行定罪。过去，众议院曾五次行使了弹劾权，但参议院定罪的只有两次，这两次都是针对地区法官的。在1867年以前，没有任何一届国会认真地考虑过使弹劾这一武器去对付一位总统。

温和的共和党人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主张，即使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也只有当其行为被指控为犯罪时才能被弹劾。尽管他们不满约翰逊政治上刚愎自用，但他们并不认为他犯了罪。可是，激进派却坚持认为，弹劾并非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而是

对那些“滥用职权，或对任何有损公众或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或故意渎职”<sup>1</sup>的政府官员进行惩罚的一个手段。他们坚持认为，约翰逊应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他赦免大批前叛乱分子，藐视国会，暗示国会是非法机构，发表有失体面的演说，他还与新奥尔良大屠杀有牵连，因为他不采取行动，以及全面反对北部人民的意志。

1867年1月7日，激进派设法在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进行弹劾调查的决议。但温和派掌管执行调查的司法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听证会，但这些听证会只是表明，约翰逊如没有更严重的倒行逆施的事例，弹劾就会毫无结果。不过，一位温和派人士在1867年2月警告说：“如果〔约翰逊〕不能按法律的精神和条文执行法律，……如果他——不论是以直接建议，还是亲自动手——把南部控制在手里，他就会鼓励南部反对进步，从而可能使民众的意志受挫，……那么总统可能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必须‘除去’的‘障碍’。”<sup>2</sup>

有一段时间，约翰逊似乎注意到了这警告。他让人们知道他是执行重建法令的。他任命由斯坦顿和格兰特推荐的将军去管理五个南部军管区。这些将军都支持国会的政策。

### **南部对“重建法令”的反应**

在南部，一些著名的前邦联分子也建议人们接受这种不可改变的现实，服从重建法令。一些南部白人在重建过程中予以合作，以期影响重建走向温和的道路。有些上层人士自称是自由民的父亲般的保护者和最好的朋友，甚至还希望控制相当一部分黑人选民。他们组织了多种族的政治会议和烧烤野餐会，在这些会议和烧烤野餐会上，他们敦促自由民选举自己的同乡南部人，而不要选外来的北方佬。这是战后有人在南部政治上所作的不懈努力的一

部分，它主要由前辉格党人领导，目的是建立一支既独立于民主党又独立于共和党的温和的第三势力。给自由民以公民权，似乎为进行这种努力的人提供了一个被其迅速抓住了的机会。

但是两党制的种种规则使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头年它们就使北部的全国联邦运动失败了。况且共和党很快就表明，它具有将广大黑人选民集结在自己旗帜下的能力。这个林肯的党、解放奴隶的党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南部共和党的核心由不受限制的联邦主义者和战后北部的移民组成，它已存在了两年。然而，只要公民权仅局限于白人，这一核心力量在南部选民中就仅仅是少数派。只有诸如东田纳西等少数几个坚定的联邦主义地区是例外。随着“重建法令”的通过，共和党只要能赢得自由民效忠，就会在至少一半的南部州里成为一个潜在的多数党。他们轻易做到了这一点。吸收黑人加入共和党的主要机构是联邦同盟。联邦同盟于战时建于北部，是个“反铜头蛇”组织，在南军投降后迁往南部。1867年春季，联邦同盟在南部建立了许多分部，将自由民组织起来上课，让他们知道自己新的政治责任。

在许多地区，自由民管理局帮助联邦同盟从事这项工作。一些自由民管理局工作人员同时担任联邦同盟的官员，并且在军事权限之内充任监督人，按“重建法令”对选民进行登记。这些带党派性的行动成为南部白人谴责自由民管理局的又一个理由——该局不仅干涉他们与黑人雇工的关系，而且现在还动员这些雇工参加外来户的政党。

随着共和党成功地争取到了黑人的选票，许多原来敦促配合重建的南方白人改变了态度。不知为何，他们希望约翰逊总统或北部民主党能把这个进程逆转过来并推翻激进派。

他们并没有完全错信了约翰逊。虽然约翰逊做过保证，要执



行“重建法令”，但是他认为这些法令不符合宪法，他打算在具体实行时削弱其影响。军队开始推行这些法案时的几个行动为约翰逊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在南部许多地区，选民登记委员会认为，剥夺公民权的条款广泛适用于战前所有担任公职的人，甚至公墓的管事人，这些人后来都支持过叛乱。有些将军以阻挠执法罪和其它理由撤换了一些州的和地方的官员。路易斯安那一得克萨斯军管区司令菲利普·谢里登将军赶走了几位高级官员，于是约翰逊对他提出指责。约翰逊请求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里对谢里登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对选民登记委员会剥夺公民权的标准进行裁定。1867年6月发表的斯坦伯里裁决对“重建法案令”作了最狭义的解释。他裁定，军队只能在警察职能上超越文职政府；司令官不得撤换文官；只有那些战前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的前官员才能因叛乱行为而被剥夺公民权；登记人员必须毫不怀疑地接受未来的选民所作的没有参加叛乱的宣誓。

司令官们对这个裁定，特别是其最后一款表示遗憾，谢里登认为这一裁定开辟了“一条让伪誓和骗局通行的碎石路”。如果对斯坦伯里裁定表示认可，它就会大大地抹煞“重建法令”的含意，因为前邦联主义者将操纵新制宪会议的选举。斯坦顿和格兰特反对这一裁定，格兰特告知军队司令官，该裁定不具有命令的约束力，并告诉他们继续按他们对法律的解释行事。

国会在7月再次开会以堵塞斯坦伯里裁决打开的漏洞。7月19日，共和党人超越约翰逊的否决权，再次通过了第三个“重建法令”，宣布南部各临时政府要完全服从军事管制；确认司令官有权撤换官员；授权登记委员会否定选民的宣誓，如果他们认为该选民作的是伪誓；并对何级战前官员应被剥夺公民权作了规定，范围较斯坦伯里的为宽。

## 第二次弹劾努力

堵完漏洞之后，国会中的激进派想再次提出弹劾。他们宣称，总统已表明他无执行法律的诚意。但温和派仍担心弹劾会使约翰逊成为牺牲品。他们想方设法阻止这种激进的作法。然而，他们私下却抱怨说，“总统……确实继续在做最使人气愤的事。如果他没有被弹劾，那可不是他的过错。”<sup>3</sup>

约翰逊看来对正在要拯救他的温和派嗤之以鼻；国会刚一休会，他又发起了进攻。民主党早就恳求他解除陆军部长斯坦顿这个唯一支持国会重建方案的内阁成员的职务。由于种种永远说不清的原因，总统过去一直没有这样做，而现在“职务任期法”似乎使他不经参议院同意就不可能解除斯坦顿的职务了。可是，俟国会休会之后，约翰逊就能在数月后参议院重新召开会议之前撤掉斯坦顿的职务。1867年8月12日他真的这样做了。

总统说服格兰特担任临时陆军部长。这使共和党大为震惊。格兰特是美国最著名的人物。尽管人人皆知他厌恶政治，但他似乎注定要在186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格兰特接受总统任命的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同意总统的作法呢？共和党很快就安下心来，因为情况表明他并非这样。格兰特曾强烈要求总统不要撤斯坦顿的职务。他接受临时任命只是想在总统和军队之间充当缓冲者，目的是阻止约翰逊做更大的坏事。8月17日，约翰逊告知格兰特，他有意让一位比较保守的将军取代谢里登担任路易斯安那一得克萨斯军管区的司令官，格兰特手书一封言词恳切的信，恳求他不要这样做。他将此信透露给报界。格兰特说，谢里登是一位伟大的将领和出色的管理者，他在战时及在和平时期，为战胜叛军所做的工作可与任何人相比。“解除他的职务只能被认为是企图使国会通过的法律受挫。此事会被南方非重建势力当做……一个胜利，会使他们相信总统是支持他们的，从而鼓励他们再次反对广

大民众的意志。”<sup>4</sup>

约翰逊根本不听这一忠告。不仅如此，他还撤换了南、北卡罗来纳军管区司令丹尼尔·西克尔斯将军，因西克尔斯大力执行“重建法令”而得罪了南部白人。格兰特尽其所能来缓和这些变动带来的影响，命令新任司令官不要起用其前任撤换的官员——在谢里登军管区内，被撤官员包括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两州的州长。

总统又一次表明，即使不修改重建法的条文，他也有能力否定重建法的精神。此事促进了弹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约翰逊想干什么？”一位前任司法部长焦虑地说道，“他是不是想在总统权力和职责问题上再来一次叛乱？”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一份报刊的出版商向一位住在华盛顿的朋友问道：“总统是疯了还是醉了？我担心他会使我们都同意对他弹劾。”<sup>5</sup> 1867年秋，几位以前曾反对弹劾的共和党编辑改变了态度，赞同弹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温和派共和党人早先投反对票，现在改为投赞成票，于是使该委员会以总统“僭越职权”的理由，通过了对之弹劾的提案（五票赞成，四票反对）。然而，在众议院对这提案投票表决之前，北部各州非大选年选举的结果却是民主党获胜，这似乎预示着公共舆论要转向保守。

种种情况又一次使州选举成为对重建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公民权问题的准公民投票。由于给了南部黑人以公民权，有人谴责共和党虚伪，在这种压力下，共和党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在仍不承认黑人选举权的北部州给黑人以公民权。一位废奴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对南部州的整个态度”就会“像法利赛教徒对待被逐出教门者的那种态度”了。<sup>6</sup> 在1867年，除了两个之外，所有州的共和党政纲都赞成在北部州里实行平等选举权的原则。为此目的，五个州的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为了给黑人以选举权而制定了宪法修正案，其中有三个将在1867年进行表决。

但是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的选民反对给黑人公民权。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至少有80%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给黑人以公民权的提案，但民主党的顽强反对，使该提案在这两个州内以微弱少数遭到失败。此事帮助民主党控制了俄亥俄州议会。该党在北部其他州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州里，一般来说，黑人公民权、弹劾和激进的重建都是重要的议题。同以往一样，民主党竭力在这次竞选中利用种族主义。一位法国报社记者评论说：“任何一位民主党员，只要他不想方设法地在讲话中暗示黑人就是变种的大猩猩，他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热情。”<sup>7</sup>

民主党把他们在1867年竞选中取得的胜利扩大为是对共和党的“伟大反击”，是“北方民众情感的突变……。从反革命的历史来判断，……激进派的统治已经屈指可数了”。安德鲁·约翰逊在白宫对一群恭维者发表“胜利演说”。总统的一位助手哈哈大笑说：“我真有点可怜激进派。为了不想让民主党得到十个州，他们把这十个州送给了黑人，结果他们还将丢掉其他州。……凡是长着废奴主义脑袋和黑鬼尾巴的党，很快就会发现，除了这个脑袋和这条尾巴之外，自己什么也没有剩下。”<sup>8</sup>

事实证明，这些关于共和党要垮台的断言下得太早了。但是，这次选举牺牲了激进派，加强了温和派在该党的地位。党的领袖开始慎重对待北方公民权问题了。用霍勒斯·格里利的话来说，“黑人问题是我们倒运的根本问题。……我们因为敢于公正地对待黑人而在自由州失去了选票。”这次选举同样也使弹劾努力受挫。格里利又说，“下次竞选时，我们要承受的负担真够沉重的，不但没有使约翰逊成为牺牲品，反而还得把他背上。”一位华盛顿记者在报道弹劾运动时说，“弹劾完蛋了，除非总统搞些新的暴行，那么它就会得到新的推动力。”<sup>9</sup>众议院在12月7日以108票对57票搁置了司法委员会的弹劾建议，从而肯定了这一论断。

## 弹劾和宣布约翰逊无罪

61

约翰逊后来的行动再次提出弹劾的问题。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是一位民主党人，约翰逊选他取代谢里登任路易斯安那一得克萨斯军管区的司令官，他改变了谢里登制定的许多政策，因此使共和党所作的努力大受挫折。约翰逊公开褒奖了汉考克。尔后，在12月28日，总统起用保守分子取代了佐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军管区的两位有激进倾向的将军，希望他们效法汉考克。这些行动鼓励了南部对重建日益增长的反抗。南部民主党在1867年—1868年冬季召开的十个制宪会中当选的代表都不占多数，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以图破坏新宪法的批准，或尽可能地拖延新宪法的批准，待到1868年民主党在总统选举时获胜，那时民主党在北方的阵地就会明显扩大，从而使重建垮台。亚特兰大一家报纸问道，“难道北部和广大的西部的白人将不能来援救吗？我们替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会不能来援救的。”<sup>10</sup>

南部共和党人\*对总统最近显示的加强对手实权的作法表示惊讶。“不友好地安排军事指挥官简直要我们的命，”亚拉巴马州共和党领袖写道：“波普和斯韦恩将军的被解职使重建工作失去了两位干练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叛乱者的仇恨在他们被撤职之后空前爆发出来，……今天谁不冒生命危险就不能参加竞选。……叛乱者在许多县为所欲为，……下一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sup>11</sup>

南部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一出新奇的戏正在华盛顿上演。格兰特将军仍是临时陆军部长，而参议院也仍在决定是否同意总统解除斯坦顿。如果参议院拒不同意，总统希望在法庭上对“职务

---

\*关于南部共和党的分析请看以下“南部诸州再次加入联邦”一节和第三十章的“南部共和党人；黑人、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一节。

任期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果这样做，他需要格兰特的合作。约翰逊认为他已得到这位将军的保证：假若参议院不同意解除斯坦顿的部长之职，就不将陆军部归还给他。但是，当格兰特在1月14日得知参院不同意解除斯坦顿之后，就腾出办公室让斯坦顿搬了回去。约翰逊指责格兰特不守信用。这位将军既惊讶又生气，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他早就表明无意触犯“职务任期法”。他们两人之间分歧的见诸激烈的言词，往来信件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约翰逊在这场文字交战中可能稍占上风，但是他却得罪了格兰特，从而进一步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提高了这位将军在共和党的威信。

约翰逊利用格兰特控制陆军部的打算落空了，他决定直接向国会挑战。2月12日，他发布了一道解除斯坦顿职务的命令，任命军务局长洛伦佐·托马斯为临时陆军部长。消息传来，国会哗然。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斯坦顿不服从这个命令。这位倔强的陆军部长坐阵于办公室里，当这个倒霉的、为庆贺得到新职而在华盛顿一个生日舞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托马斯第二天清早昏头昏脑上任时，斯坦顿拒不交出钥匙。

### 众议院对弹劾进行表决

约翰逊对“职务任期法”的明显践踏使得许多原来反对弹劾的共和党温和派转变了态度。一位温和派议员写道，“他在挑战，并且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让咱们就这个问题较量一番吧；不是你输就是我赢’。”<sup>12</sup>1868年2月24日，众议院基于共和党的政策，以126对47票表决通过对总统进行弹劾，顺应了共和党的气愤情绪，众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拟订对约翰逊的控告，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国会中一些最激进的人物：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乔治·朱利安、本杰明·巴特勒、约翰·洛根和乔治·鲍特韦尔。控

告采取了大陪审团起诉的形式，共有十一条罪状，用冗长的法律语言写成，目的是把总统所犯的每一条可以想像得到的“重罪和轻罪”都包括在内。头八条都是关于他企图不经参议院同意而撤换斯坦顿和任命继任者。第九条控告约翰逊试图说服哥伦比亚特区司令直接听命于总统，从而破坏“军队指挥法”。第十条为巴特勒所写，控告总统“力图煽动所有善良的美国人反对国会和国会通过正当合法程序实施的法律”。最后的“混合”条款实际上汇总了前十条所列举的全部罪状。

### 提交参议院审讯

宪法规定，在审讯弹劾案时，参议院起法庭作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为审判长。众议院任命了七名“协议委员”（实际上是检察官）将本案向参议院提出诉讼，七人中有史蒂文斯、巴特勒、鲍特韦尔和洛根。审讯从3月4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一个星期。因总统解除斯坦顿职务而达到高潮的强烈不满情绪在这旷日持久的过程中渐渐平息下来，这对约翰逊很有利。

约翰逊的辩护人中包括一些国内最重要的律师；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里；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威廉·埃瓦茨；前最高法院法官本杰明·柯蒂斯，他曾是“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中主要不同意见的执笔者。这些人在审判期间较之弹劾“协议委员”显示出的法律才干要高出一筹。他们主要就三个论点进行辩护：政府官员只有犯了可在普通法院起诉的罪行时才可弹劾；约翰逊寻求验证“职务任期法”的合法性并非犯罪，因为这条法律仅适用于“在总统任期之内由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所以无论如何也不适用于由林肯任命的斯坦顿。

针对这些论点，弹劾协议委员回答说：约翰逊的任职已过了林肯的任期，因此“职务任期法”适用于斯坦顿；为了在法庭检验一条

法律而让总统去违抗它，这种作法会成为危险的先例；不管约翰逊是否犯下罪行，弹劾是一种政治程序而不是刑事程序。关于这最后一点，本杰明·巴特勒认为，弹劾“就其本质或后果而言，是对破坏政府某些根本或必要原则、或是不利于民众利益的做法提出起诉。这种做法在不触犯成文法的情况下，采用滥用自由决定权的手法，可能会构成对宪法、对法律、对就职宣誓或是对职责的侵犯”。<sup>13</sup>

巴特勒的话道出弹劾案的本质。约翰逊实际上是因为两年来一直坚决反对共和党的重建计划而受审。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来说，他的罪行乃是“为了那些将南部各州拖进叛乱的要犯们的利益，而用自己的意志去重建各叛乱州的重大图谋。”弹劾也是自林肯执政以来国会和总统长期权力斗争的顶点。“这个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位坚决支持弹劾的人写道，是“国家立法机构在美国政治中是否也像英国立法机构在英国政治中那样具有无限权力。……难道我们不能早点使总统像英国国王那样不再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吗？”<sup>14</sup>

但是一些温和派害怕开创先例，有了这个先例，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撤换任何一位碰巧与之意见不一致的总统。这种做法可能破坏美国政治制度中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温和派不喜欢约翰逊，但是他们并不想削弱总统的权力。一位保守派参议员写道，“安德鲁·约翰逊是被公正地还是不公正地解除职务，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墨西哥化了，是不是成为到头来必定把我们的制度彻底推翻的样板。”<sup>15</sup> 有几位温和派也不信任激进的本杰明·韦德，要是参议院裁定约翰逊有罪，他就会成为总统。

人们的这些关注使那些焦虑不安的共和党参议员能够利用这一诉讼案在法律上的含糊不清来证明他们对弹劾持怀疑态度有



理。不喜欢约翰逊重建政策但希望投票反对弹劾的温和派参议员寻求通过斡旋者与总统达成谅解。约翰逊第一次对这样的建议有所反应。在审讯中，他既神气十足又有所顾忌。他不再发表演说或召开记者招待会来指责国会了。他保证执行“重建法令”，而且也这样做了。与温和派参议员举行过多次慎重的会谈之后，约翰逊任命约翰·斯科菲尔德将军为陆军部长，他任弗吉尼亚军管区司令时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公正使他为各个派别所接受。

这些行动增加了总统被宣告无罪希望。但是来自共和党选区的强大压力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都未见分晓。每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州代表会议都赞成定罪。南部共和党仍然预言：如果约翰逊在位，叛乱就会复起。有关受贿和其他邪恶阴谋的谣言在华盛顿到处流传。5月16日，参议院终于对弹劾案第十一款（混合条款）进行表决，唱名时气氛达到高潮。直到按字母顺序几乎排在最后的西弗吉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彼得·范温克尔投了反对票之后，结局才算明朗——约翰逊无罪。票数是35票对19票；七名共和党人和十二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整个定罪活动因一票之差少于必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而告失败。5月26日对第二、第三款的表决结果更是急转直下。弹劾“协议委员”不得不承认失败。虽然那七位进行“抗拒”的共和党参议员一时受到严厉指责，但是弹劾热很快就消逝了，共和党人又团结一致地进行总统竞选了。约翰逊在剩下的任期内一直表现不错；重建在南部继续进行，再也没有受到总统的干涉。一个曾震撼了宪法制度根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危机结束了。

## 最高法院和重建

在弹劾辩论中，国会和最高法院也在进行权力之争，最高法院

未作最后较量就退出来了。最高法院在“米利根案”(1866年)中所作的裁决——对非战争地区的公民进行军事审判是非法的——似乎使军事法院和军事管制法在南方失去作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指责“米利根”判决是一件“我们无需尊重的司法上的错误。”<sup>16</sup>他们提出很多法案和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如要求至少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最高法院法官才能裁决国会的法案为非法，限制最高法院受理上诉的权限，使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乃至解散最高法院。众议院确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最高法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判决立法为非法。但是参议院却未通过此法案。除了下面将提到的例外事件，国会未能实施任何提案来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

共和党对最高法院的攻击可能会使某些大法官相信，深思熟虑胜过勇敢。1867年，最高法院拒绝了密西西比州和佐治亚州的官员关于颁布一道禁令以阻止联邦官员实施重建法的诉讼。但是1868年初的“麦卡德尔单诉案”却有使最高法院和国会发生冲突的危险。该案的起因是军方于1867年11月逮捕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名叫威廉·麦卡德尔的编辑，因为他发表反对重建的煽动性文章。当联邦巡回法院拒绝他提出的实行人身保护法的请求之后，麦卡德尔以“1867年人身保护法”为根据，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当初是为了保护自由民免遭各州黑奴法律的监禁而通过这一法律的。正值审理麦卡德尔上诉期间，国会于1868年3月27日废除了这一上诉所依据的法令，这样就剥夺了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的权力。最高法院默认了，虽然有些

---

\* 起草“米利根案”判决的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在1867年2月说，他并不认为这个判决适用于“叛乱”州，在国会宣布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之前，可认为这些州仍处于战争状态。但共和党人担心，如果因军事判决引起的诉讼提交最高法院审理时，最高法院仍会以多数票宣布“重建法令”不合宪法。

保守的法官为了判定“重建法令”的合法性，希望以其它的理由接受这一诉讼。

这并非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最高法院因胆怯而投降。宪法第三条第二项授权国会对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判权作出规定。由于拒绝裁判这一案件和早先的密西西比案件及佐治亚案件，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宣布了前邦联各州的重建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一个在“得克萨斯州控诉怀特”案(1869年)中明确证实的论点，一个涉及分离主义为非法的判决。因为分离主义从法律上讲是行不通的，那些事实上脱离联邦的州的回归工作就是一个超越宪法的问题，所以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程序问题，是一个为保证每个州都有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而由全国性政府行使宪法职责使之合法化的政治程序。

国会的重建显示出美国宪法的弹性。尽管有分离主义和内战的冲击，但重建的进行却没有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总统职务经受住了它所经历过的最大威胁。最高法院虽然于1868年在和国会可能发生的对抗中让步了，但却保持了其作为政府的同级机构的重要性，并拥有充分的权力，在19世纪70年代取消了关键性的重建立法。好也罢，坏也罢，撒迪厄斯·史蒂文森以革命的合法性取代宪法的合法性的尝试未能成功。战争和重建引起的危机暂时改变了联邦政府这三个机构的权力平衡，但并没有摧毁这种平衡。

## 南部诸州再次加入联邦

当人们在华盛顿正在为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宪法问题作决定时，南部诸州的重建工作也在向前推进。到1867年9月选民登记工作结束时，在十个未重建的州里进行登记的大约有735000名黑人和635000名白人。黑人在五个州里构成多数选民，这五个

州是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亚拉巴马。在有可能成为选民的白人中，估计有 10% 到 15% 的人被“重建法令”剥夺了选举权；另有 25% 到 30% 的人因对登记漠不关心或是因反对整个做法而没有去登记。

民主党未能得到黑人的选票，便寻求其他方法来控制或废除重建。在驻有 20000 联邦军队的情况下是不能公开使用暴力的，但是有些白人地主和雇主以经济手段相威胁，在选举日将其黑人雇工关在屋里。有些民主党领袖要求其追随者不要投票，以期赞成召开制宪会议的票数不足所要求的注册选民的多数。他们说，即便这一招失败了，大批白人弃权也会使北部温和派对这次选举产生怀疑。“北部的变化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实现公民自由的唯一希望，”一位北卡罗来纳人写道，“我真希望激进派会自己越变越黑，直到所有的人——特别是所有的好人——看着他们变成黑人，纯种的黑人！”<sup>17</sup>

在 1867 年秋季举行的决定是否召开制宪会议的选举中，注册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的未及半数，（而黑人选民中投票者为五分之四）。在投票的白人中支持召开制宪会议的也有一半。不过，在各个州，支持召开制宪会议的票数超过了登记选民必须的多数。当选的制宪大会代表中有四分之三是共和党人；其余的则多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出于对前辉格党人的尊重，他们还没有接受民主党这个称呼。共和党的代表中 45% 是南部白人，30% 是黑人，25% 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移居南方的北部人。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制宪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是黑人，而南迁的北部白人在任何一州都不占多数。

南部白人共和党代表大多数是在战时代表内地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阿肯色的制宪大会里的人数特别多。大多数出生于北部的代表是那些决心在新的南部

奋斗一番的前联邦军官或自由民管理局官员。总的来说，在各个阶层的代表中，他们更有文化，而在共和党其它各阶层的代表中，也属他们较为富有。他们在各制宪大会所起的领导作用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四个制宪大会的主席和近半数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他们担任。黑人代表是黑人中的精英。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战前就获得了自由，而在他们为奴时，大多数又是奴隶社会的上层。有五分之四的黑人代表有文化，他们大都是牧师、教师、工匠和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农场帮工或非技术工人。

### 制宪会议

持敌视态度的南方白人把 1867 年—1868 年冬季召开的制宪大会讥讽为“黑人与皮肤晒黑的人”的大会。他们把这次大会的代表形容为“流浪汉、囚徒……狒狒、猴子、骡子。”路易斯安那州保守党说的几句话很有代表性，他们把该州制宪大会制定的宪法说成是一个“反对人性的卑鄙的阴谋……，是愚昧的黑人和一伙白人冒险分子合作的产物。”<sup>18</sup>

这类讽刺性的描述长期笼罩着这些制宪大会的历史形象。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代表们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彬彬有礼的。虽然在共和党多数派不同的派别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但这在美国政治中是很平常的事。然而，这些制宪大会的本质却远非寻常：黑人和白人第一次为制定他们所在州的基本法律而一道工作和选举。

他们所制定的宪法位于美国最进步的宪法之列。许多条款是以北部各州宪法中最进步的条款为模式的。他们关于普选权的实施比较大多数北部州还先进。所有的新宪法都规定在全州范围内建立公立学校，招收两个种族的学生。大多数州宪法还增强了州对社会福利的责任，这在南部是前所未闻的。一些宪法还创立了

州公共慈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实施监狱改革，减少了死罪的数字。这些新设立的公共机构要求大幅度提高财产税。但是大多数州却对宅地免税，即对价值达 2000 或 3000 美元的不动产和私有财产免税，从而帮助小土地持有者不会负债。这一条款受到许多南部白人代表的欢迎，这些人代表的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受到战后南部动荡经济威胁的选民。黑人代表和一些北方人则欢迎对不动产增加税收，他们希望此举能强迫不动产主以黑人农民出得起的价格出售多余的土地。虽有一些激进派代表力主把土地征为国有，但没有任何制宪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唯一在这方面作出姿态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制宪大会，它授权州土地委员会以市场价格购买土地后再分成小块以优惠价格出售。

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得到了共和党多数派联盟的坚决支持。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使该党的联盟一分为二，一派是大多数北部白人代表和黑人代表，另一派是许多南部白人共和党人及其保守派同事。问题之一就是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几乎每个制宪大会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多数制宪大会对要求进行种族隔离或是要求禁止种族隔离的提案，都用搁置的办法来解决。没有任何一州的宪法要求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只有两个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禁止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然而，实际上只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的几所小学（多在新奥尔良）才普遍废除了种族隔离。

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解除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最后制定的宪法都规定，不取消参加过叛乱的人的公民权，虽然路易斯安那州要求前邦联分子在得到选举权之前要签署一份承认错误的声明。阿肯色州、亚拉巴马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对某些级别的前邦联领导人实行剥夺公民权（可能占白人

选民的10%—20%)。\*这些剥夺公民权的条款不受白人选民、甚至不受某些黑人选民的欢迎，从而造成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宪法最初的失败。这两州的宪法直至取消了剥夺公民权的条款后才真正生效。亚拉巴马州刚恢复完全的州资格后就废除了剥夺公民权的条款。阿肯色州剥夺了大批前叛乱分子的公民权，数量大于任何一个前邦联州，直到1872年这个州才废除了这些使人丧失资格的条款，该州是南部采取这一步骤的最后一个州。

### 重新承认前邦联州在国会的代表权

宪法制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把它们交给选民投票表决了。保守派仍想阻挠重建的进行，方法是把重建拖到总统选举之后，为此他们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不让宪法得到批准。许多南部白人不相信大多数北部选民会支持共和党在南部强制实行“黑人统治”的“臭名昭著”的企图。倘若能使南部诸州的新宪法得不到批准，民主党在1868年总统选举中可能的取胜就会彻底改变重建工作的进程，使南部各州无需黑人投票就能恢复自治。为了不让宪法得到批准，许多南部白人用暴力恐吓黑人选民或消灭黑人选民。一个名称可怕的、在夜间行动的密秘组织三K党(Ku Kluk Klan)开始在这些选举中滥施暴行。

但是，保守派的主要战术是抵制投票。如果能说服或胁迫足够多的白人呆在家里，那么赞成批准宪法的投票就不会达到登记选民的多数。1868年2月4日，当亚拉巴马州第一个举行批准宪法的投票时，这一战术取得了成功。虽然支持宪法的有72812人，反对的有1005人，但这只占168813名登记选民的43%。狼狈而又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3月11日通过第四条重建法案，规定

---

\* 此时(指1868年)前邦联分子在密苏里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仍被剥夺了公民权。

宪法的批准只需实际投票人数的多数即可。在其后的两个月里，六个州以 51%（阿肯色州）到 72%（南卡罗来纳州）的多数票批准了各自州的宪法。<sup>\*</sup>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控制了州政府和州议会。各州议会很快召开，批准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达到了重新加入联邦的要求。

虽然重建取得显著成绩，但是许多共和党议员仍不愿意让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联邦，因为一旦这些州恢复了自治，联邦在那里的驻军数量就要减少。再说保守派和民主党已在几个州里显示出有赢得政权的潜力，尤其是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白人重新获得选举权之后。共和党的联盟说明该党是脆弱的，也说明其黑人选区一受到威胁时就是脆弱的。倘若南部民主党人恢复了力量，控制了一个州，那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废除新宪法，取消黑人选举权和所有这一切呢？一位激进派参议员发出警告说，要当心“各州会迅速回到叛乱主义到处漫延的状态”；另一位激进派参议员则说：“认为在此时此刻这样做是安全的人还不足十个”。<sup>19</sup>

但是，重新加入联邦一事受政治需要的支配。如果南部仍不稳定，仍实行“刺刀统治”，北部选民就要在 1868 年的选举中谴责共和党了。一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宣称：“事情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些州迟早会被接受。尽管现在无政府主义盛行，但混乱终将结束。我们必须制定民法民规。我们不能永远用刺刀控制这几个州”。<sup>20</sup> 尽管疑虑重重，共和党人还是于 1868 年 6 月重新接纳了这七个州（包括亚拉巴马州）进入国会。授权条款中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些州的宪法永远不能为剥夺黑人选举权而修改。这个条件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都值得怀疑（宪法规定国会无权强行实施这类条件），但是此举却能缓和某些国会议员的不安。

---

<sup>\*</sup> 在阿肯色州和佐治亚州，赞成批准宪法的总人数分别仅为各该州登记选民的 36% 和 46%。



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恢复工作一直拖到1869年才进行；因为得克萨斯州面积辽阔，那里的共和党又不团结，这些都推迟了制宪的完成；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内有派系斗争，该州新宪法里有一些要求严格褫夺公民权的条款不得人心，这些都阻碍了旨在批准宪法的投票的如期举行；密西西比州的一条褫夺公民权的条款激起保守分子组织猛烈的反对，结果在1868年6月22日以7600票的多数使宪法未能获得批准。密西西比州尽管驻有2000名军队，但受到暴力和恐吓威胁而未到投票站投票的共和党选民有20000人。

得克萨斯州终于在1869年完成制定宪法，重新回到国会。同年，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就褫夺公民权的条款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但未获通过，后来这两个州以其经过修改和批准的宪法重新进入国会。“重建”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没过多久，种种事态却表明，重建不过才刚刚开始。

## 第二十九章 第一届格兰特政府

### 1868 年选举

就像 1864 年的总统选举是对共和党战争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一样,1868 年的总统竞选是对重建的另一次公民投票。

#### 财政问题

不过,有一段时期,“财政问题”似乎同重建问题一样,可能会成为竞选的话题。这个问题是由战时立法印制绿背纸币和建立国家银行引起的。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双币制(纸币和硬币)形成的金元贴水使得硬币的价值高于纸币。战后,主张硬币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着手将 4.15 亿元的绿背纸币的一部分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从而使纸币与黄金等价,通过这种方法,使币制恢复金本位。国会最初批准了这个政策。到 1867 年,麦卡洛克已经把绿背纸币缩减到 3.19 亿元,贴水率保持在 140 (140 元纸币可买 100 元硬币)。同一时期,经济经历了战后衰退,通货在两年后收缩了 12%。受到这些事态发展损害的某些经济部门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纸币的收缩。国会感到恐慌,于 1868 年 1 月禁止进一步缩减纸币。

在货币问题上开始出现了类似区域性的联盟,这回不是北部反对南部,而是东部反对西部。西部的国会议员,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反对收缩,因为对国家纸币的发行作限制以及对他们地区的发行不公,对西部经济的打击甚于对东北部的打击。不过,东部共和党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撒迪厄斯·史蒂文

森和本杰明·巴特勒，也公开反对收缩。

在这个问题上，各党内部都存在着分歧，因为它不太可能成为两党之间争论的问题。但是，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力图通过那二十五种战争公债的本金是用硬币支付还是用绿背纸币支付这个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有关法律只规定，出售的公债的利息需用硬币支付。到1867年为止，许多民主党人发问，当其他人都同意以绿背纸币为合法支付手段时，为什么用贬值纸币购买了公债的公债持有者就应该受到可兑换硬币的奖赏呢？这个问题能将大多数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因为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可用硬币兑现，但是财政部还是向投资者保证将用硬币支付本金和利息。共和党人说，只要与这一保证稍有不符就如同赖账。因为强调用绿背纸币支付的是民主党昔日的和平派，所以共和党又一次谴责起“铜头蛇主义”来。

不过，用绿背纸币偿还国债的主意在中西部的民主党人中很受欢迎。在中西部，这个主意是和1868年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俄亥俄州民主党领袖乔治·彭德尔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彭德尔顿计划被纳入民主党的政策宣言。但是当该党以纽约的霍雷肖·西摩为其总统提名人时，这一计划就无人提及了。西摩和大多数东部民主党人一样反对彭德尔顿计划。因为党内存在着这种分歧，所以在不久之后，在以重建和候选人的战争经历为焦点的竞选运动中，这个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约在共和党于1868年5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就很有可能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了。格兰特唯一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是萨蒙·蔡斯，此人历来是总统候选人，他并不因为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心满意足。在1867年，多数激进派推举蔡斯而不信任格兰特，因为这位将军战前倾向民主党而战

后初期又赞同约翰逊的重建政策。但是，一些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格兰特的看法：他支持1867年的国会计划；民主党在1867年中期选举中获胜，此事使许多激进派确信，在1868年他们更需要一位战争英雄，而不是他们中的某个人为候选人；还有格兰特在1868年1月断然同约翰逊决裂。此外，蔡斯在弹劾审讯中倾向于宣告约翰逊总统无罪，此举使这位大法官实际上被共和党除名。这届共和党大会一致提名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选定候选人的政策宣言自豪地表示“国会的重建政策必能成功”。

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北部各州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破坏了这次大会喜气洋洋的气氛。激进派坚持认为，党必须明确表示，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回避这个问题或者用某些毫无意义的原则对其进行掩盖，都是道德上的败坏和政治上的愚蠢”。<sup>1</sup>但是温和派认为，含糊其词是政治上的明智，而不是愚蠢。共和党赞成北部选举权运动曾使该党在1867年选举中受创。1868年4月，密歇根的选民以61%对39%，否定了含有黑人选举权条文的新宪法，这意味着至少有20%的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这一条文。一家温和派报纸宣称，“这件事很丢人，但却有力地证明，在北部诸州授予有色人种公民权还要等一段时期。此时硬要这样做可能会损害重建的许多更现实的利益。”<sup>2</sup>

在这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政纲起草委员会成为激进派与温和派激烈斗争的场所。最终获胜的是温和派。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政纲，政纲声称。“出于对公共安全，恩惠和正义的种种考虑”，要给予前邦联诸州黑人以选举权。同时，“在各联邦州，公民权问题就是这些州的人民决定的问题了”。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谴责这一政纲，说它是“卑鄙、愚蠢和不值一提的”。查尔斯·萨姆纳准确地预言：“民主党人将有一个重大的时机来暴露其两面派的本性。”<sup>3</sup>

##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和共和党相反，民主党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太多了。在该党7月大会的前夕，民主党产生了四位领袖，他们是俄亥俄州的彭德尔顿；印地安纳州参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其辉煌战绩可以抵消格兰特在这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以及安德鲁·约翰逊。虽然总统同激进派的斗争在党内得到同情，但是他的不利条件太多了，在第三轮投票时就退出了竞争。彭德尔顿、汉考克和亨德里克分别在第八、第十八和第二十二轮投票时接近获胜的多数选票，但是每人都远未达到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在第二十二轮投票的最后时刻，有几个州的选民将其选票改投向霍雷肖·西摩。此举对这个无法开下去的大会产生了惊人的作用。赶这个浪头的州一个接一个。西摩曾对当候选人拒绝过好几次，现在他的朋友们只好把他推出大厅，以免他当场拒绝提名。最后，这位和蔼而脆弱的前纽约州州长服从需要，接受了这个与格兰特争夺胜负的前途未卜的荣誉。

民主党竞选纲领诅咒“重建法令”是“明目张胆的篡权，……是违反宪法的，是革命的，是无效的”，并且要求“取消自由民管理局，废除目的在于保障黑人至上的所有政治机构”。这成为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副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的弗兰克·布莱尔以一封公开信为这次竞选定下了调子。布莱尔在战时是位战功卓著的共和党人，战后他又恢复了其家族对民主党世代的忠诚。他在信中主张：“恢复政府和宪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当选总统宣布这些法案无效，迫使军队不再侵占南部，解散各‘毛毡提包客’州政府，并允许白人重新组织自己的政府。”<sup>4</sup>

## 种族问题和三K党

布莱尔毫不在乎共和党对他这些言论的强烈反对，在整个竞

选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共和党在南部的州政府是“杂种与私生子”政府。“白人是世界上唯一表明有能力维护自由制度下之自由政府的种族”。民主党将会恢复南方白人的“天赋权利”。这样作，“我们就会得到每一个真正属于白色人种者的同情”。其他民主党人，特别是中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从布莱尔那里得到启示。威斯康星一位编辑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得到白人选民的大多数选票，他们就会“向华盛顿进军，……各任其职，再次建立白人的政府”。<sup>5</sup>

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他们挥动着血污的衬衫，提醒那些听了西摩的“我的朋友”的演讲而投票选他的人记住1863年纽约的征兵暴乱。他们将格兰特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所写的那封信的结束语——“让我们得到和平吧”——与布莱尔的血腥反革命口号相对比。四年的战争和就重建进行的近四年的政治战使选民们感到厌倦，格兰特的讲话打动了他们的心。共和党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格兰特入主白宫将会使冲突平息，而民主党获胜就会建立“靠暗杀和暴力维持的政府，取代法治的政府”。<sup>6</sup>

一些南部民主党人好像一定要证实共和党人说得对似的。在几个州里，三K党及类似的组织大肆进行恐怖活动。既然这些州业已“重建”，联邦军队就不得援引军事管制法了，因此联邦军队阻止这一暴行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而匆匆组建的州民兵的作用又不是很大。

三K党是两年前在田纳西的普拉斯基创立的。许多三K党党员曾是邦联军队的各级军官，这个秘密团体像邦联军队那样，从南部白人社会各阶层中吸收成员。其领导人中有二十多人是邦联的将军和校官，为首者是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他是三K党的奇才。到1868年，三K党已经从一个无害的兄弟会发展成头戴兜帽、全力维护白人至上的恐怖组织。它处罚那些离开雇主、抱怨工

资低或对白人“蛮横”的自由民，鞭打自由民学校的教师，烧毁他们的校舍。但更为重要的是，三K党党徒恐吓并暗杀共和党领袖和选民。三K党及类似组织，如“白山茶花骑士团”，实际上成为民主党的武装辅助部队。

三K党声称其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我们的人民〕将被迫用暴力和鲜血去干掉无法无天的暴君和罪犯，这确实很不幸，”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报纸说，“但这又怪谁呢？……确切地说，不应该怪我们这些不堪忍受种种冤枉的南方人。而要怪激进主义和黑人平等权利的主张。……那些政治思想先进，主张社会进步改革的北部间谍们……罪有应得。”1868年8月，福雷斯特将军公开警告共和党领袖，如果他们胆敢使用民兵对付三K党，他们就要吃苦头：“我没有弹药去杀杀人的黑鬼。我想杀的是激进分子……在〔孟菲斯〕城内只有烙有标记者，而没有激进派领袖，一旦发生麻烦，这些人没有一个会活下去。”<sup>7</sup>

在1868年竞选期间，路易斯安那、佐治亚、阿肯色和田纳西的三K党及类似组织特别活跃。共和党虽然保住了后两个州，但代价惨重。阿肯色发生了二百多起政治谋杀，其中有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0月22日遭伏击而身亡。佐治亚的死亡人数低些，但恫吓和打人事件较多。这些伎俩使几千名共和党党员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佐治亚22个县的黑人选民的登记总数为9300人，但格兰特只得到87票。在佐治亚另外十一个县中，共和党一票未得。就这样，在4月份的州选举中共和党多获得7000张选票；而到了总统选举时，民主党反倒多得了45000张选票。

路易斯安那的情况更严重，一个国会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说，从1868年4月到11月，有上千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黑人。什里夫波特附近发生的两次暴乱死亡了一百多人。在奥珀卢萨斯的圣兰德教区发生的一次大暴动中，死亡人数估计共达二百人。圣兰德

教区的一位民主党领袖认为这个事件给黑人上了一堂“安全课”。他说得太对了，因为在选举日那天，这个教区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前去投票。7个教区在4月份总共投共和党4707票，而在11月却一票未投。21个教区上次投了共和党26814票，而这次只有501票选格兰特。就全州而言，共和党4月份得票58%的多数，到11月就变成民主党得多数票71%。

通过这些方法，民主党设法在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取得了胜利，并在南部其它地方使共和党的多数票大为减少，但是这种作法在北部对该党造成的损害可能大过其在南部得到的好处。它使共和党找到了口实来谴责叛乱分子和“铜头蛇”党徒企图用恐怖主义得到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1868年的选举格局和1864年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格兰特在北方得票的百分比（55%）和林肯在1864年得到的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州的选票发生的变化超过0.1%或0.2%。北部只有7%的县由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或正相反。西摩只在俄勒冈、新泽西和纽约这三个北方州获胜，而在最后一州又是仅以0.1%的多数获胜的——这很可能是纽约市坦慕尼协会作弊的结果。西摩在五个边境州中的三个州（特拉华、马里兰和肯塔基）和八个经过重建的前邦联州中的两个州获胜，使他和格兰特的选举人票比数为80比214。民主党的议席稍有增多，但共和党仍然在众院保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参议院保有五分之四的多数。

##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格兰特当选后的那年，国会仍专注于重建还未完成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一部在每一个州都授与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没有这样一条修正案，黑人选举权的前景在民主党力图重新



控制的南部诸州就可能难以预料。况且，“重建法令”要求南部而不是北部给黑人以选举权，这种不平等的要求使共和党人感到不安。“我们在道义上没有权力把一种义务强加给国家的一方，而另一方却不承担这一义务，”一位激进分子写道，“直到这种权力为全国所有，我们才能享有和平。”<sup>8</sup>

虽然衣阿华(又译艾奥瓦)和明尼苏达最终在1868年经公民表决采纳了黑人选举权，可是在北方二十一个州里有十一个州和全部五个合法蓄奴州里，黑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而美国六分之一的黑人居住在这些州里。如果给予他们选举权，他们大多会投共和党的票。因此，正像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指出的那样，“这回党的自身利益和百分之百的正义相一致了”。<sup>9</sup>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三十三个州中二十五个州的议会(不包括尚未重建的得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他们能够保证全国性的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不会受阻于公民投票，这类公民投票常使有关州公民权的修正案归于失败。

在格兰特当选和他在186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之间，国会召开了一次短期会议，专门起草“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根据种种提议归纳出三套修正案：第一套禁止各州以种族、肤色或曾是奴隶为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第二套除上述规定外，又加上禁止各州以文化、财产或出生作为有选举权的资格；第三套索性规定：凡年龄21岁以上之男性公民均有选举权。头两套方案只是限制州的权力，而第三套则要大大扩大国家的权力。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国会通过了第一种意见、也是最保守的修正案。许多激进分子担心，这一修正案不能阻止南部各州以文化或财产资格为理由剥夺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一位国会议员警告说，“在前叛乱州里剥夺有色人种公民权的手法仍旧可以做到；我告诉你，会这样做的。”<sup>10</sup> 温和派则认为，出于种族问题的原因，任

何比有限地禁止种族歧视更强烈的做法都可能得不到必需的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州议会不大可能不控制住选举规则；相当多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怀疑长远保障文盲的选举权是否明智；不得限制出生的问题可能使三个远西部的州不予批准，因那里反对中国人的情绪正在抬头。因此，这条禁止各州不得仅以种族、肤色或战前地位为理由而剥夺选举权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虽然最终确定下来，但却留下许多纰漏，使南部各州在一代人以后得以剥夺大多数黑人选民的选举权。他们使用违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目的的诡计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他们在1869年执行此法案的决心在1899年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1869年2月26日，国会通过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4个月之内，十七个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它，四个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否决了它。该修正案能否得到所必需的另外十一个州的批准还很难说。但是弗吉尼亚、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州重建的推迟给了国会一个机会来增强该修正案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州议员要求这三个州批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以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这三个州批准了这两项修正案，它们的州权在1870年初都得到了恢复。

这样，处于无州权境地的州只剩下佐治亚了。该州的国会议员曾经在1868年6月恢复过资格，但佐治亚州对重建精神的严重亵渎，使国会下令对它重新实行了军事管制。佐治亚州议会在1868年共和党人和保守党人的力量旗鼓相当。不过，一些南部白人共和党人很快变节，投向保守派。这些新加入的同盟者将二十八名黑人议员开除出去，理由是州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黑人适合担任公职。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资格条款的规定，投票赞成取消黑人议员资格的议员中有二十四人后来被证明自身就不适合担任公职！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撤销了佐治亚重返联邦。后来

那些被开除的黑人议员又回到议会，而那些不合格的白人议员则离开了议会，议会也批准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于是佐治亚的代表们于 1870 年重返国会。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佐治亚获得批准后，于 1870 年 3 月 30 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许多共和党人都坚信，这一成就是“这场战争诸问题中最后一个得到解决的大事”。现在是解决那些因全力解决地方上的争吵而长期被忽略的其它问题的时候了。自 25 年前得克萨斯合并以来，国家就因为这些争吵而无一刻安宁。“让我们结束重建吧，”《纽约论坛报》在 1870 年 4 月这样说，“举国对此已厌倦并腻味了。……让我们和平吧。”<sup>11</sup>

## 格兰特入主白宫

像尤利塞斯·格兰特那样以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善意入主白宫的总统是罕见的。既然重建已经“解决”，他的支持者现在急切地希望解决货币、财政、行政机构改革、外交政策和其它需要关注的“新问题”。但是格兰特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他的同事中有些人贪污受贿，而最重要的是重建中显然无法解决的许多难题，使许多美国人的希望破灭了，而他们以前正是抱着这些希望看着他的就职的。

总统对几个政府职务的新任命激起人们抱怨他搞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格兰特任命其妻子的一些亲戚为官。其它的职务，包括几个白宫官员的职务，为其前军队同僚所据有。后一类人中有两人——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将军和任陆军部长的威廉·贝尔纳普将军——后来被指控受贿，丢人地离开了政府。格兰特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他在选择助手时不具慧眼。他好像是赞赏富于进取的有钱人，随便接受他们的礼物和帮助而认识不到这样做的

潜在含意。同时，格兰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时则过于尴尬，无话可说，以致显得粗暴无礼，而这些人不久就组成了促使政府廉洁和有效率改革运动的先锋。

由于华尔街的两个大冒险家不择手段地要控制黄金市场，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在 1869 年大白于天下。格兰特就职没几天，国会通过了“公共存款法”，保证用黄金或等价物偿还政府所有的公债，并保证“尽快”使绿背纸币和黄金同价。但是黄金此时的贴水率仍约在 130 左右。贴水率的起伏波动招来投机商。从事这种投机的两个臭名远扬的人是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克斯。前一年，这两个华尔街的肆无忌惮的人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场金融大战，赢得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这场金融大战的主要内容是贿赂议员、收买法官和非法发行百万股伊利铁路股票。古尔德和菲克斯希望用这次冒险赚来的钱控制黄金市场，在卖方卖空时赚大钱。

但是，美国财政部每月定量出售黄金，这对他们是个阻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古尔德打算利用其同伙，华尔街投机家，总统的内兄艾贝尔·科尔宾去说服政府停止销售黄金。科尔宾把格兰特介绍给古尔德和菲斯克，他俩在自己的游艇和纽约一家由菲斯克部分所有的戏院里款待总统。古尔德向格兰特简要介绍了提高金价可降低小麦在欧洲市场的美元价格，从而增加出口量，故对美国农民有帮助的理论。总统未作任何许诺，但科尔宾让古尔德放心，政府会终止黄金销售的。

因此古尔德和菲斯克开始大肆购买黄金，使金元贴水率至 9 月 23 日涨到 144。9 月 24 日，“黑色的星期五”，那天，纽约黄金交易所一片恐慌，金元贴水率升到 162。这时格兰特已开始产生疑心，命令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抛售 400 万美元的黄金。此举控制了黄金市场的行情，贴水率很快降到 133，有几位经纪人和投机商随之

破产。古尔德在市场价格最高时出手，避免了大祸，菲斯克撕毁了几个契约也免去灾难。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很坏影响。当得知古尔德阴谋的真相后，格兰特和鲍特韦尔马上采取了行动才未在脏榜题名。尽管总统未受牵连，但是他不明智地和古尔德、菲斯克接近，以及其内兄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 战后的外交

### “亚拉巴马”号巡洋舰赔偿要求

在外交政策上，格兰特政府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也遭受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所谓成功是指解决了战时由“亚拉巴马”号及其它英制邦联巡洋舰造成的破坏而向英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美国谴责英国允许建造这些军舰是忽视和违背了中立国的义务。美国被炸船只的船主和货主提出的赔偿总数高达1500万美元以上。但是英国政府拒绝承担责任。几年来两国关系紧张。大西洋两岸的报纸互相进行挑战性的威胁。

在安德鲁·约翰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美英谈判签约以解决“亚拉巴马”号赔偿要求。但条约偏袒英国的解释，于是美国参议院在1869年4月以五十四票对一票否决了这个条约。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利用这一时机发表了挑战性的演讲，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而且要赔偿“间接损失”，包括赔偿因英国的行动和南部希望英国进行干预而使战争拖延所造成的损失。萨姆纳暗示，割让加拿大将是对间接损失的公正赔偿。虽然在外交上和国际法上没有间接损失的先例，但萨姆纳提出的极端要求还是引起许多对英国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仍然愤恨的美国人的共鸣。

萨姆纳的讲话提高了美国的赌注，似乎到了使“亚拉巴马”号

赔偿谈判希望破灭的程度。有一年多时间，这个问题没有明显的进展。但在幕后，纽约一名门之后，格兰特内阁中最能干的一员，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悄悄地为重开谈判而工作。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使有先例观念的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如果英国卷入战争，而中立国美国又为敌国建造攻击商船的快艇时，英国商业船队的可能结局。在这期间，萨姆纳因兼并圣多明各一事（将在本节后面加以论述）而同政府决裂。为了惩罚这位参议员的这种作法，并使他无力阻碍就“亚拉巴马”号赔偿达成妥协，支持政府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在1870年3月免去了萨姆纳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菲什设法创建了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来商谈解决“亚拉巴马”号赔偿和英美两国间其它分歧的条件。1871年5月，该委员会完成了“华盛顿条约”，该条约为仲裁美国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在条约中，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对“亚拉巴马”号军舰和其它在英国建造的军舰造成的破坏表示歉意。

美国参院很快就批准了“华盛顿条约”。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开庭的国际法庭由美国（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英国、瑞士、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的仲裁人组成。美国人认为间接赔偿应包括1863年7月4日以后的全部战争费用，理由是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只是因为英国的支持南部才得以战斗下去。愤愤不平的英国人威胁说，要是美国再坚持这种“不合理”的论点，英国就完全退出仲裁。菲什和亚当斯私下告知英国，美国不会坚持间接赔偿。1872年9月，仲裁人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英国持有异议）最后宣布，英国没能做到“应尽的努力”以阻止“亚拉巴马”号、“佛罗里达”号和“谢南多厄”号的建造和装备武器，故应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由这些军舰造成的破坏。这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改善英美关系的一个胜利。

## 圣多明各事件

格兰特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败是指企图吞并圣多明各(今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计划是“命定扩张论”的产物,而这一理论是在美国民族主义在内战中获胜后复兴起来的。现在许多共和党人的情感同当年民主党人的情感一样。国务卿西沃德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为获取与美国不接壤的领土开创了先例。内战表明,美国海军需要在加勒比海设有基地,故西沃德和丹麦协商签订一个条约,准备买下维尔京群岛。参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但是向加勒比海扩张的想法并未泯灭。

与兼并圣多明各计划有关的人像在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讽刺小说《镀金时代》里的人物那样。土地投机商、商业开发者、异常成功的金矿主和银矿主、希望在加勒比地区设有基地并作着巴拿马运河美梦的海军军官们在华盛顿组成了一个多米尼加院外活动集团。多米尼加独裁者,狡诈的博纳凡图拉·巴厄兹希望美国兼并,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对付革命分子的力量,在美国国内,那些不太为私利而支持兼并的人们,包括格兰特在内,认为美国拥有这块土地会给这个革命四起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会使其富饶的资源得到开发,会为美国的恩泽施遍整个加勒比地区叩开大门,并会使巴拿马运河工程得以开工。

格兰特越想越认为兼并值得一干。他希望此事能成为自己执政时外交政策成功的样板。但他因缺乏政治经验而尝到苦头。他的表现就像他仍然是一位只需发号施令的将军,而不是一位为了某一目标而必须争得政治支持的总统。格兰特未和国会领袖及内阁成员商议,就在1869年7月派他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前往圣多明各调查兼并的可能性。热心的巴布科克超越授权,带回一纸兼并条约。格兰特不顾这一议事程序不合规定,将这个条约交给瞠目结舌的内阁成员。国务卿菲什一言不发,他对整个设

想不热心。其他阁员也沉默不语。最后，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不过，总统先生，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兼并圣多明各？”<sup>12</sup>

格兰特已经暗自作主了。他又派巴布科克带着国务院的授权去圣多明各，以恰当的方式就该条约重新谈判。巴布科克按令行事，第二次返回时带来一个条约，该条约使圣多明各成为美国的领土并宣布其 12 万国民为美国公民，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只不过是 150 万美元。圣多明各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赞成兼并。1870 年 1 月格兰特自豪地把该条约呈交参议院——麻烦就此开始了。

查尔斯·萨姆纳领导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该条约作的报告正好相反。萨姆纳和那时是密苏里参议员的卡尔·舒尔兹是参院反兼并力量的领袖。他们严厉指责那些买下大批土地指望从兼并中发横财的道德败坏的开发者。他们将传统的辉格党与共和党的敌对扩大。舒尔兹质问道，将一个新的信仰天主教的混血民族并入一个种族问题已多得不能再多的国家是否明智。萨姆纳担心占有圣多明各会威胁邻国海地的独立，除利比里亚外，海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治的黑人共和国了。“这些岛屿从气候上，从占有情况上和命运上来说……都属于有色人种，”萨姆纳说，“我们不应该占有他们。对土地的贪婪绝不应该用于反对这个种族的权利。”<sup>13</sup>

格兰特遭到这样的反对甚为生气，为了签定这项条约，他亲自游说参议员，强调合并之后美国的资本、企业和政治制度将会输往那个岛国，对圣多明各和海地的穷苦黑人都有好处。格兰特私下用尖刻的语言指责萨姆纳。为了得到南部共和党参议员（他们本会听从萨姆纳的领导）对该条约的赞同而采取了高压行政手段，使总统和参议员之间令人不快的不和加剧了。萨姆纳的一位马萨诸塞州朋友和同盟者，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任用了一批联邦检察官和法官，引起南部共和党人的不满。霍尔还与政府的盟友，



马萨诸塞共和党中正在崛起的派别领袖本杰明·巴特勒不和。为了取悦巴特勒，保证南部选票赞同该条约，格兰特在1870年6月15日解除了霍尔的职务，由默默无闻的佐治亚人阿莫斯·阿克曼替代他。总统还通过任命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助手担任权力很大的纽约港税务员而使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成为条约的支持者，这一任命对后来的贪污丑行播下了种子。这些行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使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疏远了政府。1870年6月30日，参议院以28票对28票否决了这项条约，有19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9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总统怀恨在心，为了报复萨姆纳，解除了他的门徒约翰·洛思普·莫特利驻英公使的职务。当局为此举辩护，说莫特利同萨姆纳一样，以其所处的重要位置阻碍“亚拉巴马”号赔偿问题的解决。但是萨姆纳的朋友正确地理解为这是企图惩罚这位参议员。1870年冬天至1871年期间，格兰特和萨姆纳的公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格兰特顽固地重提兼并圣多明各的问题，尽管连支持他的参议员都承认这一设想已经失败。萨姆纳抓住这个机会，在一次参议院演讲时严厉指责总统，说他步富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和安德鲁·约翰逊的后尘。这太过分了。萨姆纳演讲后不久，亲政府的参议员们罢免了他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些事件严重地分裂了共和党。因圣多明各而发生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狭隘的报复特点。萨姆纳高傲的自负和公正道义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演越烈。但在这位参议员的许多旧日的自由土壤党人和辉格党人朋友看来，格兰特搞的自相残杀似乎是在攻击使得共和党成为伟大政党的理想。

他们担心共和党会落入像康克林和巴特勒这样的分赃论者和投机者的手中，这种人在反奴隶制运动中没有根基而又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在格兰特第一任期内得到推动的文官制改革运动加

剧了“新”、“老”共和党人(为简化复杂的实际情况而姑且这么说)之间的不和。

## 文官制的改革

“政党分赃制”——竞选获胜者按照此制度将公职授与本党的工作者，以示回报——是美国政治中历史最悠久的制度之一。当某党不执政时，当官的希望是保持该党忠诚一致的粘合剂。而当执政时，估计政府工资开支的2—3%就可使该党的党员们心满意足。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改革者抨击这一制度既浪费又腐败。他们强调，政府官员的任命应根据能力和优点而不是对党的忠诚。为达此目的，罗得岛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从1865年到1871年在国会每次开会时都提交一项议案，提议建立一个文官制委员会，通过举办竞争性的考试来任命官员。虽然詹克斯的提案未曾获得通过，但是支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到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的改革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改革运动之一了。

该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居住在东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大多是共和党员，同该党过去的辉格党良心派一致。他们对英国文官制度的抗腐败能力大为赞赏，极想效仿之。职业政治家们蔑视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民主的生命之本。他们谴责这些改革者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嘲笑他们是拿严肃的政治取乐。

在格兰特执政之初，改革者对这位超越政治的总统寄予很大的希望。格兰特似乎也有与他们相同的改革情绪。他和白宫所有的新主人一样，对成群结队的讨官者和令人生厌的恳求者大为烦恼。格兰特曾对一位朋友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总统职务的祸根，在

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人比总统更渴望进行文官制度的改革。……他一定是文官制度的改革者，因为他需要安静。”<sup>14</sup>

但是格兰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充其量是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内政部长考克斯和司法部长霍尔在各自的部里实行公平考试来确定某些职务的提升和任命。格兰特在1870年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里敦促制定改革立法。虽然两院想加以阻止，但还是作出联合决定，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为任命文官制定新的规则。格兰特任命乔治·威廉，《哈泼周刊》的编辑，一位主要的改革者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推荐各类竞争性考试作为获取各级文官职务的必要条件，还敦促取消党对工资的核定。格兰特颁布了这些规则，下令于1872年1月1日开始实行。但是国会拒绝拨给足够的经费，使文官制委员会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规则。虽然有些政府部门采用了某些规定，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分赃制并没有被彻底改革。

国会中那些在圣多明各事件上曾与格兰特最为一致的共和党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文官制委员会陷于瘫痪。这使改革者们对总统在该问题上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格兰特对海关和国内税收部门几个职务的任命令改革者失望。而公然使用任职权力和在圣多明各条约战中牺牲司法部长的举动更使改革者惊骇不已。1870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办事认真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在与那些力图破坏其任命政策的政党分赃论者进行了一番激战后辞职不干了。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评论这一事态发展时说：“这是总统一方向政治蛀虫投降，这群蛀虫败坏着政府，永远使它齷齪不堪。”<sup>15</sup>

## 自由共和主义的基础

考克斯、霍尔、萨姆纳、莫特利事件——对改革者来说，总统好

像为了党内最坏的人而牺牲了党内最好的人。到1871年，语言中出现了“格兰特主义”这个新名词。它代表着改革派认为的战后美国出现的所有错事：政府中的分赃制和腐败；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识论；办事不诚实；以及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在1873年写的小说中所讽刺的那种无止境的实利主义和一夜发财的贪欲，他们的小说——《镀金时代》——成为这个时期的代号。

当然，这一切的责任都让格兰特来承担也是不公平的。他为人正直，真心实意地希望改革，他在任期内取得的几个成就应该受到称赞。和其他地方的腐败相比，联邦政府的腐败就“逊色多”了。纽约海关中的小偷小摸不能同在该市作大案的特威德集团\*相比。纽约议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买卖政客的市场。据说，标准石油公司除了不能使宾夕法尼亚议会变得廉洁之外，对它什么都能做得到。战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和继1867年衰退之后经济爆炸性的增长，增强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也使全社会的各种道德标准下降。战时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政府契约的增多，为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强大的改革运动把焦点对准了腐败的黑暗角落。格兰特执政期间，许多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在清除自约翰逊政府，甚至自林肯政府以来就已大量存在的弊端。

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格兰特成了这个国家公认的诸多弊端的替罪羊。这种遭遇对较近代的总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格兰特和杰伊·古尔德与吉姆·菲斯克的关系；他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促成兼并圣多明各的人的关系；他和萨姆纳的争斗，以及像康克林、

---

\* 特威德(William M. Tweed, 1823—1878)美国政客，1859年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营私结党，侵吞巨额公款，约三千万至二亿美元，被《纽约时报》揭发，被捕判刑，死于狱中。——编注

巴特勒这样的人在其政府中影响的明显扩大……，这些都激起坚持改革的共和党人起来造反。他们起初希望能控制该党，清洗那些分赃论者，并以支持改革的总统提名人取代格兰特在 1872 年竞选总统。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改革者脱离了共和党，自己组建了“自由共和党”。他们的目标正如卡尔·舒尔兹在 1872 年自由共和党大会上宣布施政方针时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国内精英为之骄傲的”政府。<sup>16</sup>

当自由共和党人把注意力转向南部时，他们发现某些最“杰出”的人物竟是前邦联分子，他们中许多人都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被共和党政府解除了权力。在这些自由党人看来，南部的格兰特主义同华盛顿的格兰特主义是一丘之貉。“毛毡提包客—黑人政府”和“刺刀统治”成为 1872 年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

## 第三十章 南部问题， 1869年—1872年

### 南部共和党人：黑人、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

在美国政治史上，重建时期的南部共和党是独一无二的。它在这个地区并非土生土长。大多数白人认为，它是令人讨厌的变革的一个外来的工具。在北部，共和党代表了人口中最富有、受过最好教育、最有影响的人；在南部，该党的大部分追随者却是穷人、文盲、无权无势的白人——还有黑人。令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南部共和党人在掌握权力几年后就被赶下台，而是他们竟然能够掌握权力。

南部共和党的选民大约有80%是黑人。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没有土地的前奴隶，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主要来自于黑人社团中的富裕阶层。在被选入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黑人中，至少有五分之四受过教育，四分之一的人在內战以前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些人出生在北部，并在北部受过教育。大约五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其中当牧师的人数最多。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农场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四分之一多的人是工匠或小生意人（木匠、裁缝等）。尽管黑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与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中任职的黑人相比，这里的专业人员和战前自由民的比例似乎较低，而农民、工匠和文盲的比例则较高。

1868年到1876年间，在南部选出的十四名黑人众议员和两名黑人参议员中，除三人外都受过一些中等学校教育，四人上过大

学。几名在州政府中任职的黑人官员还曾享受过受教育的特殊机会。乔纳森·吉布斯战前是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毕业生。1868年到1872年他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1872年到1874年他是该州教育总监。弗朗西斯·卡多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以及爱丁堡和伦敦的神学院上学。他担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州务卿达四年之久，还在该州担任过四年的财政部长。

在对重建时期的传统描述中，黑人领导人和黑人选民们被描绘成无知无能的人，实际并非如此。的确，五分之四的黑人选民和大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官员不能读写。这一缺陷不能归咎于重建时期，而是由于旧的统治没有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有记载说，黑人提着篮子去投票处，把答应选谁的“选票”拿回家去。还有记载说，县财政官员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些故事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歪曲。其实大部分黑人官员的能力同他们担负的责任是相当的，大多数的黑人选民也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文盲没能阻止黑人理解投票的意义，正如北方的爱尔兰移民懂得同样的道理一样。参加联邦派同盟的集会和投票本身就是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我们对这次投票没有准备，”威廉·贝弗利·纳什承认说；他是参加了1868年南卡罗来纳州立宪大会的代表。他从前是奴隶，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正像把一件工具交给一个人，让他去使用，到了一定时候他就学会一门手艺。投票也是这样。最初，我们或许不懂得它，可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尽我们的责任了”。<sup>1</sup>无论重建时期的黑人政治家和选民有什么样的缺点，我们很难说他们在为本州服务方面比那些在1861年把南部引向灾难的白人前任更差。

与黑人缺乏能力的神话相联系的是重建时期关于南部州政府的“非洲化”的传说。一位名叫詹姆斯·谢泼德·派克的北部记者在1873年写了一部关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书。书名叫《一败涂地的

南卡罗来纳州》。这是一篇控告“黑人统治”的杰作。他在描写该州众议院时写道：

议长是黑人，秘书是黑人，看门人是黑人，小听差是黑人，岁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黑人，教士是黑人。坐在一些桌子后面的是黑人。在刚果以外的其它地方很难看到这样的黑人。……这是人口中的糟粕，穿上了其有智慧的前任们穿的衣服，并且对广大人口实行无知和腐败的统治。正是野蛮地使用世界上最粗暴无知的民主方式压倒了文明。<sup>2</sup>

“黑人至上”是“野蛮的非洲人”在南部十个州行使“不受控制的权力”之本，这个题目乃是民主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这种论调堂而皇之地写进了重建时期的许多教科书，也在公众的记忆中打上烙印。

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建的最盛时期，即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黑人也只不过担任了 15% 或 20% 的公职。1868 年到 1877 年间，南部众议员中只有 6% 是黑人。虽然有几个黑人担任过副州长、州务卿和州财政部长，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提名或当选为州长。只有一个黑人，南卡罗来纳州的乔纳森·赖特成为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同其在该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接近。在州议会里，从 1868 年到 1876 年，众议员的 61% 和参议员的 42% 是黑人。那几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由选举产生的州和联邦政府的全部职位中，黑人担任了其中 52% 的职位。在其它州的议会中，黑人从来没有在众参两院中占过多数。这就是所谓“黑人统治”的真实情况。

虽然白人只占南部共和党选票数的 20%，他们却掌握着该党的领导权。定居南部的北方人占据了约 30% 的共和党人担任的公职，但是他们占据的共和党投票数充其量为 2% 或 3%。这些跑到南部的北方人在更高的职位上干得更为出色；一多半的共和党人州长和近半数的共和党人众议员及国会参议员是来自北部的移



民。

“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在美国政治术语中是贬义词。本书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不包含贬义，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历史语言的一部分了。“南方佬”一词大概来源于一个名叫 Scalloway 的很小的苏格兰岛；该岛以其劣种牛马而闻名。在南部民主党人看来，“Scalawag”（南方佬）一词是形容那些参加共和党的南部白人的难得的合适字眼，因为他们是一群“卑劣、无耻、想报复、无原则……自私、卑鄙和道德败坏等等的人，连屠夫和狗都不愿意理睬他们”。民主党人承认，他们宁可喜欢“那些能够找到的最黑的人，也不愿要南部最卑劣的叛徒……，这些人已经玷污了尊贵的白人血液，是原则和种族的叛徒。”毛毡提包客一词是从“毡制旅行包”（carpetbag）一词演变而来。旅行包里装着提包客携带南去的物品，据说，这类人一路上劫夺孤弱的人。南方人形容他们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冒险家，一群流浪天涯的钻营分子”。“他们非常腐化、放荡、狡猾、无耻。他们在所经过的州中，连最低等的社会地位都得不到”。<sup>3</sup>

虽然有一些南方佬和毛毡提包客属于这类人，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一般地讲，南部共和党的领导人与另一个政党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相比，在诚实和能力方面不相上下。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他们比一般的政治家更具备勇气和理想，特别是提包客，因为他们是在进步的但被人反对的改革的第一线上工作。

大多数提包客是在内战以后、留在南部的联邦军军官。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自由民管理局担任干事，一些人当了教师或自由民学校的学监；另外一些人或是由于喜爱南部的气候，或是由于看到战后的南部边疆有许多经商的机会，因而决定在那里定居。在提包客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法律、医生、工程师或教书。参议员中有半数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不管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提包客在美国政界中也许是受过最好

的教育的人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带来的不是寒酸的毡制旅行包，而是相当数量的资本，并且在南部投资。他们还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用现代化的方式改变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恢复瘫痪了的经济，并使这里的政治活动民主化。这种改革运动引起了南部人的敌视。提包客们很明白，作为入侵军队的战士，他们刚开始来到这个地区时就不受欢迎。

许多南方佬同提包客们一样，对新南部怀有美好的憧憬。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共和党是“推动进步的党，推行教育的党，促进发展的党……。北方佬及其思想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们的资本来建设工厂、车间和铁路……。我们需要他们的干劲和胆识去经营这些工厂，我们从中学会怎样干”。一位阿肯色州的南方佬问选民们：“你们需要横穿你们州的优质公路吗？你们需要免费桥梁吗？你们需要为你们的孩子受教育提供好条件的免费学校吗？”他下结论说，如果需要，就投共和党的票吧。<sup>4</sup>

南方佬主要来自于1860年—1861年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山区、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西部，以及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的北部。他们从来不喜欢种植园制度；就像他们与南部邦联作斗争一样也同种植园制度作斗争。他们之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共和党允诺他们推翻种植园主的势力。1868年，一份致“佐治亚州穷苦白人”的共和党传单中表达了这个情绪：“让奴隶主贵族永远不能统治你们。投这样一部宪法的票吧——它会让你们的孩子受到免费教育，使可怜的负责人摆脱富有的债主，让你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足够的宅地。最重要的是，它使你们同那些过去吹嘘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每拥有一个奴隶就享有五分之三的选票的那些人平起平坐。”<sup>5</sup>

共和党人还从住在黑人聚居地区和城市中的前辉格党人那里获得了支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861年是摇摆不定的分离主义

分子，在战后也不愿意加入民主党。这些前辉格党人在战前曾努力促进南部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毫无成果。于是，他们转向了共和党，认为它是搞现代化的政党。在密西西比州，10个白人共和党控制的县中有8个为了开发木材业而将两条新建的铁路线连接起来。亚拉巴马州参加过辉格党的南方佬领导人期望共和党人通过调动私人 and 公共资本来促进“工业的复兴和繁荣”。“用铁路把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和南部联系起来，”一位南方佬编辑写道，“并且由州政府出资兴建，这是非常必要的。”<sup>6</sup>

这样，1870年的南部共和党是一个由黑人和白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住在山地的自耕农和住在平原的企业家、文盲和大学生组成的脆弱的联盟。这个由不同派别、阶层组成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尤其是南方佬更容易脱离共和党，因为他们常遭到说他们背叛种族的攻击。对一个南部白人来说，公开蔑视社会习俗需要有勇气和自信。有一位南方佬，他的老朋友拒绝同他讲话，因为“任何光顾黑人俱乐部的白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当然也就不能同一位绅士说话”。1872年，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悲叹道：“连我的亲戚都同我断绝了往来，原因是我在共和党的政府里任职。”<sup>7</sup>

民主党人尽力利用种族隔阂来分裂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保守派的主要报纸宣称，“是黑人还是白人统治北卡罗来纳州？这是首要的重大问题。所有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都应该摆下。”这种战术削弱了南方佬的力量。“让黑人永远满足是困难的”，一位白人共和党人承认。黑人候选人竞选公职阻碍了共和党获得白人选票的机会。“如果黑人硬要在候选人名单上塞进一个黑人，”1868年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那么候选人名单就不会产生出来。”<sup>8</sup>

许多黑人领导人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保

持着低姿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要求黑人扮演的角色应与其投票力量一致。“在全美国、在各党中,难道不是拥有最大多数的阶级首先得到考虑吗?”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在1870年这样问道,“没有自己领袖的人民是不会成为伟大的人民的。”<sup>9</sup>

黑人争取权力的运动,在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使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增加。但是这也削弱了白人共和党人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些黑人占多数的州和县里,使这些地方的南方佬们很快就开始投向保守党。<sup>\*</sup>站在共和党一边时间最长的白人是住在山区的白人,那里黑人较少,提包客也较少。作为外乡人,提包客不太屈从于地方上的压力。由于与共和党在战前就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的。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从事过黑人教育和争取黑人平等权力的工作,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看到黑人执政而感到震惊。一位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写道,“北部出生的激进分子,比在田纳西州出生的效忠分子自然更具有反对奴隶制的热情。与激进党的其他派别相比,他们更愿意支持给黑人的新的权利,或给黑人要求新的特殊照顾。结果,……他们更受黑人的信任。”<sup>10</sup>

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包客和黑人之间充满着和谐与亲密。相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爆发口头上的互相攻击。黑人领袖们谴责提包客行使家长作风,想限制黑人,只担任一些低级职位。一些提包客则预言,如果黑人共和党人过早地摆脱白人的监护,就会发生灾难。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提包客在1871年写道:“黑人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来领导这个旨在促进和平和繁荣的政府。”<sup>11</sup>

然而,提包客与黑人之间的摩擦同提包客与南方佬之间的摩擦相比,毕竟轻得多了。在种族问题上,北部人比当地白人共和党人更为激进。他们在诸如公共娱乐设施和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这样

---

<sup>\*</sup> 南部大多数民主党组织有几年一直称自己是“保守的”或“民主与保守的”组织,目的是鼓励从前的辉格党人转变立场。

一些敏感问题上，有时投支持黑人的票。其他不太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摩擦，乃是党内对权力和官职任命权的争夺。“我们的联邦公职人员几乎全部由提包客组成，”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抱怨道：“我们南部人民中有功劳的人和一流的政治家被排斥在外，而让这些人保持着权力。”亚拉巴马州一位著名的白人共和党人也哀叹道：“一个在本地生长的忠于联邦的美国人在将来能够做些什么、期待些什么、或指望些什么呢？提包客已经得到了所有共和党的东西——政府职位、大学、中学都被他们占据了！”<sup>12</sup>

在共和党组织中，容易引起分裂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战前就获得自由的黑白混血人后裔与前黑人奴隶之间的矛盾。在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领导权早已被混血种后裔阶层所垄断，由此造成的不同肤色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黑人社团中几乎达到了公开化。党内黑白混血种后裔和黑人之间的摩擦有时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歧还严重。据说，一位参加南卡罗来纳州 1868 年制宪大会的混血种后裔候选人说：“假如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黑人政府——一个由纯黑人组成的政府，我就迁移走。”另一方面，一位黑人领导人这样谈论混血种后裔：“他们属于哪个种族？……我知道我的祖先曾在非洲灼热的沙漠上行走。然而，为什么这些血管里流淌着大量白人血液的家伙总想着要和黑人搞联盟，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我们种族’——他们不过是些杂种。”<sup>13</sup>

与共和党内部的这些分歧相反，南部民主党人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逐渐变得团结起来。作为在野党，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赶走可恨的黑人—提包客政府。为此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不与不稳定的共和党联盟发生正面冲突。对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两党相对内聚力<sup>\*</sup>的调查表明，从 1868 年至 1876 年，民主党人平

---

\* 政治学概念，用来衡量立法机构中一党成员在投票表决时的一致程度。

均分数保持在 75%，而共和党人则是 45%。<sup>14</sup>

几乎在每一个州，至少在一次重要的选举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党人投向民主党保守派。这为通过保守派联盟，开辟了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拯救”（民主党人用语）的道路。弗吉尼亚州是第一个被“拯救”的州，开始于 1869 年。田纳西州开始于同年晚些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开始于 1870 年（虽然共和党人在 1872 年曾重新控制了亚拉巴马州，但是到 1874 年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佐治亚州开始于 1871 年，得克萨斯州是 1873 年，阿肯色州是 1874 年。由于共和党在 1872 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所以，“拯救”进程暂时被打断了。但是，从激进的重建时期一开始，共和党在南部的力量就开始衰落了。

## 掌权的南部共和党人

南部共和党人在短暂的执政时期里，确实在促进南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在各州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共校的公立学校体系，州政府还投资兴建铁路。<sup>\*</sup>他们继续进行了堤坝、桥梁、道路、公共建筑和其他被战争毁坏的设施的重建工作。为了吸引人们在南方企业中进行投资，他们还设立了工业委员会。他们重新组织了司法体系并使之现代化。在一些州，他们通过了人权法和反种族歧视法。尽管这两个法律难以得到实施，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表明，种族平等得到了保证。

取得这些成就花掉了许多钱——比南部各州在内战前的和平时期里花掉的钱还多。奴隶的解放使各州要求职业的公民人数增加了近一倍。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制度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尽

---

\* 这两项内容在下一章讨论。

管在最初阶段，自由民管理局和一些北方援助自由民协会在财政方面给予过帮助，但是学校还是吸收了州政府的大量基金。修补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财产损失和向兴建铁路贷款花去了更多的钱。结果，在共和党掌权的最初几年里，州、县的开支、税收和欠债急剧增加。1870年的税率比1860年高三至四倍。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南部的各种税收平均来讲不比中西部乡村地区的税收高，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财富遭到了破坏，财产的价值也减少了。因此，南部的税收基础也就被削弱了。奴隶解放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基础，因为在旧政权统治时期，征收奴隶税是重要的税收来源。这样，白人小土地所有者纳的税比其在奴隶制下交的多。仅此一项就使许多白人憎恨共和党人。房地产所有者几乎在南部所有的州都组织了纳税人协会，要求减税。由于这些人或是纳不起税，或是拒绝纳税，使得学校和社会服务设施陷于瘫痪。接踵而来的财政混乱使南部各州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北方人和南方人眼中失掉了信任。

## 腐败问题

大量宣传重建时期政权的腐败行为，也损害了共和党人的声誉。“如此假公济私和恣意掠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极少见，”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在重建时期结束之后不久这样写道：“由于那些完全不配享有公民资格的人和对廉洁政府不感兴趣的人（如纳税人）左右着选举，……所以，贪污盛行无阻，舞弊十分猖獗。”这种解释被当成历史事实而为人们所牢记。一位学者写道：“在南部各州政府中，那些渎职的官僚们已经成为南部的沉重负担。现在南部到处是难以置信的道德败坏、舞弊和私吞——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转变成一架破坏的机器。”\*<sup>15</sup> 这段评论代表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为

\* 要了解传统历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深入的探讨，参见肯尼思·斯坦普(Ken-

止大多数历史分析文章的典型观点。

如此歪曲事实是不多见的。的确，许多重建时期的州政府不能说是高效率或是公正的典范。铁路建设的鼓吹者们为了获得优惠的条件而去贿赂议员和州长。官员们把掺假的合同赠送给朋友，然后接受回扣作为报酬。一些拨给学校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被行政官员们卡住。路易斯安那州举办的彩票活动似乎使每一个参加的人都堕落了。州所承担的印刷合同已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在南卡罗来纳州，八年(1868—1876)的印刷费用超过了在此之前八十年的全部印刷开支。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在得知该州众议院议长据说在赌赛马中输了1000美元之后，投票同意补贴他这个数目。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罗伯特·斯科特(1868—1872)和富兰克林·摩西(1872—1874)对加在他们头上的大部分诽谤也许是无法推卸的。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提包客亨利·克莱·沃莫斯(1868—1872)也许是受诽谤最多的人。不过他不应受到这样多的诽谤和诬蔑。当然，在他当政期间，舞弊行为在路易斯安那州相当猖獗。但是，在他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在他之后，这种现象也将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沃莫斯大概对阻止舞弊行为做得更多，而不是参与其事。1870年，他对促请政府廉洁的一个新奥尔良代表团说：

你们指责议会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通过了许多旨在提高一些个人和公司地位及权利的法案。让我提醒你们，这些人和公司正是你们当中最了不起的。比如这个银行提案，现在就在有人在议会中搞暗中活动，想方设法让议会通过这个提案。我们在众议院中已经两次否决了这个提案。可是，现在它又被

---

neth Stamp):《重建时代, 1865—1877》(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纽约版, 1965), 第一章。



提了出来。谁在其中捣鬼呢？是你们的银行经理们，……这些人在贿赂议员们，以达到通过这个提案的目的。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的干预呢？”

在另外一个场合，沃莫斯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无论怎样，受到疯狂辱骂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议员们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一样地善良。哎，真糟糕，在这里每个人的道德都败坏了，腐败成风。”<sup>16</sup>

正如沃莫斯所说，应当深入地看待共和党中的舞弊现象。一是许多民主党人也参与进去，并且从中获利。一位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编辑承认：“〔州长鲁弗斯·〕布洛克政府的挥霍——我们暂且不谈腐败——不仅使许多共和党人受益，也使许多民主党人受益。这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实。”<sup>17</sup> 二是许多被称为腐败的现象其实是缺少经验的各州政府在努力解决由于战后南部的混乱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时的低效率现象。另外，关于重建时期各州政府的“挥霍行为”，有一些是虚构的。州政府的负债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一样，在看到负债明显地急剧增长时，感到失望和焦急。1867年，在共和党重建时期刚开始时，南部十一个州的全部债务大约是17500万美元。在以后的四年中，又增加到30500万美元。不过，对增加的13000万美元的债务进行分析时发现：其中近10000万美元是各州对铁路股票的担保金。对各州来说，这只是临时债务，是由铁路财产作抵押的。如果这些铁路像有些铁路那样没能建成，那么，用于支付债务的铁路资产的所有权就归这个州所有。铁路股票由各州担保，这在南部和北部普遍实行了很长时间。重建时期，南部各州在这些投资项目中并没有增加多少负债，相反由于铁路的扩展而最终得到了利益。

最后，发生在南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应当与全国的情况联系起

来考虑。把南部所有州政府从纳税人那里窃取来的钱加在一起，大概也比纽约的特威德集团窃取的钱要少。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与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相比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也许不比它们更腐败。南部各铁路“集团”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吉姆·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在伊利铁路上的所做所为相比。在战后时代，各种道德标准的放松和实业家咄咄逼人的神气影响了南部，也像美国其它地方受其影响一样。

### 赦免的问题

事实上，南部民主党人憎恨共和党政府甚于憎恨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公正廉洁的共和党政权从某种角度来说，比一个不诚实的政权更令人惊恐，因为它能证明民主党人的说法：黑人无能和提包客行骗是无稽之谈。民主党攻击共和党腐败，是民主党发动的一场败坏南部共和党名誉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的成功在于许多北方人打算相信黑人不能胜任参政。一些北方佬还开始对南部白人的苦难遭遇感到内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代表宽恕与和解的运动在北部大力展开。

卡尔·舒尔茨和霍勒斯·格里利以这个运动最著名的领袖而崭露头角。舒尔茨领导了一个旨在结束剥夺密苏里州前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公民权的运动。这个问题曾形成自内战以来一直在控制着该州的共和党分裂的原因。1870年，“自由派”共和党人退出了共和党，并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控制了密苏里州。在此同时，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也在大声疾呼与南部和解，完全赦免前叛乱分子。格里利坚持说，不与南部“高层”的白人合作，重建就无法进行。他警告说，继续实行镇压和剥夺权力的政策，只会把全体白人赶到民主党一边，并且会加剧三K党的恐怖活动。反之，克制和实行赦免只会有利于这个地区的“本地方领袖”、特别是像格里

利这样的前辉格党人控制的南部温和共和党势力的增长。1871年春天，格里利在一次大肆渲染的旅行演说中，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南部。一些对格兰特失去信心的共和党人开始提到格里利可能会成为1872年的总统候选人了。

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谴责格里利的建议会导致灾难。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再反对狭义解释的赦免；即恢复前邦联分子尚未恢复的政治上的资格。但是，赦免在自由运动的词汇中，包含着更多的含义。它暗示要完全原谅反叛者，并且愿将北方的胜利果实交给他们掌管。根据《哈泼周刊》的言论，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为绝大多数南部白人还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仇恨联邦政府、首先宣誓效忠于本州，围捕和骚扰黑人，而且组织三K党”。<sup>18</sup>

### 三 K 党 问 题

1868年选举后，恐怖活动在南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据说，三K党的过份行动迫使格兰德·威扎德·福雷斯特在1869年下令解散这个组织。但是，福雷斯特有效地实施这一指令的能力有限。三K党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受到其最高领导的完全控制。地方团伙——无论他们怎样称呼自己，是三K党还是其它什么名字——在1869年以前就单独从事恐怖活动。1869年以后，它们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传说三K党现在已为不负责任的下层分子所控制，还说南部民主党的领袖们现在也转而反对三K党了。有关三K党的最有学术价值的史料说没有证据。有关该党成员的各种情况——由州民兵或联邦军逮捕，由大审判团起诉、定罪，他们的坦白——表明在有些地区，贫穷的白人确实领导了三K党地方组织；但是三K党成员来自社会所有阶层，其领袖常常是知名人士或是这些人

的后代。<sup>19</sup> 大部分三K党员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是参加过南部邦联部队的退役军人。他们采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事实上，他们已经变成南部民主党用来推翻南部共和党统治的一支准军事秘密武器。

三K党使用暴力，其目的之一是要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控制黑人。被认为对白人至上造成威胁的黑人学校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几十所黑人学校被纵火烧毁。民主党的报纸往往对这类事件冷嘲热讽。1869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滑稽地报道说，天上出现了一个彗星，彗星尾巴落在地上，烧毁了几所学校。“这条绝妙的彗星尾巴耍了个滑稽把戏，给这些县里的自由黑人教育泼了一盆凉水；因为黑人十分迷信，他们相信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扔掉铲柄和锄柄，不要再攥着封面肮脏的识字课本了”。<sup>20</sup>

但是，三K党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政治上。每次选举前的几个月里，暴力活动就有增长。所谓共和党的劣政成为三K党进行暴力活动的理由。1871年，《约克维尔(南卡罗来纳)调查者报》用简洁的语言写道：“这个县必将由聪明、诚实的白人(纳税人)来领导！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黑人的统治、黑人的刺刀（即黑人民兵）和那帮极为堕落的偷偷摸摸的议会议员了。……我们发誓要阻止黑人的统治，我们决心要结束黑人的统治，即便我们是‘被迫而通过暴力和使用暴力的’。”一旦这股力量推翻了共和党的统治，民主党的领袖们就劝告人们要和平和守秩序。1871年2月，《罗马(佐治亚)商报》的编辑亨利·格雷迪——本人也许是三K党员——劝告“秘密组织”的全体成员目前要绝对保持冷静和遵守纪律。……令人振奋的几次选举已经过去；正义的事业已经胜利，佐治亚州的敌人已经一败涂地……。让在‘恐怖政权’时期必要的严厉行动像梦一样结束吧。”<sup>21</sup>

北方的领袖们对南部共和党人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稳定

治安，感到大惑不解。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去试。共和党在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组织了民兵去追击三K党。州长们组织了民兵连，哪里出事就派它们去哪里。亚拉巴马州的费耶特县的行政司法官解释了这些努力为什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当我集合我的民兵时……，我就有了依靠。可是我一回家，就碰到我的妻子在哭泣，说他们刚才在那里向屋子里射击。当我们解散后各自回家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我们感到灰心丧气，不知道怎样做才好。<sup>22</sup>

民兵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如果部队是白人，指挥官也许怀疑这些人是否可靠，因为三K党混进民兵队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些州长，特别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组织了黑人民兵部队。但是，偶尔使用这些部队犹如火上加油，激怒了白人，不但无助于平息暴力事件，反而促使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州长们因为害怕发生全面的种族战争而不情愿使用黑人民兵。甚至联邦军队在1871年以前在对付三K党时似乎也难以奏效。一方面，驻扎在南部的骑兵部队很少（得克萨斯州前线除外），而步兵对付不了骑马的三K党徒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另一方面，南部各州的军队在行动上受到民法的约束。

如果执法官员们确实逮捕了几名三K党徒，然后将会怎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共和党控制的县里，无论证据如何，组织一个定罪陪审团也是困难的。虽然联邦军或许能在审判期间保护见证人和陪审员，但是他们无法防止几个月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些人会遭到报复。甚至就在审判期间，恐吓也时有发生。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位地方检查官就看到过一个案件，由于五个重要的证人被暗杀而无法进行审理。其它地方的证人和陪审员也有同样的遭遇。

看来只有实行军事管制法和大规模使用军队，才能对付三K党的暴行。但是各州的议会不愿意授权州长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阿肯色和田纳西州的武装部队向三K党发起了几次进攻，取得了胜利。阿肯色州州长、提包客鲍威尔·克莱顿曾是联邦军中一名坚强的老战士，有在密苏里州对付游击队的丰富经验。他组织了几个可靠的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民兵连，任命前联邦军指挥官们率领部队，并且派密探混入三K党。他在十个县里宣布实行军事管制，进攻和驱散三K党，逮捕了不少三K党成员，然后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有几名三K党员被行刑队处决。这些措施沉重打击了阿肯色州的三K党。田纳西州的威廉·布朗洛州长在1869年采取了同样的民兵武装行动。州议会授权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他在九个县实行了军事管制。这九个县全部位于田纳西州的中部和西部，而民兵则来自为共和党所牢牢控制的田纳西州东部。由于三K党的领导人在民兵到来之前就解散了他们的部队，所以实际发生的战斗并不多。几乎没有人被捕，也没有人被判罪。虽然这样的战役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但是其它形式的恐吓依然存在。1869年的秋天，共和党人失去了对田纳西州的控制。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霍尔登为了铲除三K党，自己却招来了灾祸。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和民事法庭在遏制1870年初日益蔓延全州的恐怖浪潮中表现得无能为力。州议会授权霍尔登宣布该州发生暴乱，但是拒绝授予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或是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霍尔登知道，不采取这些措施，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霍尔登发布了州长命令，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民兵逮捕了几十名三K党成员，而另外几十人出庭作证，以图为罪犯获得较轻的判刑。迫于不断增加的压力，霍尔登放弃了在军事法庭上审判罪犯的计划。那些被逮捕的三K党人照例没有一个受到民事法庭的判决。民主党人在1870年赢得对议会的控

制之后，于 1871 年 3 月以非法宣布军法管制为罪名，对霍尔登进行弹劾，并且宣布他犯有罪行。霍尔登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州长。

### 国会反三 K 党法案

在一些州里，三 K 党和类似三 K 党的组织在 1870 年变得十分嚣张起来。被三 K 党杀死的人数已高达数百人。南部共和党人急切请求联邦政府予以帮助。为实施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两个宪法修正案而进行棘手的立法工作就成为国会工作中的主要项目。阻碍立法的绊脚石是传统的联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州拥有判决谋杀、强奸、放火等罪行的司法权。按照许多温和共和党人的意见，联邦官员审判这些罪行将会严重损害宪法。然而，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条款规定，国会有权用适当的立法来执行修正案中的规定，这似乎在法律上承认有权背离传统的做法。1870 年 5 月 31 日，国会通过了一个实施法案，规定干涉选举权为触犯联邦的罪行，将受到联邦法院的惩罚。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剥夺他人的公民或政治权利将被认定犯有重罪。

这个内容随之成为对三 K 党人起诉和定罪的依据。然而，这项法律在生效的第一年里，格兰特总统和司法部长霍尔并没有执行它。他们的南部政策是更多地使用温和的而不是铁腕的手段。不过，到了 1871 年，政府的这一温和政策已经明显地遭到了失败，三 K 党的暴行正在逐步升级。格兰特和他的新任司法部长阿莫斯·阿克曼着手准备采用铁腕政策。1871 年 2 月 28 日，国会通过了第二个实施法案，决定成立一个由联邦官员监督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机构。但是，最重要的一项实施法案是 1871 年 4 月 20 日在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这就是人人知晓的“三 K 党法案”。这项法案加强了 1870 年的法案中关于重罪和反叛罪的条款，授权总统在

执行法案时可以使用军队。另外，总统还有权在那些他宣布为处在叛乱状态的地区里，暂时停止“人身保护法”。尽管这最后一条规定没有达到真正的军事管制法的目标（这意味着罪犯还得在民事法庭上受审判），但这已经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了。三K党法案还授权法庭用宣誓的办法把三K党嫌疑分子清除出陪审团，并对他们作伪誓的行为严加惩处。

根据这些法案，格兰特政府开始狠狠地打击三K党的活动。政府派间谍混入这个组织，收集它的活动证据。1871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还对三K党进行了调查，提交了一份记录三K党罪行证据的长达十二卷的文件。总统派几个连的骑兵到南部发生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以对付骑马的三K党人。由于格兰特对民主党攻击他搞“军事专制”很敏感，所以他使用他的权力时很谨慎。他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九个县里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州，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在士兵的协助下，逮捕了几千名三K党人。其他几百名三K党人为躲避逮捕，离家出走。联邦大陪审团提交了3000多份起诉书。几百名被告人为免受刑罚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司法部为了使入满为患的法庭能够进行对主要罪犯的审判而没有对另外近2000人提出起诉。主要罪犯中约有600人被定罪，250人被判无罪。在被定罪的犯人当中，大部分人只受到交纳罚款或短期服刑的惩罚。有65人被判处长达5年的徒刑，监禁在纽约州奥尔巴尼联邦监狱里。

大规模逮捕三K党人发生在1871年至1872年间，可是对他们的审判却拖延至1875年。<sup>\*</sup>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三K党，在南

---

<sup>\*</sup> 按照1870年和1871年的立法，逮捕和审判在1875年以后继续了20年，但是最高法院1876年的几项判决逐步取消了执行法令中的重要条款。民主党国会在1894年宣布这项立法的大部分条款无效。



部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对大批人定罪。这样,法庭在处理犯有罪行的被告人时相当宽大,而且格兰特也随意使用赦免权。到了1875年,所有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或是服刑期满,或是得到赦免。政府在1871年—1872年采取的有力行动,确实为前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至少是暂时的和平与安定。结果,1872年的大选是南部直到1968年为止的最公平、最民主的总统选举。

## 1872年的总统选举

尽管格兰特在执行“三K党法案”时十分克制,但是刺刀统治在1872年的选举中还是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到头来,政府的南方政策证明更多是捞取了政治资本,而不是负下债务。

1872年初,当格兰特被重新提名的可能性变得近乎明显时,对格兰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人决定组织一个第三党。这一运动最初在密苏里州开始,在民主党的支持下,自由派共和党人最近才勉强控制了 this 由正统共和党人控制的州。1872年1月24日,密苏里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发出5月份在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呼吁。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各州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在自由派旗帜下纷纷组织起来,选出了参加大会的代表。

### 自由派共和党人代表大会

聚集在辛辛那提的人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一些人怀着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即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自由贸易。他们反对关税保护,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却支持关税保护。他们支持改革行政机构,对格兰特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深感失望。他们极力主张实行大赦,结束对南部的刺刀统治。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把共和党看作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从一个政党换到

另一个政党，每个人至少已经有一次了——从辉格党或民主党转变为共和党，自由土壤党或许也可算作其中一次。共和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保全了合众国，废除了奴隶制，重建了南方。这些成就非常伟大。但是，自由派认为，一群无所顾忌的野心家和政客垄断了这个党。因此，成立一个新政党，把过去的理想同 19 世纪 70 年代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个时机已经再次到来；这种情形与 1848 年和 1854 年的情形一样。

在辛辛那提，理想的自由派与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的政治掮客们进行了接触。来自南北方的代表们是党内宗派或寻求庇护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把自由派运动当作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手段。这使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改革行政机构的支持者。代表们在大会上畅所欲言，对关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种局面把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因此，写进政党纲领中的关税一条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妥协条款。（在此期间，国会于 1872 年将税率平均降低了 10%，并且不再对咖啡和茶叶征税，因此关税问题变得不像以前严重了）。政党纲领中对于行政机构的改革态度十分强硬。它写道，在格兰特执政期间，官僚政府“已经成为党派专制暴政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自由制度的丑闻和耻辱，……是在共和政府中长存的威胁”。目前急需革除这些弊端，而这在“格兰特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是办不到的”。<sup>23</sup>

虽然改革行政机构受到了重视，但是南部问题仍是自由派共和党运动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党需要和民主党联合；二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的个性。1871年，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敦促民主党与从前的种族主义行为决裂，并承认重建的合法性。这为“民主党中的优秀人物”与反格兰特的共和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许多北部民主党人准备埋葬过去的“死问题”，并采取通向未来胜利的“新政策”。克莱门

特·瓦兰迪加姆是“铜头蛇”的大头目，在1871年5月的一次县民主党会议上，他提出几项承认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视其为内战的自然、合法结果的决议。这样，新政策就成了现实。十几个州的民主党大会在1871年通过了这些决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其结果是，“攻击我们不忠实和铜头蛇主义的把戏结束了”。<sup>24</sup>

这个预言下得早了些。其实，民主党同意接受重建包含了另外一番意思。民主党继续坚持各州享有权力的原则。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投票反对1870年—1871年的实施法令，并且指责逮捕三K党人是“暴君”和“专制”行为。这给自由派共和党人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初是支持这些法令的。为了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肯定了这些法令的用意，但是批评了使用“刺刀”去实施它们的行为。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被写进自由派共和党的纲领之中。纲领中有两条宣誓，要忠实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无论他的出生地、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但是纲领中另有条要求宽恕所有从前南部邦联的拥护者，鼓吹“民法置于军事权威之上”，号召“地方自治”（这已经是南部实行白人统治的代名词了），并谴责格兰特政府使用“专横手段”。<sup>25</sup>由于“刺刀”和“专横手段”已经证明是保护南部平等权力的唯一方式，所以纲领中的这些条文被普遍认为是在争取和民主党人搞联盟。

南部问题成为主要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自由派出人意料地提名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

格里利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由于一些涉及到名誉的原因，他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支持了各种各样不受欢迎、争论很大、或只是些平庸骗人的观点和立场。他的堂吉诃德式的性格和小天使般的脸庞使他成为漫画家们所喜爱的人物。他在1861年对南部十一个州和平

脱离联邦保持了短时间的沉默，以后又在鼓吹全面战争和通过谈判实现和解之间摇摆不定。战后，他支持强硬的重建政策，又要求宽恕反叛者。这一切给人以思想混乱、糊糊涂涂的印象。格里利长期攻击民主党人，这段历史使他不那么可能成为一个与民主党的联盟的领袖。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格里利毕竟是一名国内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到了1871年，他已经成为宣扬赦免、和解和给南部自治的主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在会前的活动中，格里利并没有很大希望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个名列前茅的候选人是外交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亚当斯严肃公正，赢得了新英格兰人和原则性强的改革者们的支持。而职业政治家们则倾向于戴维斯。实际上，两个人的竞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这为格里利争取戴维斯的拥护者、在第六次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投票中混水摸鱼地取胜铺平了道路。亚当斯的支持者们，包括卡尔·舒尔茨和其他许多自由派运动的发起人对格里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当中一些人愤然退出了这个党，一些人转向支持格兰特，或是退出了竞选。但大部分人还是吞下了这个苦果，准备竭尽全力推举格里利当选总统。

## 竞选运动

根据“不惜一切击败格兰特”的口号的精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宽宏大量地摈弃了四十年之久的敌对和攻击，同意提名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建立了州一级的联合投票点。竞选初期，格里利成为候选人的势头很猛。

但是，在推动自由派运动发展的三个问题中——改革行政机构，降低关税和与地方和解——格里利对第一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二个问题表示反对。这样，自由派共和党的“重要口号”就只剩

下大赦和自治政府两项内容了。格里利在接受提名的信中宣称，他打算把格兰特的联邦政府对南部诸州“内部政体的破坏”当作竞选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全国广大同胞……渴望互相握手言和，填平长久以来把他们分隔开来的鸿沟”。<sup>26</sup>

1872年5月，共和党国会免去了所有不合格的前邦联分子官员（少数合格者除外），借此减少了自由派呼吁大赦的潜在作用。除此之外，格里利在南部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政治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大多数北部选民还不信任南部白人或民主党人。《哈泼周刊》的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曾以他辛辣的漫画帮助推翻了特威德集团而闻名，现在又来搞垮格里利。在一幅漫画里，这位编辑站在一条沾满血迹的壕沟上同刚刚打死一名联邦战士的叛乱者握手。其他漫画表现格里利同叛乱者握手，中间是安德森维尔监狱和一名被三K党杀害的黑人。一幅击中要害的漫画描绘格里利正在向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伸出手，下面是林肯的坟墓。在纳斯特为竞选活动画的最有名的一幅漫画中，格里利被画成是海盗船的船长，他把船停在象征国家的这条船旁边，与此同时，武装到牙齿的邦联领袖们正在下面埋伏着，伺机冲上船，把它毁掉。

虽然有几名前自由土壤党成员参加了自由派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在主流上依然保持反奴和废奴的立场。几乎所有的黑人选民也是这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代表后者讲话时说，自由派运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无论共和党犯了怎样的错误”，道格拉斯说，“它毕竟是唯一对黑人权力友好的党”。民主党同意支持格里利，证实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想法，即自由派运动“不过是民主党用来夺取总统职位的工具罢了”。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虽然不能参加投票，但她却是废奴主义者中最机敏的政治观察家。她写道，自由派和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叛乱者和民主党人设置了种种欺骗圈套，想方设法

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们鼓吹“各州自治”，其含义是要恢复叛乱者为之奋斗的“各州的统治权”。……他们要求“国家应当恢复使用和平手段，政府的权威应当凌驾于军事权威之上”，这就是说，当三K党人再次屠杀白人或是黑人共和党人时，把他们交给南部民事当局处理——也就是交给法官和陪审员们处理，而这些人本身就是三K党组织的成员。<sup>27</sup>

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格里利的候选人资格开始显露危机了，自由派临时拼凑的竞选机器证明了不是财源充足的共和党的对手。许多不愿意投格里利票的民主党人决定在选举日那天呆在家里。格兰特在平息三K党的叛乱中取得的明显胜利使贪污腐化问题未能影响他的竞选。11月5日，总统取得了击败对手的决定性的胜利。格兰特获得了58%的选票，是从1828年到1904年获选票比例最高的候选人。他在北部的所有州和16个南部及边境州中的10个州里取得了胜利。共和党在众议院中重新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在参议院中保持了同样的多数。格里利由于在竞选中劳累过度，竞选的结果又使他心灰意冷，加上妻子最近去世给他带来悲痛，使他在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也去世了。

自由派共和党也就此解体了。尽管选举显然要求对南部实行严厉政策，但是改革与和解问题依然存在。自1873年经济大萧条后，全国一时兴旺起来的经济繁荣陷入了衰退，共和党因此对那些在1872年没有起作用的攻击感到招架不住了。

## 第三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的重建

### 南部的教育

重建时期最可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南部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同校的公立学校。这是一株脆弱的小树，受到暴力、贪污腐化、纳税人的反抗和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活动的猛烈冲击。然而，它没有夭折，而是成长起来，给自由民带来文化，并把某种现代教育体系带到了南部。

和平的降临使自由民教育团体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自由民一直渴望受到教育。除了拥有土地，黑人们把受教育看作是向上发展的最大希望。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民对一位北方的教师说：“上帝哟，夫人，学习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白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1869年，一位密西西比黑人发誓说：“我活着即使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也要给我的孩子们去上学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受教育是仅次于获得自由的最好的事情。”<sup>1</sup>

黑人受教育使许多南部白人不高兴，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危及白人的权威。较有远见的南方人则认识到，让自由民受教育很有必要，这会使他们对自己获得的自由产生责任感。但是他们害怕北方佬教师会把“错误的平等观念”向黑人的思想中灌输。在反对自由民学校的暴力事件中，大部分采取攻击北部教师的方式。为了阻止北方佬垄断学校教育，一些同情黑人教育的南部温和分子敦促南部白人去支持黑人学校。

然而这些呼吁都无济于事。在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里，南部

白人没有为黑人教育做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的传教士、联邦政府和自由民自己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黑人学校体系。通过美国传教士协会、新教各教派、特别是公理会的教友们，带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援助自由民的各种非宗教团体也在北方纷纷出现。其中，大多数团体在1866年组成了美国自由民联合会。黑人各教派，尤其是非洲人卫理公会也建立了一些学校。1866年，自由民管理局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发展黑人教育。

联合私人 and 政府办教育，这是一次独特的尝试。自由民管理局拥有许多学校，它为北部教师去南部提供旅费，还做总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种援助自由民的团体和传教士协会招收教师，支付薪金，规定学校教育的全部课程和内容。到了1870年，北方教师最初在数量上的优势已下降为不及半数了。在这一年，约有半数黑人教师，一小部分是南部白人教师。从1865年至1870年，用在自由民教育上的开支总计约为900万美元，其中自由民管理局出资500万美元，北方各个团体出资总共300多万美元，其余由自由民本身承担。1870年有4000所自由民学校，9000名教师和20多万名学生。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激动，但是在1870年，在170万名黑人学龄儿童中（6—17岁），只有12%入了学。南部白人儿童上学的比例并不比这高很多。

重建后的州政府在建立公立学校时许下诺言，要扩大教育体系，并使之稳定不变。但是这一诺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州政府的更迭，税收的困难，一些学校的资金在开销上的浪费和贪污，维持一套适用于黑人和白人两种学校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额外开支，学校中，特别是黑人学校中，合格的教师和合格的管理人员的缺乏，白人对黑人教育抱有顽固的敌视态度，以及乡村地区人口的稀少，所有这些都减缓了公立学校体系的迅速发展。大部分的好学校建立在城市里或大的市镇里。乡村里的学校即使开课，每年也只



开三个多月。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到 1876 年，在从前的蓄奴州里，半数以上的白人学龄儿童和近五分之二黑人学龄儿童入了学。在仅仅六年时间里，入学儿童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公立学校尽管还是一颗弱小的小树，但它已经在南部扎下了根。

随着公立学校的建立，各个非宗教的北方自由民团体把它们的财产移交给了各州的政府，随后这些团体就解散了。宗教团体也与各州订立契约，将它们所有的大部分初级学校转交给各州。但是，它们继续开办专科学校和“学院”，后者最初是中等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黑人教师、教士和其他有专业知识的领导人——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称这部分人是“有才能的人的十分之一”。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这方面继续走在了前头。大部分有名的黑人学院，诸如菲斯克大学、亚特兰大大学和迪拉尔德大学、塔拉德加学院、图加鲁学院、莫雷豪斯学院和斯贝尔曼学院，以及其他许多学院，都是从美国传教士协会和其他北方新教团体建立和资助的学校中发展而来的。经过这些学院和公立学校的努力，黑人的文盲率逐渐从 1870 年的 80 % 下降到 1900 年的 45 %。

### 种族隔离问题

19 世纪 70 年代，一场关于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但收效甚微。早在 1865 年，援助自由民团体在自己的学校中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坚持废奴的传统，欢迎黑人和白人到他办的学校中一起学习。美国自由民联合会在 1866 年宣布，消除种族隔离虽然“会在南部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这项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联合会不会“因为肤色而把孩子们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动乱和四年的内战使美国懂得了‘自由’一词的含义。上帝用不算大的代价教我们懂得了‘权利平等’的含义”。<sup>2</sup>

实际上,没有几个南部白人选择上这样的学校。从 1867 年至 1870 年,进入自由民管理局办的学校学习的白人学生只占 1%。除一个学校之外,没有几个白人学生在传教士开办的中学和大学学习,而这些白人学生主要是在这些学校里教书的北部人的子女。例外的那所学校是贝累阿学院。它是由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肯塔基东部创办的。从 1866 年以后,这个学院既招收白人学生也招收黑人学生,直到 1904 年肯塔基州议会恢复种族隔离为止。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贝累阿学院的黑人和白人学生平均各占一半。在黑、白人合校方面,这个学院在全美国做得最彻底。

重建时期,北部的几个州也开始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866 年和 1867 年,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议会效仿马萨诸塞州的榜样,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在以后十年里,密歇根、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堪萨斯等州制定立法或由法庭决定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尽管各州在执行这些法令时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居住在最北部的为数不多的黑人儿童中,大多数人上了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

南部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包括南方佬在内的白人代言人,不断地警告说,强行取消种族隔离会赶走所有的白人,从而毁掉刚刚建立的公立学校。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法律上规定保护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佛罗里达州在 1873 年也颁布了同样内容的法令。然而在佛罗里达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法令并没有执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县里,有一段时间,白人和黑人儿童去同一所学校上学。19 世纪 70 年代有几年时间,在新奥尔良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是白人和黑人儿童的混合学校。提包客出身的行政官员们在 1873 年强迫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接收黑人学生。但是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怀疑。几乎所有的白人都退出了这所大学。到了

1875年，十分之九的学生是黑人，剩下不多的白人大部分是提包客或北方传教士们的儿子。新奥尔良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成绩，部分原因是这个城市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城市人口包括了各种肤色的人种。在这个城市，很难截然分清“黑人”和“白人”的区别。即使这样，在新奥尔良市消除种族隔离也造成了紧张和暴乱。几千名白人儿童转到了私人学校学习，或者干脆退学。民主党在1877年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重新控制，结束了南部在公共教育中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次实验。

### 1875年的民权法

联邦政府也参加进来，试图制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令。1870年，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在全美国的学校、陪审团、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行动。“擦去这个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的最后一个污点”。在这场废奴运动的支持下，萨姆纳在以后的历次国会会议上都提出他的议案，直到1874年他去世为止。但是许多律师怀疑这个议案的合法性，因为第十四条修正案似乎只是要取缔由各州政府搞的种族歧视，而并不禁止个人或公司的歧视行为。公立学校显然属于州立机构的范围，但是人们对修正案中的同等保护条款是否适用于非公立学校抱有疑问。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同一个国会还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体系。另外，许多激进人士在理论上对萨姆纳的目的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这条法律可能会在实际上毁掉南部的学校表示了担心。一位激进派的编辑写道，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即便是建立在“毫无道理的偏见”之上，但“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知道，这种现存的偏见是不会因为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民权法案而被纠正的。让两个种族都受教育——即使是在‘分开’的学校里——要比根本不让他们受

教育要强得多”。<sup>3</sup>

尽管人们顾虑重重,参议院还是在1874年5月通过了萨姆纳的议案——有几个参议员投赞成票只是为了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萨姆纳表示悼念而已。众议院在把议案中有关学校的条款删去后,于1875年2月也通过了该议案。尽管涉及学校的条款被删去,这个法令的内容也已远远地走在了它那个时代的前面。许多投赞成票的国会议员不相信该议案会战胜合法的挑战,或者会被执行。司法部在实施这项法律上几乎没有行动。法令通过后,在南部以及北部,虽然有些铁路线、市区有轨电车线、甚至饭馆和剧院取消了种族隔离,向黑人提供了服务,但是南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这样做。在低级法院上诉的几起种族歧视案件被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83年,最高法院判决1875年的法令不合宪法(关于陪审团的条款除外),理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法令反对各州实行种族歧视,但是无权制定反对个人歧视行为的法令。

## 南部农业的新体制

重建时期的黑人教育在取得了飞跃发展之后,停滞在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格局上。\* 与此相同,自由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时得到迅速改善,后来却陷入了受剥削与贫穷的境况中。

对奴隶解放后的经济状况的研究表明,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其原因很简单。南北战争结束后,棉花以高价格出售持续了几年。同时,战后的混乱状况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人有条

---

\* 19世纪70年代,白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似乎比黑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高30%到40%,这个差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这个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件讨价还价，以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如果种植园主不愿意付出使人满意的价钱，那么他的工人就可以去其它地方谋生。劳动力的流动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在经济上获益的主要因素。南部白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使用了反诱惑法、流浪汉法、暴力和其他手段，但都没能完全改变这一经济现实。1865年，种植园主向自由工人提供生活用品和住房，以及5至6美元的月薪或收成的十分之一。到1867年，自由民的平均月薪已经提高到一个整劳力（成年男子）10美元，或者是收成的三分之一。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报告很有代表性：“保守的种植园主们在几个星期以前赶走了他们的黑奴，现在又出大价钱相诱，尽力留住黑奴们为他们干活。种植园主宁愿拿出一部分收成给黑人——最先是四分之一，后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二分之一——也不愿意让他们的种植园无人耕种。”<sup>4</sup>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在试图计算黑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十年中的收入。在分析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对利润分配的估算。利润来自投入棉花种植中的三部分资金：资本（土地、种子、工具等），劳动力和管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们只得到利润的22%——以食物、衣服和房屋的形式支付。赢得自由后，黑人们的分配一跃而成为56%。然而，这一增长并不表明黑人的所得有明显的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南部人均产量与战前相比普遍下降。黑人得到了一份较大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实际上是个小份额。第二，自由民不愿意再像奴隶一样被驱使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些黑人孩子们不再去做工了，而是去上学；一些母亲不再去棉花地里干活，而是留在家里看养孩子；男人们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自由让他们作出了这些选择，这是奴隶解放的功劳之一。这样还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是，总的劳动产品的下降也同时降低了每户潜在的收入。

经济学家罗杰·兰塞姆和理查德·萨奇在计算中考虑了所有

这些变量。他们估计,从 1857 年至 1879 年,棉花种植州的黑人人均农业收入增长了 46%,其中主要是在获得自由后的头几年里取得的。与此同时,棉花种植州的白人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了 35%。换句话说,黑人的人均收入从奴隶制时期占白人收入的 23% 增长到 70 年代占白人收入的 52%。虽然自由黑人享受着只有南部白人一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的收入自奴隶制以来有了相对增长,这是美国历史上按最大比例的收入再分配。表 31.1 说明了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sup>5</sup>

表 31.1 七个棉花种植州中人均农业收入

	1857 年	1879 年
黑 人	28.95 美元	42.22 美元
白 人	124.79 美元	80.57 美元
平 均	74.28 美元	60.13 美元

重新分配收入对从前的奴隶主是一大损失,他们再也不能把属于劳动者的那部分收入占为己有。战后的种植园主们大声抱怨这种使人窘迫的困境。“黑鬼们在偷懒,棉花价格在下跌,我变成一个失败者,就是说,我交出挣得的所有钱后,还要欠债,”一位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在 1868 年 1 月这样写道,“我比我所雇佣的任何一个黑鬼都干得多,得到的却很少。他们把粮食和衣服带给他们的家人,我却毫无所得。”这个种植园主在同年早些时候承认:“不能不说这种状况令人忧虑、令人沮丧。……我们感到低人一等,感到灰心丧气,精疲力竭。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穷。有为黑鬼们说话的立法者、陪审员和执行官的存在,我们只会陷进更深的深渊之中。……如果我能够卖掉我的土地或是筹到一笔钱,足够我买一张火车票的话,我一个星期也不愿意在这里再呆下去

了。”<sup>6</sup>

## 佃农制的演变

自由民的讨价还价加上其它经济因素，促使种植园主对劳动力进行重新组织。过去，奴隶们一般是在一个奴隶主、工头或监工的看管之下集体干活。内战结束后，种植园主们试图恢复这一制度，不过唯一出现的新特点乃是付给工资。但是这点尝试不久就告吹，因战后南部长期缺乏现金，致使许多种植园主无法支付或难以支付货币工资。这样出现了用一部分收成作为支付工资的现象。这对种植园主来说是有利的，它可以使工人知道工作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自由民看来，它包含了一种所有权的意义。他们开始要求，改变集体工作和用一部分收成或现金支付工资的旧的劳动方式，允许他们独立经营一块土地，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租金。在这种新的劳动方式下，自由民实际上成为农场的经营者，而不再是农场的劳动力了。他们至少可以享受某些方面的独立，而不再遭受白人日复一日的监督。

分成制佃农没有得到普及。事实上，到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各种令人困惑的土地和劳动力制度，并一直存在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1880年，南部农业中有四分之一的雇佣黑人（连同一些白人）领取工资干活。被人口调查者称为“农场经营者”的其他人中间，三分之二的白人和五分之一的黑人拥有其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十分之一的白人和四分之一的黑人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量的租金。四分之一的白人和二分之一多一点的黑人租种土地，分享一部分收成。支付固定租金有两种方式，支付现金，或支付一定磅数或蒲式耳数的收成（标准租金）。分成制佃农也采用两种方式（这一点非专门研究人员有时分辨不清）：租金分成和谷物分成。前者是土地所有者，只提供土地和住房；租佃农提供牲畜、种子、工

具和他的劳动力，并且支付四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在谷物分成中，分成农只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并且获得一半的收成作为支付他的报酬。谷物分成比租金分成更为普遍，因为大多数分成佃农缺少购置牲畜、种子和机器的资本。

## 土地所有制

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形式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谷物分成在最低一层，土地占有在最高一层。在重建时期，白人与黑人农场主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内战前夕，多于五分之四的白人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到了1880年，在种植棉花的南部，这个比例下降为三分之二，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内地的白人农民离开了贫瘠的土地，移居到需要劳动力的肥沃的低地地区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租佃农或分成农的身分，用拥有的薄瘠土地所有权与可望获得高收入的土地交换。使一些白人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第二个原因是缺少资金。这使他们负债累累，许多人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土地让与债权人。第三个原因是重建时期的税收加重。这也迫使一些白人农民沦为佃农。与此同时，许多刚刚摆脱奴隶制的、一无所有的黑人靠苦干、节俭和运气购买了自己的土地。至1880年，约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农场经营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黑人平均占有土地的英亩数不及白人平均占有数的一半，而且黑人占有的土地每公顷的价格低于白人土地每公顷的价格。然而，对一个在1865年还两手空空，到1880年已经干得很好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就，而且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因为此时许多白人农民正在失去他们的土地。黑人得到土地，白人丧失土地，这个现象有助于解释在重建时期为什么发生了白人迫害黑人的暴力行为。

尽管政府在1865年作出承诺，但它在帮助自由民获得土地方



面没做什么工作。不过，有三个值得一提的机构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它们是：援助自由民协会、“自由民银行”和“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

几个援助自由民协会或是在南部购买土地，分成小块后卖给自由民，或是充当北方慈善家的代理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在鼓励黑人积累资金方面，“自由民储存与信用公司”做得最为雄心勃勃。它是由反奴隶制的白人在1865年建立的，通常被称为“自由民银行”。银行在南部建立了分公司，吸引获释奴隶存款。在银行存在的九年里，有10万多人在这个银行里存款，总数达5700万美元。几千名自由民使用这笔存款购买房屋，农场和企业。然而，“自由民银行”的结局却很不幸。银行的分支机构采取卑劣的手段侵吞公款，银行在华盛顿房地产上进行冒险投资，以及对银行内部人员进行风险很高的贷款，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银行的储备。1873年发生的金融大恐慌结束了这一切。1874年该银行倒闭了。剩下的61000个存户每户平均损失了20美元。

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也有一部成就与欺诈交织在一起的记录。这个委员会是1869年由州议会通过成立的。它有资本500万美元，有权购买土地。委员会把购买到的土地分成从25至100英亩大小不等的地块，然后以优惠的信贷条件转卖出去。虽然贪污舞弊的行政官员们吮吸了一些资金，但是委员会确实将土地设法卖给了大约140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黑人。民主党人在1877年重新控制南卡罗来纳州后，保留了土地委员会，但是改变了它的宗旨。共和党实行的关于不履行抵押便取消赎回权的惯例结束了。南卡罗来纳州就这样重新夺回了黑人占有的大部分土地，然后把大块的土地再卖给白人。到1890年该委员会解体为止，它已将68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白人，把44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黑人。

## 谷物留置权制度

无论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是否已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农或分成农，他们都发现自己受到了信贷制度的剥削压榨。这个制度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变穷，并且延缓了南部农业的发展。

战后，种植园主和代理商们试图重建战前的市场经济结构。凭这个市场，代理商购买原料，组织信贷，通过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谷物投放到市场上。然而，由于谷物分成制和佃农制的发展，农场经营者的数字成倍增加。代理商们发现，为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和佃农服务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镇中的银行也不能像它们在中西部那样向农民发放贷款。战争毁掉了南部的银行，而银行在开始成立时资金就不很充足。即使银行有现成的贷款，南部也没有几个农民拥有足够的财产作为附属担保物。然而他们仍迫切需要贷款去购买种子、肥料和供他们能够生活到收获和出售谷物时的生活资料。走进这个信贷真空的是乡村中的街头商人。他们的商店预先将物资贷给农民，而以农民的收成作为抵押。

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土地所有者、乡村商人和佃农中发展着。在老的种植园地区，土地所有者有时开设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者扣押佃农的财产来抵偿债务，使自己也成为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个黑人佃农可能欠同一个人两笔债务。这个人也许是他从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为租金。他还享有收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赊账卖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佃农的收成不错，并且卖了好的价钱，在偿还了商店的债务后，他还会有些剩余。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跌，或者是干旱、洪水，粘虫以及其它十几种可能出现的灾难影响了产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负债更重。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也会遇到这一连串的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的负债现象愈来愈

愈严重。

商人通过赊帐从城市的批发商那里获得商品。批发商大概也是得到一个北方银行或是贸易商行的财政支持。这条长链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从中获取利润或提取利息。乡村商人在出售赊账商品中,赚取了高于同类商品现金价格的50%到60%的额外费用。实际上,这个信用加价就成为他的贷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欲熏心,通过篡改帐目来欺骗债务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农不识字,无法躲避这种剥削。他们也不能逛几家商店,选择最便宜的价格,因为在汽车时代以前,乡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里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规定也站在了种植园主和商人的一边,尤其是在重建结束、共和党被赶走以后,黑人农民日益成为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黑人向上进取的大门被关死了。

另一方面,谷物留置权制度造成了南方农业的恶性循环。许多农民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把在市场上最有销路的经济作物——棉花种到了家门口。这样造成了棉花价格的下跌,强化了南方单一作物的经济,并且耗尽了地力。棉花价格越低,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就必须种更多的棉花。这只会使棉花价格进一步降低。同时,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也减少了。那些原来可以生产自己的玉米粉和咸肉的农民变得愈益依赖于商人的供应。战争以前,棉花种植州几乎粮食自给。但是在战后的数十年里,它们不得不买进近一半的粮食,价格比南部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高50%。

从大学里的农学家到最底层的分成农,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有种植多种作物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是,谷物留置权制度阻止了南部农民这样做。“我们应当少种些(棉花和烟草),多种些粮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在1887年说:“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呢。那个以50%的利率供应我们口粮的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他只允许我们种植经济作物。……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购

买一切东西都用棉花来偿还。”<sup>7</sup> 结果，棉花的产量在1869年到1889年间增长了两倍多，但是棉花的价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给农民的必需品的价格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 南部农业的贫困

棉花价格的跌落是造成战后南部收入总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奴隶解放，它使黑人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南部的财富。第四个原因是1870年以后，由于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农业上的投资不多。南部农业依然是劳力最密集和资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国经济中发展最慢的一个部门。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南部的人均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一，并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间从占南方白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开始重新增长。实现经济解放的诺言，与重建时期的政治诺言一样，对经历了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来说只是实现了一半。

### 战后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部基本上仍旧以农业为主，农业部门的落后也减缓了这个地区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1860年到1880年间，当北部的农业和制造业的人均产量分别增长了30%和45%时，南方的人均产量却分别下降了19%和2%。1860年，南部邦联十一个州拥有这个国家制造业资本的10%，和30%的铁路总英里数。但是到1880年，这十一个州只拥有5%的制造业资本和17%的铁路英

里数。

## 战后铁路的发展

南部在铁路建设中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认识到,改进运输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党都号召各州要在铁路建设上给予援助。重建时期的各州政府都在自己的州内为建造铁路提供土地,并且,每建设一英里铁路,州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一笔固定资金或者用该州的信贷款来支持铁路的债券。地方政府购买了铁路股票。南北战争以前,州和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在重建时期由共和党赞助、州政府向铁路提供的援助却引起了争议,原因是援助中的贪污舞弊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把柄。共和党人常常遭到指责,这不仅仅是因为贪污舞弊行为,还因为他们好像成就很少。从1865年到1879年,在南部只铺设了7000英里的新铁路线,而在北部则铺设了45000英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由于舞弊行为,也不是由于效率低,而是由于战争对南部铁路的破坏程度。战后最初几年,大部分的投资和建设都用来恢复原状。直到1870年,南部铁路才修复到战前的水平。只有到了这时,新的建设才蓬勃开展起来,但是1873年的金融大恐慌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使建设速度放慢了。

在北部,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在战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占了主导地位。铁路是全国最大的非农业雇主。与铁路相联系的各种新的工业和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在这些年里,由于火车的燃料不再使用木头而是用煤,这使1865年到1880年间煤的产量增加了三倍。<sup>\*</sup> 战后几十年里,铁路轨道也由原来的铁轨换成了钢轨。采

---

\* 煤燃烧后产生的水蒸汽取代了木柴和水,成为战后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

用新式贝塞麦炼钢法后，钢的成批生产量从 1867 年的微不足道的 19000 吨猛增到 1880 年的 1247000 吨。70 年代冷冻火车厢的出现使长途运送加工过的肉类成为现实。反过来，这也促进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肉类工业的发展，并且在得克萨斯州和一些平原州中出现了有名的牲畜饲养场。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随着铁路在这些州中的大量铺设，这些牲畜饲养基地也从赶着牛群到广阔的草原上去啃食青草，改变为用较科学的方法训养牲畜的畜牧业。

为了使火车舒适，有效率和运行安全，人们加强了对铁路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技术革新。乔治·普尔曼在 19 世纪 60 年代改进了卧车厢；乔治·威斯汀·豪斯在 70 年代发明了汽闸，许多人在用关节挂钩替代不安全的链环和钉子方面做出了贡献。1883 年，铁路业不能容忍由于各地的地方时间不同而引起的火车运行时间上的混乱，于是将全国分成四个时区，从而创造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标准时间的概念。

### **技术和市场的革新**

在战后的 15 年里，还出现了其他许多发明，它们改变美国的经济，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是打字机、带倒刺的篱笆、电话、白炽电灯、电唱机。最后两项发明主要是从托马斯·爱迪生那富有智慧的大脑中产生的。1881 年，他的实验室还第一次成功地制造出用来发电的“发电机”。这为作为 20 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能源和用来照明的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是采用新方法推销工业产品的关键时期。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铁路和内战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掌握着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与批发商、代售商、进口商或零售商一样，商人的作用如同中间人，通

过他们的手，产品从生产者手里送到了消费者手里。19世纪中叶，铁路网的扩大开始从两方面打破了这个为商人统治的王国。首先，通过扩大销售网，才有可能把生产集中在几个地方和几个较大的公司，这样，公司可以对自己的市场施加一些影响。第二，作为钢轨、火车头、车厢、车轮和其它产品的用户，铁路为生产者提供了第一个大型的集中化市场。生产商不需要中间商就可以成批地出售按合同订购的商品。内战产生了第二个集中化市场：政府。战争还解放了许多制造商，使他们不会为了短期贷款而依赖于批发商和商行了。战时的通货膨胀和利润使生产厂家还清了债务，并且积蓄了为将来发展的资金。

战后，中间商特别在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中衰落了，如在钢铁工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钢铁工业中，生产商将自己的产品（成批地）卖给其它工业——铁路、火炉制造业、电线制造业，等等——而不是卖给个人。另外，许多消费品工业利用城市的发展而造成集中市场的增加，建立了自己的推销和市场销售网，从而消灭了介于制造业与零售商之间的所有的中间商人。例如，在肉类包装工业中，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在全国建立了连锁冷藏仓库，这样斯威夫特的牛肉和猪肉能够直接卖给零售商。在石油方面，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各个城市中心批发自己的煤油和润滑油。其他消费品工业也竞相效法，或是尝试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铁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把肉从芝加哥的包装厂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公司仓库里去。洛克菲勒之所以能够以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并把他们逐出商业界，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批发销售，另一方面他迫使铁路在货物运费上以回扣的形式给他大的折扣。

## 反铁路情绪

当铁路在许多重要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巨大作用时，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和批评。从1866年到1873年，铁路建设的速度异常迅猛。在那几年里，新铺铁路的英里数(35000英里)是1830年到1865年铺设铁路的总和。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穿过1800英里长的人烟稀少的平原和高低不平的群山，它的建成引起了世人的敬仰。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波因特，一枚连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黄金道钉钉入路轨上；这是时代的象征，人们纷纷拍照，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是，在建设这些铁路以及西部其它铁路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涉及战后铁路的问题。在没有人烟的危险禁区建筑铁路，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资本，这只能由政府提供土地和贷款。为了增加补贴，在一场铁路铺得越多越好的竞赛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筑的铁路质量很差，不久就不得不对部分线路返工重建。美国镀金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信贷公司丑闻就是由于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资金而引起的。

这个听起来异国情调很浓的公司是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组成的，是一个铺设铁路的建筑公司。他们利用自己是一个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的权力，把合同赠送给另外一个公司——信贷公司，而他们自己也是该公司的董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做法减少了建筑公司在铁路建设上的财政风险。但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且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信贷公司的一些董事们免不了通过虚报建筑合同来大饱私囊。

一位名叫奥克斯·艾姆斯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他恰好是一家向信贷公司出售建筑器材的公司的老板，也是信贷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在相信国会对这些事情不会认真追究后，于1867年和1868年将信贷公司的股份以象征性的价格卖



给了几个有影响的众议员。艾姆斯私下写道：“引诱人们去关心自己的财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把这些股份放到“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sup>8</sup> 1872年，纽约一家报纸披露了这些交易。公众群情激愤，要求国会对此事进行调查。众议员艾姆斯受到了谴责。其他几名共和党政治家的政治前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从前几乎不为人所知悉的利益冲突的概念也随着对这一事件的反宣传而为人们所认识。

到了1873年，铁路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攻击。建筑第二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北太平洋铁路线——迅速导致了一场金融恐慌，从此战后繁荣的幻影被打破了。经济陷入了萧条，直到1878年才开始复苏。南北战争时期北部金融界的英雄杰·库克成为1873年大恐慌的替罪羊。库克的费城银行在1869年接手管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政。尽管该公司已经得到国会批准转让的大片土地和巨额贷款，但是该公司竟然仍没有建筑一英里的铁路。在库克的管理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从1870年开始从德卢斯向西建筑铁路。为了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建设工地，库克用累进式方法经营，吸收一切可以得到的股票和贷款。其它银行、铁路公司和工业企业也起而效法，拼命地扩大企业和大搞投机。1873年9月，纸制金字塔倒塌了。库克银行由于负债过多，成为第一家关门的公司。如同多米诺骨牌，几百家银行和公司相继出现了恐慌。在全国364家铁路公司中，有89家倒闭。两年中，有18000家公司垮台。到1876年，失业率增长到了14%，‘‘艰难时世’’像阴云一般笼罩了全国。

即使在大恐慌以前，中西部的铁路公司就已经引起了客户的仇恨。开始时，火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因为它把远方的市场同他们联系起来。现在许多农民开始诅咒铁路公司，因为它牢牢垄断着运输这条生命线。战时飞涨的谷物价格现在开始下跌，这更加

剧了这一形势。从1867年到1870年，小麦价格下降了一半。玉米价格在1869年到1872年间也下降了一半。运费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绝没有下降到一半。农民们抱怨铁路公司把他们搞成这般悲惨。铁路公司相信这样一条理论，在没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高的价格，在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低的价格。然而，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只有一条铁路线提供服务的地区。铁路公司还拥有许多谷仓。这些谷仓由于在验收粮食、划分等级上欺骗农民而受到了攻击。

农民们为了在出售谷物和购买必需品上绕过中间人，组织了各种市场购销合作协会。成立于1867年的“农业保护者协会”，又称“格兰其”，是许多这样的合作组织的保护伞。但是，农民不能修建自己的铁路。他们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们参加了政治，组织起“反垄断”政党，还选举了州议员。这些议员同其他运输行业的代表一起将“格兰其法”在六个州里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建立州铁路委员会，确定最高运费和仓库收费。铁路公司到法庭上控告这些法律。有八个“格兰其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于1877年在“孟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作了判决。法院认为，各州可以合法使用警察力量去整顿涉及“公众利益”的企业——运输公司、面粉厂、客栈等等。尽管最高法院表示了支持，但是某些格兰其法仍然很难实施。争取实施铁路规定的运动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势头。

## 劳工斗争

铁路还成为劳工骚乱和工人暴动的焦点。持续十年的劳工骚乱和四年的经济萧条，终于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大罢工。

从1865年到187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平均25%的速度增长，就是说，当总的价格指数从战时的暴涨水平下降了20%，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一点。增长的这部分工资也由熟练工人获得了，而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继续长时间地劳动，所挣

工资仅够糊口。尽管熟练工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许多行业中不断实行的机械化危及了古老的手工业技术，引起了工匠们对丧失独立的焦虑。这些曾经控制着自己行业的工匠们现在被迫成为拥有新式机器的工厂主的雇工。

繁荣与不安，两股对立的潮流交织在一起，掀起了组织工会的高潮。除了战前和战时成立的 10 个工会外，又有 22 个新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诞生了。许多工会联合起来，在 1866 年组成了全国劳工同盟。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在不降低工资的前提下，将每天平均 10 或 11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为 8 个小时。各个工会为了努力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采取了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形式，而且还借助于立法。在工业较发达的州，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出现了几个劳工改革党。马萨诸塞州的改革党在 1870 年竞选州长的选举中，该党的州长候选人获得 13% 的选票。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大保证了实行 8 小时工作时间的法案在六个州获得通过。但是，这些法案实际上充满了漏洞，而且缺少执行法律的机构。1872 年，政治上倾向于劳工、为劳工说话的人们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这些政治活动在工会领导人中引起了一阵紧张。许多人担心，分裂工会力量将不利于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实实在在的集体谈判。全国劳工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 18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获得公众选票的 0.5%。继这次混乱之后，劳工改革党和全国劳工同盟全都垮台了。

在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眼中，工人暴动使工会名誉扫地。1875 年，报纸用大字标题在显著的地位披露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矿区里的“莫利社”<sup>\*</sup>，引起了一阵轰动。这个地区是美国社会

---

\* 莫利社(Molly Maguires)，据说 1862 年—1876 年宾州无烟煤矿的恐怖活动应由该社负责。莫利原系一寡妇的名字，1840 年代，她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地主。——编注

中种族和阶级对抗的缩影。这个矿的所有者大部分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教友；许多工头和熟练工人是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新教徒，而大部分非熟练工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熟练矿工们组织了“工人互助协会”。到1873年它已经为自己的成员赢得了有限的利益。许多爱尔兰人属于“爱尔兰人古代公会”这个组织。自称是该公会核心集团的莫利社计划进行以雇主、工头和工人为对象的一系列的暗杀和仇杀活动。1875年至1877年，对莫利社成员进行了审判和判决（20人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这些判决不仅使该公会名誉扫地，而且还使煤矿的雇主们有机会发动逼人的攻势，要求法律反对一切劳工组织，以此来削弱“工人互助协会”的力量。

1877年发生的铁路大罢工引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仇恨。在这以前的三年中，东部的几家铁路公司以公司的收入减少为由，削减了工人工资的35%（在同一时期，零售价格下降了约8%）。工人们组织起来，试图反抗削减工资，但没有成功。1877年7月16日，当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第三次宣布再削减工资的10%时，两地的铁路工人同时举行了罢工，阻止火车运行，罢工波及到东部其它铁路线，速度之快可以与传递消息的电报相比。罢工使远到西部的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铁路交通陷于停顿。有10个州出动了民团。在一些地方，民团向罢工工人开了枪；在另外一些地方，民团却和工人们握手言和。应这些州的州长的紧急要求，拉瑟福德·海斯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到六、七个城市中去。到了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军队、民团和警察终于控制了局势。至少有一百名罢工工人、军队士兵和无辜的过路人丧生，有几百人受伤。罢工结束后，一些铁路公司部分撤消了削减工资的决定。但是各州和地方城市还是加强了各自的反暴动力量。在这些罢工中出现的阶级对立的幽灵吓坏了许多美国人，他们对前景感到悲观。

## 货币问题

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是,当时正就全国金融体制进行论战,并且愈演愈烈。继金融大恐慌之后,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在价格下跌的打击下怨声载道,为此,国会于1874年通过了一项提高绿背纸币和国家银行纸币价值百分之十的法案。但是格兰特总统的反通货膨胀顾问们劝他否决这个法案。共和党内形成了以主张收缩通货为一方和主张通货膨胀为另一方的两派,这种分裂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了损害。为了在1876年的总统大选前弥补这种分歧,该党财政专家、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了一项回收硬币法案。对收缩通货主张者来说,这个法案的优点是,从1879年1月1日起,允许用金币按票面价值收兑绿背纸币。对主张通货膨胀的人来说,这项法案的吸引力在于,它不再限制银行纸币的流通,同时规定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不超过三亿美元。这项法案达到了在财政问题上团结共和党人的政治目标。国会于1875年投票通过了这项符合共和党路线的法案。从理论上讲,“回收硬币法”允许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以满足经济的需求。但是,银行纸币问题一直与银行持有的美国债券相联系。随着战争造成的国家负债的不断减少和银行愿意出售债券并将收入投资于其它地方,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就受到了阻碍。从另一方面讲,“硬币回收法”确实实现了收缩通货主张者的目标——让绿背纸币和金元面价相等。作为财政部长的谢尔曼在1878年底亲自指挥,取得了这项成功。美国与西欧各国一样,也实行了金本位制。

这些活动并没有结束关于金融政策的争论,相反,却使争论更为激烈。一群金融理论家、劳工领袖、农场代言人和制造厂家坚持说,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通货不足,它特别损害了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因为那里缺少银行和纸币。它还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他们发现,由于提高了金元的币值,收缩通货使他们负债愈加严重。由于

利息率的提高和贷款来源的枯竭,那些需要资本的人也受到损害。谷物价格被压低,农民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硬币回收政策会由于进一步提高绿背纸币的价值而使局势更加恶化。绿背纸币——反回收分子这样称呼他们——相信,货币应当以经济生产力为基础。他们坚持要求使用一种流通货币——由国家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并且以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对它的信任作为对它的唯一支持。1876年,绿背纸币组成了“绿背党”。尽管绿背党的总统候选人只获得了1%的选票,但是,不断加重的经济萧条吸引了许多不满意分子在1878年站到了该党的旗帜下。绿背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15%的选票,选出了14名国会众议员。

## 银币问题

与此同时,金融争论由于银币问题的出现有了新的转变。经过几年的讨论,国会于1873年实行了一项取消银元作为货币单位(造币厂继续生产少量的银币)的铸币法令,停止用银币作货币本位。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准备使用金本位制,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项法令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金融论战在1875年底以后变得激烈时,反收缩通货分子开始把这项法令称为“1873年的罪行”——是一个欺骗农民和工人并使银行家发财的阴险的国际阴谋。它废除了人民的货币——银币。

要求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压力开始出现了。使压力愈来愈大的原因有两个。各类理论家和利益集团认为,把银币投放到经济中去,可以治愈收缩通货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孪生病症。同时,美国白银产量在1869年至1876年间增加了三倍,而黄金产量却在下降。这一情况扭转了自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来黄金产量一直增长的趋势。急速增长的黄金产量使黄金的市场价格对比白银的价格,是下降了。直到白银在公开市场上开出的价

格高于美国官方铸币厂规定的 16 盎司白银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价为止,这种情况才结束。但是,随着 1860 年代新银矿的开采,特别是位于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巨型银矿的开采,持续上升的白银产量使它的价格低于 16:1 的比价,这也为主张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那派人增加了力量。

这些压力终于迫使国会在 1878 年不顾总统海斯的否决通过了准许恢复铸造银币的布兰德—亚里森法案。然而,对主张恢复银币者来说,这并不是大获全胜。他们曾极力要求无限制地把所有送到铸币厂用于出售的白银都按 16:1 的比价铸成硬币。但是,由于这样做会增加银币的价值,并且通过把金元排挤出流通领域,而使美国离开了金本位制的轨道。所以,法案规定每月只准铸造 200 万到 400 万美元的限量银币。此后财政部铸造了 200 万美元的银币,并且通过用黄金来兑现白银和绿背纸币来保持金本位制。流通中的银币量从 1878 年的 6000 万美元上升到 1884 年的 18000 万美元。但是,这没有改变收缩通货这个时代的趋势。在以后的 35 年中,全美国有四种美元同时流通。绿背纸币、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包括可兑现硬币的银币证券)和金币(包括金币证券)。

虽然布兰德—亚里森法案没有结束这场金融论争,但却使它平息了几年。1878 年以后,经济开始复苏,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也开始缓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加上格兰特政府中新的丑闻被揭露,共和党遭到了削弱,这为它退出重建铺平了道路。

## 第三十二章 从重建后退

### 1873年—1876年重建时期解决的问题

格兰特总统在1872年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当选，这一结果看来是肯定了全国对重建的赞许。大多数选民否定了自由派共和党人呼吁让南部“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家乡”。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再次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继续控制前邦联十一个州中的七个。对三K党的起诉也迅速进行。

但是在格兰特第二任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上述成就是建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的。北部日益不信任南部共和党人就是要出乱子的第一个征兆。尽管自由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反对刺刀统治和提包客。

贪污腐化的呼声在1872年并没有动摇共和党的大部分选民，但在以后的几年间，这些呼声继续高涨。1873年—1874年间大多数争论都集中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上。

#### 路易斯安那州的纠纷

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内部的分裂导致1872年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出现两份，而其中一份得到民主党人的赞许。混乱的选举结果引起激烈争吵：到底是谁赢得选举。两派为了详细检查投票结果，剔除假票，各自成立了各自的“选举委员会”。正统的共和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民主党联盟各自召开其议会，各自为其选出的州长举行就职仪式。国会拒绝为路易斯安那州计算两派议长候选人的选票。格兰特在评论这一事件时代表了大多数的美国人的



意见。他说,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情况,“其混乱程度出乎我的预料”。<sup>1</sup>一位联邦地方法官最后宣布,共和党人的政府是合法的。格兰特下令联邦部队去执行这个判决。

这一行动的道义力量由于共和党人的名声不佳而失去份量。格兰特本人私下也承认,提包客州长威廉·凯洛格是个“头等蠢才”。<sup>2</sup>一些坚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称凯洛格的政府是一个靠联邦军队的刺刀维持其统治的“伪政府”。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而且实际上还组织了一个得到名叫“白人同盟”的半军事性武装小队支持的影子政府。白人同盟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他们一有机会就对共和党人和黑人发动攻击。该州由行政司法长官指挥的民团和以黑人为主的民兵对此无能为力,而联邦军队的力量又有限,对新奥尔良以外的地区便力所不及。1873年4月13日,黑人民兵和武装的白人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克尔法克斯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二名白人和估计七十名黑人的死亡,其中有一半黑人是在他们投降后被惨杀的。这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联邦政府逮捕了一百多名白人,控告他们参与了克尔法克斯的大屠杀。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却在一项判决中宣布释放他们,理由是对这些人起诉的根据是1870年执行法令中的部分条款,而这个法令据最高法院说是违反宪法的。

在1874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暴力事件也不断增多。8月下旬,白人同盟在靠近什里夫波特的库沙塔,谋杀了六名共和党官员。这是发生在乡村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两个星期后的9月14日,在新奥尔良发生了一场以警察和州民兵为一方,白人同盟为另一方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有三十人丧生,一百人受伤,双方死伤人数相等。不过,白人同盟在战斗中击败了对手。这次骚乱之后,格兰特派出了更多的联邦军队。军队制

止了大规模暴乱事件的发生,保证了选举平安进行。但是,要阻止白人对边远地区庄园和农场中的黑人选民进行威胁和施加经济压力,军队就难以做到了。

1874年,在州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又出现了新的有争议的结果,并且导致了武装干涉。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在州众议院取得了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的选举委员会拒绝承认几个选区的选举结果,理由是这几个选区的选民受到了恐吓。选举委员会证明了53名民主党人和53名共和党人的选票有效,并且把未定的五名候选人提交给了州众议院。当众议院在1875年1月4日开会时,民主党人进行了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他们任命了一名州众议院议长,让他宣誓就职,然后通过了一项使五名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获得席位的动议。蒙在鼓里的共和党人立刻组织起来,阻止通过这项动议。凯洛格州长为此要求联邦军队把这五名没有当选证明书的民主党人赶出去。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把白人同盟成员称作是一群“土匪”,应当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对他的部下、一名陆军指挥官带兵冲进州议会大厅并赶走那五名民主党人的行动表示了赞同。

这一事件在国会和整个美国引起了轰动。大部分激进共和党人和一些温和共和党人都赞成军队的行动。白人同盟不值得宽恕,不止一家激进派报纸这样说。“要无情地全部消灭他们。……即便在南部实行军事统治40年也胜过把南部交给这些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家伙统治一天。”<sup>3</sup>然而,民主党人和相当多的共和党人谴责政府支持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动用军队侵犯一个州的立法机构。“如果在路易斯安那州能够这样做,”卡尔·舒尔茨说,“那么在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发生类似的事情还会有多久呢?……要不了多久,一个士兵也会趾高气扬地走进国会众议院,指着议长手中的权杖说:‘拿开这个骗小孩的玩意儿!’”<sup>4</sup>

## 逃避承诺的北部共和党人

国会终于使路易斯安那州实现一项妥协方案：民主党人获得对州众议院的控制；作为交换，民主党人承诺在凯洛格任州长的最后两年不进行任何骚乱性活动。这项妥协为路易斯安那州带来了不稳定的和平。但是，南部其它州在1874年至1875年间，发生日益严重的分裂事件。如：阿肯色州共和党内敌对派别之间的布鲁克斯—巴克斯特之“战”；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内部的无谓争吵与分裂；密西西比的民主党人组成了袭击共和党人的“长枪俱乐部”。1873年得克萨斯为民主党人所控制，阿肯色和亚拉巴马也在1874年为民主党人所控制。越来越多的北部共和党人愿意在不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承认这些州易手。缅因州的一位共和党的领导人承认，选民们对提包客政府感到“十分厌倦”。格兰特的邮政局长哀叹道，各级提包客里“没有一个是一流人材。……这是些不易对付的南部无赖，人民再不会服从他们，我也不能责备那里的人民。”<sup>5</sup>

共和党人对争取黑人权利的承诺从来都不是很真诚。只是党内的激进派曾抱着真诚的信念支持过种族平等。然而，到了1874年，这些人中有些人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内战和重建带来的革命成果——奴隶解放，公民平等，黑人获得投票权，黑人参加南部州政府——与其说是出自为了黑人的动机，不如说是出于反对南部的目的。取得这些成果最初是由于战争时期的军事需要，以及和平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从社会目的来考虑的。随着北方选民十分关心的新问题——经济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跌、工资削减、失业、金融混乱——的出现，这些选民们对远方黑人的悲惨处境失去了兴趣。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对黑人就从未怀有多少同情。华盛顿的一家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在1874年1月评论说：“人民对抽象问题厌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兴趣。错综

复杂的黑人问题和处于无休无止的混乱状态中的南部诸州的重建,已经丧失了它们曾经发挥过的大部分威力。”一年以后,一位共和党政治家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一个意思:“实际情况是,我们的人民对‘南部人残暴无比!!!’这种声嘶力竭的叫喊感到十分厌倦。世道艰难、苛捐杂税使他们希望‘黑鬼’,‘使人厌烦的黑鬼’,最好还是下地狱或回到非洲去。”<sup>6</sup>

共和党人在1874年选举中的挫败加重了他们对重建的失望心情。民主党人在十八年中第一次夺得了对下一届众议院的控制,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获得了众议院七十七个席位,参议院十个席位;而且在全国每一个选区里都取得了这类胜利。马萨诸塞州甚至选举了一名民主党人州长,这在一代人中还是头一次。掀起这股民主党“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同以往一样,选民们在世道艰难时总要惩罚在朝的政党。但是,共和党的分析家们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选民对共和党的南部政策的厌恶。他们开始说,在1876年以前,要把提包客—黑人政府这个死包袱“卸掉”,以免在总统选举中再次败北。

卸包袱政策在1875年的密西西比的州选举中第一次产生了结果。为了这次选举,该州民主党人制订了一项“密西西比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将全体白人赶进民主党。民主党人使用了施加社会和经济压力、排斥和威胁等手段,强迫该州百分之十或十五的自称是共和党人的白人改变立场。一位屈服于这些压力的白人共和党人解释说,民主党人做起事情来“极其狠毒,我们不得不加入。……没有一个白人将来能够在南部生活而不和民主党打交道的,除非他愿意并且准备远离政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sup>7</sup>

密西西比计划的第二步是对黑人选民进行冷酷无情的恫吓与威胁。民主党人的报纸采用的口号是:“如果可能,和平选举;如有必要,诉诸武力。”经济威胁证明对黑人劳工和佃农是十分有效的。

他们被告知，如果投共和党的票，他们就甭想再有工作干。不过，仅仅这样还不够。民主党人组织了长枪俱乐部，把党的各个分部变成了兵工厂。他们发现，最好的政治策略是制造“骚乱”。每当共和党聚会时，——像7月4日的野餐会，是一次政治性集会，等等——武装白人就寻衅制造事端，最后导致开枪。在这类事件中发生最早、伤亡最重的一次是维克斯堡骚乱。它发生在1874年12月一次县选举的前夕。骚乱中，至少有三十五名黑人和二名白人被打死。三个月以后，维克斯堡的民主党人报纸宣称：“拯救维克斯堡的策略将确实能拯救整个州，除此法外，别无它法。”<sup>8</sup> 居住在这个州其它地方的民主党人采纳了这一建议。又有几起骚乱发生了，它们的规模比维克斯堡小，但被打死的黑人与白人的比例却与维克斯堡相同。

1875年9月，阿德尔伯特·艾姆斯州长——一个出生在缅因州，战争中获得过荣誉勋章，在提包客中最有能力的州长——呼吁华盛顿派兵控制这些骚乱。格兰特打算同意派兵，但是他的司法部长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代表团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说，即使派兵，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也将在选举中失败。而刺刀统治问题会使即将开始的俄亥俄州的选举朝着有利于民主党人的方向发展。司法部长在写给艾姆斯的一封信中，通知他联邦政府不派兵，同时教训州长说：“全体公民对南部每年秋天发生的这些骚乱已经习以为常。大多数人对政府出面进行的任何干涉行为都要加以谴责。……利用您本州的力量去维护和平吧，让全国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民——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共和党人——有勇气为他们自己的权利去战斗。”<sup>9</sup>

艾姆斯确实尝试过组织一支忠实的州民兵武装。不过，他这样做有困难。无论如何，他对使用黑人部队顾虑重重，害怕会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而在这种事件中，受害最深的往往是黑人。他选

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同民主党领袖举行了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民主党人答应保持和平，条件是共和党解散民兵武装。艾姆斯无可奈何地说道：“不管他们是否要夺取这个州，那又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去夺取它吧，我们只要和平，不要再有人被屠杀。”<sup>10</sup>

尽管选举那天异常平静，然而，暴力活动并未停止。共和党人在几个县的投票处没有露面，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五个县中，共和党人得票数分别是十二票、七票、四票、二票和零票。密西西比计划使在上次选举中比共和党少得三万张选票的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比共和党多获得三万张选票。

### 最高法院与重建

随着 1876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南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之外，各州的共和党政府已被当作包袱“卸掉”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华盛顿的一些事件也使联邦政府无暇顾及南部的共和党人，尽管政府还是抱着这个愿望。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削减了司法部的经费，目的是要逼迫该部减少设在南部的执法机构。1876 年春天，最高法院作出了两项判决，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美国诉里斯案”和“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已分别在 1873 年和 1874 年由地方法院审理过。里斯案涉及肯塔基州的一些白人试图阻止黑人投票。克鲁克香克案源自对参加路易斯安那州科尔法克斯大屠杀的白人的起诉。巡回法庭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决是，对这些白人的起诉是根据 1870 年的实施的法令，而巡回法庭对它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当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两个案件时，司法部停止了按执行该法令进行起诉的工作。司法部长在 1875 年写道：“我相信，在目前情况下无法给人定罪，最高法院认定这些法令是否符合宪法以前，应当中止按这些法令进行的刑事诉讼。”<sup>11</sup>

1876年，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判决，但是它的判决并不很明确。两个案件的起诉一方都被驳回，主要理由是1870年的法令在某些部分存在法律上的漏洞。不仅如此，首席法官莫里森·韦特对两个案件提出的严格见解，缩小了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对象范围。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两项修正案只赋予国会以制定反对各州歧视行为法律的权力。“国会有权……为实现这方面的保证而制定法律，但是它不能把法律条文引伸到各州去镇压普通的犯罪事件。……这一职责原本应由各州自己承担；现在仍然是这样。”<sup>12</sup> 对里斯案件和克鲁克香克案件的判决结果，加上北方人失去了贯彻重建的意志，这些都阻碍了进一步实施法律的努力。

## 政府丑闻

1875年和1876年出现的新的丑闻也使共和党人陷入了混乱。虽然这些丑闻不涉及南部，但是，丑闻的余波在各方面都损害了格兰特主义的信誉，并且进一步影响了共和党支持提包客政府的意愿。几乎每一级的联邦政府官员都被怀疑有非法行为。司法部长的妻子和内政部长的儿子被指控接受作为影响这两个政府政策的报酬的贿赂。这两名内阁成员在1875年辞职。1876年3月，众议院弹劾陆军部长威廉·贝尔纳普对西部地区军队营地服务商店的任命工作中(通过妻子)接受贿赂。贝尔纳普在参议院进行审讯之前就提出辞职，而格兰特总统在还不明白他所以辞职的用意时，批准他的辞呈，于是贝尔纳普得以逃脱判决。

这十年中，最轰动的丑闻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是酿酒商人和政府税收官员狼狈为奸的复杂组织，其中心设在圣路易斯，每年骗取政府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里斯托是负责揭露这个集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在1874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的前任是在被怀疑有不正当行为之后辞职的。布里斯

托组织了一批廉洁的官员。1875年5月10日，布里斯托的人在三个中西部城市查封了几家酒厂和几个国内税务所。经调查发现贪污受贿已经相当严重，甚至已经牵涉到了白宫。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他曾在1870年同圣多明各就倒霉的兼并条约进行过谈判——被证明是这个集团的一名成员。格兰特受到了震动，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让任何有罪的人逃脱”。几个联邦大陪审团对350多名制酒商人和政府官员提出起诉。布里斯托自己处理了176个人的案子，其中给110人定了罪。

但是，巴布科克不在被判有罪的人之列。随着检举起诉工作的进行，布里斯托成为共和党改革派——包括许多曾经指责格兰特，反对他1872年再次当选的人——的英雄。总统愈来愈确信，布里斯托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赞同改革派的高调，实际上就是在指控他的政府。他还开始相信布里斯托的热情的动机是希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格兰特对此十分恼火。他于1876年2月写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作为审判他的秘书时用。面对这样一份证词，陪审员们不愿意与美国总统对抗，投票同意巴布科克无罪。这是格兰特总统任职期间最令人遗憾的一段插曲。这件事也成为他在当政的最后一年中走下坡路的开端。

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的最紧张的场面之一，略次于1860年的选举。由于大量揭露了上层人士中的贪污受贿行为，所以改革也自然作为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主要课题出现了。在南部以及在华盛顿实施格兰特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无论谁竞选获胜，剩下的提包客政府很可能将在改革中不复存在。

## 1876年的选举

民主党人通过提名纽约州的塞缪尔·蒂尔登为总统竞选人而



昭示全国，他们将在竞选中利用改革问题的意图。蒂尔登作为纽约州民主党的主席，在搞垮特威德集团事件中起了作用，赢得了改革者的声誉。1874年，他竞选州长获胜后，就着手揭露一个“运河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个集团虚报一份维修伊利运河的合同来欺骗纽约州。蒂尔登参加了1876年的总统竞选，他的竞选纲领有12次提到“改革”一词。该竞选纲领宣称，只有民主党的胜利，才能把国家“从腐败的中央集权制中拯救出来。这个中央集权制连累了十个州的专制和贪婪的提包客政府后，再把联邦政府部门搞得百孔千疮，毫无能力、挥霍浪费和充满欺诈。”<sup>13</sup>

共和党人不乏鼓吹改革的候选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有本杰明·布里斯托。他在胜利地揭露“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中脱颖而出。但是，代表大会前在党内有声望的政治家是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他在1862年当选众议员，从1869年至1875年担任众议院议长。他极有政治才能，是富有魅力的人物。然而，他却成为改革浪潮的牺牲品。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期间，他曾买了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铁路公司的股票。当股票的价格下跌时，布莱恩将一部分股票以高出市场的价格卖给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两家铁路公司都已从政府那里得到过转让的土地。因此，它们都十分乐于同布莱恩这位影响颇大的人物保持友谊关系。布莱恩的敌人发现并且公开了这两笔铁路交易。这位众议员申辩说，这些交易是清白的，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由此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推举一个有污点的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而竞选的主要议题是改革和贫困，这样的前景使许多共和党人心灰意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缅因州的众议员虽然在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前六次选举中都名列榜首，但是，在第七次选举中，布里斯托的支持者和反布莱恩的激进派分子组成了联盟，一致提名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候选人。

海斯是内战时期的将军，三次担任过俄亥俄州的州长，是位大家都能接受的合适的候选人。在改革问题上，他信誉不错。在南部问题上他是个温和派。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保证给予南部“长期稳定”和实现“平民、政党和公众行使权利时，严格做到平等。”<sup>14</sup>到1876年，大部分的美国白人开始相信，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共和党未来的南部政策就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海斯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信中，采纳了在如何处理南部问题上的各种意见。这封信比竞选政策纲领更加重要。卡尔·舒尔茨打算让海斯宣布，“地方自治政府的立宪权力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海斯反对这个说法。它看来“使人感到在玩弄着猎刀和手枪的滋味。‘地方自治政府’已经使第十五条修正案在几个州中丧失了法律效力，而且很可能使第十四条和第十三条修正案也丧失法律效力。”海斯的信包括了每个人所期望的内容。对那些对提包客的统治感到无望的人来说，这封信允诺要支持南部“诚实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它也肯定，“如果人民中一部分人的立法权力长期受到蔑视，那么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sup>15</sup>

这封信几乎没有阐明共和党的未来政策。海斯在竞选中拒绝发表更多的意见，以免让公众费解。尽管海斯已经正式答复了舒尔茨，但是他几年来一直认为“刺刀统治”是一个失败。作为一名前辉格党人，他希望用安抚的手段代替高压政策，这样可以把南部从前的辉格党人争取过来，和共和党人一起把腐败的提包客们清除出党。他相信，在保护黑人权力方面，南部温和派的善良愿望和影响比联邦军队更能够提供保护。

但是，南部发生的几次事件，加上共和党人急需竞选纲领，致使共和党采取了强硬手段。7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汉堡，一队黑人民兵和两个白人之间发生了一起小的冲突。四天之后，这场小冲突竟发展为民兵和两百名白人之间的一场激战。这以后，

五名被俘的黑人“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北部老共和党人的战争叫嚣,但同时也使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团结一致,他们决心选举民主党的州候选人。他们还调动武装的“红衫”部队去威胁恫吓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选民。州长丹尼尔·张伯伦请求联邦政府增派军队。张伯伦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是耶鲁学院和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这次,格兰特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总统本人出面斥责汉堡大屠杀是“惨无人道的,是蓄谋制造的……,是继南部其它州发生的大屠杀之后的又一次大屠杀”,南部有几个州是“由通过欺骗和暴力手段选举出来的官员”统治着,“他们不认为这样的屠杀是野蛮的残暴行为”。<sup>16</sup> 政府不仅增派了军队去这些出事地点,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而且还在南部任命了几千名代理执法官和选举监督专员。显示武力的结果减少了投票处的暴力事件。但是,发生在远离投票处的威胁与攻击却无法制止。在前南部邦联的各州中采取这种策略,使共和党在 1876 年的竞选中失掉了约 250000 张选票。

南部人的暴行和叛乱者要重新夺取政权的危险成为共和党竞选讲演中的主要内容。甚至海斯也鼓励使用复仇手段来对付南部人。他在写给他的共和党伙伴的信中说:“我们担心南部会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会被叛乱者所统治。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理由;我希望您会在您的演讲中把这些题目发挥得精采些。这将引导人民忘掉贫困的生活,而这正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把这个建议成功地付诸实践的人当中有著名的不可知论者,陆军上校罗伯特·英格索尔。他 9 月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次共和国大军\* 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是一篇煽动复仇的佳作:

所有脱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州是民主党人操纵的

---

\* 共和国大军是北部联邦陆军退伍军人的组织,后成为政治影响很大的集团。

州。……所有企图毁灭这个民族的人是民主党人。所有喜爱奴隶制甚于自由的人是民主党人。暗杀阿伯拉罕·林肯的那个人是民主党人。……所有豢养恶狗去咬人的人是民主党人。……士兵们，你们英勇的躯体上的每一块伤疤都是民主党人给的。<sup>17</sup>

但是，许多北方选民更关心的仍然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旷日持久的黑人问题”。选举前夕，多数共和党的领导人私下表示十分悲观。民主党人如果能够在所有从前的奴隶州中获胜（他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他们只需要 47 张北方选票，就能获得 185 张的规定票数，而取得竞选的胜利。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或者，纽约州、新泽西州，和肯塔基州会是一帆风顺的。实际果然如此，蒂尔顿在这四个州里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选举之后，他能否在所有南部诸州中获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怀疑。

### 有争议的选举结果

从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传来了互相矛盾的竞选结果报告。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两州的选举结果，从表面上看，蒂尔顿已经在那里获胜了，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两个州的州长，并且在州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南卡罗来纳州虽然报告说，海斯以微弱多数获胜，但是州长候选人、民主党人韦德·汉普顿已经获胜是显而易见的了；在下一届的州议会中民主党人占多数，控制了议会。但是，由于有人谴责在竞选中使用武力和欺骗手段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些竞选结果的疑问。在这三个州中，负责准确公正地计算选票的州选举委员会是由现存的共和党州政府控制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以前曾经利用过州竞选委员会，把民主党显而易见的胜利转变成共和党的胜利。他们准备在 1876 年的选举中重演故伎。这样做未必像民主党人攻击的那样是践踏正义的行为。

相反，正是由于民主党人使用武力和恐吓去践踏正义，才使成立州竞选委员会成为必要。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摆在路易斯安那州竞选委员会面前的是怎样一种情况。据记载，在该州的一个县里，1874年有1688名共和党的选民，而在1876年却仅有1名。

几十名“视察要员”——两党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们——亲临三州，监督州竞选委员会的点票工作。点票是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赌博与竞选总统本身绝无两样。蒂尔顿即使没有这三个州，他也已经有了184张选票。海斯需要他的选举团的全部十九名成员都获胜，蒂尔顿则只需要一名。到处流传着有关贿赂和作伪证的各种有根有据的谣言。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竞选委员会把蒂尔顿的7500张显然的多数票算到海斯的名下，使他得到4500张多数票，并且不计算或修改受到恐吓的几个县的选票数字，以此证明共和党人的州长当选和州议会的组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竞选委员会承认了海斯的选举团成员们的胜利，并且取消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的选票，从而保证了州长张伯伦再次当选，并且在州议会中保证了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在佛罗里达州，州竞选委员会把蒂尔顿的明显胜利换成海斯取得了胜利，不过它没能转变民主党人夺取州长职位和控制州议会的结果。

这样，从这些州报来的正式统计数字使海斯的选票达到了规定的185张票数。<sup>\*</sup>民主党人叫嚷这是欺骗，并且拒绝承认这个结果。在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民主党得到了法庭转给总统选举团的决定，指出蒂尔顿竞选胜利的选票统计结果有效。在路易斯安那州，声称在1872年选出的民主党的影子州长签署了一份呈交华盛顿的选票统计证明书的副本。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

\* 争夺俄勒冈的一张选票是一场技术较量，共和党总统选举团的一名成员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但是，海斯在俄勒冈无疑已取得胜利。民主党人在那里的挑战是在使用牵制战术。

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新的州议会，为自己的州长举行就职典礼。在这两个州里，只是由于有了联邦政府的军队，才保持了共和党州政府的门面，它们的实际权力几乎超不出州议会的大楼。从1876年12月到1877年4月，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向民主党的州政府交税。在谁是合法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民主党实际上控制了这两个州的政府。

## 1877年的妥协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国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选举真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共和党很可能在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获胜，在密西西比和北卡罗来纳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获胜。估计有250000名南部共和党人由于害怕而没有参加投票，否则蒂尔顿以估计252000张超过票数而占据优势的局就会被打破。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佛罗里达的欺骗行为也许已经抵销了由于民主党人的恐吓而失去的票数，他们借此手段还从蒂尔顿手中将州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抢了过来。

在这次危机中，宪法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办法。第十二条修正案只是说，总统选举团应当将其选票交给“参议院主席”（一般情况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兼任），“由他在参众两院当众打开所有证明书，然后计算选票”。但这样无济于事。谁来计算选票呢？自1864年以来，国会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第22次联合统治之下进行工作的，这种情况要求两院一起表决来计算每一个州的选票。然而，这一规定在1875年已经被取消了。国会由于分成共和党的参议院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而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制定新的规则。宪法条文规定，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选票，那么由众议院选举一名总统（参议院选举一名副总统）。这条规则也不可行，因为

只有计算了选票之后，才能够按这条规则行事。1876年的问题 乃是如何计算选票。

正当国会尽力解决这个难题时，国内的忿怒情绪也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在共和党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北部和南部的新铜头蛇长枪俱乐部”准备如果有必要时用武力把蒂尔顿拥上台就职。民主党人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编辑亨利·沃特森号召10万名民主党人到华盛顿去举行示威游行。关于新的内战的流言处处纷飞，连格兰特总统也悄悄地加强华盛顿的卫戍部队。

但是所有的流言蜚语和花言巧语都是站不住脚的。南部没有什么人对发动一场新内战感兴趣。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向海斯报告说，“国会中重要的南部民主党人，特别是老辉格党人说，他们已经看够了战争。他们不愿意跟着他们的北部同仁跑；这些同仁……‘在和平时期是战无不胜的，但在战争时期就不见人影了’。”蒂尔顿本人也不赞成民主党人的战争叫嚣。“进行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对头脑发热的战争支持者们说，“我们刚刚摆脱了内战，不能再打新的内战了；战争只会在毁灭自由政府中结束。”<sup>18</sup>

## 选举委员会

许多利益集团纷纷要求国会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实业界的代表们特别指出，危机如果长期拖下去，只会使经济萧条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会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在筛选了几十条建议之后，委员会提议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来仲裁这个有争议的选举情况。选举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如果不被国会参众两院否决，则视为最终决定。选举委员会计划由15名成员组成：5名参议员（3名共和党议员、2名民主党议员）；5名众议员（3名民主党议员，2名共和党议员）和5名最高法院法官。从理论上讲，

法官的候选人应当是无偏见的。而实际上，两名法官将是民主党人，两名将是共和党人，第五名则被认定是伊利诺伊州的戴维·戴维斯。他一度是林肯的伙伴，在1872年成为自由派共和党人，现在是无党派人士。民主党人以为戴维斯会站在他们一边，所以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起用戴维斯的主张，而共和党人则较为冷漠对之。民主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投票表决，以150票对18票支持成立选举委员会。而共和党则以84票对57票反对。格兰特总统于1877年1月29日签署了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法案。

可是，从伊利诺伊州传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整个民主党阵营陷入沮丧之中。伊利诺伊州议会中的民主党人与绿背纸币党人的联盟推选戴维斯为参议员。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包括蒂尔顿的侄子在内，做出这样的举动像是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这个表示会把戴维斯牢牢地拉到民主党一边，从而稳妥地得到他在选举委员会中的那一票。戴维斯接受了参议员的席位（他认为这是晋身总统的阶梯），但是却拒绝了选举委员会的任命。由于最高法院中再没有多余的民主党人，所以第五名法院候选人就落在了有独立倾向的法官约瑟夫·布雷德利的头上。

选举委员会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案。民主党人坚持说，该州的州竞选委员会非法掉换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回答说，由州长签署的选举批准书才是唯一有效的；又说，选举委员会对这些官方选举结果的调查不会有结果，除非它去调查地方的选举结果，了解有关投票的种种情况。但是，在3月4日下届总统宣誓就职以前，这样做是无法办到的。委员会按照政党的关系分为7比7票，只有法官布雷德利的意见还未听到。他的肩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2月9日，布雷德利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承认佛罗里达的官方统计结果。

尽管民主党人用下流的语言咒骂，并且阴险地暗示布雷德利



已经接受了贿赂，只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怀疑，但已为时太晚了。如果选举委员会不对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结果进行调查，那么它也不会对路易斯安那或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结果进行调查。蒂尔顿私下失望之余，准备去欧洲旅行。2月16日，委员会承认海斯在路易斯安那州获得的选票；2月18日，委员会承认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的选票。根据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规定，只有在国会两院都否决选举委员会的裁决时，裁决才能被推翻。参议院很快通过了裁决。但是，一些民主党众议员不死心。他们想出一个主意，用冗长的发言来拖延时间，以便在3月4日以前不能最后完成选票的统计工作。那时，由于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票，众议院就可以行使宪法权力选举一名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推选蒂尔顿了。

## 幕后谈判

当这些可怕的活动公开进行时，各种非正式的谈判也在幕后进行着。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海斯的伙伴同一些较为温和的南部民主党人之间的谈判了。后者手中并无大牌。不过，他们像有经验的赌徒一样，一眼不眨，摆出一副唬人的架势。其实，一旦真的摊牌，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希望占上风。共和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最高法院、政府机构和军队；他们对北部人的爱国情绪仍然能一呼百应，这也是同等重要的。选举委员会一经作出决定，共和党人就可以把任何抗拒决定的行为说成是过激行为。北部民主党人好容易才开始洗刷他们在战时的铜头蛇形象；在这次国家危机中，再次站错方向是他们难以承受的了。这点有助于解释蒂尔顿和大部分东部民主党人为何拒绝同意任何抵制海斯就职的计划。在被北部同盟者抛弃之后，许多南部民主党人开始打算与共和党人进行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交易。曾经是辉格党人的南部人尤其乐于此道。他们小心翼翼地同海斯的共和党人建立了联系。

后者公开表示欢迎建立联系。海斯对整顿党内派别非常热心。他打算下力气进行行政机构的改革。他还希望以辉格党的纲领为基础重新建立南部共和党。几十年以前，林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北部辉格共和党人和南部辉格民主党人的利益在好几方面都有共同点。后者想得到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和对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贷款。他们还想获得联邦政府的补贴，用来重建密西西比河上的码头和改进南部范围内的其它设施。大多数北部民主党人反对这样的补贴，但是，共和党人为了换取南部人对海斯就职的默认，或许会支持补贴南方。

在同海斯的助手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南部民主党人还提出了内阁成员的任命和联邦政府对他们的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总之，他们想知道海斯对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将采取那些措施。海斯会使用军队支持提包客政权吗？抑或撤出军队，让实际上已经控制这几个州的民主党人按照法律治理之？海斯表示，他理解南部人的全部期望——的确，这些希望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交换，他只要求南部要公正地对待自由民，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通过这些非正式的对话，相当一部分南部民主党人可能在投票中与共和党人采取一致立场，这样使后者有可能控制下一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中将仅有微弱的 10—12 张多数票）。

双方并没有就这些问题达成任何正式的“密约”。但是，双方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谅解”在 2 月末初露端倪。民主党人用冗长的发言妨碍会议的进程，拖延选票统计工作，这种威胁使南部人能够比较坚定地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某些谅解，而不能另择出路。现在由于半数以上的北部及南部民主党人不愿支持这种用冗长发言来妨碍会议进程的手段，所以拖延战术也就破产了。选票统计工作结束之后，海斯顺利地宣誓就职。

海斯根据他的权限，开始实施他承诺的部分谅解。他提出的

内阁成员名单预示了政府的新政策是改革与妥协。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威廉·埃瓦茨，他曾是安德鲁·约翰逊在接受弹劾审判时的辩护律师；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他是1872年重要的自由派共和党人；邮政局长戴维·基，他是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一名前南部邦联的拥护者，他领导的邮政总局没有多久就开始向南部温和派提供大量的援助。联邦政府给南部的许多建设项目拨款，1878年，南部得到联邦的资助多于以往任何时期。尽管海斯政府最后没有批准联邦政府投资建筑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但它鼓励在没有补贴情况下建筑南部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把旧南部同新西南部联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海斯以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民主党州长竞选人立下保证黑人权利的承诺为条件，下令联邦军队撤离两个州的首府；这两个州中的共和政府也随即倒台。与其它几个前南部邦联州一样，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现在也被“收复”了。

共和党的老激进派布莱恩共和党人和大部分废奴分子指责海斯的撤回军队是出卖自由民的行为。本杰明·韦德宣称：“让这些人得到解放，然后把他们置于无人保护的境地，这是在犯罪，这与把已经自由的人们重新推到奴隶制中去一样可耻。”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锐气不亚当年，严厉抨击海斯的“政策是妥协投降，是上当受骗，是软弱无能，是卑躬屈膝”，这样一项政策只会是“强权压倒公理……有钱人压迫穷苦人，有势力的人压迫不受保护的人”。关于南部许诺要尊重黑人的权利，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在南部这片土地里，处处埋藏着食言的种子。相信南部人的诺言就是发疯的绝好证据。”<sup>19</sup>

但是这些呼吁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举国上下正在为选举危机的结束而感到庆幸。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重建意味着对南部各州事务的军事干涉，那么还是最好不要重建。“对只能靠他人

刺刀扶植的地方政府,我不再抱任何信心,”《纽约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1877年4月写道,“如果说,黑人选举权意味着一项终身事业,那么黑人选举权就是一个失败。”<sup>20</sup> 事实是,海斯除了撤走部队,没有其它选择。在格兰特拒绝介入1875年密西西比州的选举和最高法院在1876年对里斯案和克鲁克香克案作出判决时,就已经预示了要有这样的结果。众议院已经削减了司法部的经费,现在威胁陆军部,如果它还要在南部使用军队——继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发生的卡斯特灾难和1877年北方铁路罢工之后,又发生了边疆印第安人的骚乱,此时这些地方急需军队——众议院将停止拨经费给它。甚至一些著名的黑人领袖,像最著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都赞同海斯的做法。道格拉斯在1877年5月说,“所谓总统的政策最好理解为总统需要做的事情。……政治家往往由于不得已被迫按事实办事,而不是按好恶去做。”<sup>21</sup>

尽管没有一个南部民主党人脱离自己的党去帮助共和党人组织众议院,但是1877年妥协的其它内容看来正在奏效。安宁在一代人中第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下游地区降临。1877年9月,海斯骄傲地宣布:“自内战到现在,在6个月中,很少发生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一年以后,一位海斯的主要政治顾问仍然坚持说:“一个真正的共和党在南部崛起只是时间问题,它将包括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富人和南部白人中的新教徒,这些人将会保护和支  
持黑人。”<sup>22</sup>

##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

### 长期存在的南部问题

1878年的国会选举在海斯和解的南部政策的许多支持者——包括总统本人——中间引起一阵恐慌。尽管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保证要公正处理暴力与恫吓行为，但是，它还是给两州的选举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下南部地区，共和党在187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与上一届选举相比急剧下降。在黑人占多数的294个县中，只有62个追随共和党，而两年以前却是125个。有几个黑人县竟没有记录一张共和党的选票。海斯曾打算把南部前辉格民主党人拉进共和党，但没有取得显著的结果。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总统对此表示十分失望。海斯说，他已经开始实行一项新的南部政策，他“真诚希望能赢得南部领导人的支持，……能缓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他继续说道，可是现在，“我迫不得已承认，这次尝试是个失败。实施这项政策后，第一次重要的选举已经证明，使用自由选举权进行公正的选举……在南部是行不通的。”<sup>1</sup>

面对此现状，能够做些什么呢？海斯保证，要采取“最坚决、最有力的行动。”<sup>2</sup> 联邦法院执行官们以违犯现行联邦选举法的罪名逮捕了22名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共和党人要求通过新的立法，实施第15条修正案。他们敦促国会拒绝接受通过暴力和欺骗手段选出来的南部众议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南部没有一个陪审团会证明白人犯有违反选举法的罪行。民主党人已经控制了众议院。1878年的选举结束之后，他们还会控制下一届的参议院。再不会通过新的执行法令。民主党人的目的很明确，要利用

现行的法律阻止总统的任何提案。他们在 1879 年五次在关键性的经费议案中加上附加条款，目的是要撤消 1870 年—1871 年执行法令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条款。海斯五次否决了这些议案，即使一些政府机构因经费枯竭而停止了运转。民主党国会多数派终于让步了。但是执行法令却一直是一纸空文。

到 1879 年，甚至共和党激进分子也开始认识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南部采取的行动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重新控制国会。一个团结一致的北部，一定要在选票上战胜团结一致的南部。这对南部黑人会有帮助吗？一家共和党报纸说，北部的团结一致会使南部白人认识到，想通过“威胁、恐吓和投假票”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不能公正对待黑人政治权利的政党来统治这个国家”。<sup>3</sup>

国会在 1879 年—1880 年开会期间，共和党人为了 1880 年的总统选举，准备公开提出血污衬衫问题。他们对“叛军将军们”现在控制着国会看得很严重。的确，南部人在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中占多数，其中，90% 多的众议员曾经在南部邦联的军队中服役过或是在邦联政府中工作过。有 18 名前南部邦联将军坐在国会里，有一名前南部邦联的编辑是国会参议院的秘书，前南部邦联的战俘营司令官现在是参议院抚恤金委员会的主席。一名共和党编辑说，在这个俘虏营里，“许多可怜的小伙子不体面地被饥饿和疾病夺走了生命”。这些足以使那些认为自己是胜利一方的联邦军队的退伍军人感到震惊。共和党在 1880 年的选举中得到“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协助，准备利用这令人震惊的旧事。

### 1880 年的总统选举

经过 35 次毫无结果的选举，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第 36 次选举中，提名俄亥俄州的黑马詹姆斯·加菲尔德为总统竞选人。加

菲尔德(与出生在小木屋里的林肯一样)是靠自学成才的。内战时期,他步步高升,被授予少将军衔。1863年他被选入国会,一直到被提名为1880年的总统竞选人。为了打破共和党对爱国主义问题的垄断,民主党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名联邦军将军、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为总统竞选人。

共和党人把汉考克描画成一位傀儡候选人,内战时期就是一名同情南部民主党人的俘虏。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份通报坚持说,“一千名联军将领……不能宽恕……恐怖和折磨,流血和屠杀。而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干,他们要用团结一致的南部来对抗北部爱国的士兵和水兵”。共和党人也毫不犹豫地用欠公平的语言进行攻击。在托马斯·纳斯特画的漫画上,汉考克正在凝神注视着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丧命的叛军坟墓,漫画的说明是:“‘沉默的(民主党)多数派’。汉考克将军将在大选那天怀念他们”。<sup>4</sup>

共和党采取的“北部团结一致”的战略取得了成果。汉考克虽然在全部从前的蓄奴州中获胜,但是加菲尔德除了失掉三个不大的北部州外,在其他各州中均获胜。尽管在900多万张选票中,他的超过票数只有10000张,但他还是以微弱的多数欣慰地获胜了。共和党在南部获得了41%的公民选票,与1876年的选举结果相同。

但是,在一些黑人选民比重大的南部州中,共和党获得的黑人选票总数急剧下降。共和党在竞选政策纲领中保证要保护所有选民免遭“恐怖、暴力和欺骗”。这样的承诺,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共和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控制了众议院,但是在参议院中,力量的天平却掌握在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无党派人士威廉·马奥尼的手中。这使人想到了共和党的新的南部战略。海斯总统曾想争取从前的辉格党人,把他们拉进共和党,但是这个努力已经失败了。当

选总统加菲尔德也考虑这个主意，促进共和党与南部几个州中出现的无党派人士结盟。1881年盛夏期间，加菲尔德遭到了暗杀。继承人切斯特·阿瑟尽力贯彻这一结盟政策。

### 弗吉尼亚州的重新调整运动

南部民主党人重新领有南部诸州后，却在经济和其他非种族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裂，其中弗吉尼亚的分裂最引人注目。19世纪70年代，该州负担的债务已成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弗吉尼亚州承担着南北战争以前的高利率的沉重债务（在1870年是全国人均负债的两倍）。尽管战争破坏了资源，并且由于西弗吉尼亚的分裂活动使该州的白人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该州还是想方设法还清债务。但试图让西弗吉尼亚承担一部分债务的努力失败了。曾在19世纪70年代统治过这个州的最顽固的南部民主党保守分子坚持说，为了维护弗吉尼亚州的尊严和信誉，必须偿还全部债务。为了还清欠债，他们征收高税，大量减少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学校。“自由人的学校没有必要建立，”州长在1878年坚持认为，“我们的先辈把自由民造就成这样，并没有依靠自由民学校的帮助。……（学校）是一种奢侈品，与其他奢侈品一样，要由那些企望得到好处的人们去付钱。”<sup>5</sup> 这些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反对，民主党人分裂成“筹款派”和“重新调整派”。在铁路建设倡导者、前南部邦联将军威廉·马洪的领导下，“重新调整派”在1879年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党。重新调整派效仿其它几个州的做法，提议降低弗吉尼亚州债务的利率，\* 拒绝偿还应当由西弗吉尼亚承担的那部分

---

\* 19世纪70和80年代，通货收缩趋势每年在名义利息率上增加1%或2%。10年之后，通货收缩每年增长积累的结果可以使利息率增长到15%到20%。这一负担引起了广泛的运动，尤其是在1873年—1878年经济不景气时期。这些运动要求重新就降低各州债务利息进行商谈。



债务。该派说,这样不仅会降低具有破坏性的税收,而且还会为有生产能力的企业提供该州的资源和能源。恢复公立学校将会增加该州黑人和白人的自身资本。在黑人以及白人选民的支持下,重新调整派在1879年控制了弗吉尼亚州的议会。1881年他们选举了州长,并把马洪送进了美国参议院。

重新调整派实现了他们的诺言。他们按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债务,把利息从6%降到3%。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增加了三倍。弗吉尼亚州的黑人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也是受益者。重新调整派一共和党联盟还选举了几名黑人进入州议会。在参加重新调整派1881年大会的代表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重新调整派政府拔掉了惩罚罪犯的鞭挞柱(这是奴隶制的遗物),吸收了黑人参加陪审团,还撤消了使许多穷苦白人和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的人头税。马洪还提议与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实现正式联合。

弗吉尼亚州在政治上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尽管北部的一些共和党人对债务调整在财政上是否道德表示关心,但是大部分北部共和党人欢迎与这一运动联合。这个运动与共和党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相似,并且发誓要打破南部的团结。马萨诸塞州一位激进人士说,债务问题“在这个运动中具有的重要性位居第二。这个派以它确定的真正的原则而自豪,即权力平等,公平选举,点票要老实,和实行彻底的公共教育制度。”共和党人赞成调整派的主张:弗吉尼亚州必须抛弃旧南部“僵死的风俗和陈旧的传统”,应当与“正在发展的强大的北部各州”携起手,开发新南方的工业和人力资源。一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称赞马洪是内战以来南部出现的“唯一的政治家”。“他似乎已经抓住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即南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能够并且应当成为同其他最受欢迎的地方一样富有,强大和繁荣”。<sup>6</sup>参议员马洪为了让共和党人能够组织1881年的参议院,在投票中站在了共和党人一边。作为

报答，阿瑟总统将弗吉尼亚的联邦资助控制权交给了马洪，并且批准成立共和党—重新调整派联盟。

重新调整派在弗吉尼亚州的成功促进了南部其它州的独立运动的发展。阿瑟利用任命权来鼓励这些运动。但是它们都不能与重新调整派的成就媲美。另外，虽然这些运动在口头上要保证黑人的政治权利，但是在他们的选区里选民主要是穷苦的白人农民，他们对黑人根本就不同情。即使在弗吉尼亚州，种族问题造成了共和党—重新调整派联盟于 1883 年破裂。民主党人搬出白人至上和白人团结的口号，指责重新调整派是当今的无赖汉。民主党人还利用选举前夕发生在丹维尔市的种族骚乱，在关于歧视有色人种问题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全胜。马洪从此成为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的领袖。在 1888 年弗吉尼亚州的选举中，该党几乎获胜。但是，其它地方的独立运动却都消失了，南部依然为民主党所牢牢控制。

## 新南部的思想与现实

1878 年以后，美国经济从萧条中走向复苏，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 80 年代，钢的产量增加了四倍。在这十年中，铁路建筑工人铺设了 75000 英里长的新铁路线，几乎将原来 86000 英里长的铁路线增加了一倍。工业的迅速增长相应地使各工会的成员增加。劳动骑士团在 1886 年吸收的会员估计有 700000 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于同年成立。芝加哥的海马基特广场的爆炸事件和几次大罢工使 1886 年成为自 1877 年铁路大罢工以来劳工闹事最严重的一年。尽管这样，80 年代的经济情况一直是令人乐观的。

### “新南部”的思想

南部也走进了发展的浪潮之中。据传说，民主党在 1880 年总

统选举中的败北使一些向前看的南方人确信，凭借政治是不可能自救的。从此，他们挽起袖子，开始建立一个有商业、轧棉花厂和铸造厂的“新南部”。与所有的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包含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一种新的创业精神加快了 80 年代南方人的生活节奏。知名的记者和工业倡导者们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鼓吹北方佬的经济现代化的思想意识。

80 年代的新南部纲领并不是全新的。战前就有一些南方人呼吁南部经济要多样化和工业化，但没有引起注意。战争以后，南部许多知名的有识之士把南部邦联的失败归因于南部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战争失败了，南部必须效法胜利者。《德鲍评论》在 1867 年宣称：“为了自救，我们不得不发展制造业。”<sup>7</sup> 由于经济萧条，而且大量精力倾注于重建时期的政治问题，于是耽误了南部现代化思想意识的及早出现和臻于成熟。

《亚特兰大宪法报》的编辑亨利·格雷迪成为最早宣传新南部思想意识的人。格雷迪在 1880 年说，这个地区需要的是“少一些树桩(竞选)演说家，多一些拔树桩的人。……如果汉考克的竞选失败能够引导我们的人民从政治转向实干的话，那么南部也就因祸得福了。”似此强调“南部最需要的是工作”的说法已经成为新南部的倡导者反复宣讲的道理。1886 年，格雷迪在一次对北部商人发表的并使他一鸣惊人的讲演中说，新南部纲领已经取得了成果：“我们已经把理论传播到大小城镇，把事业放在政治之上了。我们已经向他们的马萨诸塞州的纺纱厂和费城的炼铁厂提出了挑战。……我们已经在城市和乡村中树立起节俭的美德。我们已经爱上了工作。”<sup>8</sup>

## 新南部的工业

格雷迪的雄辩演说并非言过其实，南部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

在“把纱厂送到棉花种植园去”的口号推动下，南部的纺织工业在 80 年代发展十分迅速。沿着从弗吉尼亚州到亚拉巴马州的山麓，兴建了许多新的纱厂和工人居住的城镇。劳动力几乎全部是白人，其中 40% 是妇女，25% 是儿童。他们为挣只有新英格兰工人一半的工资而工作着。从 1880 年到 1900 年，南部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九倍。1880 年，南部的纺织生产能力只占全国纺织生产能力的 5%，而 1900 年这个部门的生产能力已增长至 23%。到了 1930 年它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新英格兰。南部纺织工业的大部分资本最先筹自南部。不过 1893 年以后，来自北部的资本开始增加，因为新英格兰的纱厂主们开始看到，在低工资、无工会的南部办工厂有利可图。

南部的另外一个工业是从当地的农作物——烟草中发展起来的。南方人在烟草工业中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烟草工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住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詹姆斯·B. 杜克。杜克具备的企业家才能和策略可以与约翰·D. 洛克菲勒的才能并驾齐驱。1890 年，杜克成立了美国烟草有限公司。有一个时期，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烟草生产，直到 1911 年因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被解散为止。与纺织厂不同，烟草工厂雇佣了相当数量的黑人工人。

新南部有两种工业依赖北部的资本，这就是铁路和钢铁。19 世纪 80 年代，南部铁路建设的速度超过了全国铁路建设的平均速度。1886 年，南部各条铁路的轨距从传统的 5 英尺宽改为全国标准轨距 4 英尺 8.5 英寸。这一变化使南部铁路成为全国铁路网的一部分。它也象征着北部铁路的支配逐渐加强。到 1890 年，在已经控制了三分之二的南部铁路线的公司中，大部分董事职位为北方人所占据。1893 年—1897 年的经济萧条迫使北部的银行重新组织和整顿南部的许多铁路线，这样，北部对南部的铁路加强了控制。

南部的冶铁工业在 80 年代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地区是发展集中的地区。那里蕴藏的煤、石灰石和矿产使新建城市伯明翰成为“南部的匹兹堡”。1880 年，从前的蓄奴州生产的生铁只占全国产量的 9%。到 1890 年，产量增长了两倍多。在这期间，北部的投资数字十分突出：据一位评论家说，在 80 年代，“南部冶铁业中的联邦将军几乎同华盛顿政界中的南部邦联将军一样引人注目。”<sup>9</sup> 1907 年，美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对南部最大的公司——田纳西冶铁和煤矿公司的控制。从此，北部对南部冶铁业的支配加强了。

### 北方人对新南部的理解

鼓吹工业化的南方人欢迎北方佬的金元侵入南部。南部还很贫穷，筹集不到足够的资本投入重工业生产。80 年代在南部不同城市中举办的工业“展览”，其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北部和欧洲投资者的兴趣与注意。北部一些倡导新南部的鼓吹者们发表的演说甚至比他们的南部伙伴们的演说还动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阿特金森是一名纺织厂主，战前是自由土壤党人。他在 1881 年说，新南部精神“有气魄，有活力”，它正在为实现繁荣和种族和谐“创造新的条件”，这样，在不远的将来，“奴隶制的毒瘤”会被治愈，新南部会“朝着和平、秩序、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发展”。1886 年，前共和党激进派国会议员、费城的威廉·D. 凯利出版了一本题为《旧南部和新南部》的书。书中极力鼓吹新南部。“财富与荣誉就在新南部前进的道路上”，凯利写道，“它的崛起会推动文明的前进。……它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冒险乐园中的埃尔多拉多”。\*<sup>10</sup>

\* 埃尔多拉多(Eldorado),原意为“镀金人”,在传奇中为波哥大附近的一座印第安人城镇的统治者,非常富有。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纷纷前来寻找此镀金人;之后又传为“黄金国”,葡萄牙人继西班牙人之后,也来寻找这个国家。于是,他们的活动迅速发展并征服南美大部分。这个词乃成为任何可以发财致富的地方的代名词。——编注

阿特金森和凯利的言论代表了共和党在 80 年代的主要观点。他们两位都是反蓄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曾支持过激进的重建政策。政治上的重建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他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经济重建上。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北部的现代化已经提高了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并且改进了社会风气。他们希望，南部的现代化会改善黑人和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缓和种族敌对情绪，为黑人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向上发展的条件。一位波士顿的激进分子说，南部也许会变得像新英格兰一样。“继横贯南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之后，应当发展学校、工厂、商店，以及更美好的家庭和更和谐的社团感情。”1885 年，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得出结论说，“工作和金钱已经使南部社会中的新的理想，新的尝试和新的雄心蔚成风气。资本毕竟是文明的最伟大的推动力，……当财富在两个种族之间更加平等地分配时，他们也就会和睦相处了。”<sup>11</sup>

### 新南部的教育

南部在 80 年代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且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黑人的高等教育虽然主要得到北部的一些传教组织的支持，但是在这十年中，南部有几个州建立了自己的黑人学院或工学院。弗吉尼亚州政府向汉普顿学院提供了资助，亚拉巴马州拨出一小笔款帮助布克·华盛顿创办塔斯基吉学院。进入中等学校和大学学习的黑人学生人数在 80 年代增加了两倍，进入初级学校学习的黑人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这幅南部教育的发展图上，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是空白。1880 年，20% 的白人和 70% 多的黑人依然是目不识丁。在达到上学年龄的白人和黑人儿童中，上了学的白人孩子不到五分之三，黑人孩子不到五分之一。南方人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还不到北方人的三分之一。在南部乡村里，年平均上课时间是三个月或少

一些。一位同情南部的北部评论家在 1888 年写道：“典型的南部自由民学校是设在一间木房里。它们有的是泥土地面，有的是用半圆的木料铺成的地板，没有课桌或者没有黑板。”数百万正在长大的儿童没有受到足够的、令人满意的教育。“这些儿童应当受到教育，这已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北方富有，它能够教育好自己的儿童。南部贫穷，它教育不了自己的儿童”。<sup>12</sup>

联邦政府为此发起一场支援南部教育的运动。资金的分配是以各州的文盲情况为根据而进行的。这种分配方法使四分之三的资金拨给了南部。自 1867 年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提出一项联邦政府支持南部办学的议案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这个意见。1872 年，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把从公有土地买卖中获得的收入拨给公立学校。然而，参议院对这项议案没有作出响应。70 年代经济的不景气阻碍了人们作进一步的努力。1880 年的人口调查发现，年龄在 10 岁或更大一点的美国人当中，有 600 多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个发现重新复活了支援南部教育的运动。1880 年的共和党的政策纲领保证，该党要围绕着联邦政府的援助而工作。那些活着的废奴主义者敦促政府要慷慨地为南部的教育拨款。一位反奴隶制的老战士说：“对奴隶制犯下的罪恶同样负有责任的北方，有责任解放奴隶和赋予他们各种政治权利。因此，身负三重义务的北部同样应当承担起教育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的责任和重担，使他们担负起公民的义务。”<sup>13</sup>

1884 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由新罕布什尔州的亨利·布莱尔提出的议案。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在七年中向各州拨款 7700 万美元（按 1981 年的比价为 7 亿美元），用于公立学校的建设。这笔款按照各州文盲人数在全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议案还要求各州拨出相应的款项，用于本州建立的公立学校。位于最南边的几个州中的民主党人——他们的州将受益最多——以及共

和党人投票赞成这项议案。但是,从 1883 年到 1889 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拒绝通过这项议案。民主党人持反对态度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民主党对各州的权利承担了义务;民主党害怕议案会成为复活重建的一个契机;主张低税率的民主党人怀疑这个措施是保护主义者为保持高税率而设下的圈套。\* 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分别在 1886 年和 1888 年第二次和第三次通过了布莱尔的议案,但是在 1888 年支持议案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众议院和以前一样拒绝考虑议案。当布莱尔在 1890 年第四次把他的议案提交参议院时,三名共和党人和四名南部民主党人转变了他们先前赞同的立场,投了否决票,从此这项议案被永久地打入了冷宫。推动南部教育的一次比较有希望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 新南部的政治

居住在波托马克河上游和下游的新南部的倡导者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哈泼周刊》的编辑乔治·威廉·柯蒂斯在 1886 年说出了人们普遍具有的信心,“蓬勃发展的工业企业以它仁慈的行为正在平息着政治分歧和种族冲突。”<sup>14</sup> 这种信心虽然总带点主观愿望,但是,一些事实为这种信心提供了依据。在三K党和白人同盟最猖獗时期过去以后,种族冲突趋于下降。按现代标准,在 80 年代统治过南部的鼓吹白人至上的保守派们几乎不会受到人们的理睬了。不过,他们的种族主义比起新一代南部政治家们搞的种族主义少一点恶毒意味。虽然黑人还不被允许发挥重建时期那样多的力量,但是他们在 80 年代和进入 90 年代以后,一直参加选举,

---

\* 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大部分年头里,联邦预算出现了盈余。大多数民主党人希望降低关税(当时一种主要的税收方式),目的是把政府的收入降低到它的开支水平。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降低关税。民主党人怀疑,共和党人支持联邦政府向教育提供援助,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掩盖预算过剩问题,从而使降低关税运动受到挫折。



还担任了相当数量的公职。在 1884 年和 1888 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从前的蓄奴州中获得的选票一直保持在 40% 左右。共和党在上南部地区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除了在弗吉尼亚州与重新调整派顺利结盟之外，共和党还趁民主党在 1880 年由于该州的欠债问题而分裂之机，获得了田纳西州州长的职位，1884 年，共和党以极小的差数夺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职位。从 1881 年到 1901 年，每届国会至少有一名南部黑人担任议员。这些年中，几百名黑人被选进各州的立法机构，上千名黑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完全禁止黑人从政是在 1900 年前后，而不是在联邦军队 1877 年停止实行重建前后。

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过分夸大。在最南部地区，使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压低共和党人的选票的行径自 70 年代以来一直很盛行。如果光明正大地投票，至少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倒向共和党。但是，确确实实就在这几个州中，从 1876 年以后，共和党在历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总数是最低的。白人至上在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所以，白人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南卡罗来纳州 1882 年通过了一项“八箱法”，它要求选民按选票的对象投进不同选票箱中。这样的投票方式，实际上是一次识字能力的测验，它剥夺了许多黑人选民的投票权利。佐治亚州要求选民支付人头税。有几个州通过了手续烦琐的各种登记规定。穷人和不甚了解规定的人因此在投票中退缩了。把大量假选票塞进投票箱中成为一门艺术。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把大量的“薄纸假选票”掺进了票箱。当点票人员发现选票的数目超过了合法选民的数目时，民主党人把大一些、厚一些的选票——全部是共和党人的——捡出来后扔掉。\* 其它地方也存在这种现

---

\* 那时选票由各党印制，不由政府包办。1888 年以后，与引进澳大利亚秘密选票制度相联系的一项改革就是由州政府印制规格统一的选票。

象。白人土地所有者代表他们的黑人分成佃农投票。这对解释在一些州的黑人居住区里，民主党获得大量选票的原因是有帮助的。正如一位亚拉巴马人所说：“只要需要，黑人居住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一万、一万五千，二万或是三万张黑人选票来。”<sup>15</sup>

### 新南部的其它一些现实情况

新南部的种族和谐形象也被其它一些瑕疵所玷污。其中，最严重的是罪犯出租制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形式的奴隶制是奴隶解放造成的后果。在旧的统治时期，大部分的奴隶犯罪后要在种植园里受到劳动征罚。内战结束后，由于罪犯人数的增加，南部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南部多数的州开始与私人公司签订合同，把犯人出租给它们——煤矿公司、铁路建筑公司、农场，等等。这种做法证明相当成功，重建以后的各州政府都大加采用。每个州不仅节省了犯人的膳宿费用，而且还得到了一笔收入。租方得到了廉价劳动力，罪犯可以像奴隶那样工作。的确，这个制度看起来对每一方都有利——除了对罪犯本人。犯人遭受了残酷的虐待与剥削，这使犯人出租制度很快成为全国的一件丑闻。90%的罪犯是黑人，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实行了种族歧视的法令。犯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干着牛马般的活，成为看守们残酷虐待的牺牲品。在密西西比州的犯人中，80年代的年死亡率大约是11%，在阿肯色州是25%。在南卡罗来纳州修建铁路的一群囚犯在1878年和1879年两年中的死亡率是50%。1887年，一个大陪审团在调查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犯人医院后报告说，大多数病人的“背部有多处明显的鞭痕、伤疤和血泡，一些人由于遭到毒打，全身皮开肉绽。……他们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其中一些人躺在光溜溜的木板上，样子十分可怜。他们很衰弱，瘦得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和一张皮了。”<sup>16</sup>

在其它问题上，对新南部持友好态度的北方人谴责出租犯人是“最新、最令人厌恶的奴隶制形式”，“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有头脑的南方人同意这种说法。佐治亚州进行的一次官方调查表明，出租犯人是“野蛮的”，“比奴隶制更不道德”，“对文明人来说是一种耻辱”。<sup>17</sup> 南部很快出现了一批以废除犯人奴隶制度为目标的改革组织，其中许多组织是由妇女领导的。不过，实践证明，进行改革是困难的。许多有势力的人都从犯人出租制度中谋取私利。新南部的一部分工业企业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只是在 20 世纪初叶的 20 年里，南部的改革者们才逐渐地扫除了这个制度。

闪闪发光的未必尽是黄金，新南部在其它方面也同样如此。尽管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但是，南部的经济依然紧紧地依赖于北部。南部纱厂生产的较粗糙的纱和布常常要送到新英格兰的纱厂里进行最后的加工。由于南部的钢铁厂和铁路的所有权为北部所掌握，所以，在价格和利率上歧视南部的现象时有发生。以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几个州，它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尽管增加了一倍，即从 1880 年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 5% 增加到 1900 年的 10%，但是它们实际上与 1860 年的情况相同。与北部相比较，新南部的工业进步只不过是恢复到这个地区的战前水平。在人均收入方面，新南部做得也不好。从 1880 年到 1900 年，南部人均收入增长了 21%，这仅仅与北部的增长速度相一致。南部的人均收入只是北部的五分之二——这与 1880 年的比例相同，但低于 1860 年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南部未能赶上北部的一个原因是，在南部工业企业中普遍采用低工资制。另一个原因是，南部农业患有顽固的贫血症。负债和生产过剩呈恶性循环，造成棉花价格持续下降，棉花种植者因此贫困化。大多数鼓吹新南部的人，除了偶尔在口头上说一说农作物

多样化的好处之外,关于农业,他们说很少,做得也很少。几乎所有新的投资都跑到非农业部门中去。1800年到1900年间,在以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各州中,人均工业资本增长了300%,而人均农业资本只增加了29%。

贫困的南部农业,在政治上造成了1890年以后一触即发的后果。人民党运动和一些“南部农民叛乱”推翻了几个保守政权,从而永远改变了南部的政治图景。与此同时,打算重新由联邦政府实施选举权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由于它的失败,重建的最后一点残余也慢慢地消失了。

## 向血污衬衫告别

重新调整派和其它独立派运动在1883年垮台后,北部共和党人开始寻找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反的途径来接近南方。1884年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最初希望在关税问题上赢得南部工业地区的选票。当希望破灭时,布莱恩公开提出了血污衬衫问题,并且指责说,由于压制南部共和党人投票,他在选举中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但是,相当多的共和党人对血污衬衫问题已经厌倦了,尤其是在共和党掌握国家权力时,对保护黑人选民似乎无能为力。1888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抱着在经济问题上可能会把大批南部老辉格党人争取过来的希望,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关税问题上。无论这个问题的潜力如何,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获得了北部248张选票中的233张,赢得了总统职位,而他几乎要瓦解了团结一致的南部:在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中,只要有不到1.5%或1%的普通选民转变立场,那么这几个州就会站在共和党人一边。

但是,共和党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中，只分别获得了 27%、26%和 17%的选票。如此令人不能容忍的结果等于是对“宪法的公开打击”，一家共和党报纸宣称道。“我们怎能无视这种挑战呢”。<sup>18</sup> 1888 年，共和党在控制了国会两院以及总统职位后，一些共和党人想利用新的执行立法来回答这种挑战。1889 年 12 月，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面临 17 个有争议的南部选举案。众议院对其中 11 个案子的裁决均有利于共和党。这些案件中的证据使许多国会议员相信，在选举国会议员时，为了能够控制时间、地点和方式，有必要以国会宪法权力为基础，制定一项新的联邦选举法（第一条，第 4 款）。

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负责提交众议院多项议案。他综合这些议案而成一个全面性的议案。洛奇的议案授权联邦地区法官，在任何一个选区，只要有 100 名选民请求，就可以任命选举监督。选举监督有权检查登记簿，监察投票和向选民解说投票程序。联邦巡回法庭应当任命检票委员会。委员会要证明选举结果准确无误（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即使其决定与州选举委员会的报告的结果不一致）。委员会能够对被指控有恐吓和欺骗行为的任何人提出诉讼。这是一项有影响的议案，但它只适用于国会的选举。在州和地方的竞选中，议案在保护黑人选民方面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而在这样的竞选中，关系到黑人利益的重要的事情被决定下来，诸如学校、劳工立法、惩罚罪犯等等。然而，民主党人掀起了一场疯狂反对这个“强制议案”的运动。他们称这个议案会带来“黑人重建”时期的最黑暗的日子。任凭民主党狂怒之极，众议院在 1890 年 7 月 2 日一致投票通过了洛奇的议案。

但是，在参议院，其它审议事项把洛奇的议案挤到一旁。国会已经颁布了一项新的养老金条例、一项反托拉斯法令和一项增加银币的条例。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还有麦金利税法——这是内

战以来对进口税进行最全面的、向上调整的一次修改。在许多共和党人看来，讨论这个复杂的议案应当先于选举法。参议院共和党的决策人物决定把选举法推迟到下次会议进行讨论，以便完成制订税法的工作。因为错过这个有利时机，这就是洛奇议案失败的关键。在下一次会议上，一群想得到一项更加放任的银币立法的西部共和党参议员，为换取南部支持他们的银币议案，同意放弃选举法案。由于参议院不能限制辩论时间，所以，民主党故意拖延时间的发言没有受到阻止，提出选举议案的共和党人被迫放弃了该议案。

洛奇议案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放弃涉及“南部问题”的立法，转而赞成制订关税，托拉斯和银币的议案，这表明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开始转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充斥于每届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和种族斗争问题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参加过内战的一代人相继去世了，新的一代人开始掌握了领导权，他们没有战争的记忆，对内战时期的问题也不感兴趣。除了1957年通过的人权法外，洛奇议案是最后一个几乎被通过的关于黑人权利的议案。1894年，民主党国会撤消了1870年—1871年实施的许多法规。重建时代就这样悄然结束了。

## 结 束 语

南部民主党人把洛奇选举议案的失败正确地解释为北部最后投降的一个信号。在他们对此作出反应之前，又出现了人民党主义，造成了新的危机。人民党，即平民党，是在南部和西部诸州的农业经济不景气和乡村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产生的。连续四年，棉花价格暴跌，几乎下降了50%。1894年，每磅棉花的价格是4.5美分，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农民感到前景暗淡。“南部农民联合会”把成百上千名农民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几个州——南卡罗来纳、田纳西、佛罗里达和阿肯色——中农民运动在民主党内有了一定的势力，但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在其它州，农民们拒绝支持民主党人。他们于1892年和西部的反抗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民党——这是自内战以来除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政党。

1896年，民主党吞并了人民党，并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他在竞选纲领中鼓吹要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以此来扭转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结束1893年经济恐慌造成的不景气。布赖恩虽然在所有参加前南部邦联的州中以及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在北部诸州，以及在马里兰、肯塔基、西弗吉尼亚和特拉华等州中大获全胜。人民党从此销声匿迹，南部以外的民主党在以后的15年中也变得气息奄奄。

人民党主义在它短暂的存在时间里，曾使6个南部州在政治上发生混乱。共和党—人民党联盟取得了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控制

达四年之久，但是在其它州中却没有成功，原因是民主党人搞了许多骗局。民主党人再一次全力以赴在“黑人统治”和“黑人重建时期的重演”上做文章，以诋毁人民党—共和党联盟。种族主义的宣传不像从前那样恶毒了，但暴力事件几乎达到了重建时期的水平。1896年以后，骚乱平息下来，民主党人重新牢牢控制了南部的政局，在以后的60年中，没有一个党派向南部的一党统治提出过严厉的挑战。

在这个时期里，南部诸州剥夺了黑人选民的选举权。民主党人承认这样做有几个目的：要净化南部的政治，消除混乱与腐败现象。要剔除文盲和不够资格的选民；要重新实现没有害人幽灵——黑人统治——的“正常的”政治。但是，民主党人潜在的目的是决心要通过剥夺反对派的选举权来巩固一党统治。1889年至1902年间，所有从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州都效法佐治亚州，以交纳人头税作为参加投票的条件。1890年，密西西比州建立了识字能力测验的制度，其他州也纷纷效法：南卡罗来纳州在1900年、亚拉巴马州在1901年、弗吉尼亚州在1902年、佐治亚州在1908年先后建立这种制度。最后5个州允许拥有300美元以上的财产的文盲参加选举。由于很多白人既不识字也不符合财产要求，所以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4个州通过了“理解”条款。条款规定，一个既不识字也无财产的白人，如果能够听懂州宪法条文的话，登记员就可以让他们登记。实际上，这个条款使登记员有权把选票送给白人，而不给黑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等4个州还制定了“祖父”条款。规定如果白人能够证明自己或是自己的祖先在1867年——这年黑人获得了选举权——以前投过票，那么他们就可以参加选举。这种明目张胆地践踏联邦宪法的规定直到1915年才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最高法院批准了南部诸法规中关于选举权



的其它条款，因为第十五条修正案不允许仅仅以种族或肤色——而不是以文化程度、财产或纳税情况——为由剥夺一个人的选举权。在“威廉斯诉密西西比州”（1898）的案件中，法院批准了密西西比州对选举权作出的各种限制性规定以及理解条款，理由是它们在“表面上没有把白人与黑人分开”。

两年以前，最高法院在“普来西诉弗格森”的案件中，还批准了另外关于黑人是二等公民的条款。这是加在黑人头上的规定，它出现在吉姆·克劳主义时期。普来西关心的是路易斯安那州颁布的关于火车客运车厢内要实行种族隔离的一项法令。1890年以前，公共服务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在南部很常见，但没有波及整个南部。一些铁路公司要求黑人乘坐“二等”车厢（通常是吸烟车厢），即便他们付了全票的价钱。新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在1889年规定，铁路必须向黑人和白人提供同等的服务与设备，但对这一规定的异议便向该委员会提出来。然而，法院的判决不要求提供同样的服务与设备。这为吉姆·克劳立法开了闸门。到1891年，有7个州通过了法律，在铁路车厢内实行“平等的隔离”。尽管车厢内的服务与设备在实际上很少相等，但是最高法院对“普来西案”的判决使平等的隔离的主张合法化，因此就同意了吉姆·克劳法律。受到法律保护种族隔离不久就遍及到南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汽车、喷水池、饭馆、娱乐设施等等。

由于吉姆·克劳法正式把黑人和白人分成等级，黑人的选举权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黑人选民不再构成南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了。贫穷的白人选民也陷入了选举权被剥夺的境地。人头税和其它限制性的措施使白人选民人数减少四

---

\* 不仅如此，黑人选民在实际上被排斥后，民主党人设立了“白人初选”，以限制白人在提名民主党候选人的初选中的选举权。由于黑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使共和党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初选就成为南部唯一有意义的选举了。

分之一。一党制使更多的选民不能参加选举。到 20 世纪的最初 30 年,两党制才在南部重新出现。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人权运动产生了第二次重建,这时南部黑人才重新争取到他们在第一次重建时期享有的权利和权力。

## 附 注

### 第 十 八 章

1. James Longstreet, "The Battle of Fredericksburg,"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II, 79;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redericksburg to Meridian* (New York, 1963), p. 44,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War Becomes Revolution* (New York, 1960), p. 348.

2. *Harper's Weekly*, December 27, 1862; Meigs to Burnside, December 30, 1862, in *O.R.*, Ser. 1, Vol. 21, p. 917; Medill to Elihu Washburne, January 14, 1863, in Nevins, *War Becomes Revolution*, p. 351; Lincoln quoted in William Henry Wadsworth to Samuel L. M. Barlow, December 16, 1862,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3. Samuel Wilkeson to Sydney Howard Gay, December 19, 1862, Gay Papers,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Orville Hickman Browning, *The Diary of Orville Hickman Browning*, ed. Theodore C. Pease and James G. Randall, 2 vols. (Springfield, Ill., 1927—1933), I, 600—601.

4. The best contemporary accounts of this affair are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I, 194—204, and Pease and Randall, *Diary of Browning*, I, 596—604. The best secondary accounts are Nevins, *War Becomes Revolution*, 350—65, and James G. Randall, *Lincoln the President*, 4 vols. (New York, 1945—1955), II, 241—49.

5.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I, 39, 424.

6. Ulysses S. Grant, *Personal Memoirs*, 2 vols. (New York, 1885—1886), I, 480—81.

7. Frederick E. Whitton,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Modern Times* (London, 1923), p. 45.

8. *O.R.*, Ser. 1, Vol. 24, pt. 1, p. 273.

9.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Indianapolis, 1952), p. 280; Alan T. Nolan, *The Iron Brigade: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1), p. 193.
10. Charles S. Wainwright, *A Diary of Battle*, ed. Allan Nevins (New York, 1962), pp. 157—58.
1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78—79.
12. Bruce Catton, *Glory Road* (Garden City, N.Y., 1952). p. 161.
13. *Ibid.*, p. 157; Darius N. Couch, "The Chancellorsville Campaign,"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II, 155.
14. John Bigelow, *The Campaign of Chancellorsville* (New Haven, 1910), p. 221.
15.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Lee's Lieutenants*, 3 vols. (New York, 1942—1944), II, 669.
16. Noah Brooks, *Washington in Lincoln's Time* (New York, 1896), pp. 57—58.

## 第 十 九 章

1. Lincoln to Hooker, June 10, 1863, in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I, 257.
2. O.R., Ser. 1, Vol 27, pt. 1, p. 83.
3.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 371;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 67.
4.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327—28.
5. O.R., Ser. 1, Vol. 24, pt. 1, p. 227.
6.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Organized War 1863—64* (New York, 1971), p. 71.
7.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Johnny Reb* (Indianapolis, 1943), p. 94.
8.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409.
9. J.F.C. Fuller, *Grant and Lee* (London, 1933), p. 184; T. Harry Williams, *Lincoln and His Generals* (New York, 1952), p.

272.

10. Bell I. Wiley, *The Road to Appomattox* (Memphis, 1956), pp. 64—65;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V, 548, 554; Frank Vandiver (ed.), *The Civil War Diary of General Josiah Gorgas* (University, Ala., 1947), p. 55.

11. *O.R.*, Ser. 1, Vol. 23, pt. 2, p. 518.

12. Daniel Harvey Hill, "Chickamauga—The Great Battle of the West,"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II, 644.

13. Bruce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ocket Books ed. (New York 1967), p. 235.

14. *O.R.*, Ser. 1, Vol. 30, pt. 1, p. 142; John B. Jones, *A Rebel War Clerk's Diary* (New York, 1935), II, 50.

15.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 247.

16.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redericksburg to Meridian* (New York, 1963), p. 843.

17. Quotations in these paragraphs are from *ibid*, p. 856, and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 253.

18. Foote, *Fredericksburg to Meridian*, p. 859.

19. *Ibid.*, p. 868.

20. Worthington C. Ford (ed.), *A Cycle of Adams Letters, 1861—1865*, 2 vols. (Boston, 1920), II, 40, 60.

21. Ephraim D. Adams,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 vols. (New York, 1925), II, 144.

## 第 二 十 章

1.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 Thomas (ed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1835—1875*, 4 vols. (New York, 1952), III, 330.

2. The former Illinois governor, the county Democratic conventions, and the New York meeting are quoted in Wood Gray, *The Hidden Civil War: The Story of the Copperheads* (New York, 1942), pp. 115, 123, 147; the Iowa editor is quoted in Frank L. Klement, *The Copperheads in the Middle West* (Chicago, 1960), p. 44, Seymour is quoted in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War Becomes Revolution* (New York, 1960), p. 394.

3. Albert G. Riddle, *Recollections of War Times* (New York, 1895), p. 321.

4. John B. Jones, *A Rebel War Clerk's Diary*, 2 vols. (New York, 1935), I, 249, 253.

5. Gray, *Hidden Civil War*, p. 133; Bruce Catton, *Glory Road* (Garden City, N.Y., 1952), p. 246.

6. William B. Hesseltine, *Lincoln and the War Governors* (New York, 1948), p. 331.

7. *Congressional Globe*, 37th Cong., 3rd sess., (1863) Appendix, 93;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1968), p. 42.

8. *Douglass' Monthly*, August 1863.

9. Herbert Aptheker, "The Negro in the Union Navy,"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2 (April 1947), 169—200, estimates that blacks constituted one-fourth of the navy personnel. This estimate may be too high. The navy did not designate its personnel by race.

10.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 2nd ed. (Washington, D.C., 1865), pp. 197, 274.

11.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V, 357, 423; O.R., Ser. 1, Vol. 14, pp. 377—78.

12.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149—50.

13. Bruce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Boston, 1960), p. 404.

14. Frederick Douglass, *The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Hartford, 1882), pp. 386—87.

15. *National Intelligencer*, August 24, 1863;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863; Charles A. Dana, *Recollections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889), p. 86.

16. William Hanchett, *I ish: Charles G. Halpine in Civil War America* (Syracuse, 1970), p. 70.

17. Eugene C. Murdock, *Patriotism Limited: The Civil War Draft and the Bounty System* (Kent, Ohio, 1967).

18. The data for the 1860 occupations of males in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states in Tables 20.1 and 20.2 were compiled from the

occupational tables in the 1860 census. The samples of the previous occupations of Union soldiers are from (1) a U. S. Sanitary Commission survey of the occupations of 666,530 Union soldiers from all Union states except Maryland and Delaware; (2) Bell I. Wiley's sample of 13,392 white Union soldiers in 114 companies from all the free states plus Missouri. (California, Oregon, and the territori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se data because they contributed a negligible number of soldiers to Civil War armies.) Both the Sanitary Commission and Wiley samples were drawn from company muster rolls. Both were general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opor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oldiers from the various states. The Sanitary Commission data were reported in Benjamin A. Gould, *Investigations in Milita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atistics of American Soldiers* (New York, 1869). I am grateful for the generosity of the late Professor Wiley in supplying me with copies of his research data on the occupations of Union soldiers as well as similar data on the occupations of Confederate soldiers, analyzed in Table 20.2.

19. Southern woman and *Richmond Examiner* quoted in Ella Lonn, *Foreigners in the Union Army and Navy* (Baton Rouge, 1951), p. 576n.; Southern historian quoted in Wiley, *Billy Yank*, p. 428n.

20. Data on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born soldiers in the Union army were derived from Gould, *Investigations in Milita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atistics of American Soldiers*, pp. 15—29; Lonn, *Foreigners in the Union Army and Navy*, esp. pp. 581—82; and Wiley, *Billy Yank*, 306—13.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born males of military age in the Union states has been calculated from the population tables of the 1860 and 1870 published census reports.

21. Ella Lonn, *Foreigners in the Confederacy* (Chapel Hill, N. C., 1940), pp. 200—240, esp. pp. 200, 218—20.

22. James M. McPhers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Abolitionists and 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Princeton, 1964), p. 211.

23.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408—10.

24. Frank L. Klement, *The Limits of Dissent: Clement L. Vallandigham and the Civil War* (Lexington, Ky., 1970), p. 245; V. Jacques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Chicago, 1967), p. 126.

25.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 470.
26. The voting percentages are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in *The Tribune Almanac for 1864*, pp. 55—69.
27.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p. 131; Nevins and Thoma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III, 408;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 49—50.
28. McPherson, *Struggle for Equality*, pp. 85, 132.
29. The Diary of Christopher Fleetwood, Manuscript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30. E. Merton Coulter,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Baton Rouge, 1950), p. 141.
31. Clement Eaton,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Collier Books ed. (New York, 1961[1954]), p. 63.
32. Thomas B. Alexander and Richard E. Beringer, *The Anatomy of the Confederate Congress* (Nashville, 1972), p. 40.
33. Coulter, *Confederate States*, pp. 375, 386.
34. James Z. Rabun, "Alexander Stephens and Jefferson Dav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8 (1953), 307, 310; A. Stephens to Herschel V. Johnson, April 8, 1864, in *O.R.*, Ser. 4, Vol. 3, p. 280; David M. Potter, "Jefferson Davis and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 Confederate Defeat," in David Donald (ed.), *Why the North Won the Civil War* (Baton Rouge, 1960), pp. 102, 112.
35. Joseph T. Durkin, *Stephen R. Mallory: Confederate Navy Chief* (Chapel Hill, N. C., 1954), p. 176.
36. Edward Younger (ed.), *Inside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The Diary of Robert Garlick Hill Kean* (New York, 1957), p. 100.
37. James M. Mathews (ed.), *Public Laws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Richmond, 1862), p. 1.
38.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redericksburg to Meridian* (New York, 1963), p. 951; Curtis A. Amlund, *Federalism in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Washington, D. C., 1966), p. 106; Allen D. Candler (ed.), *The Confederate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4 vols. (Atlanta, 1909—1911), II, 305.
39. Ulrich B. Phillips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Toombs, Alexander H. Stephens, and Howell Cobb* (Washington, D.



C., 1913), p. 598.

## 第二十一章

1. *New York Sun*, March 24, 1865.
2. Emerson D. Fite, *Social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10), p. 9; George Winston Smith and Charles Judah (eds.), *Life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Albuquerque, 1966), p. 167.
3. Paul W. Gates, *Agriculture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65), pp. 141, 193; Joe B. Frantz, *Gail Borden: Dairyman to a Nation* (Norman, Okla., 1951), p. 255.
4. These statistics and those in subsequent paragraphs are compiled from the relevant tables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75), and from Ralph Andreano (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1962), Appendix.
5. See especially Thomas C. Cochran, "Did the Civil War Retard Industrializatio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8 (September 1961), 197—210; David T. Gilchrist and W. David Lewis (eds.), *Economic Change in the Civil War Era* (Greenville, Del., 1965);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nd Ser., III (1966), 176—99.
6. Cochran, "Did the Civil War Retard Industrialization?" p. 205.
7.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p. 184.
8. Lee Soltow, *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New Haven, Conn., 1975), p. 65; Stanley Engerman, "Some Economic Factors in Southern Backward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ohn F. Kain and John R. Meyer (eds.), *Essays in Reg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1971), pp. 291, 300.
9. Rachel Sherman Thorndike (ed.), *The Sherman Letters* (New York, 1894), p. 258.
10. Kart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ichard Enmale (New York, 1937), p. 281.
11. Darid Montgomery, *Beyond Equality Labor and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1862—1872* (New York, 1967), pp. 90—91.

12. John B. Jones, *A Rebel War Clerk's Diary*, 2 vols. (New York, 1935), II, 78

13. E. Merton Coulter,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Baton Rouge, 1950), pp. 225, 231—32, 227.

14. Stephen E. Ambrose, "Yeoman Discontent in the Confederacy," *Civil War History*, 8 (September 1962), 262; Frank L. Owsley, *State Rights in the Confederacy* (Chicago, 1925), p. 229.

15. *O.R.*, Ser. 1, Vol. 17, pt. 2, p. 141.

16. *Ibid.*, Vol. 52, pt. 1, p. 331, Vol. 24, pt. 3, p. 538.

17. *Ibid.*, Vol. 17, pt. 2, pp. 424, 530, 544, Vol. 24, pt. 1, p. 9.

18. Jessie A. Marshall (ed.), *Private and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f General Benjamin F. Butl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ivil War*, 5 vols. (Norwood, Mass., 1917), I, 490; Frank Moore (ed.), *The Rebellion Record: A Diary of American Events, With Documents, Narratives, Illustrative Incidents, Poetry, etc.*, 12 vols. (New York, 1862—1868), VI, 291—93.

19. Gerald M. Capers, *Occupied City: New Orleans Under the Federals, 1862—1865* (Lexington, Ky., 1965), pp. 83—84.

20. Banks quoted in Bruce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ocket Books ed. (New York, 1967), p. 68; Coulter, *Confederate States*, p. 287.

21.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III, 163—64.

22. *O.R.*, Ser. 4, Vol. 2, pp. 151, 173—75, 334—35, Vol. 3, pp. 646—48.

23. 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7 vols. (New York, 1892—1906), V, 420.

24. *O.R.*, Ser. 3, Vol. 2, p. 236.

25. Robert E. Lee, Jr., *Recollections and Letters of General Robert E. Lee* (New York, 1904), p. 46.

26. Peter J. Parish,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1975), p. 147.

27. William Q. Maxwell, *Lincoln's Fifth Wheel: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 (New York, 1956), p. 245. The comparative statistics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

*ibid.*, p. 5; George W. Adams, *Doctors in Blue: The Medical History of the Union Army in the Civil War*, Collier Books ed. (New York, 1961), p. 169; and E. B. Long, *The Civil War Day by Day: An Almanac; 1861—1865* (Garden City, N. Y., 1971), p. 711.

28.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Organized War, 1863—1864* (New York, 1971), p. 312.

29. Adams, *Doctors in Blue*, p. 68.

30. H. H. Cunningham, *Doctors in Gray: The Confederate Medical Service* (Baton Rouge, 1958).

31. Mary Elizabeth Massey, *Bonnet Brigades* (New York, 1966), p. 62.

32. *Ibid.*, p. 47.

33. Bruce Catton, *Grant Moves South*, (Boston, 1960), pp. 53—54.

## 第二十二章

1.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II, 53—56.

2. *Ibid.*, p. 380.

3.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 1st sess. (1864), 2995.

4. Charles L. Wagandt, *The Mighty Revolution: Negro Emancipation in Maryland, 1862—1864* (Baltimore, 1964), p. 264.

5. *O. R.*, Ser 1, Vol. 15, pp. 666—67, Vol. 34, pt. 2, pp. 227—31, Ser 3, Vol. 4, pp. 166—70.

6. *Liberator*. February 5, 1864; *Boston Commonwealth*, January 15, 1864, James Mckysye, *The Mastership and Its Fruits: The Emancipated Slave Face to Face With His Old Master* (New York, 1864), p. 37.

7. *Boston Commonwealth*, March 4, 1864.

8. George W. Julian, *Political Recollections* (Chicago, 1884), pp. 245—46; *U. S. Statutes at Large*, XIII, 507—9.

9. James M. McPhers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Princeton, 1964), pp. 257—59.

10. *Liberator*, January 8, 1864.

11.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January 7, 1865; *Friends' Review*, December 28, 1872.

12. Rupert S. Holland (ed.), *Letters and Diary of Laura M. Towne* (Cambridge, Mass., 1912), p. 8;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03), p.100.

13. James M. McPherson, *The Abolitionist Legacy: From Reconstruction to the NAACP* (Princeton, 1975), pp.161—63.

14. *Ibid.*, pp.212,188.

15.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 365, VII,51.

16. McPherson, *Struggle for Equality*, pp.370, 249; *Liberator*, August 8,1862.

17. For a perceptive brief treatment of Stevens, see Eric Foner, "Thaddeus Stevens, Confis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trick (eds.), *The Hofstadter Aegis: A Memorial* (New York, 1974), pp.154—83.

18. H.B. Sargent to John Andrew, January 14,1862, Andrew Pap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Jhon C. Collins quoted in Peyton McCrary, *Abraham Lincol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Louisiana Experiment* (Princeton, 1978), p.228.

19. Banks to Lincoln, December 20, 1863, quoted in McCrary, *Lincoln and Reconstruction*, p. 224.

20. Phillips to Benjamin Butler, December 13,1863. Butler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Phillips to George W. Julian, March 27,1864, Giddings-Juli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Liberator*, May 20, 1864.

21. *Liberator*, February 5,1864.

22. Hans L. Trefousse,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New York, 1969), p.285.

23. McCrary, *Lincoln and Reconstruction*, p.199.

24.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243.

25. Herman Belz, *Reconstructing the Union: Theory and Policy During the Civil War* (Ithaca, 1969), p.173.

26.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 433—34.

27. *New York Tribune*, August 5,1864.

28. *Ibid.*, June 1,1864.

## 第二十三章

1. Edward Younger (ed.), *Inside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 The Diary of Robert Garlick Hill Kean* (New York, 1957), p. 119.
2. Bruce Catton, *A Stillness at Appomattox* (Garden City, N. Y., 1957), p. 36.
  3. *Ibid.*, pp. 25—29;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New York, 1952), pp. 343—44.
  4. *O. R.*, Ser. 1, Vol. 42, pt. 2, p. 783.
  5. *Ibid.*, Vol. 46, pt. 1, p. 11.
  6. *Ibid.*, Vol. 33, pp. 827—28.
  7. Tyler Dennett (ed.),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New York, 1939), p. 179.
  8. *O. R.*, Ser. 1, Vol. 32, pt. 3, p. 246.
  9. *Ibid.*, Vol. 46, pt. 1, p. 20.
  10. Herace Porter, *Campaigning With Grant* (New York, 1897), pp. 69—70.
  11. Catton, *Stillness at Appomattox*, p. 91;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Red River to Appomattox* (New York, 1974), pp. 189—91.
  12. Catton, *Stillness at Appomattox*, p. 127.
  13. George R. Agassiz (ed.), *Meade's Headquarters, 1863—1865, Letters of Colonel Theodore Lyman* (Boston, 1922), p. 106.
  14. *O. R.*, Ser. 1, Vol. 36, pt. 2, p. 627; Noah Brooks, *Washington in Lincoln's Time* (New York, 1895), p. 148.
  15. Foote, *Red River to Appomattox*, pp. 290, 294.
  16. *O. R.*, Ser. 1, Vol. 40, pt. 2, pp. 167, 179, 205.
  17. Catton, *Stillness at Appomattox*, pp. 168, 170, 198.
  18. *Ibid.*, p. 220.
  19. Dudley T. Cornish, *The Sable Arm: Negro Troops in the Union Army* (New York, 1956), p. 273.
  20. *Ibid.*, p. 274.
  21. *O. R.*, Ser. I, Vol. 40, pt. 1, p. 17; William Mahone, "The Crater," in James H. Stine, *History of the Army of the Potomac* (Philadelphia, 1892), pp. 675—76.
  22. Bruce Catton, *Grant Takes Command* (Boston, 1969), p. 344.
  23. Lloyd Lewis, *Sherman: Fighting Prophet* (New York, 1932), p. 357.
  24. *O. R.*, Ser. 1., Vol. 39, pt. 2, p. 121.

25. *Ibid.*, Vol. 38, pt. 4, p. 507.
26. Bruce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ocket Books ed., (New York, 1967), p. 315.
27. *O.R.*, Ser. 1, Vol. 38, pt. 5, pp. 882—83, 885.
28. William T. Sherma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in *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 4 vols. (New York, 1887), IV, 253; William T. Sherman, *Memoirs*, 2nd ed. rev., 2 vols. (New York, 1886), II, 72.
29. Basil H. Liddell Hart, *Sherman: Soldier, Realist, American* (New York, 1929), esp. chaps. 16—18.
30. *New York World*, July 12, 1864; Frank L. Klement, *The Copperheads in the Middle West* (Chicago, 1960), p. 233.

## 第二十四章

1. Greeley to Lincoln, July 7, August 8, 1864, Lincol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2.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J., 1953—1955), VII, 435.
3. Edward C. Kirkland, *The Peacemakers of 1864* (New York, 1927), pp. 85—96; Hudson Strode, *Jefferson Davis*, 3 vols. (New York, 1955—1964), III, 74—81.
4. *Columbus Crisis*, August 3, 1864, quoted in 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Chicago, 1967), p. 146; Francis Brown, *Raymond of the Times* (New York, 1951), pp. 259—60.
5.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 517—18, 501.
6. *Ibid.*, pp. 518, 500, 507.
7. *Ibid.*, p. 514.
8.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 2nd ed. (Washington, D.C., 1865), pp. 419—20.
9. Charles R. Wilson, "McClellan's Changing Views on the Peace Plank of 186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8 (April 1933), 498—505. The three drafts of McClellan's letter show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ce to Union as the first priority are in the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10. William F. Zornow, *Lincoln and the Party Divided* (Nor-

man, Okla., 1954), p. 139.

11. Allan Nevins and Milton H. Thomas (eds.), *The Diary of George Templeton Strong*, 4 vols. (New York, 1952), III, 480—8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 533.

12. Wood Gray, *The Hidden Civil War: The Story of the Copperheads* (New York, 1942), p. 189; Lloyd Lewis, *Sherman: Fighting Prophet* (New York, 1932), p. 409.

13. Bruce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ocket Books ed. (New York, 1967), p. 369.

14. *O. R.*, Ser. 1, Vol. 43, pt. 1, pp. 30—31.

15. Quoted in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 374, from a letter of a Union army surgeon written on the day of the battle.

16. Clifford Dowdey (ed.), *The Wartime Papers of R. E. Lee* (Boston, 1961), p. 868.

17. Grant to Elihu Washburne, August 16, 1864, quoted in Bruce Catton, *Grant Takes Command* (Boston, 1969), p. 355; Grant to Stanton, September 13, 1864, in *O. R.*, Ser. 3, Vol. 4, p. 713.

18. E. Merton Coulter,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Baton Rouge, 1950), p. 544; Clement C. Clay to Judah Benjamin, September 12, 1864, in *O. R.*, Ser. 4, Vol. 3, pp. 637—38.

19. Frank L. Klement, *The Copperheads in the Middle West* (Chicago, 1960), p. 205; Frank L. Klement, *The Limits of Dissent: Clement L. Vallandigham and the Civil War* (Lexington, Ky., 1970), p. 294. See also Richard O. Curry, "The Union as It Was: A Critique of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pperheads," *Civil War History*, 13 (March 1967), 25—39.

20. For a sober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about these activities, see Stephen Z. Starr, "Was There a Northwest Conspiracy?" *The Filson Club Historical Quarterly*, 38 (October 1964), 323—41. Two full-scale studies that tend to exaggerate the dimensions of treasonable Copperhead activities are Gray, *Hidden Civil War*, and George Fort Milt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ifth Column* (New York, 1942). Of the two, Gray is the more reliable.

21. *O. R.*, Ser. 1, Vol. 43, pt. 2, pp. 930—36.

22. *Freeman's Journal*, August 20, 1864.

23. For a summary of the race issue in the 1864 campaign, see

Forrest G. Wood, *Black Scare: The Racist Response to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1968), pp. 53—79.

24. McPherson,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p. 420.

25. Eliza Frances Andrews, *The War-Time Journal of a Georgia Girl, 1864—1865* (New York, 1908), pp. 78—79.

26. *O.R.*, Ser. 2, Vol. 5, pp. 797, 808, 940—41, 128, 696.

27. *Ibid.*, Vol. 6, pp. 441—42, 647—49, 226.

28. *Ibid.*, Vol. 7, pp. 578—79, 606, 688, Vol. 8, p. 150; Benjamin F. Butler, *Autobiography* (Boston 1892), p. 605.

29. *O.R.*, Ser. 2, Vol. 7, pp. 607, 615.

30. *Ibid.*, pp. 906—7, 909, 914.

31. Gideon Welles, *The Diary of Gideon Welles*, ed. Howard K. Beale, 3 vols. (New York, 1960), II, 168—72; *O.R.*, Ser. 2, Vol. 7, p. 1007, Vol. 8, pp. 98, 123, 504.

32.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101.

33. Bruce Catton, *A Stillness at Appomattox* (Garden City, N. Y., 1957), p. 323; John Berry to Samuel L. M. Barlow, August 27, 1864, Barlow Papers.

34.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soldier vote is Oscar O. Winther, "The Soldier Vote in the Election of 1864," *New York History*, 25 (1944), 440—58.

35. Catton, *Grant Takes Command*, p. 384; Paul M. Angle and Earl Schenck Miers (eds.), *Tragic Years, 1860—1865* (New York, 1960), p. 920.

36. Samuel L. M. Barlow to Fitz-John Porter, November 17, 1864, Barlow Papers; Allan Nevins, *The War for the Union: The Organized War to Victory, 1864—1865* (New York, 1971), p. 141.

37.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evis, Constitutionalist*.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VI, 386.

## 第二十五章

1. William T. Sherman, *Memoirs*, 2nd ed. rev., 2 vols., (New York, 1886), II, 111.

2. *Ibid.*, pp. 119—21, 125—27.

3. *O.R.*, Ser. 1, Vol. 39, pt. 3, p. 660; John Bennett Walters, "General William T. Sherman and Total War,"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4 (August 1948), 463, 470.

4. *O.R.*, Ser. 1, Vol. 39, pt. 3, pp. 162, 202, 595.
5. Lloyd Lewis, *Sherman: Fighting Prophet* (New York, 1932), p. 457; B. H. Liddell Hart, *Sherman* (New York, 1929), p. 330.
6. Sherman, *Memoirs*, II, 179.
7. Bruce Catton, *Never Call Retreat*, Pocket Books ed. (New York, 1967), p. 395.
8. Sherman, *Memoirs*, II, 189.
9. Lewis, *Sherman*, 440.
10. *O.R.*, Ser. 1, vol. 44, p. 13; Lewis, *Sherman*, 451—52.
11. E. Merton Coulter,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Baton Rouge, 1950), pp. 549—50.
12. *O.R.*, Ser. 1, Vol. 44, p. 783.
13. *Congressional Globe*, 38th Cong., 2nd sess., (1865) 525—26.
14. *Ibid.* p. 531.
15. Bessie Martin, *Desertion of Alabama Troops From the Confederate Army* (New York, 1932), p. 148.
16.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Johnny Reb* (Indianapolis, 1943), p. 134; Ella Lonn, *Desertion During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28), p. 28.
17. Alexander Stephens, *A Const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 2 vols. (Philadelphia, 1868—1870), II, 619.
18. Roy P. Basler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1953—1955), VIII, 275—76.
19. Dunbar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Constitutionalist*, 10 vols. (Jackson, Miss., 1923), VI, 466. The fullest account of the Hampton Roads conference is in Stephens, *Constitutional View*, II, 599—624.
20.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333.
21. Lewis, *Sherman*, pp. 484, 490.
22. Rowland (ed.), *Jefferson Davis*, VI, 489.
23. *O.R.*, Ser. 1, Vol. 44, p. 741.
24. Lewis, *Sherman*, p. 446; *O.R.*, Ser. 1, Vol. 44, p. 799.
25. Lewis, *Sherman*, pp. 493, 489; James G. Randall and David Donald,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2nd ed. (Lexington, Mass., 1969), p. 432.

26. The fullest and fairest discussion of this event is Marion Brunson Lucas, *Sherman and the Burning of Columbia* (College Station, Tex., 1976).

27. James L. Sellers, "The Economic Incidence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South,"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4(1927), 179—91; Stanley Engerman, "Some Economic Factors in Southern Backward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ohn F. Kain and John R. Meyer (eds.), *Essays in Reg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1971), pp. 300—302; *U.S. Census*, 1870, Vol. III, pp. 8—11.

28.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152.

29. These complex events are chronicled in Herman Belz, *Reconstructing the Union: Theory and Policy During the Civil War* (Ithaca, 1969), chap 9.

30. *Boston Commonwealth*, March 4, 1865.

31.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399—405.

32. Edward Younger (ed.), *Inside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The Diary of Robert Garlick Hill Kean* (New York, 1957), p. 182.

33. Robert F. Durden, *The Gray and the Black: The Confederate Debate on Emancipation* (Baton Rouge, 1972), p. 114; *O.R.*, Ser. 4, Vol. 3, p. 1010; Shelby Foote, *The Civil War: A Narrative. From Meridian to Appomattox* (New York, 1974), pp. 766, 860.

34. *O.R.*, Ser. 4, Vol. 3, p. 1012; James D. McCabe, Jr., *Life and Campaigns of General Robert E. Lee* (Atlanta, 1866), p. 574; Emory Thomas, *The Confederacy as a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1971), p. 130.

35. Bell I. Wiley, *The Life of Billy Yank* (Indianapolis, 1952), pp. 321—23; Lewis, *Sherman*, p. 362.

36. Wiley, *Billy Yank*, p. 322.

37. These data were compiled from Thomas L. Livermore, *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Boston, 1901), and William F. Fox, *Regimental Losses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lbany, 1889).

38. *Philadelphia Press*, April 11, 12, 1865.

39. Douglas Southall Freeman, *R. E. Lee: A Biography*, 4 vols. (New York, 1934—1935), IV, 120—23.

40. Ulysses S. Grant, *Personal Memoirs*, 2 vols. (New York, 1885), II, 489.

41. *War Diary and Letters of Stephen Minot Weld, 1861—1865* (Boston, 1979), p. 396; Bruce Catton, *Grant Takes Command* (Boston, 1969), p. 469.
42.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VIII, 333.
43. Rowland, *Jefferson Davis*, VI, 530.
44. Leander Stillwell, *The Story of a Common Soldier, or Army Life in the Civil War* (Erie, Kansas, 1917), p. 154.
45.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Speeches* (Boston, 1913), p. 11.
46. Leon F.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The Aftermath of Slavery* (New York, 1979), p. 171; William Mckee Evans, *Bal- lots and Fence Rails: Reconstruction on the Lower Cape Fear* (New York 1967), p. 87.
47. 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4), p. 110;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pp. 96, 102.

## 第二十六章

1. James L. Roark, *Masters Without Slaves: Southern Planters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77), p. 86; John T. Trowbridge, *A Picture of the Desolated States and the Work of Restoration, 1865—1868* (Hartford, 1868), p. 577.
2. Eric L.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Chicago, 1960), p. 40.
3. James P. Shenton (ed.), *The Reconstruc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3), p. 18; Robert M. Myers (ed.), *The Children of Pride: A True Story of Georgia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2), p. 1273.
4. Trowbridge, *A Picture of the Desolated States*, p. 291; Leon F.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The Aftermath of Slavery* (New York, 1979), p. 108.
5. Whitelaw Reid, *After the War: A Tour of the Southern States 1865—1866* (Cincinnati, 1866), p. 296; Sidney 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Boston, 1866), p. 95.
6.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 20; John Hope Frankli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1), p. 27.

7.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87.
8. Kenneth M. Stamp,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65), pp. 52—53.
9. Michael Les Benedict (ed.), *The Fruits of Victory: Alternatives in Restoring the Union, 1865—1877* (Philadelphia, 1975), pp. 93—94.
10. Clifton Hall, *Andrew Johnson. Military Governor of Tennessee* (Princeton, 1916), p.221; LaWanda Cox and John H. Cox, *Politics, Principle, e Prejudice: Dilemma of Reconstruction America* (New York, 1963), p.163.
11. Howard K. Beale, *The Critical Year: A Study of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30), pp.63—64.
12.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78 and n.
13.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1875), p.19.
14.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 167.
15. *Boston Commonwealth*, October 7, 1865.
16. Michael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The South and Reconstruction 1865—1868* (Cambridge, 1973), p.82; 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p.391.
17. Michael Les Benedict, *A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Reconstruction, 1863—1869* (New York, 1974), p.120.
18.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211.
19.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p.100; *Boston Commonwealth*, September 30, 1865.
20.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pp. 170—71;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73.
21.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p.173,183.
22. *Ibid.*, p.173.
23.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p.296.
24. Reid, *After the War*, p.564;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Journal*, entry of November 21, 1863, Higginson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5. *Congressional Globe*, 39th Cong., 1st sess., (1866)1309.

26. George R. Bentley, *A History of the Freedmen's Bureau* (Philadelphia, 1955), p.93.

27. James M. McPhers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Abolitionists and 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Princeton, 1964), pp.411—12.

28. Samuel Thomas to Oliver O. Howard, September 21, 1865, Freedmen's Bureau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105, Box 3. Vol. 1; Andrews, *The South Since the War*, p.398.

29. Samuel Thomas to Oliver O. Howard, September 21, 1865, *loc. cit.*

30. Bentley, *A History of the Freedmen's Bureau*, pp. 104, 159; Walter Lynwood Fleming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2 vols. (Cleveland, 1906), I, 368; Roark, *Masters Without Slaves*, p.154.

31. Bentley, *A History of the Freedmen's Bureau*, p.151.

32. *Ibid.*, p.159.

33. *Chicago Tribune*, December 1, 1865.

## 第二十七章

1. *Congressional Globe*, 39th Cong., 1st sess., (1865) Appendix, 2—3.

2.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1875), pp.68—72.

3. Eric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Chicago, 1960), p.292.

4. McPherson, *Political History*, pp.58—63.

5.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297n.

6. Michael Les Benedict (ed). *The Fruits of Victory: Aiteniatives in Restoring the Union, 1865—1877* (Philadelphia, 1975), p.22.

7. McPherson, *Politiel Histon*, pp.74—78.

8. LaWanda Cox and John H. Cox, *Politics, Principle, and Prejudice: Dilemma of Reconstruction America* (New York, 1963), pp.212, 202; Michael Les Benedict, *A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74), p.164.

9. Cox and Cox, *Politics, Principle, and Prejudice*, p.206; Benedict,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p.165.
10. James M. McPhers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Princeton, 1964), pp.352,354,365; Kenneth M. Stampp,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65),p.142.
11.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p.318—19.
12. *New York Tribune*, May 22,1866.
13. Edward McPherson, *Political History*, p.135;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432.
14.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p.451n.; Michael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The South and Reconstruction 1865—1868* (Cambridge, 1973),pp.238,239.
15. Cox and Cox, *Politics, Principle, and Prejudice*, p.230.
16. Benedict, *Fruits of Victory*, p.31.
17. David Donald,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1863—1867*(Baton Rouge, 1965),pp.62—63.
18. Benedict, *Fruits of Victory*, pp.111—12.
19. Stampp, *Era of Reconstruction*. p.170.

## 第二十八章

1. *New York Tribune*, October 27,1866.
2. Michael Les Benedict, *The Impcachment and Trial of Andrew Johnson* (New York, 1973),p.25.
3. *Ibid.*, p.56.
4. Edward McPhers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1875),p.307.
5. Benedict, *Impeachment*, pp.58—59.
6. Parker Pillsbury to Gerrit Smith, November 27, 1867, Gerrit Smith Papers,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
7. Georges Clemenceau, *American Reconstruction 1865—1870*, trans.Margaret MacVeagh (New York, 1928),p.131.
8. Michael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The South and Reconstruction 1865—1868* (Cambridge, 1973), pp. 320—21; C. Vann Woodward, "Seeds of Failure in Radical Race Policy," in Harold Hyman (ed.), *New Frontiers of the American Reconstruction*

(Urbana, Ill., 1966), p.137; Ira Brown, "Pennsylvania and the Rights of the Negro, 1865—1887," *Pennsylvania History*, 28 (January 1961), 51.

9. *Independent*, November 14, 21, 1867; *New York Tribune*, December 9, 1867.

10.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p.317.

11. Hans L. Trefousse, *Impeachment of a President: Andrew Johnson, the Blacks, and Reconstruction* (Knoxville, 1975), p.119; Eric McKittrick,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Chicago, 1960), p.500n; Michael Les Benedict. *A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Reconstruction, 1863—1869* (New York, 1974), p.290.

12. Benedict,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p.299.

13. *The Trial of Andrew Johnson ... for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3 vols. (Washington, D.C., 1868), I, 88.

14. *House Reports*, No. 7, 40th Cong, 1st sess. (1867)2 William R. Brock, *An American Crisis. Congress and Reconstruction 1865—1867* (London, 1963), p.260.

15. Benedict, *Impeachment*, p. 179.

16. Brock, *American Crisis*, p.262.

17. Perman, *Reunion Without Compromise*, p.317.

18. Kenneth M. Stampp,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7—1877* (New York, 1965), p.170; Joe Gray Taylor, *Louisiana Reconstructed, 1863—1877* (Baton Rouge, 1974), p.148; John Hope Frankli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1), p.105.

19. Benedict,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p.317.

20. *Ibid.*, p.319.

## 第二十九章

1. *Independent*, May 4, 1868.

2. *Springfield Republican*, quoted in *The Revolution*, April 23, 1868.

3. Charles Sumner to Frank Bird, May 28, 1868, Bird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Independent*, May 28, 1868.

4. John Hope Franklin, "Election of 1868,"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4 vols. (New York, 1971),II,1269; *Independent*, July 16,1868.

5. Edward McPherson,*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1875), pp.381,382; Charles H. Coleman, *The Election of 1868* (New York, 1933),p.155; Franklin, "The Election of 1868," p.1259; *La Crosse Democrat*, quoted in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March 7, 1868.

6. Franklin, "The Election of 1868," p.1262.

7. Allen W. Trelease, *White Terror: The Ku Klux Klan Conspiracy and Southern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71),pp. xlv, 46.

8. *Zion's Herald*, December 10,1868.

9.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November 14,1868.

10. Michael Les Benedict, *A Compromise of Principle: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Reconstruction, 1863—1869* (New York, 1974),p.332.

11. *Northwestern Christian Advocate*, February 9,1870; *New York Tribune*, April 18,1870.

12. Allan Nevins, *Hamilton Fish: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Grant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1936),p.271.

13. Edward L. Pierce, *Memoir and Letters of Charles Sumner*, 4 vols. (Boston, 1877—1893),IV,448.

14. Howard N. Meyer, *Let Us Have Peace: The Story of Ulysses S. Grant* (New York, 1966),p.202.

15. William B. Hesseltine, *Ulysses S. Grant, Politician* (New York, 1935),p.218.

16. *Speeches,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6 vols. (New York, 1913),II,359.

### 第三十章

1. John Hope Frankli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1),p.87.

2. James S. Pike, *The Prostrate State: South Carolina Under Negro Government* (New York, 1874),pp.15,12.

3. Franklin, *Reconstruction*, pp.93,98,101. E. Merton Coulter, *The South During Reconstruction* (Baton Rouge, 1947),pp.124—26.

4. Carl N. Degler, *The Other South; Southern Dissen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74), pp. 218, 226.

5. *Ibid.*, pp. 217—18.

6. *Ibid.*, pp. 208—9.

7. *Ibid.*, p. 254.

8. Otto H. Olsen, "Reconsidering the Scalawags," *Civil War History*, 12 (December 1966), 314; Degler, *Other South*, p. 233.

9. Thomas Holt, *Black Over White: Negro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South Carolina During Reconstruction* (Urbana, Ill., 1977), pp. 106—7.

10. Degler, *Other South*, p. 258.

11. Holt, *Black Over White*, p. 104.

12. Degler, *Other South*, pp. 256, 257.

13. Holt, *Black Over White*, pp. 59—60.

14. *Ibid.*, p. 123.

15.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3rd ed., 2 vols. (New York, 1895), I, 476—77; Coulter, *South During Reconstruction*, p. 148.

16. Richard N. Current, *Three Carpetbag Governors* (Baton Rouge, 1967), p. 60; Roger W. Shugg, *Origins of Class Struggle in Louisiana* (Baton Rouge, 1939), p. 227.

17. Coulter, *South During Reconstruction*, 153.

18. *Harper's Weekly*, November 11, 1871.

19. Allen W. Trelease, *White Terror: The Ku Klux Klan Conspiracy and Southern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71), pp. 296, 354, and *passim*.

20. *Ibid.*, p. 259.

21. *Ibid.*, pp. 369, 327.

22. *Ibid.*, pp. 268—69.

23. William Gillette, "Election of 1872,"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4 vols. (New York, 1971), II, 1335—36.

24. Lawrence Grossma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Negro: Northern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68—1892* (Urbana, Ill., 1976), p. 26.

25. Gillette, "Election of 1872," p. 1336.

26. *Ibid.*, pp. 1358—59.

27. James M. McPherson, "Grant or Greeley? The Abolitionist Dilemma in the Election of 187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October 1965), 49, 51.

### 第三十一章

1. Leon F. 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The Aftermath of Slavery* (New York, 1979), pp. 472—73.
2. *American Freedman*, I (April 1866), 2—6.
3. *Independent*, June 4, 1874.
4. Robert Higgs, *Competition and Coercion: Black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Cambridge, 1977), p. 49.
5. Table adapted from data in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 (1979), 225.
6. Samuel M. Browne to Samuel L. M. Barlow, January 26, April 9, 1868, S. L. M. Barlow Papers,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7. Ransom an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p. 161.
8.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 1865—1878* (New York, 1927), p. 189.

### 第三十二章

1. William Gillette, *Retreat From Reconstruction 1869—1879* (Baton Rouge, 1979), p. 107.
2. William B. Hesseltine, *Ulysses S. Grant: Politician* (New York, 1935), p. 348.
3. James M. McPherson, *The Abolitionist Legacy: From Reconstruction to the NAACP* (Princeton, 1975), pp. 46, 40—41.
4. *Congressional Record*, 43rd Cong., 2nd sess, (1875) 367.
5. Vincent P. De Santis, *Republicans Face the Southern Question: The New Departure Years, 1877—1897* (Baltimore, 1959), pp. 39—40.
6. *Washington National Republican*, January 24, 1874; Hesseltine, *Grant*, p. 358.
7. Vernon Lane Wharton, *The Negro in Mississippi, 1865—*

1890 (Chapel Hill, N.C., 1947), p.183.

8. *Ibid.*, pp.187,190.

9. Richard N. Current, *Three Carpetbag Governors* (Baton Rouge, 1967), p.88.

10. Wharton, *Negro in Mississippi*, p.195.

11. Everette Swinney, "Enforcing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7(1962),208.

12. 25 *Fed. Cas.* 707, p. 210;92 *U.S. Reports*, 542.

13. Arthur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789—1968*, 4 vols. (New York, 1971), II,1437—40.

14. *Ibid.*, p.1441.

15. De Santis, *Republicans Face the Southern Question*, p. 54; Schlesinger,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I,1449—50.

16. Hesselstine, *Grant*, p.409.

17. Keith I. Polakoff, *The Politics of Inertia: The Election of 1876 and the End of Reconstruction* (Baton Rouge, 1973), pp. 115, 145—46.

18. C. Vann Woodward, *Reunion and Reaction: The Compromise of 1877 and the End of Reconstruction*, rev. ed. (New York,1956), p.23; Harry Barnard, *Rutherford B. Hayes and His America* (Indianapolis, 1954), p.343.

19. Hans L. Trefousse, *The Radical Republicans: Lincoln's Vanguard for Racial Justice* (New York, 1969), P.469; McPherson, *Abolitionist Legacy*, 89—90.

20. De Santis, *Republicans Face the Southern Question*, p.113.

21. McPherson, *Abolitionist Legacy*, p.93.

22. *Ibid.*, p.95; Michael Les Benedict, *The Fruits of Victory: Alternatives in Restoring the Union, 1865—1877* (Philadelphia,1975), p.74.

### 第三十三章

1. Stanley P. Hirshson, *Farewell to the Bloody Shirt: Northern Republicans and the Southern Negro, 1877—93* (Bloomington, Ind., 1962), p. 49.

2. *Ibid.*

3. *Independent*, December 12, 1878.
4. Mary R. Dearing, *Veterans in Politics: The Story of the G. A. R.* (Baton Rouge, 1952), pp. 257—58, 262—63.
5. Carl N. Degler, *The Other South: Southern Dissen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74), p. 271.
6. *Boston Commonwealth*, June 11, 1881; James Tice Moore, *Two Paths to the New South: The Virginia Debt Controversy, 1870—1883* (Lexington, Ky., 1974), pp. 85—86; Degler, *Other South*, p. 287.
7. Paul M. Gasion, *The New South Creed: A Study in Southern Mythmaking* (New York, 1970), p. 25.
8. *Ibid.*, pp. 42, 108; Joel Chandler Harris (ed.), *Life of Henry W. Grady. Including 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 (New York, 1890), p. 88.
9. C. Vann Woodward,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Baton Rouge, 1951), p. 128.
10. James M. McPherson, *The Abolitionist Legacy: From Reconstruction to the NAACP* (Princeton, 1975), pp. 108—9.
11. *Ibid.*
12. *Ibid.*, p. 130.
13. *Independent*, June 11, 1891.
14. *Harper's Weekly*, December 25, 1886.
15. J. Morgan Kousser, *The Shaping of Southern Politics: Suffrage Restri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Party South, 1880—1910* (New Haven, Conn., 1974), p. 47.
16. Woodward,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p. 214.
17. McPherson, *Abolitionist Legacy*, p. 115; Woodward,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p. 424.
18. McPherson, *Abolitionist Legacy*, p. 134.